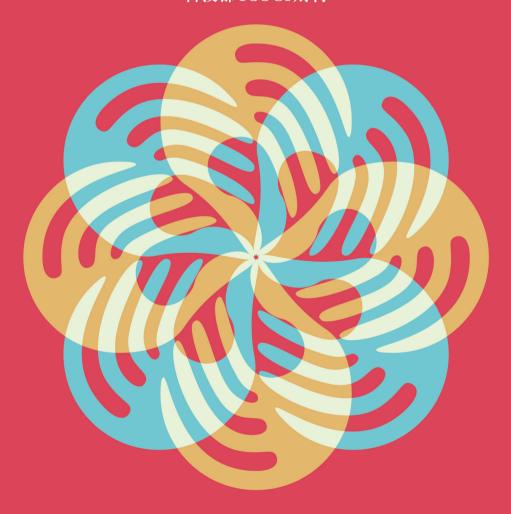
傳播 播 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科技部TSSCI期刊



Volume 12, Number 2, July 2022

主 編

夏春祥/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副主編

蔡 珮/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

編輯委員 (依姓氏筆劃)

王孝勇/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特聘教授 林照真/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林鴻亦/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胡幼偉/文化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施琮仁/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陳炳宏/國立臺灣師節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編輯顧問 (依姓氏筆劃)

周成蔭/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館長

美國杜克大學亞洲中東研究學系實踐副教授與故事實驗室負責人

林富美/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邱皓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系教授

胡智鋒/中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唐海江/中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

翁秀琪/《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世新大學新聞學系退休教授

高 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張惠晶/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榮譽學院教授

張錦華/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張讚國/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大眾暨新聞傳播學院名譽教授

郭良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

郭振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

陳國明/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陳憶寧/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程曼麗/中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黄清龍/臺北市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中國時報》前發行人兼總編輯

黃鈴媚/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黃懿慧/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媒體系講座教授

劉新儀/美國德州聖道大學傳播藝術系教授

鍾振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英文編輯

張明傑/傑作翻譯工作室

執行編輯

徐暄淯/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江信昱/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編輯助理

林昱萱/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碩士生

Editor

Hsia, Chun-Hsiang /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Address: No. 1, Ln. 17,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Tel: +886-2-22368225 ext. 83170

Fax: +886-2-22360278

Email: chhsia@mail.shu.edu.tw

Associate Editor

Tsai, Pei / Departmen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li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Editorial Board

Wang, Hsiao-Yung /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Lin, Chao-Chen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Lin, Hong-Yi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Hu, Yu-Wei /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wan

Shih, Tsung-Je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hen, Ping-Hu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Advisory Board

Chow, Cheng-Yin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Duke University, USA

Lin, Fu-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Chiou, Haw-Je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Hu, Zhi-Feng / Beijing Film Academy, China

Tang, Hai-Jiang /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Weng, Shieu-Chi / Mirror TV Brocasting Ltd., Taiwan

Gao, Gang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Chang, Hui-Ching /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Chang, Chin-Hwa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Chang, Tsan-Kuo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Kuo, Liang-Wen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Kuo, Chen-Yu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Chen, Guo-Ming /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Chen, Yi-Ning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heng, Man-Li /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Huang, Ching-Lung / Taipei Trust in Democracy Association, Taiwan

Huang, Lin-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Huang, Christine Yi-Hui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Liu, Hsin-I /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Texas, USA

Chung, Jensen /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USA

English Editor

Chang, Ming-Jay / Jay'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xecutive Editor

Hsu, Hsuan-Yu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Chiang, Hsin-Yu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Editorial Assistant

Lin, Yu-Hsuan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編者的話

2022 夏,期刊又到了出刊時節,睽違兩年、籌畫多時的專題論壇:「新 冠疫情與運動傳播」(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Sports Communication) 終於推出,感謝擔任客座主編的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陳子軒的費 心、全體編務團隊同仁暨編委們的通力合作,以及審查委員、各篇論文作者 的持續對話與用心修改,共同從一個運動賽事的獨特視角,以各自的生活經 驗與群體記憶,記錄下芸芸眾生,乃至社會文化與國家民族的一段變動輪廓。 今日回首,很多衝擊卻有點船過水無痕,難以追憶,我們則試圖為這一轉瞬 片段留下紀錄(本專題共有投稿論文9篇,撤回1篇,錄取3篇)。

2019年底便已現蹤的傳染性肺炎,首次出現在《傳播研究與實踐》十卷 二期的討論中,現在已是反覆出現在各地、各城成為全球大流行。傳說中新 冠疫情「最後一戰」的 Omicron 病毒,又不斷出現 BA.4 及 BA.5 亞型,感 染病例再度持續增加,臺灣在這波全球犴潮中焦慮更甚,且更為不安,因為 各國已經大幅減少檢測,難以精確掌握發展情況下,本地社會中新冠肺炎的 染病率與致死率又大幅增加,尤其是在2022年四月底,本土確診病例首度 破萬,而在七月初,臺灣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累計七百餘例,死亡率達 4.81%, 高於全球平均值。再加上動盪因素不斷出現在西太平洋,且與亞洲東部、南 部的一連串海島息息相關;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遭到暗殺, 7月14日,斯里蘭卡總統在抗議者進逼下出逃新加坡,總理擔任代理總統, 但民眾仍然無法接受,世界時局的秩序變化令人咋舌。

本卷期共由三部分組成,除了前述疫情論壇的三篇「專題論文」,回應 近日變化外,還有兩個討論過往的重點關鍵用以呼應對於未來的變遷期盼。 一是揭示、探究新聞史專家、新加坡傳播學者卓南生(1942-)關於二戰後 日本演變專書與主題的兩篇文章,藉以記錄與再思前輩學者昔日關注的今日 價值;第二部分則是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近日終結五十年來對墮胎權憲法保 障的現況中,繼續揭示和性別議題密切,但研究取徑與關懷重點有別的兩篇 「研究論文」。

學者卓南生以新聞史研究知名,曾於上個世紀末(1998年)在臺北正中書局出版《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一書,指出從戈公振(1890-1935)首部系統研究報業發展專著的《中國報學史》(1927,上海商務印書館)以來,當時新聞學知識中有些以訛傳訛、不加辨明之處,如報章名稱、出版時間,甚且歷史真實性(historicity)被籠統且模糊地陳述等;由今觀之,當時的研究成果可說是三代研究新聞史的集大成之作,且針對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1815-1821)等相關出版品,進行有系統地探究與意義定位的釐清,也彰顯了日本新聞史研究中從小野秀雄(1885-1977)到平井隆太郎(1921-2015)的發生史傳承。當然,當時的考證、修訂現在已在網路上輕易可以搜尋獲得,但辨明的科學精神與求是的學術態度卻很難尋覓,這也是卓南生研究的重要積累;已從政大新聞系退休的彭家發(1999)曾撰文〈一字一汗滴,十年心血盡成書〉,仔細討論了成書歷程及研究價值。

本期「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專欄,特約邀請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陽美燕、北京工商大學傳媒與設計學院副教授李傑瓊,以及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劉揚共同完成的〈新聞史論、時事評析與新聞教育:卓南生的傳播研究與實踐〉一文,則將卓南生新聞史研究的觀點主張,置於他個人成長、求職、任教以至於退休的生命歷程來加以考察,仔細記錄了卓南生在新加坡報業中新聞評論到駐日特派員的歷程轉變,也回溯了他投身中(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日(東京大學、名古屋大學和龍谷大學)、馬(新紀元大學學院)新聞教育三十餘年的跨文化體驗,繼而在結論中指出卓南生獨特的問題意識(problem awareness)指涉,及由此生命歷程醞釀出來的歷史是非觀,這與學術研究者普遍通稱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以及臺灣新聞史社群中的史觀說,可說是形成極具解釋縱深與辯證張力的反思軸線。

這種在不同觀點主張之間的對話,一直是期刊倡議的發展方向;本期另篇討論卓南生觀點的「研究論文」〈新聞事業與戰爭責任:論日本「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之新聞思想〉,係由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林鴻亦所撰寫。他以卓南生 2020 年的新作《東亞新聞事業論》為起點,論述聚焦在「新聞學(事業)的戰爭責任」上;在東亞新聞事業發展上,他整理出卓南生的兩個邏輯特徵:第一,再次確認中、日兩國近代報刊的誕生並非單純出自國內因素,而是有來自帝國主義擴張的國際因素。第二,這些在殖民地開拓港或租借地由洋人開辦的報紙,其言論立場自然體現西方國家利益,對鴉片銷

售中國等現實議題則抱持道德上的雙重標準。通篇論述中,卓南生個人「要真正反思戰爭,只有從全盤否定大東亞戰爭作為起點」的主張被安排在日本 1940 年代以來,由《思想的科學》雜誌(1946)、「思想的科學研究會」(1949),以至於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1910-1977),以及關注新聞、傳播學理論化工作與社會實踐的鶴見俊輔(1922-2015)等的思想史爭議中討論與釐清,內容相當具有啟發性,對於 2014 年便已開展的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衝突,且於今年 2 月 24 日以來的全面戰爭,尤具參照價值。

而在性別實踐的文化領域中,我們收納兩文,分別是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王孝勇特聘教授的〈從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論「對話論」另解:以變性敘事為例〉,以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平兩晨的〈一起同學當媽媽:婦幼社群閱聽人之醫用協商與共能知識〉。

前者的首要關注並非是純然的性別議題,而是學術觀念史中的概念釐清 與辨明,討論的核心在於甚麼是「對話」(dialogue),與性別有關的變性敘 事只是在闡述概念、引導討論的適當案例。作者以思想史的方式對二十世紀 初德國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俄國巴赫汀及其友人對其的評述詮釋進行討 論,進而以巴赫汀「行為意識形態」(behavior ideology)的概念,來揭橥對 話意涵中的「自我與他者互動」,實應轉向「自我與自我關係」的表述處境 或語藝困境,這種在公共與私我之間「豐富內在」的彰顯與「衝突必然」的 倡議,有其在社會實踐上的現實意義,畢竟每一個體的差異都應被理解與重 視,尤其是那些湧之於心、卻難以言說的生存感受;而在學術領域中,本文 其實是傳播研究裡較少人觸及的內向溝通(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領 域中的重要篇章,值得有心者關注閱讀。

後者則是對變遷社會中母職扮演知識的來源研究,尤其是那些出生於世紀末、成長於新世紀的年輕女性為對象,作者以《嬰兒與母親》、《寶貝家庭》等兩個婦幼官網的討論區資料進行文本分析,指出現時年輕婦女在扮演母親角色上對於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依賴已不同於以往,更重要的是過往在婦幼傳播研究中認為是單一關鍵力量的醫療專家論述,現已在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與智慧型手機等技術基礎上,被更多資深媽媽,與護理、照顧、體能、美姿等多方專家所取代,因此她提出了這種包括如何育兒、如何選擇協助等母職扮演知識具有「共同賦能」(coempowermental)的性質。結論中,她將醫療領域中普遍理解與接受的「醫

用關係」(professional-users relationship)進行闡述,並對年輕媽媽在尋求相關協助時借助各種數位聯繫「一起同學當媽媽」的現實景況加以闡述。

近三年,《傳播研究與實踐》的退稿率仍舊為七成左右(2020-2022), 高高低低;一般文章白投稿起,三個月內即被接受者有,但更多是往還反覆、 不斷調整,持續達一年者亦有。各位作者的投稿心情,我們謹記在心,幾位 對期刊的叮嚀、提醒也不斷鞭策著編務團隊,他們是倪炎元(1957-2021)、 習賢德(1951-2021)、與潘家慶(1935-2022)老師,謹此致意,表達對前 **輩們用心耕耘臺灣傳播學界的無限追思,期刊會戰戰兢兢地經營並建立有益** 於社群長期發展的制度。新日編輯委員會與編輯顧問有些變動,我們激請到 本刊前主編,現任《鏡電視》新聞台外部公評人的翁秀琪老師加入,繼續給 予期刊發展方向提供建言;同時也激請各位到我們的數位網頁註冊登錄會員, 共同參與線上傳播社群的建立。在 2021 年的「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 比暨核心期刊收錄」中,《傳播研究與實踐》繼續被收錄在最新的 TSSCI 名 單之中; 2022 年, 刊物再次獲得「111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獲獎名單」的 「期刊即時傳播獎」及「期刊長期傳播獎」的肯定,用以回應各界對期刊的 殷殷期盼。而盱衡未來,本期刊在「傳播創生與社群實踐」的專題論文徵稿 之後,繼續因應世局變遷,邀請專家學者們籌畫「媒體與戰爭」、「民主深化 與傳播媒介 | 等論壇, 歡迎各位投稿。

夏春祥

2022年07月15日

目次

專題論文/論壇:新冠疫情與運動傳播	
導言/運動傳播:後疫情的重整與新視野/陳子軒	1
新冠國族主義:疫情中臺灣職業棒球的媒體國族論述/劉昌德	5
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在新冠疫情下之變化歷程: 以中華職棒為例/許彥輝	35
串流運動:新冠疫情下臺灣運動紀錄片之發展脈絡與契機/安碧芸	67
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	
新聞史論、時事評析與新聞教育: 卓南生的傳播研究與實踐/陽美燕、李傑瓊、劉揚	107
研究論文	
新聞事業與戰爭責任: 論日本「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之新聞思想/林鴻亦	147
從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論「對話論」另解: 以變性敘事為例/王孝勇	177
一起同學當媽媽:婦幼社群閱聽人之醫用協商與共能知識/平雨晨	211

Contents

FEATURE RESEARCH ARTICLES / FORUM OF SPECIAL TOPIC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Sports Communication	
Introduction / Sports Communication:	
Post-Pandemic Reformations and New Visions / CHEN, Tzu-Hsuan	1
Coronationalism: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of Taiwa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in the Media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 LIU, Chang-De	5
The Changing Course of Media-Sport Complex in Taiwan Under the COVID-19: The Case of CPBL / HSU, Yen-Hui Alex	35
Stream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Opportunities of Taiwan Sports Documentarie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 AN, Pi-Yun	67
FIELDNOTE /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Historiography of Journalism,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ion,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Toh Lam Seng'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 YANG, Mei-Yan & LI, Jie-Qiong & LIU, Yang	107
RESEARCH ARTICLES	
Journalism and War Responsibility: On the Thoughts of Journalism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Shiso no Kagaku" in Japan / LIN, Hung-Yi	147
Reviving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Dialogue" from the Bakhtin Circle's Critique of Freudianism: The Case of Transsexual Narratives / WANG, Hsiao-Yung	177
Mothers Stronger Together: Co-Empowerment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User Negotiation in Online Mothering Forums	211

導言

運動傳播:後疫情的重整與新視野

陳子軒 *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

COVID-19 疫情自 2020 年初蔓延逾兩年至今,對於人類文明與生活的各種形式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全球運動在 2020 年春天 COVID-19 疫情初爆發之時,幾乎同步按下暫停鍵,原本彷彿時令規律前行般的運動嘎然而止,歐洲各國足球聯賽、北美職籃 NBA 與冰球 NHL 漸入尾聲的球季無以為繼,美、日、韓等國家原本該與春天同步甦醒的棒球賽季,卻怎樣都難以發出新春的嫩芽。NBA 在美國奧蘭多,NHL 在加拿大艾德蒙頓與多倫多搭建防疫泡泡,復賽後的歐洲足球在各球隊主場進行比賽,但卻也無法讓球迷進場觀戰,不論是何種形式的閉門比賽,都成了全球體壇為了減少損失而不得不採行的應變措施。曾幾何時,人形立牌、甚至電腦繪製的虛擬觀眾與加油音效,應驗了布希亞的超現實(hyper-reality)寓/預言。這一切,都只為了運動轉播權利金能如期入袋,將收入損失降到最小。

除了職業聯賽,國際運動賽事,也紛紛延期、甚至停辦。原訂於 2020、2021 年進行的歐洲男子與女子國家盃足球賽各自延後一年舉辦,儘管歐美各國與病毒共存的生活步調漸漸定調,運動賽事的舉行與觀眾進場逐漸恢復疫情前的常態,但多波變種病毒的餘波,依舊不時中斷漸趨常態的運動世界。全球性的超大型賽會,更是疫情下不可避免的最大受害者,延宕一年後的東京夏季奧運雖然原地舉行,但除了東京外圍的少數場館允許觀眾入場外,依舊是近乎閉門比賽的媒體景觀;2022 年初的北京冬季奧運,在中國堅壁清野的防疫措施以及與歐美民主諸國因人權與外交議題交惡下,成為全然的媒體景觀與大外宣的機器。

^{*} E-mail: tzuhsuanchen@gmail.com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1







就當運動場域規律的節奏被病毒攪亂的同時,全球媒體也於此時持續在新/舊、分眾/大敘事、個人/群體、全球/在地以及世代之間掙扎求生,臺灣媒體亦然,傳播內容與型態的眾聲喧嘩,正在傳統線性電視與OTT、社群媒體等新傳播形式之間傾軋交疊。這波COVID-19之亂下,運動媒體受創至深,由於整個產業鏈中最核心的運動賽事近乎停擺,沒有最重要的內容來源,運動媒體只能在沒有前跡可循的危機下自行摸索出路。2020年12月31日,FOX體育臺三個頻道同時劃下句點,儘管與疫情並非直接因果,而是跨國媒體集團Disney與FOX整併下的決策,但確實也為有線付費運動頻道在臺灣的經營投下不信任票,緯來體育臺、Eleven Sports、MomoTV、愛爾達體育臺、博斯運動網、智林體育臺等頻道,成為臺灣運動電視頻道舊秩序僅存的利害關係者。

在臺灣的我們,雖曾於 2021 年五月至七月下旬,經歷三級警戒的管制措施,但比起歐美諸國封城的規模與衝擊,仍是程度有別的不同生活經驗。在運動場域中,2020 年中華職棒的開打,開啟了處於全球運動體系邊陲的臺灣一個顛覆既有全球政經南北秩序的裂縫。原本在美日職棒的跨國強勢傳播商品下,臺灣棒球是淨輸入國的角色,但核心國家的大聯盟停賽給予中華職棒可乘之機。緊接著臺灣職棒開打的韓國職棒,更在美國透過 ESPN 的轉播,直驅美國人的家庭,添補了大聯盟遲至 8 月份才開打的棒球真空。全球棒球體系在此期間翻轉與重整,東亞反倒一夕之間成為棒球媒體商品出口國。

中華職棒率先在全球疫情初起的 2020 年 4 月開打,首度透過 Twitter 向全世界進行英語轉播,原本只是 Eleven Sports 短暫新鮮的嘗試,但隨著效果出奇的好,其他各隊乃至各級政府機關紛紛搭上這防疫成果的便車,反倒成為臺灣防疫成果「微外宣」的利器,向美國「逆輸出」,成為另類的「臺灣之光」。這也正是本專題當中,劉昌德所稱「新冠國族主義」(coronationalism)的體現。國族主義向來為臺灣運動敘事的最主要基調,關乎存亡的疫情下,依舊扛起國族主義的包袱,50 年前的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如此,連今日的職業運動亦是如此。

劉昌德透過蒐集中華職棒在疫情爆發後的 2020 年賽季率先全球開打的 相關報導,以批判論述分析為方法,解析在疫情爆發下的全球風險社會中, 國族主義如何形塑疾病與運動之間的話語。從「看見臺灣」到「世界第一防 疫」,再再都突顯了臺灣在艱鉅的國際地緣政治情勢下,渴望被國際社會肯 定的集體焦慮,但外宣的同時,由於中華職棒的「名不正」,尤其是英文的 「Chinese」,讓臺灣所渴求的國際宣傳,反倒混淆了國際社會對於臺灣與中國之間界線的理解。但職棒承載臺灣國族的發展畢竟來得意外,隨著日美職棒的恢復進行,臺灣棒球也退居其原本的位置,隨著歐美率先進入與病毒共存的後疫情時代,舊體系權力流動的裂縫也漸漸修補,2022年的今日,舊秩序已然恢復。

本專題收錄的第二篇研究論文為許彥輝撰寫之〈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在新冠疫情下之變化歷程:以中華職棒為例〉,則以運動媒體為中心,聚焦於疫情期間臺灣運動電視媒體在苦無內容下的變與不變。許文透過深度訪談臺灣運動媒體重要關係人,企圖釐清臺灣「有價」運動閱聽人在 COVID-19疫情期間如何被運動媒體召喚,並續留在此複合體結構中,進而產生角色的轉變。他進一步針對前述中華職棒英語轉播提供更細部的資料與分析,並立論指出在疫情期間,由於賽事缺乏,使得運動媒體必須提供更多替代性的媒體商品以維繫此複合體,包括卡通、紀錄片、電競等非傳統運動媒體內容都在此時重整,以企圖維繫閱聽人在此複合體中的中介地位。

承接許文的論述,由於疫情期間,運動產業最核心的賽事闕如,運動媒體被迫在此時間內容產製方向的改變,由美國 ESPN 與 Netflix 共同製作的 The Last Dance《最後一舞》提早在疫情初熾的 2020 年 4 月下旬首播,在美國成為 ESPN 頻道史上最高收視率的紀錄片,並在全球各國或透過 Netflix或透過當地 NBA 轉播頻道播放,造成 1990 年代芝加哥公牛王朝的懷舊之旅。對此,安碧芸以運動紀錄片為經,串流平臺為緯,比對國際與臺灣運動紀錄片在疫情下的發展,該文以文本分析為主、輔以深度訪談,首先梳理臺灣運動類紀錄片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背景,從映演管道、形式到內容進行統整;接著,她並導入影音串流平臺上國內外運動紀錄片的發展現況,並提供此類影片未來的發展願景。

安文論述中提及,臺灣此類紀錄片雖然取材運動項目多元,但是議題呈 現上卻多偏向偏鄉青少年教育以及運動賽場上輸贏的價值導向,探討層面未 若外國運動紀錄片取材多元;另一方面,由於這類影片商業價值普遍不高, 戲院並非合理的曝光管道,但串流平臺的興起,確實使得運動紀錄片的播放 管道更為多元與易於近用。

疫情漸散,曾有的提問似乎也塵埃漸落後回歸常態,臺灣棒球的被世界看見、全球運動閉門比賽的「超現實」,似乎都只是運動數百年發展歷程中的非常態短波震動而已,曾有的「重整」跡象,僅成為疫情前舊有秩序的小

亂流。歐洲足球、北美四大職業運動、國際超大型賽會的秩序都漸漸回歸疫情前的樣態,但這並不代表此間的運動傳播現象僅是無意義的片段;相反地,這兩年間的運動傳播樣態,是臺灣運動傳播歷程中重要的「軌跡」甚至是對未來的「諭示」,透過「新冠國族主義」、運動媒體複合體新貌以及運動紀錄片的串流,這些透過 COVID-19 疫情肆虐下所襯托下的反差日常,成為我們面對未來運動傳播新視野的一瞥。

專題主編

陳子軒

新冠國族主義: 疫情中臺灣職業棒球的媒體國族論述^{*}

劉昌德**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摘要

新冠肺炎於 2020 年爆發初期,臺灣管控相對得宜,中華職棒於 4 月以 閉門比賽搶先全球開打,並於 Twitter 進行英語直播,吸引美日等地球迷關 注。本研究探討 2020 年臺灣職棒於疫情中開打後,與象徵臺灣公衛的疫情 控制成就互相結合,構成「新冠國族主義」。媒體國族論述將職棒賽事與防 疫成就視為國族驕傲,藉由翻譯外電及外國球評推文,強調全世界「看見臺 灣」。再者,「中職改名」論戰,反映了臺灣社會內部的國族認同之衝突。 最後,疫情期間的國族論述複製全球化的世界體系,以美國與日本棒球作為 標準。臺灣的新冠國族主義論述與其他國家的種族歧視與排外情緒有明顯差 異,強調職棒與防疫作為國族之光,並作為全球危機中受到國際社會承認與 接納的具體象徵。

關鍵字:全球大流行病、全球化、國族主義、運動、認同

* 本研究獲臺灣行政院科技部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4 -009 -MY2。

** E-mail: chadliu@nccu.edu.tw

投稿日期: 2022 年 04 月 08 日;接受日期: 2022 年 06 月 21 日







壹、新冠疫情, 國族主義與臺灣棒球

新冠肺炎(COVID-19)自 2020 年 1 月中旬在中國武漢市(Wuhan City, China)爆發,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於三月宣布進入全球大流行。世界上許多地區經歷瘟疫的健康風險與死亡威脅,封城和國境封鎖等更帶來日常生活改變的壓力與經濟困境。瘟疫造成大規模感染與恐慌,在世界各地社會引起對於華人與亞裔的種族歧視及攻擊行為(BBC News Chinese, 2020, February 11)。

隨著 COVID-19 在 2020 年間疫情日益嚴重,種族歧視與國族主義隨之 興起。以「新冠國族主義」(coronationalism)此一複合名詞(coronavirus 與 nationalism)稱呼此一現象,首次見於荷蘭國際關係智庫(Clingendael)一 位研究員 2020 年 3 月 18 日所發表的評論文章。他在此文當中描述,面對 COVID-19 疫情爆發,2020 年初期美國與歐盟國家採取了強調國家主權的 各種措施,預示了全球多邊主義的國際關係途徑的撤退(Colijn, 2020, March 18)。稍後,比利時一位政治人物也在一篇文章中,使用新冠國族主義一詞, 來批評極右派散佈關於疫情的錯假訊息(Ozkirimli, 2020, April 14)。

大流行病更往往引發「排他性」的國族主義的抬頭,以及種族主義與威權政治的興起。COVID-19 與種族及國際政治的議題高度相關,包括病毒曾被政治人物稱呼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或病毒的源頭是中國或美國的爭議、以及疫苗分配在全球南北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等(Oxfam, 2021, December 24; Rogers et al., 2020, March 18)。COVID-19 的盛行下,各國「封城」(lockdown)與疫苗強制施打等政策,大大影響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對於「外來」病毒的恐懼與厭惡,增強了關於特定移民團體與少數族群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再者,政府為了防疫,必須限制移動自由等人民基本權益,並且暫時性地關閉邊境。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s)與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趨勢,成為滋生極右派政黨與威權政治的溫床(Bieber, 2022)。

因為近年與中國的政治與軍事緊張關係,COVID-19 在臺灣更促發了許多民族與政治認同的衝突。例如官方對於疾病的中文名稱始終定為「武漢肺炎」(Wuhan Pneumonia),中國爆發疫情初期的當地臺灣商人子女能否回國的「小明事件」,以及負責政府「防疫外交」以口罩支援友邦之運送任務的「中華航空公司」是否需要改名,都引發本地社會的「反中」與「親中」不

同政治陣營之間的高度對立(蔡文居等人,2020年4月13日)。

2020年春季世界各地都經歷了封城與封鎖國境的日常生活改變。儘管如此,臺灣早期應對措施得宜,例如嚴格監管旅行、嚴格的接觸者追蹤、技術強制隔離和普遍佩戴口罩,因此疫情控制相對成功。從 2020年4月12日至12月22日,臺灣創下了超過250天沒有本地病例的記錄(Bloomberg, 2020, December 22),這一亮眼成績更讓社會形成「國家驕傲」的民族意識。政府藉由防疫成績提升國族認同與建構國家的策略,使得COVID-19期間臺灣民族主義有升高的趨勢(蔡友月,2020年5月14日)。

因此,各國的運動賽事於 2020 年春季都因疫情封館時,臺灣職業棒球在 4月 12 日以閉門比賽的方式開打,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開打的職業球賽。接著,臺灣職棒轉播單位 Eleven Sports 於推特(Twitter)官方帳號上進行英語直播,吸引美國、日本等地棒球界與球迷的關注。臺灣職棒球隊當時在無觀眾球場上的創新作法,像是「機器人應援團」與吉祥物的搞笑,引發國內外網友討論,單場直播賽事吸引超過百萬觀看人次,將臺灣職棒推廣「給全世界看」(自由時報體育中心,2020年4月16日;楊啟芳,2020年4月17日)。

疫情中本地職業棒球比賽的向外傳播以及國際的關注,對臺灣社會與球 迷具有特別的民族主義意涵。棒球作為臺灣運動中最具代表性與國族意義投 射的「國球」,自日本殖民時期開始,就作為反殖民與現代性的文化活動。 1970年代開始,棒球也是國民黨政權做為「自由中國」國家建構的象徵之 一。在 1980年代晚期的民主化運動中,棒球隨著臺灣政治本土化而開始成 為本地文化的重要資產。隨後在 2000年代經濟與文化進一步全球化的趨勢 下,本地菁英棒球員被吸納進以美國職業棒球為中心的跨國運動產業當中; 臺灣社會則視本地球員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簡 稱MLB)的傑出表現為「臺灣之光」與國族認同中的重要文化符號(劉昌德, 2021年7月17日)。因此,疫情期間的臺灣國族論述,將本地職業棒球賽事 與國家公共衛生體系有效防止病毒加以連結,兩者都成為臺灣的國族光榮與 「對抗病毒共同體」的認同象徵。

因此,由新冠疫情激發的新冠國族主義,在臺灣與歐美有極大差異。歐 美新冠國族主義充滿種族歧視,並展現出排外及去全球化的特徵。但是,因 為外交孤立的歷史與尋求國際承認的需求,臺灣同一時間、同樣由疫情激起 的新冠國族主義,卻是出現尋求國際接納並積極融入全球化的現象。

本研究以疫情期間臺灣職業棒球的國際傳播現象為研究案例,探討全球

大流行期間的運動與國家建構的特徵。透過檢視美國與中國衝突國際政治脈 絡中的臺灣棒球「疫情國族主義」,本文希望能夠拓展全球風險社會與國族 主義關係的理論視野,以及對大流行病等風險社會現象的社會學理解。

貳、文獻回顧

一、瘟疫、國族主義與全球風險社會

災難與流行疾病,跟種族衝突及民族主義之間有極大的關連性。例如 1918 年大流行感冒(常簡稱為西班牙流感,Spain flu)時期,非裔美國人罹病人數比例較高,而衍生黑人天生缺陷的觀點(racist theories of black biological inferiority),但其實其真實原因是非裔美國人較為貧窮,導致缺乏醫藥與公共衛生制度的保護(Brooks, 2020, October 5; Gamble, 2010)。

如同 Beck et al. (1994) 指出,風險社會中包括生物科學等人類科技中的「自然的」與「社會建構的」,其實難以區分。人類的自然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受到社會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影響或型塑。而在現代性所創造的風險社會中,充滿了包括生態與金融等各種人類無法控制的危機與災難。這些危機難以國家邊界來區隔或阻絕,引發各地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國族動員與仇外情緒(Zhou, 2021)。

因此,疾病與疾病防治不只是公共衛生與科學議題,而混和了社會建構的過程。在東亞的發展中社會,生物科技與國家發展及國族認同有密切的關連。例如 Gottweis & Kim(2010)就以「生物民族主義」(bionationalism)一詞,說明韓國政府與民間全力動員支持幹細胞研究,並因而以生物科技重新型塑韓國人的國族建構與認同。Ong & Chen(2010)則指出在東亞區域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某種特殊疾病之類的生物學焦慮時,政府將之轉變為發展藥物、克服疾病,型塑「命運共同體」(communities of fate)的認同象徵。

新冠國族主義或「新冠疫情國族主義」(COVID nationalism)在歐美社會興起,具體展現在融合病毒陰謀論與愛國主義的「反限制與反疫苗注射」抗議活動。在近年美國與中國對抗的全球政治經濟脈絡中,病毒與中國、聯合國、甚至是微軟等跨國科技業結合,成為新冠國族主義的共同敵人,「去全球化」也成為極右派排他性國族主義的目標(Juergensmeyer, 2020, September 6)。

以英國在疫情期間的防疫政策為例,有研究分析指出,公共衛生專家與學者的論述聚焦在邊境管制,並將之型塑為國家衝突及民族主義的議題。此種「病毒國族主義」(viral nationalism)將國家邊境管制視為控制病毒感染的最主要戰場,因而忽視移民與難民非自願之國際流動的必要性。為了確保國內的防疫戰線,病毒國族主義也會出現訴諸暴力、軍隊等類型的修辭或隱喻(Fitzgerald, 2022)。

根據 2021 年初的調查顯示,佔全球人口總數 16%的高收入國家,所購得的疫苗數量佔全球比例高達 60%;在 2021 年中,全球高收入與中高收入國家的疫苗接種率達 85%,而低收入國家卻只有 1%。以「國民福祉優先」的防疫國家安全為考量,許多富有國家壟斷或搶購疫苗,形成「疫苗國族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在疫苗的市場競爭中,全球北方的富有國家以自私的國族主義壟斷了疫苗,導致全球南方的人民無法免於 COVID-19的流行與傷害,弔詭地造成病毒的全球化,並加深國家之間的全球性衝突(Mittelman, 2021; Zhou, 2021)。

疫苗分配的國家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國族主義衝突,更加深了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以及去全球化的趨勢。負擔全球公共衛生治理責任的聯合國與WHO等國際組織,因為國際政治衝突、財力不足、執法力量弱化等限制,而難以因應全球大流行的危機,讓貧窮國家陷入疫苗不足的防疫困境,也加深了COVID-19對全球的威脅。

再者,疫苗與病毒國族主義也受到 2010 年代以後的美國與中國對抗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影響。中國作為疫情爆發的起源地,而美國則在 2020 年間成為全世界感染與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因此,疫苗的研發與分配,也成為兩大世界強權之間的鬥爭場域,而不是「地球村」式的平等交融與互助 (Zhou, 2021)。

國族主義與認同的型塑,一方面透過有形的制度、儀式、符號等來組織 與凝聚,另一方面也透過各種理論或日常論述來生產及動員。在形成國族此 一共同體的文化建構過程中,全國性的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Anderson, 1983; Hobsbawm, 1983)。透過媒體上的報導與評論等, 以特定的論述策略,劃定出國家與國民的邊界與界線,也牽動人們關於想像 共同體的各種情緒。在災難與疾病威脅的風險當中,媒體論述也成為上述新 冠國族主義與認同的最主要型塑管道。

舉例來說,在1996年歐盟國家因為防止犴牛症而禁止英國牛肉推口,

引起英國社會與媒體的「反歐洲」論述。英國的小報大肆渲染排外情緒,特別在當年歐洲國家杯足球賽(1996 UEFA European Football Championship)的四強戰由英格蘭對德國的比賽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德軍來描繪對手,挑起歷史的戰爭仇恨情結。在狂牛症的危機中,英國媒體區分「我們」英國與「他者」歐洲的對抗,複製過去英國與歐洲矛盾的刻板印象,並將此一公共衛生危機升級為英國牛肉產業與全國經濟的威脅,而加深了兩地之間的政治衝突(Brookes, 1999)。

在新冠疫情期間,媒體報導同樣透過各種政治論述,型塑國家的國族認同。對於美國與韓國的比較研究發現,兩個國家的自由派與保守派新聞媒體在 COVID-19 大流行時,使用了類似的方式來建構主要「他者」中國的形象,美國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媒體都認同「我們」美國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在中國與美國的政治經濟對抗下,兩個陣營的媒體都傾向將中國作為主要的他者與敵人。保守派的媒體更傾向描繪中國的負面形象,像是「野心勃勃的邪惡共產政權」(an evil communist regime that is hyper ambitious)。在韓國,面對新冠疫情威脅的風險,喚起了國家危機感。保守派媒體的論述中,中國是一個隱匿疫情的「流氓國家」,並且批評韓國自由派政府面對中國的軟弱態度。自由派媒體則傾向頌揚韓國作為防疫「模範生」,比中國與西方國家更妥善地處理大流行病的風險,能夠在不執行封城措施的狀況下控制 COVID-19的傳布(Chung et al., 2021)。

瘟疫與災難等跨國界的大型全球性風險,跨國治理機構往往無力應對。 種族主義與排他性國族主義興起,導致疫苗分配的不平等,也激化了國家之間的衝突與地緣政治的對抗。全球大流行期間,想像共同體區分「我族」與「他人」的文化建構過程中,媒體扮演了關鍵角色。媒體的新冠國族主義論述中,一方面塑造有助於自我認同的良好國家形象,另一方面則將「敵人」或「他者」,設定為其他國家、移民、或弱勢族群,而非病毒。

二、運動、國族認同與全球化

在歐洲與北美的許多國家,都經由建構「國家運動」(the national sport)的傳統,來團結社會與人民。當社會內部的國家認同並不一致,例如 北愛爾蘭和加泰羅尼亞,國家運動就成為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承載著鞏固 中央政府構建的統一國族認同的文化使命,另一方面也成為獨立運動或分離

主義者的文化符號。蘇格蘭和北愛爾蘭足球員很少為「英國」代表隊踢球; 加泰隆尼亞更常常是西班牙的敵手 (Bairner, 2001; Hobsbawm, 1983; Maguire et al., 2002) o

運動中的國族主義,在過去對殖民帝國、以及對被殖民社會而言,同 樣也有其雙面性。以臺灣棒球為例,日本殖民時期引入的棒球運動,受到 許多臺灣人的接納與喜愛,逐漸成為當代臺灣的國家運動。在日本殖民期 間,棒球作為殖民政府的統治工具,執行包括「皇民化」等社會整合與國家 統治的政治目標。其中,日本人、漢人、高砂族「三民族融合」的 KANO 高中棒球隊的成功,更被當作同化政策的樣版(謝仕淵,2011; Lin & Lee, 2007)。不過另一方面,棒球的集體認同,也成為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帝國 的象徵。在日本殖民前後,無論是韓國或臺灣,在棒球場上擊敗日本,都代 表著反轉殖民秩序與反抗的意義。因此,日本與棒球在殖民地的臺灣與韓國, 是剝削本地人民與社會的壓迫者,但同時也象徵著「進步的」現代化與現代 性的啟蒙者。經由東方殖民帝國帶來的西方文明,對殖民地而言是一種「折 射現代性」(refracted modernity),形成運動與集體認同的雙重角色(Cho, 2008, 2016) •

因此,作為國族主義象徵之一的國家運動「傳統」,其實是一個不易捉 摸(slippery)的概念(Bairner, 2001)。也正由於不易捉摸,常常是人為且 有意識的結果,在文化經濟的全球化景觀中,運動的國族意涵內容同樣並非 固定不變。既然是發明出來的傳統,政府常常扮演主宰的力量。舉例來說, 二十世紀中期的古巴,在卡斯楚政府主導下,棒球被建構成革命與「古巴性」 (Cubandad) 的象徵,是共產古巴的國族運動與傳統。但反對卡斯楚政權的 異議人士,也同時以不同角度來詮釋與爭奪棒球中「古巴性」的意義(Carter, 2008)。除了在同時期成為多方角力下的產物,運動國族意涵的內容,在不 同時代也受到政權所處的政治經濟條件所決定。例如在韓國,國族主義的再 現歷經軍事政權統治時期、前民主化時期、到民主化之後的全球化,常因政 府在不同時期的需求與政治利益,左右了媒體如何報導國旗、國歌、國名、 兩韓關係、以及運動員的角色等(Cho, 2009)。

全球化過程中的跨國資本擴張也對運動國族主義的論述鬥爭構成影響。 一如 Hardt & Negri (2000) 強調,全球化時代,帝國意涵並沒有被取代, 而是轉化。新型態的全球資本帝國的本質,與傳統帝國主義訴諸的地理併吞 與社會殖民不同,它的權力基礎是透過資本的全球擴張,對不同地區的國族 與文化認同加以調整、管理、與轉化,且是建立在人民與政府的共識上。許 多專業運動組織自 1990 年代以來快速的商業化與跨國化,正可看見這種帝 國發展的路徑。

運動聯盟如歐洲足球協會聯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簡稱 UEFA)下的歐洲各國職業足球、美國職棒(MLB)與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簡稱 NBA)等,近幾年來紛紛利用靈活的跨國選秀,雇用來自不同國家的菁英運動員。除了以低廉的簽約金及年薪,廣召世界各國優異的勞動力,降低球團的經營成本,也藉由這群離散的運動員在母國的高人氣支持,拓展跨國的運動消費市場。透過這種 Miller 所言的「新文化勞動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國族認同成了跨國企業挪用、藉以促銷商品的護身符,而運動國族主義則成了便於資本進行全球性「商品區隔」的條碼(Miller et al., 2003)。

在運動商品化過程中,國族主義淪為「企業國族主義」(corporate nationalism)(Silk et al., 2005)。商業勢力入侵運動場域的現象,往往左右了特定國家的運動發展。紐西蘭的快艇運動拜廣告商贊助之賜,其國家代表隊因為參加美國盃的錦標賽而成為全國媒體報導、國民關注的焦點,即是一例(John & Jackson, 2010)。韓國在 1997 年金融危機之後,開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的援助,國族主義論述因此見風轉舵。媒體報導 MLB 的旅外選手時,開始強調個人主義、全球競爭、以及這些成功的旅外選手對於國家的責任(Cho, 2008)。

而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在舉辦的「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期間,美、韓媒體甚至為了商業考量,轉播韓日對決的比賽時,刻意利用兩國之間過往的殖民情結,升高對決的氣氛,使得韓國的仇日情緒也成為一種媒體視聽的「再殖民」(Lee, 2012)。這種透過全球資本的「帝國之眼」瞭解他者,在臺灣亦復如此。在MLB 吸納臺灣菁英棒球員之後,臺灣棒球的論述逐漸以大聯盟為向背。除了將 MLB 視作棒球運動理所當然的最高殿堂,MLB 的生產與消費體系還成為理解其他地區棒球的參照指標(劉昌德,2008)。

過去以政治力量為主導的國家運動與國族主義場域中,往往可以看到不同文化認同陣營的論述鬥爭,或者官方與民間國族主義的衝突。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下,運動國族主義也成為跨國企業擴展市場的工具,在地運動與球迷的世界觀也逐漸為跨國職業運動所滲透。

參、全球大流行期間的臺灣職棒國族論述

作為全球性危機的 COVID-19,激化世界各國媒體的國族主義與情緒。 在大流行期間的運動賽事,更成為想像共同體的文化建構中心。為了理解臺 灣的國族論述在疫情期間如何型塑想像的共同體,以及本地疫情國族主義 的特徵,本研究檢視臺灣的中華職棒大聯盟(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簡稱 CPBL) 在 COVID-19 爆發時國際曝光的媒體表現。本研究 蒐集 4 月 12 日和 5 月 12 日的一個月之間,在臺灣三家主流報紙《自由時 報》、《蘋果日報》、與《聯合報》之網路資料庫(分別為「自由時報新聞查 詢」https://search.ltn.com.tw/、蘋果日報昔日新聞 https://tw.appledaily.com/ archive/、以及圖書館付費之「聯合知識庫」),透過「中華職棒」(與其同 義字如「中職」、「臺灣職棒」、「CPBL」等)、「英語轉播」、「推特轉播」 等相關關鍵字進行搜尋。經由研究者剔除主要是比賽過程或結果的賽事報導 後,蒐集共計 285 篇新聞報導,分別是 180 篇來自自由時報, 33 篇來自蘋果 日報,72 篇來自聯合報。蒐集此三家報社相關報導,主要是依據其為業界調 查在 2020 年之閱讀率前三名之全國性綜合報紙(臺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 會,2021)。而此三家報紙於近年之政治立場、特別是統獨或對中國之態度, 《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較傾向支持獨派與反中,而《聯合報》則通常 被認為支持統派與親中(例如:王希,2019年9月5日)。

接著,本研究以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探討上述這些新聞報導的國族認 同意涵。學者 Fairclough (1993) 強調,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探究論述與權 力、以及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透過對文本的描述(description)、詮釋 (interpretation) 與社會脈絡的解釋 (explanation), 分析霸權與意識形態的 運作。因此,本小節即以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探討前述媒體報導中,關於全 球風險社會中臺灣國族認同的主要特徵,說明民族主義如何塑造疾病和運動 的話語。

一、防疫與職棒開賽做為國族光榮

在 2020 年大流行初期,「防疫」與「職業棒球」兩者作為臺灣集體認同 的國家光榮,主要透過兩個相互聯繫的論述策略。首先,來自西方的接納與 「承認」,一直是臺灣官方與社會的長期渴望。因為受到中國的壓制,臺灣的 國家角色長年來不受國際承認,邦交國僅約15個國家。所以外國媒體與網友對於臺灣防疫與CPBL球賽的報導,成為世界「看見臺灣」的象徵。其次,臺灣主流媒體報導將國家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的成功,以及CPBL成為世界當時唯一開賽的職業運動連結起來。國族主義論述將防疫視為社會的共同成就,臺灣成為「抵禦病毒威脅的共同體」,CPBL則是「臺灣之光」的國族驕傲。

因為對於疫情控制相對得宜,CPBL在2020年4月成為「第一個在全球大封鎖期間開啟職業棒球賽季的國家」,並獲得各國媒體的關注。本地新聞報導透過翻譯外電或外國媒體報導,以及蒐集與編輯美國與日本棒球作家、球評和球迷的推文,表示「全世界都在觀看我們的比賽」。在媒體報導中強調各國媒體聚焦於臺灣(蘋果日報,2020年4月12日),甚至連球賽中因為觸身球引發兩隊衝突、清空板凳的負面訊息,也強調「被世界看見」(羅志朋,2020年4月19日)。

在這類報導當中,來自國際知名媒體的關注,往往成為本地媒體強調的 重點。例如美國或日本跨國媒體的報導:

中華職棒讓臺灣成爲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唯一還有職業棒球賽事開打的國家,吸引越來越多國際媒體報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加入行列,文中指出臺灣防疫成功讓運動賽事得以開打,並趁此機會加強轉播力道,讓整個世界能同步收看(吳敏欣,2020年4月18日)。

長駐臺灣的日本棒球專欄作家駒田英昨更大篇幅介紹臺灣成功抗疫、職業棒球操作模式與球員心聲的文章,詳述在全球健康危機下的臺灣職棒成功開打經驗,登上日本雅虎棒球頭條(王翊亘、王覺一,2020年4月16日)。

作為當時唯一的職業棒球比賽,CPBL 被國際媒體看見,被放大成為臺灣被國際承認的象徵。例如美國 MLB 道奇隊前經理(former manager)對於 CPBL 與臺灣被看見表示「開心」,而報導特別引用他將臺灣視為「國家」的貼文:

道奇前總管伊凡斯 (Dan Evans) 又在推特轉發《自由體育》

海外收視達 525 萬人次的新聞,並寫道:「臺灣是個很棒的國家、這裡的棒球充滿活力……這個國家很美麗、我愛那裡的文化。」(自由時報,2020年5月1日)。

美國紐約時報的報導被臺灣媒體轉載,並刊登臺灣職棒作為「國家驕傲」:

臺灣政府因抗疫有成,讓中華職棒能率先獨步全球開打。中職 因此登上《紐約時報》,該文提到,中職成了臺灣人的驕傲,是抗 疫成功的象徵(自由時報,2020年5月6日)。

臺灣長期在外交上不受其他國家「承認」的困境,是此一論述特徵的歷史脈絡。在中國政府於國際社會的「一個中國」政策下,臺灣外交空間不斷壓縮;以 2012 年到 2021 年的十年間為例,邦交國從 23 國持續下滑至 14 國(主計處,2022)。以棒球等國際運動賽事的參與及舉辦,來提升國際能見度,是國民黨政府從 1970 年代三級棒球時代以來,相當重要的外交管道與凝聚國民認同的文化政策(盂峻瑋等人,2006)。因此在全球疫情之下,臺灣政府與社會長期遭受國際社會孤立的焦慮,由於職棒轉播或防疫成就得到國際媒體「承認」,而受到彌補:

彭博臺灣分社社長艾里斯(Samson Ellis)在推特貼出於新莊球場拍攝的短片,向世界分享這可貴的棒子擊球聲、觀眾的歡呼聲。艾里斯說:「那是全世界棒球迷一直想念的聲音。」……香港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網站使用路透社提供的影片,介紹臺灣棒球賽的現場情況,國軍在外野展開的巨幅國旗登上版面(中央社,2020年5月9日)。1

轉播 CPBL 球賽的英語主播也指出,「這也是個臺灣能向世界展示的一個方式。」因此,CPBL 的球賽轉播對於臺灣的意義,並不限於棒球,而是臺灣文化與國家的國際宣傳機會:

¹ 参見: Chang, Y. (2020, May 9). Taiwan baseball league reopens stadiums to fa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www.scmp.com/video/coronavirus/3083616/taiwan-baseball-league-reopens-stadiums-fans; Ellis, S. [@samsonellis]. (2020, May 9). That sound baseball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been missing. Life in #Taiwan slowly gets back to normal with the first pro baseball game with fans back in the stadium. @jodifs, why aren't you here? [Video attached] [Tweet]. Twitter. https://twitter.com/samsonellis/status/1258931691361427456

「我希望在看了中職的比賽後,國外的觀眾可以知道更多事情,一點一滴地了解臺灣。」王雲慶補充道……偉恩 (Wayne McNeil) 說道:……所有的事情對臺灣來說都是很好的曝光機會,這比起棒球本身還要來得巨大 (自由時報,2020年5月7日a)。

「看見臺灣」之後,接下來則是強調防疫與臺灣職棒的「世界第一」的地位。防疫成功是當時臺灣社會的集體「驕傲」,像是加拿大媒體報導在外籍球員讚賞本地的防疫成效(自由時報,2020年4月26日),或者路透社「驚嘆」臺灣的防疫世界,並以「難波萬(第一)」作為標題:

路透社今天也特別報導指出,臺灣的棒球和企業甲級足球聯賽都如期開踢,對於球迷而言實屬珍貴……臺灣成功控制病毒傳播……企業甲級足球聯賽12日開打……而原定4月11日開打的中職開幕戰,因雨延賽,12日的中信兄弟和統一獅的比賽成爲全球職棒首戰(自由時報,2020年4月14日)。

本地媒體對於「世界第一」的描述,更包括了球賽中的其他細節,例如 CPBL 出現 2020 年世界職業棒球第一支全壘打,並且說明挨轟的投手是有 美國 MLB 經歷的「世界菁英選手」:

CBS Sports 列出的 5 大觀戰焦點,第一是統一獅鄭鎧文擊出全球首轟,挨轟的是曾效力水手和金鶯的米蘭達…… (吳清正,2020年4月14日)。²

由於領先全球、世界第一, CPBL 更因此成為世界各國球迷的「希望所在」。例如美國 MLB 金鶯隊的球評在推特貼文表示,必須「靠 CPBL 度過 COVID-19 時期」(自由時報,2020年4月20日);引述美國媒體讚譽臺灣職棒是「棒球迷新希望」:

時代雜誌也特別撰文報導,……對於想念大聯盟美好時光的球 述,有了新希望,只需要把目光看向世界另一端的臺灣(蘇志畬,

² 参見:Anderson, R. (2020, April 13).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becomes first to play ball in 2020. CBS.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www.cbssports.com/mlb/news/actual-baseball-highlights-chinese-professional-baseball-league-becomes-first-to-play-ball-in-2020/

2020年4月17日)。3

而在五月份韓國職棒也開始恢復「現場無觀眾」的比賽時,臺灣職棒接著再度領先其他國家開放現場觀眾入場,報導更強調這項「世界第一」的成就,如何受到外國媒體的關注:「臺灣宣布 8 日起將重新開放職棒球迷可以入場觀看球賽,爲全世界首例,吸引近兩百家國內外媒體申請採訪,將成爲世界級的運動賽事焦點」。(翁聿煌,2020 年 5 月 7 日) 更有報導一口氣將當時各國媒體的採訪羅列,並稱之為臺灣的「微外宣」:

《波士頓環球報》昨專訪英文播報員王雲慶與「臺灣之光」王建民,ESPN刊出統一獅洋投羅里奇專訪,而日本的《日刊體育》 昨起陸續連載12位中職啦啦隊女孩,《產經體育》則全版刊登新 莊棒球場聲援甲子園歷史博物館的新聞,近日還陸續會有《紐約時 報》與《運動畫刊》對中職的報導曝光,富邦悍將副領隊陳昭如說: 「這是中職對臺灣的微外宣!」(謝岱額,2020年5月4日)。

二、職棒聯盟改名與國族認同衝突

因為臺灣職業棒球比賽獲得了難得一見的國際關注度,CPBL的英文名稱屢屢混淆外國球迷與球員,誤以為 CPBL 是中國的職業聯盟。因此,政治人物、棒球界、以及媒體開始辯論本地職業聯盟的「改名/正名」議題。在疫情期間,關於「中華職棒改名」的辯論首先反映了臺灣社會不同國族認同的衝突,以及「親中」與「反中」的政治陣營對立。

接著,支持統派或獨派的媒體在此一爭議中,各自有不同觀點的報導。即使立場大相逕庭,兩種立場的媒體卻都採取類似的論述策略。不同立場的國族論述,都區分「他者/敵人」和「我們/同伴」的差別。「親統/親中」媒體將臺灣政府和支持改名運動者,都視為「他人」,並描繪他們為「不理智」和「泛政治化」的狂熱份子。相反地,「獨派/反中」的論述則強調,「我們的」臺灣棒球與和公衛體系,是「全民的」和「進步的」,因此與中國人這些「他者」有所不同、必須區分。

³ 参見:Zennie, M. (2020, April 16). Missing baseball? Taiwanese games are now broadcasting in English. Here's how to watch live. TIMES.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time.com/5822240/watchtaiwan-baseball-live-free/

類似的認同爭議,在運動場域中並不少見。舉例來說,2018年1月由前 奧運國手、總統府國策顧問紀政等人發起「以臺灣為名申請參加 2020年東 京奧運公投案」(簡稱「東奧正名」),便是臺灣社會的國家認同歧異在運動 界的具體展現。從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臺灣代表團的國家名 稱於屢屆奧運出現多次爭議,甚至於1976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會造成臺灣 代表團退出。1981年,臺灣的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簽訂協議,同 意以「Chinese Taipei」(臺灣政府翻譯為「中華台北」)的名稱參賽,並成 為許多國際運動賽事中的代表隊或選手國籍之通稱。2018年間,東奧正名公 投正式成案並引發政壇及體壇許多討論,支持與反對陣營跟藍綠政黨之間也 有密切關連。在運動場域中的國家認同與「改名」爭議,持續至 2020年的 疫情期間再次引燃。

臺灣職棒於 4 月 12 日開打之後,獲得美國球評的注意,隨即出現許多「誤認」為中國的報導。像是運動網站《Fansided》專欄作家 Jeffrey Bellone 卻誤把中華職棒(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當作是中國棒球聯盟(China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自由時報,2020 年 4 月 19 日 b)。而即使是知名 MLB 退役球星 Manny Ramirez——他曾經於 2013 年在 CPBL 打球達半年的經紀人,當時也將 CPBL 誤認為中國職業聯盟(陳宛晶,2020年 4 月 30 日)。這些誤解的狀況,引來包括臺灣總統在社群媒體上加以更正:

中職受到國際關注,卻有外媒誤認比賽是在中國,美國棒球作家卡比斯在推特上轉發中職開打影片,並寫著「棒球在中國開打了」,隨即被指正是在臺灣,蔡英文總統也在臉書發文表示:「CPBL是臺灣的職棒。」(吳清正,2020年4月14日)。

在臺灣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上,對於 CPBL 改名的報導中,關於「中國」的名稱有著最明顯的差異。親中的「泛藍」報紙,大多在標題以「中國大陸」或「大陸」來稱呼對岸(藍宗標,2020年4月13日);而反中的「泛綠」報紙,則大多在標題直接以「中國」稱呼,而標示我國為「臺灣」(自由時報,2020年5月2日b)。

不同政治立場媒體在文字使用上的政治差異,還可見於對瘟疫的「命名」。COVID-19 最早被發現的病例與大規模流行在中國武漢市,因此在2020年初,包括中國與臺灣等地的中文媒體,都出現「武漢肺炎」的稱呼。但為了避免誤解與歧視,WHO的要求世界大流行病不可以地名或國家名來

命名。因此在 2020 年 3 月之後,中文媒體開始改以「新冠肺炎」或「新冠 病毒 | 來稱呼 COVID-19; 不過臺灣官方與反中媒體,則直至 2022 年初都 仍以「武漢肺炎」或縮寫的「武肺」來稱呼此一世界大流行病(林宥辰, 2020年4月16日)。

在文字使用差異之外,關於 CPBL 改名的倡議,泛藍媒體的報導大多描 述為「非必要」、「不理性」的作法。一方面,親中的聯合報在 CPBL 開賽 的第二天,就報導:

中職秘書長馮勝賢強調……美媒誤認 CPBL 在大陸,他說, 只要大家多看中職比賽,聯盟做好宣傳,就知 CPBL 是在臺灣(藍 宗標,2020年4月13日)。

當政府明確建議 CPBL 考慮改名,由前國民黨籍政治人物擔任的聯盟理 事長吳志揚明確回應拒絕,聯合報也在標題上強調「(聯盟)非政府單位」 與「政府不該干涉」(吳敏欣,2020年4月15日)。在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 AIT)於五月份發文呼籲 CPBL 改名臺灣時,聯合 報也引用國民黨政治人物挪用中國外交詞彙的「不用對他國內政指指點點」 作為標題(高字震,2020年5月9日)。

另一方面,反中的自由時報在報導 CPBL 的理事長同應時,在標題上強 調「開季被中國吃豆腐」(羅志朋,2020年4月16日)。除了在文字上區分「臺 灣「與「中國」的差別之外,也強調職棒聯盟改名是主權與國家利益,更獲 得美國支持:

打棒球是臺灣國內的事情,任何國家無權干涉,用臺灣也是名 正言順,職棒雖是民間運動,但事涉國家利益,政府不應袖手旁觀, 連 AIT 也建議中華職棒正名臺灣職棒,政府不能再以各種理由拒 絕正名。他更強調,臺灣職棒在全球首先開打,卻因爲「中華職棒」 又讓人誤認是中國職棒 (王姝琇,2020年5月12日)。

而在五月份開放觀眾進場後,同樣立場較為反中的蘋果日報,也在報導 中強調:

臺灣的職業棒球……今天又將獨步全球開放每場千位觀眾進 場,包括世界3大通訊社等全球媒體都專文報導。但中華職棒聯

盟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的英文縮寫 CPBL 的「C」,也因近1個月來英文直播賽事全球放送,常被誤解與「中國 (China)」有關 (謝岱穎等人,2020年4月17日)。

三、 想像的全球共同體:棒球世界體系的階序

疫情期間的臺灣棒球國族論述,仍然是一種全球化下的意識形態。在高舉臺灣職業棒球與防疫的成就時,同時是以美國與日本等資本主義中心作為自我認同的標準,也複製了棒球「世界體系」中的全球階序。

在本地媒體的報導當中,美國與日本的球迷,為了理解或介紹過去並不熟悉的 CPBL,往往以知名的 MLB 或日本棒球來作為比喻。例如,媒體報導美國球評以「臺灣洋基隊」來介紹兄弟象或桃猿隊,或者桃猿對富邦悍將的球賽為「(洋)基(紅)襪大戰」(自由時報,2020 年 4 月 17 日,2020年 4 月 19 日 a,2020 年 5 月 11 日)。

媒體報導中也呈現出美國與日本的投射,像是日本球迷眼中的「臺灣大谷翔平/おたにしょうへい」(統一獅隊的林安可)、或者 MLB 球迷的臺灣「阿洛馬」或「臺灣法官」(統一獅隊林靖凱、樂天桃猿隊朱育賢)(自由時報,2020年5月2日a;蘋果日報,2020年5月7日,2020年5月12日)。

以美國為棒球世界體系中心的視野,在報導「CPBL 技術水準介於美國職棒小聯盟低階與高階 1A 之間」的爭議中更加凸顯。從 2000 年代的全球化時代以來,在臺灣的媒體報導或球迷討論之中,不時會以 MLB 體系來定義全球各地棒球的技術實力。例如,CPBL 定位為「1A」級,因此不如「高於3A」的日本、以及約略是「3A 等級」的韓國。但這樣的觀點與比擬,通常侷限在臺灣棒球界的球評與球迷之間。到了疫情期間,此一「大聯盟中心」的觀點,再度為國外媒體介紹臺灣職棒時提出,然後再由臺灣媒體報導並為國內球迷所注意與討論。例如四月底時臺灣媒體轉載加拿大媒體報導:

《加拿大廣播公司》旗下法語部門「Radio-Canada」……報導……加拿大籍的富邦悍將打擊教練杜西(Rob Ducey)……說:「臺灣的層級大概相較於北美職棒的 2A,臺灣有很多好打者,但其他的大概是 1A 等級……文章還提到,中職各隊有一些前大聯盟投手……杜西過去有 13 年大聯盟球員資歷(自由時報,2020 年 4 月

24日b)。

隨後在五月初因為韓國職業棒球賽事展開,美國媒體報導對韓國與臺灣兩聯盟進行比較,而出現了更多關於臺灣職棒水準的比較與討論。由於是來自美國此一棒球中心之評比,在臺灣媒體與棒球界引起更大的關注。開啟爭端話題的是體育雜誌《棒球美國》(Baseball America)記者 Kyle Glaser指出 MLB 對於亞洲的日本、韓國、臺灣的評比,認為「日職(Nippon Professional Baseball,簡稱 NPB)介於大聯盟與 3A 之間、韓職(Korea Baseball Organization,簡稱 KBO)介於 2A 與 3A、中華職棒(CPBL)介於低階 1A 與高階 1A」(自由時報,2020年5月5日 a)。而在被評比為優於臺灣的韓國職棒於五月開始比賽之後,導致 CPBL 的海外球迷觀眾流失,臺灣媒體甚至引用美國球評 Clinton Yates 於推特貼文,以「韓職開幕……搶走原屬中職的鎂光燈……這很像是自己所認識的男性友人回頭偷看其他正妹一般」來形容此一苦澀的國族情感(自由時報,2020年5月5日 b)。4

對於臺灣棒球表現低於韓國的評價,媒體的國族論述中,首先出現許多「不平之鳴」,包括認為此一評價不夠公允、或者強調部分打者超過此一平均水準而可達 3A(自由時報,2020年5月5日a;倪婉君,2020年5月6日)。但是對於來自美國中心的不公平判斷,仍然需要透過同一個美國「權威單位」提供理由解釋:

葛雷瑟 (Glaser) 寫著,「大聯盟球隊通常都在業餘階段就簽下臺灣球員,就和簽多明尼加、委內瑞拉球員一樣,所以臺灣的頂尖年輕好手通常在打中職前,就先離開臺灣」 (陳宛晶,2020年5月7日)。

再者,即便臺灣 CPBL 的實力不如韓國 KBO,透過美國球評與球迷的 觀看與肯定,臺灣棒球仍可在世界棒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經由全球棒球體系 的定位,彰顯臺灣被世界棒球所「承認」與「認可」:

推特上仍有許多美國球迷不離不棄力挺中職。美國 ESPN 記者 李維拉 (Marly Rivera) 依舊準時收看昨天的獅象戰:「第3局, 比數6:4,這會是很長的比賽!」一名費城的老師回應:「現在是8:

⁴ 参見:Yates, C.[@clintonyates]. (2020, May 4). Thank you. [Tweet]. Twitter. https://twitter.com/clintonyates/status/1257437908614754310?ref_src=twsrc%5Etfw

4,第4局了,我想我還是會堅持看臺灣棒球,昨天 ESPN 轉播的 KBO 實在很粗糙…… (自由時報,2020年5月7日b)。

即便在實力評比上無法超越韓國,但是美國球迷的觀看與肯定,仍是臺灣職棒被世界肯定的證據。例如:

(一位) 美國……球迷……認為較低層級的臺灣職棒不會讓他感到困擾……說,「我不反對看弱隊比賽,我發現聽到球棒聲就很療癒。」……(另一位) 美國球迷……表示看到熟悉的前大聯盟投手、現效力富邦悍將的索沙(Henry Sosa),讓他感興趣(自由時報,2020年4月24日a)。5

肆、結論

2020年初的全球新冠疫情,導致世界各國與許多國際重要體育賽事取消或延後,也在各地引發種族歧視與排外國族主義。在疫情爆發初期臺灣管控相對得宜,臺灣職棒(CPBL)於當年4月因而得以閉門比賽,搶先全球開打,轉播單位並於Twitter進行英語直播,吸引美、日等地球迷關注,社會也因「全世界看見臺灣」而振奮。本研究以2020年臺灣職棒於疫情中開賽的事件為研究對象,蒐集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在2020年4月11日到5月31日共285篇報導,透過批判論述分析,探討新冠肺炎期間,牽動本地國族認同的棒球運動,如何與象徵臺灣生科與公衛的疫情控制成就互相結合,而構成「瘟疫國族主義」。

研究發現,首先,疫情期間的國族論述將職棒與國家有效防止病毒加以連結,職棒賽事成為國族驕傲或臺灣之光。藉由翻譯外電及外國球評的推文,包括來自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的報導,強調「全世界都在看臺灣」。在國際的目光下,臺灣社會藉由職棒與防疫,成為「對抗病毒的想像共同體」(an imagined community against viral threat)。

其次,疫情期間的「中職改名」論戰,反映了臺灣社會內部的國族認同 之衝突、以及對於中國的正反兩極態度。由「泛藍」媒體所代表的統派論述,

⁵ 参見:Steger, I. (2020, April 23). The world's baseball fans are being kept entertained by just four pro teams in Taiwan. Quartz.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qz.com/1842138/baseball-fans-turn-to-taiwan-pro-league-for-entertainment/

傾向將臺灣政府和改名運動的支持者塑造為「過於政治化」的「非理性」他者。相對地,「泛綠」媒體代表的獨派論述,則將屬於我們的運動賽事和醫療體系視為「進步」象徵,因此必須跟他者的中國劃清界線。

第三,疫情期間的國族論述複製全球化的棒球「世界體系」,以美國或日本棒球作為臺灣棒球的標準與定位。國族論述將臺灣棒球隊和球員比喻為著名的 MLB 或日本棒球;並且透過大聯盟的農場體系,對東亞各國職棒的水準加以劃分——日本為小聯盟 3A 以上水準、韓國為 3A,而臺灣則是 1A 到高階 1A 的程度。藉由世界體系定位,彰顯臺灣在全球棒球的國際社會中受到認可。

在全球大流行期間,因為流行瘟疫的威脅,導致世界各地的「新冠國族主義」或「病毒/疫苗國族主義」,大致呈現出種族歧視與排外情緒等特徵。 不過,疫情期間的臺灣新冠國族論述,卻是在臺灣社會長期渴望國際社會「承認」的焦慮下,以及近年美國、中國對抗的全球化政治經濟格局中,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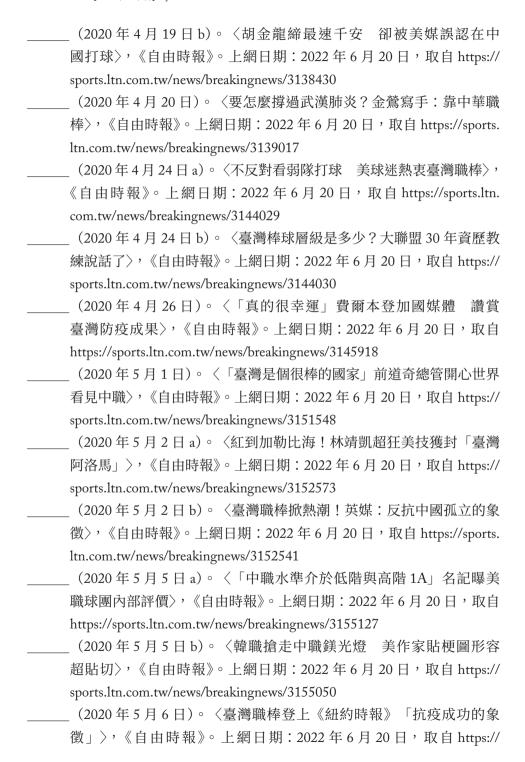
在全球化公衛風險與危機中,臺灣的新冠國族主義展現出「被隔離」(isolated)國家尋求承認與接納的焦慮,並再次體現了社會內部的國家認同差異及衝突。當防疫成果與職棒賽事「被世界看見」時,兩者因而成為臺灣的國家之光,並且作為想像共同體得以被國際社會「接納」與「承認」的具體象徵。此一全球化風險社會下的臺灣國族認同,將自身的防疫與棒球在國際上「被看見」,視為走向國際的象徵,如同殖民時代將棒球視為「現代化」象徵。因此,當新冠疫情在其他國家引發的「反全球化」排外焦慮,臺灣職棒轉播事件中的新冠國族論述卻體現了全球化「雙重性」的另一面,轉而擁抱全球化與全球世界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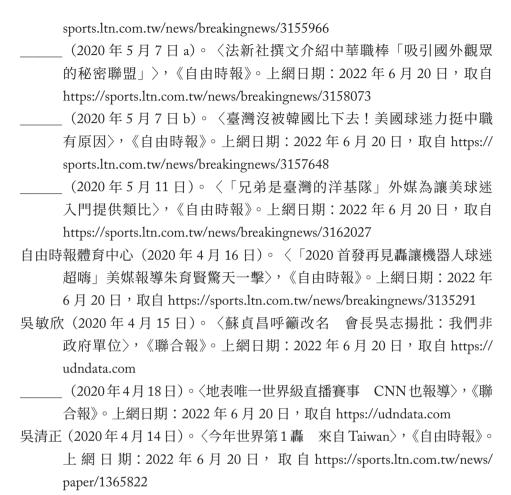
正因為服膺於此一世界體系的階序,臺灣職棒國族主義無論是在論述或實踐上,都並未有「翻轉」全球化的意識或企圖。在2020年稍後開打的韓國、日本、美國職棒,逐漸「淹沒」了臺灣職棒轉播;到了2021年,更因為各國職業棒球都恢復正常賽季,臺灣職棒因而終止了網路上的英語轉播(婁靖平,2021年2月5日)。就如同網路論壇PTT在2021年臺灣職棒取消英語轉播的報導討論串中,球迷網友留言包括「誰想熬夜看低階1A聯盟啊(帳號 ofpurity)」、或者「去年是沒球看今年美日韓大家都要正常開打了沒什麼優勢(帳號 mtyk10100)」,都能反映臺灣社會與棒球迷對於此一世界體系的理解與接納(Gotham,2021年2月10日)。整體來說,一方面,臺灣

的新冠國族主義呈現了在地政治的矛盾與集體認同的焦慮;另一方面,也再現了全球化下的本地國族意識形態對世界體系秩序的擁抱及順從。因此,臺灣職棒於 2020 年疫情期間的「新冠國族主義」論述,是在全球與在地的政治經濟脈絡下的意識形態產物。

參考文獻

- Gotham (2021 年 2 月 10 日)。〈[新聞]去年引領風潮的英語轉播 今年新賽季恐怕消失〉,PTT棒球版。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https://www.ptt.cc/bbs/Baseball/M.1612971310.A.C6C.html
- 中央社(2020年5月9日)。〈臺灣開放觀眾外媒稱羨 巨幅國旗登國際版面〉,《聯合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udndata.com
- 王 希 (2019年9月5日)。〈【沃草看報紙】只看中時、聯合頭條,你會以為香港反送中就是港人暴動變恐怖份子〉,《沃草》。上網 日 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watchout.tw/reports/Xibbd0HZ7WpbvTe5AFKK
- 王姝琇(2020年5月12日)。〈被外媒誤解為「中國」 南市議員籲正名刻 不容緩〉,《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62934
- 王翊亘、王覺一(2020年4月16日)。〈中職兩地開打 登上日本雅虎頭條〉, 《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tw.appledaily. com/sports/20200416/4PWYHR6WOQI5W736RTJ7MIAV5Q/
- 主計處(2022)。〈我國邦交國統計(101 年至 110 年)〉,中華民國外交部。 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ws.mofa.gov.tw/Download.as hx?u=LzAwMS9VcGxvYWQvNDAyL3JlbGZpbGUvMTQ1Lzk3MjQwL zM0MWRlMTRILTZiZmQtNDQ2Yi05YTYyLTk0Y2Y0YThlMjBmMi 5wZGY%3d&n=5oiR5ZyL6YKm5Lqk5ZyL57Wx6KiILnBkZg%3d%3d
- 自由時報(2020 年 4 月 14 日)。〈臺灣防疫南波萬!路透驚嘆棒足如期開打〉,《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33360
- _____(2020 年 4 月 17 日)。〈「桃猿是臺灣的洋基隊」美作家輕率類比 遭糾正〉,《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 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36848
- _____(2020 年 4 月 19 日 a)。〈外媒作家看臺灣職棒 桃猿、悍將比賽「像基襪大戰」〉,《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38261





- 林宥辰 (2020年4月16日)。〈武肺作球 鄭鎧文轟出能見度〉,《自由時報》。 上網日期: 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sports.ltn.com.tw/news/paper/1366108
- 盂峻瑋、謝仕淵、謝佳芬、曾文誠、賈亦珍、唐盛梅(2006)。《旋動歲月: 臺灣棒球百年史》。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 倪婉君(2020年5月6日)。〈中職被評小聯盟1A水準!馮勝賢:對球員不公平〉,《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sports.ltn.com.tw/news/paper/1370821
- 翁聿煌(2020年5月7日)。〈全球首場職棒觀眾賽 全世界都在看!〉,《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58332

- 高宇震(2020年5月9日)。〈酈英傑建議中職改台職 藍委:不要對他國內 政指指點點〉,《聯合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 udndata.com
- 婁靖平(2021年2月5日)。〈去年引領風潮的英語轉播 今年新賽季恐怕 消失〉,《聯合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udndata.com
- 陳宛晶(2020年4月30日)。〈曼尼經紀人搞烏龍 求職單位錯寫中國職棒〉, 《聯合報》。上網日期: 2022年6月20日,取自 https://udndata.com
- _____(2020年5月7日)。〈評中職僅1A引論戰 棒球美國:因頂尖業餘 好手外流〉,《聯合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udndata.com
- 楊啟芳(2020年4月17日)。〈中職全球破百萬觀看 英文講評:把臺灣 推廣出去〉,《中央社》。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 https:// 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4170264.aspx
- 臺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2021)。〈2021 年臺灣媒體白皮書〉。上網日期: 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maataipei.org/download/2020%e5%aa%9 2%e9%ab%94%e7%99%bd%e7%9a%ae%e6%9b%b8-2-2/#
- 劉昌德(2008)。〈帝國搖旗,國族吶喊:棒球勞動國際分工與運動國族論述 之轉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0:33-77。
- _____(2021 年 7 月 17 日)。〈國族吶喊:棒球場上百年孤寂的認同召喚〉,《Fountain 新活水》。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fountain.org.tw/issue/do-you-hear-the-baseball-sing/baseball-in-taiwan
- 蔡友月 (2020年5月14日)。〈想像的病毒共同體:全球 vs. 臺灣生物民族主義之戰〉,《報導者》。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covid-19-imagined-communities
- 蔡文居、賴筱桐、張菁雅、謝君臨 (2020 年 4 月 13 日)。〈臺灣送口罩「人情做到墓仔埔去」〉,《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65493
- 謝仕淵(2011)。《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臺灣棒球運動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謝岱穎(2020年5月4日)。〈微外宣打動美日 外媒瘋中職〉,《蘋果日報》。上網日期: 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www.appledaily.com.

tw/sports/20200504/BEMWANS4H4FNYLPXR4RVWFYA2E/

- 謝岱穎、賴德剛、王翊亘 (2020年4月17日)。〈球迷回來了 千人今進場 中職改名台職夯〉,《蘋果日報》。上網日期: 2022年6月20日, 取 自 https://tw.appledaily.com/sports/20200508/OUY3[IICI33X]P]PWUPPWHH]ME/
- 藍宗標(2020年4月13日)。〈CPBL被誤認在大陸 馮勝賢:做好宣傳就 知在臺灣〉,《聯合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udndata.com
- 羅志朋(2020年4月16日)。〈開季被中國吃豆腐 吳志揚:「叫中華職 棒沒有問題」〉,《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 https://sports.ltn.com.tw/news/paper/1366110
- _____(2020 年 4 月 19 日)。〈索沙丟觸身球兩隊板凳清空 全世界球迷 都看見〉,《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38932
- 蘇志畬(2020年4月17日)。〈疫情中開打時代雜誌:棒球迷新希望〉,《聯合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udndata.com
- 蘋果日報(2020年4月12日)。〈外國媒體蜂擁至 世界聚焦看中職〉,《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sports/20200412/3K3N5VPYW7CGODKBU6L5GKJ2AQ/
- _____(2020年5月7日)。〈朱育賢太猛 美媒喻「臺灣法官」媲美洋基賈吉〉,《蘋果日報》。上網日期: 2022年6月20日, 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sports/20200507/ATJVLNQ2WB43SV5UPHLGEHSGX4/
- _____(2020年5月12日)。〈日媒點名林安可 臺灣大谷紅不讓〉,《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22年6月20日,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sports/20200512/NVGU7UWKGKWIWDHHMAXRCLCGM/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 Bairner, A. (2001). Sport,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SUNY.
- BBC News Chinese (2020, February 11). Coronavirus: Racism widespread over the world.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

world-51454984 [In Chinese]

- Beck, U., Giddens, A., & Lash, S.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eber, F. (2022). Global nationalism in tim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Nationalities Papers, 50(1), 13-25. https://doi.org/10.1017/nps.2020.35
- Bloomberg (2020, December 22). World's longest virus-free streak ends with new Taiwan case.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2-22/world-s-longest-virus-free-streak-ends-astaiwan-case-emerges.
- Brookes, R. (1999). Newspaper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BSE/CJD crisis and the British Pres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1*(2), 247-263.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99021002007
- Brooks, R. (2020, October 5). Why African Americans were more likely to die during the 1918 flu pandemic.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www.history.com/news/1918-flu-pandemic-african-americans-healthcare-black-nurses
- Carter, T. (2008). The auality of home runs: The passion, politics, and language of Cuban baseball.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o, Y. (2008).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de/reconstructing nationalism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IMF interventio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1), 82-96. https://doi.org/10.1080/14649370701789666
- _____(2009). Unfolding sporting nationalism in South Korean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1968, 1984 and 2000 Olympic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3), 347-364.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09102709
- (2016). Double binding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Trajectories of baseball in Japan, Taiwan, and Korea. *Cultural Studies*, *30*(6), 926-948. https://doi.org/10.1080/09502386.2015.1094498
- Chung, A., Jo, H., Lee, J., & Yang, F. (2021). COVID-19 and the political framing of China, nationalism, and borders in the U.S. and South Korean news medi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64(5), 747-764. https://doi.org/10.1177/07311214211005484
- Colijn, K. (2020, March 18). Coronationalisme.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 https://spectator.clingendael.org/nl/publicatie/coronationalisme
- Fairclough, N. (199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The universities. *Discourse and Society, 4*(2), 133-168. 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93004002002
- Fitzgerald, D. (2022). Normal island: COVID-19, border control, and viral nationalism in UK public health discours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https://doi.org/10.1177/13607804211049464
- Gamble, V. (2010). There wasn't a Lot of comforts in those days: African Americans, public health, and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 *Public Health Report*, 125(3), 114-122. https://doi.org/10.1177/00333549101250S314
- Gottweis, H., & Kim, B. (2010). Explaining Hwang-Gate: South Korean identity politics between bio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5*(4), 501-524. https://doi.org/10.1177/0162243909345840
- Hardt, M., & Negri, A. (2000).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 Hobsbawm, E. (1983).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E. Hobsbawm &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p. 263-30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 A., & Jackson, S. (2010). Call me loyal: Globalization, corporate na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s Cup.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46(4), 399-417. https://doi.org/10.1177/1012690210384658
- Juergensmeyer, M. (2020, September 6). Covid nationalism.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www.e-ir.info/2020/09/06/covid-nationalism/
- Lin, C. Y., & Lee, P. C. (2007). Sport as a medium of national resistance: Politics and baseball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ism, 1895-1945.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4*(3), 319-337. https://doi.org/10.1080/09523360601101311
- Maguire, J., Jarvie, G., Bradley, J., & Mansfield, L. (2002).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Human Kinetics.
- Lee, J. (2012). Commodifying colonial histories: Korea versus Japan and the re/productions of colonial violence in the World Baseball Classic.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36*(3), 231-244. https://doi.org/10.1177/0193723512443245

- Miller, T., Rowe, D., McKay, J., & Lawrence, G. (2003). The over-production of US sport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38(4), 427-440. https://doi.org/10.1177/1012690203384004
- Mittelman, J. (2021). Global transitioning: Beyond the Covid-19 pandemic. *Globalizations*, 19(3), 439-449. https://doi.org/10.1080/14747731.2021.196 3201
- Ong, A., & Chen, N. (Eds.). (2010). Asian biotech ethics and communities of fate.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xfam (2021, December 24). Rich countries have received more vaccines in run-up to Christmas than African countries have all year.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rich-countries-have-received-more-vaccines-run-christmas-african-countries-have-all
- Ozkirimli, U. (2020, April 14). "Coronationalism?". *OpenDemocracy.*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can-europe-make-it/coronationalism/
- Rogers, K., Jakes, L., & Swanson, A. (2020, March 18). Trump defends using 'Chinese Virus' label, ignoring growing criticism.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June 20, 2022,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8/us/politics/china-virus.html?_ga=2.160095540.849900311.1642494506-2061640437.1633943144
- Silk, M., Andrews, D., & Cole, C. (2005). Sport and corporate nationalisms. Berg.
- Zhou, Y. (2021). Vaccine nationalism: Contes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VID-19 and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s*, 19(3), 450-465. https://doi.org/10.1080/1 4747731.2021.1963202

本文引用格式

- 劉昌德 (2022)。〈新冠國族主義:疫情中臺灣職業棒球的媒體國族論述〉,《傳播研究與實踐》,12 (2) : 5-34。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 022071202002
- Liu, C. D. (2022). Coronationalism: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of Taiwa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in the media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5-34. http://dx.doi. 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2 [Text in Chinese]

Coronationalism: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of Taiwa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in the Media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LIU, Chang-D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aiwan controlled well against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beginning of 2020,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in Taiwan (CPBL) was able to hold ball games without attendance in April and became the "only" professional baseball season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The CPBL launched live English-language broadcast on Twitter to attract sports fans from the U.S., Japa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d the "coronationalism"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during the outbreak) in Taiwan. First, Taiwa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games, as well as the relative success in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were regarded as a national glory during the pandemic. Related news reports in foreign media and tweets from foreign baseball commentators were evidences that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Taiwan." Moreover, the debate of renaming the CPBL reflected the conflic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within Taiwan society. Furthermore,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duplicated the world system of baseball modeled after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s in the U.S. and in Japan.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in Taiwan during the pandemic, which emphasized the CPBL games, the pandemic management as the national glory, and the world's recognition of Taiwan, were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from racism and xenophobia observe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is global public health crisis.

Keywords: pandemic, globalization, nationalism, sports, identities

* E-mail: chadliu@nccu.edu.tw Received: 2022.04.08; Accepted: 2022.06.21







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在新冠疫情下之 變化歷程:以中華職棒為例

許彥輝*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摘要

2020年3至5月COVID-19造成運動賽事荒,媒體運動複合體、運動組織與廣告主之間連結關係轉弱,有價運動閱聽人重要性大幅提升。運動組織願意配合媒體運動複合體被動改變,目的一是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或球迷),目的二是保有轉播權利金。媒體運動複合體大膽嘗試各式節目,以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收視慣習。研究更發現在疫情期間,有價運動閱聽人結構改變、影響力增強,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收視慣習,變成媒體運動複合體當下重點。中華職棒是當時疫情下唯一開打的職業體育組織,進而發展出英語轉播賽事,但其目標卻是宣傳品牌國際知名度而非增加海外有價閱聽人。Twitter的資料分析顯示英語轉播未獲得國外運動閱聽人青睞,這也是2021年中職不再進行英語轉播的主因。

關鍵字:中華職棒、有價運動閱聽人、英語轉播、媒體運動複合體、轉播權 利金

* E-mail: oceangreat999@hotmail.com

投稿日期: 2021年09月07日;接受日期: 2022年05月14日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隨著全球化科技進步,世界性職業賽事時程近幾一致化,例如北半球的 職業棒球賽事,皆在3月至11月開打,籃球多在9月至隔年6月舉行。傳 播科技帶動賽事直播全球同步,使得賽事、體育組織、運動選手、體育頻道 商、閱聽眾形成密不可分的體制關係。體育賽事在體育頻道商上排程播出, 依循各地閱聽人需求,排出合適節目表,取得最大收視率,廣告利潤也因此 極大化。

2019年底爆發 COVID-19,為了阻止其傳播,全世界不得不停止舉辦運動賽事,暫停人際與政治交流,這也直接影響體育頻道商的賽事排程與觀看人數。以美國為例,美國高爾夫球公開賽最後一輪比賽是 30 多年來觀看人數最少的一次;美國網球公開賽在 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 (ESPN) 上的收視率大幅下滑 45%;肯塔基州賽馬會通常大約有 1,500 萬觀眾,但在 9 月份重新安排的時段,只有 930 萬觀眾 (USA TODAY, 2020, October 8)。這代表長期以來觀看運動賽事的慣習被打亂,突然間,在 2020 年秋季,所有精彩的運動總決賽全擠在一起播出,但播出的賽事是因應疫情而改變的賽事制度,已非原本人們熟悉的賽制。

2020 年在 COVID-19 影響下,臺灣體育頻道商也遭受無國外體育賽事直播的窘境。當下臺灣因為防疫有成,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中職)完整執行全 240 場例行賽賽事及臺灣大賽。但一天最多兩場的中職賽事,不可能支撐體育臺整體節目表。體育頻道商失去了長期穩定的國外運動賽事來源,該如何運用媒體運動複合體的特性,在疫情不明的狀態下維持收視率,抓住有價運動閱聽人的慣習,以度過疫情期間,成為本文的焦點。

因 COVID-19 讓全世界賽事都無法正常進行,導致媒體運動複合體無賽事可供轉播,是否造成其制度性轉變?如何改變?是為維護哪些因素而改變?本研究希望以實證方式,佐以次級資料,以媒體運動複合體的結構視角,觀察有價運動閱聽人的轉換。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試圖架在閱聽人商品化概念上,進行媒體運動複合體的理論探討,一方面可以藉此釐清運動閱聽人對於大型運動電視臺的影響;另一方面

以媒體運動複合體的觀念,探討媒介組織以及運動組織相互交纏之關係。

一、 媒體運動複合體: 兩種制度相互纏繞的複合體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美國以壟斷資本主義特徵的大眾媒體被創造出來,受到廣告資源挹注的媒體,結合大熔爐勞工階級,對於廣告主而言,勞工階級成為可銷售的閱聽人。運動與媒體投資者藉由強化壟斷的資本主義,創造了以媒體播放的直播運動,而運動與媒體的結合,運動閱聽人以收視率的形態,被媒體製造成商品販賣給廣告主。

運動轉播節目的製作成本較為便宜,並可以吸引特定的運動閱聽人收看,創造高收視率,吸引廣告主投廣告,媒體因此獲得利潤(Maguire, 1991, p. 316)。職業運動與商營媒體,特別是電視之間基於商業利益的結合,構成的媒體運動複合體(media-sport complex)是歐美電視產業與職業運動產業的普遍現象與特點(劉昌德,2017)。所以媒體與運動之間的關係是共生且相互販賣彼此。

陳子軒(2012, p.3)表示媒體運動複合體:

從 Wenner 兩本著作中可發現,他採取社會學觀點……建立了媒體/運動/社會互動關係模式,將社會、生產複合體、媒體運動內容及閱聽人等四個面向共同討論。媒體運動的現象必須針對媒體、運動在人類當代社會中的脈絡及其互動關係進行討論。

媒體運動複合體是由 Jhally (1984) 所提出的觀念,媒體運動複合體是建立在閱聽人商品化的基礎而形成,有下列幾個重要特色:(一) 追求有價運動閱聽人。當下美國的法規是允許運動轉播權可以獨家壟斷,這也是造成各媒體為了追求極大有價運動閱聽人,轉播權利金越開越高價的原因之一。(二) 閱聽人商品化:運動產業願意為媒體賣命,也願意讓媒體改變原本運動結構,以配合電視要求。同時媒體運動複合體會進入運動領域,改變運動規則來製造更多的運動閱聽人,運動閱聽人就是這種改變的中介因素。運動與媒體的利益結合,會進一步創造有價商品。例如轉播可以為運動員帶來薪水的提升,但這必須依賴吸引有收視保證的閱聽人,才能讓廣告費收益極大

化,也是提高轉播權利金依據。¹

而轉播權利金的確是探討媒體運動複合體的絕佳起源(陳子軒,2012),從職業運動的三大主要收入來源:轉播權利金、廣告贊助與票房收入,更可看出媒體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王建興、黃國軒,2015)。轉播不僅在門票及周邊商品有極大助益,對於廣告贊助商而言也是重要考慮因素。運動組織可經由媒體轉播增加觀看人數及提升曝光度,更可帶來龐大的轉播權利金收入(李俞麟、黃蕙娟,2011)。這種以廣告為主宰所建立的職業運動商品化過程,包含權利金和廣告資金的流動,促使運動組織與媒體更加緊密(趙晉文,2008)。在職業賽事轉播的連結下,運動與媒體之間密不可分,雙方所蘊藏的商業價值是促成此種關係的重要推手(劉昌德,2005)。

回歸到 Jhally(1984)的概念,轉播權利金的基礎來源,是建構在有價運動閱聽人之上,也就是運動節目擁有穩定的觀眾基礎,「以人口學變項重新組織閱聽人」是一種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Jhally, 1987)。正因運動閱聽人之人口統計有鮮明特色,富有極大廣告價值,轉播觀賞賽因此成為提供媒體運作、運動產業的經濟推力。觀眾能被運動內容吸引和被吸引多久就成為轉播權買賣的價值考量。

而 Livant (1981) 指出「現在媒體主要的商品不是訊息而是閱聽人」,所謂閱聽人商品,就是閱聽人的時間,也就是閱聽人的勞動。閱聽人創造了商業媒體商品的價值,而閱聽人統計(譯按:收視率)決定了閱聽人商品的價格(羅世宏、徐福德譯,2017)。當資本主義把價值當做唯一道德時,精準的價值概念就會被需要(Fuchs,2014)。閱聽人商品即是閱聽人的勞動時間,而媒體企業的利潤來自閱聽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從傳播科技歷史來看,從電報、電話到網路一路發展至今的媒體結構中, 收視率只是不斷的改變形態與名稱,在廣播上即為收聽率,在電視上即為收 視率,在網路上即為流量,但,最基本的定義關係並沒有產生重大變化。

職業運動之建構,必有其歷史脈絡以及完整的制度支撐,進而形成職業聯盟。而商營媒體,基於組織以及商業邏輯的支撐下,形成一套獨立的制度,

^{1 1960}年代早期,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已是市場主流,雖然澳式足球聯盟(Australian rules football,簡稱 AFL)存在,但比賽不嚴謹,也因資助少而無法支付頂尖的球員。1964年,NFL 的電視合約需更新,三大聯播網都競逐此份合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最後取得 NFL 的轉播權。但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傳媒 NBC 環球集團,以五倍於上一份美國廣播公司(ABC)合約的價格取得轉播權。NBC 聯播網在此舉開始便知道會在 AFL 上賠錢,但為了打破 NFL/CBS 的壟斷,只好先簽了這筆合約。AFL 也因此獲得大筆轉播權利金,球員的薪水上升,也能找到實力更好的球員進入 AFL,為比賽提升精彩度,收視率反而更好。

運動制度與媒體體制,兩套體制相互纏繞,其中貫穿連結是有價運動閱聽人。 然而, Jhally (1984) 也表示閱聽人也能輕易的停止觀看運動節目。要是 有太多競爭者,媒體運動複合體是必須反映並迎合運動閱聽人的真實需求, 運動閱聽人不一定照單全收運動賽事轉播。

在 COVID-19 所引起的賽事荒下,媒體運動複合體如何維持著有價運動閱聽人的收視慣習,才有機會在賽事荒的情況下取得廣告主的廣告費。媒體運動複合體,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相互纏繞,在閱聽人商品化的基礎下,有價運動閱聽人與轉播權利金正流動於職業運動與媒體之間。社會、生產複合體、媒體運動內容及閱聽人,相互影響相互牽引。當媒體組織與運動組織,被有價運動閱聽人串起而具體呈現在媒體運動複合體時,制度之間的纏繞與進退,逼迫與合作,目的都是極大化有價運動閱聽人,運動與媒體各自形成特色,存在於市場。

二、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的文獻梳理

以媒體運動複合體作為關鍵字搜尋全國博碩十論文網以及華藝線上圖書 館,共搜得九篇博碩士論文以及五篇期刊論文。在媒體運動複合體的基礎上, 大致上分為兩大討論方向。一為資金運作加強複合體與相關環境之關係,在 實務上,廣告費與轉播權利金為實際討論形式。臺灣運動產業複合體的運作 玀輯,大致符合西方文獻中所述的渾動與資本的關係,三者間的資金流動造 成其相互依賴(連思晨,2007)。體育因媒體而廣為人知,媒體也因為運動 商業化帶來豐富的廣告利潤(施致平,2000)。而這與劉昌德(1998)看法 相同,資本主義社會中媒體/運動產製複合體的運作邏輯,是為了創造更多 的利潤。媒體依靠運動轉播與報導,增加收入,並以掌握運動組織來源的方 式,逐漸對運動發揮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而運動與媒體的互動發展,兩者之 間的關係已達到無可分割的共生關係,而臺灣特有的政治環境,使得棒球-媒體-政治的三角習題更加難解(陳子軒,1998)。運動組織、媒體集團與 企業,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而「結構化」為「媒體運動文化經濟產製複合體」, 並以「資本積累」極大化的思維,來開展全球範圍內的政經擴張策略(邱建 章,2008)。所以重點在於資金流動造成媒體、運動組織與廣告企業之間的 共生關係。而劉昌德(2017)再提出媒體運動複合體的發展停滯,導致運動 產業難有足夠資金挹注,對於運動文化的長期培養也設下障礙,停滯現象起

因於資金挹注不足。

另一些文獻則從文化批判的角度討論媒體運動複合體。邱繡霞(2001) 認為最確切的定位應是一種「全球化的美國式霸權」,是金錢和權力如何在 運動和媒體之間交相作用,輔以文化帝國主義和全球化理論,以期能了解媒 體運動的全球擴張軌跡。陳鴻嘉(2018)也提出類似的觀點,認為運動/媒 體/文化面向的全球化論述應再考慮從「文化中介者」出發的中層分析視角 討論媒體運動複合體的現象。

從臺灣的文獻探討梳理下,可看出媒體運動複合體、運動組織與廣告企業之間,因應資金流動所形成的結構對於環境影響,以及全球化下的文化批判。但隨之而來的新媒體浪潮,使得業界以及學術界更需將把焦點置於全球媒體運動複合體上,以及閱聽人角色在此浪潮的轉變與意義生成的過程(陳子軒,2013)。而全球化事件 COVID-19 導致媒體運動複合體、運動組織與廣告企業之間的關係面臨挑戰,同時也強化有價閱聽人在此結構中的角色,此時正是一個極佳的研究機會,可觀察此結構關係的發展以及有價閱聽人角色的轉變過程。

參、研究問題與方法

社會、生產複合體、媒體運動內容及閱聽人,相互影響相互牽引。當媒 體組織與運動組織,被有價運動閱聽人串起而具體呈現在媒體運動複合體 時,這其中,有運動賽事運作邏輯以及媒體運作的商業邏輯,自上世紀八零 年代以來,年復一年從來沒有被打斷過。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打斷如此連結。運動賽事荒,導致運動閱聽人無法看到固定播出賽事,沒有節目收視率,就無法賺取廣告費;沒有了廣告費,也無法支付球團轉播權利金。媒體運動複合體的運作基礎,看似被打破。

2020 年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沒有一家是因為賽事荒而倒閉²或是停止運作,但他們如何在疫情期間度過賽事荒?本研究將探討在 2020 年 COVID-19 影響下,媒體運動複合體與運動組織的因應過程以及有價運動閱聽人在疫情期間的重要性。

中職於 2020 年依舊維持賽制,完整執行 240 場以及臺灣大賽。既提供

² 臺灣福斯體育臺是因為全球經營策略被總部下令關臺,並非受到疫情影響而結束臺灣福斯體育臺的營運(受訪者B)。

穩定賽事來源,甚至在某段時間裡成為全球唯一開打的職業運動聯盟。這在 全球賽事荒下形成強烈對比。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如何運用當時所擁有獨 家轉播權,維持整體發展?

本研究誘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收集臺灣運動轉播媒體高階經理人以及 職棒團高階經理人的經驗與觀點為第一手資料(見表 1), 佐以媒體收視率調 查以及媒體報導次級資料,呈現媒體運動複合體因應 COVID-19 變化過程。

研究問題如下:

- (一) 在 COVID-19 期間,有價運動閱聽人在媒體運動複合體中的角色 轉變,以及媒體運動複合體如何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
- (二) 在 COVID-19 期間,中華職棒的有價閱聽人是否有改變?如何改 變?
- (三)中職因應 COVID-19 而發展的英語轉播,其目的與過程如何變化? 宣傳與收視效果如何?

表 1:本研究受訪者彙整

受訪者代號	所屬單位	訪談時間
A	緯來電視臺	2021年01月12日 2021年06月11日 ³
В	福斯體育臺	2121年03月03日
С	ELEVEN SPORTS 體育臺	2021年01月02日 2021年05月28日
D	ELEVEN SPORTS 體育臺	2021年01月11日
E	MOMO 體育臺	2021年05月08日
F	愛爾達體育臺	2021年12月24日
G	職棒球團代表	2020年12月20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2021} 年 6 月 11 日的緯來電視臺訪談以及 2021 年 5 月 28 日的 ELEVEN SPORTS 體育臺訪談, 資料出處為劉昌德(2020)。

肆、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的窘境與變化

本研究將 2020 年 3、4 月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所面臨到的窘境,敘述並 建構當下情境作為參考背景。

在臺灣整體來說,媒體對臺灣職業運動,尤其是職業棒球的發展,具有相當正面的影響(劉昌德,1998)。但在 COVID-19 疫情下,全球賽事暫停舉辦,媒體運動複合體也苦於沒有直播賽事可供播出。當下臺灣因疫情防疫有成,中華職棒成為當時唯一開打的世界職業運動聯盟(宇研,2020 年 4 月 14 日)。面臨世界賽事荒以及擁有獨自開打中職轉播權的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必須思考面對營運壓力的問題。

針對臺灣當下,因疫情造成的賽事停賽,本研究整理資料以建構當下的 情境,如表 2 所示。

表 2:2020年3、4月,臺灣室內聚集人數、場館的行政命令整理表

時間	大事紀
0129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DC)宣布中港澳入境師生需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
0130	學校室內活動 100 人以上延緩
0226	臺北市宣布暫緩實施大型活動集會及游泳課程
0319	新北市宣布公共封閉型場館暫停開放14天
0320	臺北市宣布運動場館採取實名制進場管理
0323	臺北市宣布市立國中、小校園平日暫停開放
0324	教育部函請各大專院校全面暫緩游泳課程
0325	CDC 宣布室內 100 人以上、室外 500 人以上公眾集會活動建議停辦
0406	臺北市宣布高中職以下校園平日暫停開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有 2020 年 3 月 24 日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Tokyo Olympic Games)宣布延期舉辦,所有奧運資格賽停止舉辦;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SEAN Basketball League,簡稱 ABL)宣布無限停賽(體路專刊,2020 年 10 月 5 日);歐洲各國足球聯賽陸續宣布延賽、停賽;職業網球聯合會(Association of Tennis Professionals,簡稱 ATP)、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簡稱 WTA)聯合聲明,表明各巡迴賽都將停賽到 2020 年 7 月

13 日(林緯平,2020年4月2日)。本研究整理2020年3、4月當時資料, 還原當下因賽事停辦媒體運動複合體遭受的窘境,如表3所示。

表 3:賽事聯盟於 2020年 3、4月重大賽事的停賽閉門整理表

時間	大事紀
0126	亞洲足球聯合會(Asi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 AFC)宣布女足東奥亞洲區資格賽移至澳洲舉辦
0215	高中籃球聯賽(HBL)八強賽閉門開打
0313	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宣布無限停賽
0309	社團法人日本野球機構(Nippon Professional Baseball,日職,NPB)開幕戰宣布延期,0619關門比賽
0310	韓國棒球委員會(Korea Baseball Organization,韓職,KBO)開幕戰宣布延期,0505 關門比賽,歐洲各國足球聯賽陸續宣布延賽、停賽。
0311	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首例球員確診,隔(12)日宣布無限期延賽
0312	中華職棒(CPBL)開幕戰宣布延期。0412 閉門比賽
0313	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開幕戰宣布延期
0324	2020 東京奧運宣布延期
0325	108 學年度全中運、全大運、109 年度身心障礙運動會宣布延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0年,臺灣籃球界也誕生臺灣男子職業籃球聯盟(P. League+, PLG), 2020年12月19日開幕戰,在民視第一臺151頻道、MOD 315頻道、MOMO TV以及 Youtube播出(周毓洵,2020年12月17日;運動視界編輯,2020年10月19日)。此時已至2020年底,全世界賽事陸續恢復正常,對於在COVID-19下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的變化討論,助益較少,因此本研究暫不引入。其他的非職業賽事,在臺灣尚有超級籃球聯賽(Super Basketball League,簡稱SBL)、學生棒球、企業排球聯賽等進行無觀眾比賽,所以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在COVID-19疫情時,並非只有中華職棒可播。

中職自從 2020 年 3 月 5 日成立中華職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小組以來,因疫情針對賽事作出賽程決議(表 4),這一些賽程決議也將影響轉播平臺的賽程轉播。其中僅中職率先決定閉門開打(王真魚,2020 年 3 月 23 日),成為全球唯一進行職業比賽(婁靖平,2020 年 4 月 21 日)。二軍例行賽首戰再現經典「龍象大戰」,卻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採取閉門賽也沒轉

播,球迷無緣觀賽(王翊亘,2020年3月19日)。直至5月8日開放200名 觀眾入場為止,球迷終可返回二軍球場,參與比賽。

表 4:中職在 COVID-19下,2020年會議決議的大事紀

時間	大事紀
0305	第一次中職防疫會議,由會長、秘書長,兩副秘書長以及五大球團領隊共同組成。
0312	第二次中職防疫會議,邀請政府官方出席會議。
0323	第三次中職防疫會議,會中決議開幕戰為閉門比賽。
0420	第五次中職防疫會議,決議只要一個球員染疫,例行賽即停止舉行。
0423	中職英語轉播於 Twitter 上進行。
0428	第六次中職防疫會議,邀體署官員討論疫情下棒球產業去向。
0508	中職是世界上第一個職業聯盟開放觀眾進場觀賽,此次開放 1,000 位觀眾。
0605	第八次中職防疫會議決議,觀眾觀看賽事時可以脫掉口罩,但走動時需戴上口罩。
0723	下半球季允許開放觀眾入場達 78% 席位。
1030	中職 31 年,240 場例行賽完整舉辦完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職為媒體運動複合體提供了穩定賽事來源。國外職棒參考中職經驗, 韓職 KBO 延至 2020 年 5 月 5 日閉門開打,日職 NPB 於 6 月 19 日閉門開幕, 大聯盟因牽扯到縮水賽程與薪資連動,直到 7 月 24 日才開賽,而中職則是 以正常賽制打完 240 場(聯合報體育組,2020 年 12 月 31 日)。

根據上述情況,2020年4月13日到5月5日,全世界只有中職提供正常賽事訊號給媒體運動複合體,在5月5日後,才陸續有其他職業聯盟,提供縮短賽程或是變化賽制的賽事。

一、 媒體運動複合體連帶關係轉弱,有價運動閱聽人地位增強

如同前述文獻探討所示,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運動組織與廣告企業因為賽事轉播而形成相互依賴的結構,有價運動閱聽人被轉換成商品,以資金形式(如:轉播權利金、廣告預算等)串流於三者之間。COVID-19的影響,全球幾乎所有職業賽事皆暫停比賽,這也讓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面臨空前挑戰:缺少大量直播運動賽事。

轉播權利金大致與比賽入場人數漲跌有所連動,程度不等地反映賽事受到球迷關注市場需求(劉昌德,2017),轉播權利金以及球場廣告都必須依賴轉播才能達到廣告效果。但沒有賽事就沒有轉播權利金,就沒有廣告收入,有價運動閱聽人也無法轉換為商品,串起三者。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廣告主以及運動組織,三者之間連結關係轉為薄弱。

國外轉播會遇到一些狀況,我們的轉播員是在停了3個月之後,才進入所謂泡泡聯盟開打,非常非常久(此指停止轉播國外賽事時間),然後再開始繼續打。這邊對緯來來說,停止國外轉播,廣告收入減少非常非常多(受訪者A)。

三月是棒球,五月是法網,都被取消了。但亞洲棒球很積極, 我們相信賽事一定會回來,但是我們要維持住收視眾的習慣,三到 六月(此指2020年)的重點是求生存,不是賺錢(受訪者B)。

大部分直播賽事消失,三者之間頓時失去連接,轉播權利金、廣告預算無從計算,有價運動閱聽人更無法按照習慣收看運動賽事。「不可以開天窗,當時最大的挑戰是要做出節目播出表……收視率有掉,因爲當時新的節目量只有三分之一,重播量過大是最主要的原因」(受訪者 B),只有維持住有價運動閱聽人,才有可能有收視率。即使如此,當時的收視率所得來的廣告收入,也轉換不了足以支撐媒體運動複合體的營運費。

即使有廣告,我也沒節目收視率可以消化廣告預算,走 CPRP⁴根本無法消化廣告主的預算。你可能拿到 100 檔廣告預算,但是實際 CPRP 只能讓你收五檔的錢 (受訪者 C)。

有收視不代表有收入,其實收入是大幅減少(此指 2020 一整年),但是中華職棒的收視率是過去三年中最好的,去年(指 2020年)中信的收視率算逆勢成長(受訪者 A)。

當下金流已無法維持三者關係時,有價運動閱聽人重要性立即增強。當下媒體運動複合體已非以獲取廣告預算為最主要的目標,就如同受訪者C表

⁴ 所謂 CPRP 是 Cost Per Rating Point 每收視點成本。業界通行的「保證 CPRP」,是讓廣告客戶 先下單,直到收視率補足才收錢。

示要維持住有價運動閱聽人,是求生存,不是賺錢。為了讓廣告預算轉換為 利潤,媒體運動複合體利用轉播權利金,迫使運動組織配合改變。受訪者C 表示:

我們非常明白向球團表示,只要球團未依約進行比賽,我們就不會依約支付轉播權利金給他們(受訪者C)。

以臺灣運動轉播情況為例「中華職棒臺灣觀眾還是會買帳的,中職收視率比 MLB 好,再來才是日職」(受訪者 D)。2020年4月13日到5月5日,中職是全世界唯一正常提供賽事訊號的職業運動聯盟,在媒體運動複合體的壓力下,中職徵求 CDC 同意並於第三次防疫會議表示「中職例行賽於4月11日開打並採取閉門比賽」。這也表示球團捨棄門票與周邊商品收入,爭取轉播權利金以及廣告贊助金。

聯盟與各球團體認爲疫情不太可能在 2020 年 6 月之前結束, 考量轉播權利金以及廣告贊助。共同決議於 4 月 11 日閉門開賽, 5 放棄票房收入 (受訪者 G)。

要轉播權利金,唯一方式就得開賽。轉播權利金促使運動組織願意為媒體運動複合體賣命,改變原本制度結構以配合媒體運動複合體的需求,2020年 MLB 以及 NPB 也是相同情況(陳是祈,2020年9月28日;謝靜雯,2020年6月15日)。在2020年3到6月中職儼然成為全世界職業賽事最大直播賽事來源,訪談資料明確表示:

2020 收視其實有變好的 (此指中華職棒)。推測因爲疫情的關係,很多國家的比賽其實都減少,再來是大家都在家有時間可以看球,所以大多數的收視 (此指中華職棒) 都是成長的 (受訪者 C)。

中職不受疫情影響,照表提供賽事,再加上疫情期間民眾都待在家中,所以收視率比2019年高。反觀日職收視表現,受疫情影響,日職賽事收視率不如往年正常(受訪者A)。

然而,受到疫情影響,有價運動閱聽人結構也隨之改變,中職因為穩定

⁵ 根據第三次防疫會議顯示,2020 年 4 月 11 日是開賽日,但因雨延賽,2020 年 4 月 12 日才於洲際球場正式開打。

耒	5	:	2019	頠	2020	中華職棒的收視狀況
イベ	J	•	2019	115	ZUZU	T == 400/14 1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球團	年度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臺灣大賽
樂天	2019	0.80	0.41	0.41	0.28	0.24	0.37	0.29	0.47	1.15
(11s)	2020		0.49	0.56	0.42	0.52	0.35	0.36	0.43	
中信兄弟	2019	0.58	0.49	0.41	0.34	0.33	0.39	0.50	0.77	0.79
緯來體育	2020		0.62	0.59	0.56	0.61	0.54	0.50	0.51	1.53
統一	2019	0.38	0.51	0.45	0.33	0.25	0.25	0.25		
(11s)	2020		0.51	0.47	0.33	0.67	0.39	0.44	0.38	1.79
統一	2019	0.23		0.08	0.11	0.16	0.10	0.09		
(momo)	2020			0.38	0.28	0.24	0.39	0.29	0.63	1.18
富邦悍將	2019		0.18	0.12	0.19	0.15	0.15	0.17	0.12	
(momo)	2020		0.39	0.40	0.29	0.27	0.35	0.32	0.43	

資料來源:ELEVEN SPORTS、緯來體育臺及 momo TV 提供,本研究整理。

表 6:2019 與 2020 中華職棒的男女收視比較狀況

	緯來體	育臺			ELEV	EN 體育	育一臺		Momo	綜合臺		
	2019	2020	TVR ⁶	PROFILE ⁷	2019	2020	TVR	PROFILE	2019	2020	TVR	PROFILE
男性	0.50	0.67	34%	-3%	0.36	0.52	44%	-7%	0.19	0.35	79%	-6%
女性	0.29	0.41	41%	5%	0.18	0.30	67%	15%	0.10	0.21	110%	12%

資料來源:ELEVEN SPORTS、緯來體育臺及 momo TV 提供,本研究整理。

⁶ TVR 全名為 TV rating,表示電視節目收視率。 PROFILE 指節目收視族群的輪廓,如性別、地區別、年齡別等。

提供賽事,收視率大幅提升,收視結構與2019年相較,結構有相當改變,如表5至表7所示:

丰 7	7 •	各年齡層的收視率與觀眾輪廓
1X /		台中欧眉的牧牧学兴眠从珊绵

	緯來覺	豊育臺	ELEVEN 體育一臺 Momo 綜合臺				ELEVEN 體育一臺					
	2019	2020	TVR	PROFILE	2019	2020	TVR	PROFILE	2019	2020	TVR	PROFILE
4-9	0.19	0.28	47%	0%	0.12	0.20	67%	50%	0.06	0.10	67%	0%
10-14	0.18	0.27	50%	0%	0.11	0.16	45%	0%	0.06	0.06	0%	-50%
15-17	0.18	0.33	83%	0%	0.16	0.20	25%	-33%	0.09	0.11	22%	-33%
18-19	0.10	0.24	140%	0%	0.09	0.22	144%	0%	0.05	0.10	100%	0%
20-24	0.35	0.33	-6%	-20%	0.16	0.23	44%	-25%	0.09	0.15	67%	-25%
25-29	0.25	0.33	32%	-20%	0.13	0.15	15%	0%	0.08	0.23	188%	50%
30-34	0.42	0.52	24%	-25%	0.22	0.35	59%	0%	0.09	0.29	222%	75%
35-39	0.40	0.82	105%	44%	0.23	0.52	126%	38%	0.12	0.44	267%	86%
40-44	0.40	0.49	23%	-11%	0.22	0.31	41%	0%	0.08	0.19	138%	20%
45-49	0.43	0.52	21%	-22%	0.55	0.66	20%	-25%	0.15	0.32	113%	13%
50-54	0.63	0.74	17%	-15%	0.33	0.57	73%	10%	0.28	0.36	29%	-31%
55-64	0.47	0.73	55%	17%	0.32	0.54	69%	11%	0.20	0.38	90%	0%
65+	0.50	0.58	16%	-11%	0.38	0.52	37%	-5%	0.21	0.30	43%	-26%

資料來源:ELEVEN SPORTS、緯來體育臺及 momo TV 提供,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5、6、7 所示,本研究整理數據與訪談資料,發現如下:

- (一) 性別分布來說, 2020 年觀看中華職棒女性觀眾較 2019 成長 5-15%, 且在收視率的貢獻上有至少 4 成的成長。
- (二)以全部收看運動賽事人口而言,收視年齡層來看,2020年所有頻 道 35-39 歲及 55-64 歲這兩個族群較 2019 的表現都是成長的,尤其 35-39 歲的收視貢獻都有較去年多 1-2 倍的增加。
- (三) 依照緯來體育臺、ELEVEN SPORTS 以及 momo TV 播出中華職棒 賽事的收視率表,僅有樂天桃猿球團八與十月,中信兄弟球團十月, 2020 的收視率比 2019 差,其餘中職賽事收視率均比 2019 上升。

因疫情,運動組織無法提供賽事,媒體運動複合體無法將有價運動閱聽 人轉化成商品,向廣告主企業收取廣告費,也無法支付轉播權利金,三者關 係逐漸式微。

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觀看賽事慣習成為疫情之下的重點,轉播權利金的轉化基礎來自有價運動閱聽人,媒體運動複合體利用各種手段維護此基礎,如改變運動的制度結構等,而有價運動閱聽人的收視結構,也因為疫情的影響、賽事改變而產生結構性的變化。

二、創新節目型態以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收視慣習

COVID-19 前節目表現方式以例行性運動賽事、體育新聞與運動專題節目為主。運動賽事皆是年度性安排,有價運動閱聽人可依照喜好安排觀賞行程,媒體運動複合體藉由觀賞賽事將有價運動閱聽人轉化為商品。廣告主與媒體運動複合體,藉由運動轉播串連起來形成整體環境體系。在 COVID-19 爆發後,媒體運動複合體急需找尋可供播出的運動類型節目,以維持運動閱聽人的收視慣習。

MLB 也知道體育臺快不行了,主動提供經典賽事,有話題球星,雜誌型專題的節目,大部分是不用付費的。當聯盟(此指MLB)認為要在第一時間中提供大型電視臺免費的節目,各職業聯盟(此指國外職業運動聯盟)沒有猶豫的直接協助各大電視臺(受訪者B)。

2020年3至6月時,運動組織與媒體運動複合體的合作重點,是共同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的存在與其觀賞賽事的慣習。面對比賽取消或是閉門比賽,運動組織只能依靠媒體接觸球迷,協助媒體運動複合體穩定有價運動閱聽人的慣習,就是協助運動組織穩定球迷。唯有如此,收視率才能順利轉換成為廣告費。而維護手段創意盡出,可見當下面臨到壓力巨大。受訪者F表示維護運動閱聽人的方法之一,是重播日本運動卡通《灌籃高手》:

那時一天播兩集,播了50天,收視率不好,觀眾不買帳,前兩天就可猜出後面的結果了。但話題性十足,創造許多新聞……灌籃高手既然無法吸引既有TA的長期關注,播一季後,我們再也不播出其他相同類型的影片(受訪者F)。

以收視率作為評價依據,但媒體運動複合體們知道此種節目類型收視率

不佳後,此種形式再也沒出現過。根據事後回訪愛爾達電視臺,其表示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曾於 2020 年 12 月 16 日發新聞稿「ELTA 體育 2 臺 109 年 3 月 26 日體育前線節目,播出《灌籃高手》節目宣傳內容,予以警告」(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2020 年 12 月 16 日)。即使在疫情下,不符合法規的節目 型態,只要有檢舉,國家通訊委員也會依照法規處罰;而根據再回訪愛爾達 電視臺,其表示灌籃高手當時的收視數字,尼爾森首播平均 0.09、最高 0.16。 數字表現不亮眼,與訪談資料相輔相成。所以各家媒體運動複合體各有測試 有價閱聽人的方式,收視率可透過收視率調查,觀看他家收視表現,收視不 佳的節目播出形式,也不會在他家媒體運動複合體出現。

播 NBA 球星打電競比賽,就是墊檔,觀眾看的出來的,墊檔的收視率就是不會好。電競比賽,正式的有賽制認證的,那種電競比賽收視率自然會好;但是播 NBA 球星打電玩遊戲,畫質又差,裝備又不齊,當然沒觀眾買單。像那個喬丹紀錄片,《最後一舞》(The Last Dance),收視還不錯,在國外這是要付費收看的耶,在國內看免費,當然有一定的市場,The Last Dance 是類紀錄片的意義,蠻符合體育臺的觀眾屬性(受訪者A)。

選手玩電競敢不敢在 cable 上播, COVID-19 給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以前不敢試的節目,在那一段期間試驗。因爲不可抗拒的疫情,所以選手玩電競,是可以被接受的,是一個話題。不要用正常專業去看這件事,電視觀眾並沒有很被動,不喜歡他們就會選擇轉臺不會硬看(受訪者B)。

以美國收視情況,在疫情之下喬丹紀錄片創 ESPN 紀錄,平均收視有500萬人數(蔡佳齡,2020年5月19日),另外,本研究以《最後一舞》(*The Last Dance*)在臺的首波收視表現,以多重證據支持媒體運動複合體須極力尋找新型熊節目迎合有價運動閱聽人的慣習的論點,如表8示:

~										
集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期	0425	0425	0502	0502	0509	0509	0516	0516	0523	0523
緯來 rate	0.48	0.55	0.58	0.68	0.26	0.44	0.33	0.50	0.75	0.80
11Sp.rate	0.13	0.28	0.15	0.17	0.27	0.10	0.14	0.18	0.05	0.14

表 8:《最後一舞》(*The Last Dance*) 2020 年於緯來體育臺與 ELEVEN SPORTS 之首播妝視率

資料來源:ELEVEN SPORTS、緯來體育臺提供,本研究整理。

在緯來體育臺首播的收視率平均表現為 0.537,在 ELEVEN SPORTS 的首播收視平均表現為 0.161,其中緯來體育臺首播時間比 ELEVEN SPORTS 的首播快了 12 個小時,所以真正首播是在緯來體育臺,收視率相對高出許多,收視數字也亮眼。但,不管是在緯來體育或是 ELEVEN SPORTS 的首播,很明顯的比愛爾達體育的《灌籃高手》首播收視高出許多。也由於有價運動閱聽人肯買單,讓媒體運動複合體在疫情期間,直播賽事短缺狀況下,願意花更多資金與精力去尋找適當的節目型態,以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的閱聽慣習。

另外,媒體運動複合體也找尋較為低階但立即可用的運動賽事。受訪者A表示「但我們只想播與中信兄弟有關的二軍例行賽」,這是因為中信兄弟的有價運動閱聽人與緯來體育臺的屬性較為相同。缺少賽事播出的情況下,受訪者A表示「製作部門也沒賽事可製作,不如選擇符合跟我們臺性很match的中信兄弟球團二軍,嘗試收視表現」,媒體運動複合體此時願意付出成本去尋找過渡性的替代題材。由此可知尋找新節目形式以維持有價閱聽人的收視慣習,是此時期的重點。播出舊有賽事也是另一方式,原因是為重播不需要付費或是花費極少。

我們反而再趁此機會將手上有版權的國際賽事,如奧運、亞運以及世足,做完整整理,一來整理版權清單,二來也可以幫今年(指2020年)的東京奧運先做暖場。重播 NBA 的經典賽事,就是要挑出有意義來播(受訪者F)。

在疫情初期下,以想像中可以吸引有價運動閱聽人的節目表現形式,如 運動選手打電競節目、專業電競賽事、以運動為主題的日本卡通片、過往賽 事重播、運動選手紀錄片,在臺灣內部尋找低階但常規性的運動賽事轉播, 並以收視率作做為評價依據逐步修改,擬定接下來數週的播出計畫。研究也 發現,大部分媒體運動複合體對於重播有收視率的經典比賽,相當偏愛。因 為除了順應現有運動閱聽人慣習,還能節省版權費,降低營運成本,也會有 廣告收入。

三、 中職英語轉播,宣傳意義大於爭取海外有價運動閱聽人

(一) 英語轉播是基於宣傳意識作為出發點

關於中職海外轉播權歸屬,截至 2021 年底為止是屬於各球團,這是必須先陳述的事實。2020 年 4 月 13 日到 5 月 5 日,在職業賽事層級,全世界只有中職能提供正常賽事訊號。此時,臺灣體育頻道商 ELEVEN SPORTS 徵得樂天桃猿球團同意,於 4 月 15 日在 Twitter 上進行中職英語球賽轉播(徐正揚,2020 年 4 月 21 日;楊啟芳,2020 年 4 月 16 日)。這是由頻道商 ELEVEN SPORTS 所發動的中職英語轉播,使用國外近用社群媒體「Twitter」以及在語言使用也以英語為主,看似為了爭取海外有價運動閱聽人與海外市場,但受訪者 C 表示:

英語轉播是爲品牌知名度以及對國外宣傳,就我專業判斷這是臺灣棒球有機會在國際上露臉,剛剛開始觀看的人次有百萬(受訪者 C)。

受訪者C明確表示,中職英語轉播是為了品牌知名度而發展出來。

「根據中華職棒聯盟統計,明天(此指2020年4月11日), 有約100名媒體人員到場,其中外國媒體約有10人,包括NHK、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都會有媒體到場,中華職棒會長吳志揚表 示,這是中華職棒推向世界的好機會」(王怡翔,2020年4月10日)。

由此可知,在疫情之下開打職業賽事,當時能躍上國際新聞,應該是臺灣防疫做的好而得以進行球賽進行正常生活,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是藉中職開打的新聞去對照各國因疫情無法舉辦球賽的窘境,這才是他國報導中職開打的新聞點。而 ELEVEN SPORTS 也為了爭取海外的收入,在美國地區將

收看中職由免費轉為收費,但僅只一天被球辦罵翻,而隔天在美國地區再更 改為免費收看(賴德剛,2020年5月8日)。

在新聞宣傳效應下,富邦悍將球團從2020年4月24日起,於富邦悍 將球團官方 Twitter 提供英語轉播;統一獅球團部分主場賽事在 ELEVEN SPORTS 體育臺的官方 Twitter 平臺播出(林曉慧, 2020 年 4 月 22 日)。

愛爾達體育臺受訪者E表示「中信兄弟球團委託愛爾達電視臺爲其製作 英語轉播訊號,所以權利交換下,愛爾達一臺也會播出英語主播球評訊號, 但也會協助中信兄弟球團將英語主播球評訊號打上中信兄弟的官方 Twitter 帳號」,此時的時間點是 2020 年 5 月 5 日。

在疫情初期的確引起國際與國內媒體大肆宣傳中職開打,由媒體運動複 合體發動的中職英語轉播,因為盲傳效應,導致球團全部跟進。本研究接下 來將以量化和質化的證據,說明英語轉播的收視狀況,以釐清宣傳與收視效 果。

(二)疫情當下,中職英語轉播賽事國外收視效果不佳

根據本研究針對 ELEVEN SPORTS 官方 Twitter,於第一階段 2020 年 5月5日擷取4月15日到4月29日,以及2021年2月11日擷取第二階段 2020 年 9 月 10 日到 11 月 5 日當下數據進行觀察。

在第一階段如表 9 所示,藉由 Twitter 觀看英語轉播的中職球賽,最長 平均觀賞時間是 1 分 03 秒,最短每天觀賞平均時間是 46 秒;而最多人觀賞 日期落在4月19日,直播觀賞觀眾人數114萬6,457人,重播觀賞人數為8 萬 5,877 人,而當日每人平均觀賞球賽時間為每人 55 秒。

第二階段如表 10 所示,藉由 Twitter 觀看球賽,最長平均觀賞時間是 7 分 13 秒,最短每天觀賞平均時間是 39 秒;而最多人觀賞日期落在 11 月 4 日, 直播觀賞觀眾人數 207 萬 6.535 人,重播觀賞人數為 4 萬 6.637 人,而當日 每人平均觀賞球賽時間為每人 44 秒。

表 9:第一階段統計,2020年 Twitter 中職英語轉播球賽數字

日期	對戰組合	直播觀眾	平均觀看時間
0415	統一vs樂天	544,767	1分03秒
0416	統一vs樂天	284,274	1分00秒
0417	富邦 vs 樂天	841,071	1分02秒
0418	富邦 vs 樂天	1,131,240	53 秒
0419	富邦 vs 樂天	1,146,457	55 秒
0424	樂天 vs 統一	593,084	55 秒
0425	樂天 vs 統一	623,376	47 秒
0426	樂天 vs 統一	575,624	52 秒
0429	中信 vs 統一	505,428	50 秒
0430	中信 vs 統一	706,125	48 秒
0501	中信 vs 樂天	753,638	56 秒
0501	富邦 vs 統一	606,916	46 秒
0502	中信 vs 樂天	796,965	51 秒
0502	富邦 vs 統一	669,749	46 秒
0503	中信 vs 樂天	630,087	49 秒

於 2020 年 5 月 5 日擷取 2020 年 4 月 15 日到 4 月 29 日的數據整理。數據會依照累積觀賞而變動。資料來源:ELEVEN SPORTS 官方 Twitter,本研究整理。

表 10:第二階段統計, Twitter 中職英語轉播球賽數字

日期	對戰組合	直播觀眾人數	平均觀看時間
1105	兄弟 VS 統一	1,496,767	39秒
1104	兄弟 VS 統一	2,076,535	44 秒
1018	兄弟 VS 樂天	1,381	5分20秒
1017	兄弟 VS 樂天	2,211	4分16秒
1016	富邦 VS 統一	1,319	4分27秒
1014	樂天 VS 統一	1,146	5分14秒
1013	樂天 VS 統一	1,465	4分33秒
1011	富邦 VS 樂天	1,648	5分11秒
1010	富邦 VS 樂天	1,251	4分24秒
1009	富邦 VS 樂天	1,345	5分17秒
1004	樂天 VS 統一	976	4分07秒
1003	樂天 VS 統一	1,399	4分38秒
1002	樂天 VS 統一	1,203	4分24秒
0929	兄弟 VS 統一	1,621	4分46秒
0927	富邦 VS 統一	1,114	5分06秒
0926	富邦 VS 統一	647	4分58秒
0925	兄弟 VS 樂天	1,853	4分40秒
0923	統一 VS 樂天	1,345	7分13秒
0922	統一 VS 樂天	1,840	5分40秒
0915	樂天 VS 統一	1,157	4分43秒
0914	樂天 VS 統一	1,820	5分07秒
0913	兄弟 VS 統一	1,253	4分53秒
0912	兄弟 VS 統一	303	1分04秒
0911	兄弟 VS 統一	1,381	5分19秒
0910	兄弟 VS 樂天	2,346	6分33秒

於 2021 年 2 月 11 日擷取 2020 年 9 月 10 日到 11 月 5 日的數據整理。數據會依照累 積觀賞而變動。資料來源:ELEVEN SPORTS 官方 Twitter,本研究整理。

以中職比賽,一場平均落於3至3.5個小時,不管是第一或是第二觀察階段最長的觀賽時間,實在不足以稱為有效觀賞比賽。富邦悍將球團受訪者G表示:「籍 Twitter 觀看富邦悍將比賽的成果並不好,觀賞人數並不漂亮的話2021年可能不製作」。愛爾達電視臺受訪者F表示「中信兄弟球團的英語轉播節目,收視率也不如預期目標。在2020總冠軍賽中,已經停止製作英語轉播的球賽訊號」。

臺灣觀眾不會用 Twitter 收看英語賽事轉播。而國外觀看中華職棒,閱覽次數多但眼球停留秒數不長,這也是在沒有 MLB 可看下,才會發生的 (受訪者 D)。

不管質化深度訪談以及量化數據都指出,中職英語轉播的確在吸引國外閱聽人上並未達到成效,在疫情開始時或有話題性,但觀賞時間上並未有效吸引國外球迷。「隨著韓職在5月5日開打,美國 ESPN 破天荒轉播後,美國球迷目光也逐漸轉往韓職」(自由時報體育中心,2020年5月28日)。在利潤獲取上「以 Twitter 轉播中職英語轉播,是收不到任何費用的」(受訪者C)。在訪談中,所有的媒體運動複合體以及職業球團均表示2021年,應該不會再進行英語球賽訊號的製作與播出。後來事實也證明2021年並沒有任何一場英語轉播的場次出現。

(三) 部分球團英語轉播資金來自政府單位

受到全球獨步開打的新聞效應影響,不管是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觀察到中職可作為宣傳工具。「桃園市政府在2020年5月1日起,補助200萬英語轉播,藉此機會讓國外球迷認識臺灣,認識桃園」(周敏鴻,2020年4月22日)。「臺南市長黃偉哲表示,職棒全世界收看率破百萬人次,這點讓人非常雀躍,日前也跟統一獅球團達成共識,繼樂天桃猿之後,臺南市政府願意繼續資助,跟球團一起維持每場英語轉播」(羅志朋,2020年5月2日)。資金來源如表11:

主場球團	播出平臺	資金來源
中信兄弟球團	中信兄弟官方 Twitter	中信兄弟球團自行出資
富邦悍將球團	富邦悍將官方 Twitter	富邦悍將球團自行出資
樂天桃猿球團	ELEVEN SPORTS 官方 Twitter	桃園市政府出資 200 萬以及 ELEVEN SPORTS 出資
統一獅球團	ELEVEN SPORTS 官方 Twitter	臺南市政府出資 200 萬以及 ELEVEN SPORTS 出資

表 11: 英語轉播資金來源一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政府資金的投入,皆由球團出面與地方政府談妥經費,經費先撥給球團,球團再撥給媒體運動複合體,進行製作英語轉播,資金投入的目的是為了宣傳當地政府政績,宣傳意識隱含其中。

「英語轉播,把政府款項算進來,只有賠一些,還在可接受的程度」(受 訪者 C)。在製作成本考量之下,若能達到損益兩平或接近損益兩平,其媒 體邏輯又會逐漸恢復平日運作方式。在疫情期間關於中職英語轉播,本研究 訪談指出,不管是球團以及媒體運動複合體都認為效果不好,無法獲取有價 運動閱聽人的關注進而產生流量帶來利潤。

媒體運動複合體、運動組織及廣告企業主,相互影響與牽引。在疫情之下中職職業賽事,使用國外近用之載具與語言,目的不是爭取國外有價閱聽人的市場而是爭取宣傳知名度。媒體組織與運動組織,制度之間的纏繞與進退,逼迫與合作,各取所需自形特色,存在於運動市場上。

伍、結論與建議

媒體運動複合體、運動組織以及廣告企業主,三者所組成的結構,操控 著賽事直播。有價運動閱聽人在觀賞賽事下化作商品,以金流形態如廣告預算、轉播權利金等形式,穿梭、鞏固三者之間的關係。隨著疫情影響,賽事 消失,三者關係轉弱,有價運動閱聽人無法成功轉化為商品,但,這也突顯 了有價運動閱聽人的價值。只有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的收視慣習,媒體運動 複合體才有機會走出疫情的影響。

媒體運動複合體不斷變更節目呈現方式,吸引有價運動閱聽人的目光。 節目呈現方式不斷試驗,從不被接受到最後找出尚能與之共處的模式,再次 驗證在媒體運動複合體、運動組織與廣告企業主三者之間,有價運動閱聽人 是中介變數。為了生存,媒體運動複合體脅迫運動組織做出運動制度改變, 而運動組織也自願被迫改變,以符合有價運動閱聽人的需求。

運動組織願意配合媒體運動複合體的要求的原因,一來是轉播權利金與廣告贊助款,在頓失門票收入下,不能再失去此兩筆為數龐大的金流。二來是運動組織以及球團可以利用媒介來維持球迷,此兩點是媒體運動複合體能有效的迫使運動組織改變的主要原因。這也符合 Jhally (1984) 認為「媒體運動複合體會進入運動領域,改變運動規則來製造更多的運動閱聽人,運動閱聽人就是這種改變的中介因素」的說法。

如何維持有價運動閱聽人維持觀看運動賽事,是疫情當下的重點。有些 職業聯盟會免費提供運動相關內容,媒體運動複合體更會竭盡所能開發新節 目,如運動卡通、運動記錄片、專業電競賽事或是運動選手打電競遊戲的節 目,甚至整理過去既有版權的賽事節目,節省開銷,或維持或開發有價運動 閱聽人。

疫情之下,部分媒體運動複合體擁有世上唯一開打的中職的轉播權利, 在成本接近損益兩平衡之下進行英語轉播,使用外國閱聽人近用的載具與語言,但研究發現,英語轉播的目的不是爭取國外有價運動閱聽人,而是國際 知名度,宣傳意識隱藏英語轉播的政策下,這也表示商業邏輯依舊持續主宰 媒體運動複合體,疫情被視為非常態下的運作方式,依舊必須為疫情過後的 環境做準備。

本研究重點關注限制於有價運動閱聽人在疫情下變化的進程,而COVID-19期間,尚有其他重大事件,如福斯體育退出臺灣、ELEVEN SPORTS的高階經理層重整、中職的第五隊加入等等,影響了媒體運動複合體與運動組織各項關係。但因與有價運動閱聽人的關係稍弱,所以暫時排除在本研究中討論。但以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傳播形定(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觀察,可將媒體以外的機構不只承受媒體作用,受中介影響的對象而已,萬物萬事皆中介,影響力絕對有,但有強有弱。以此次訪談資料為例,ELEVEN SPORTS高階經理層異動原因,是臺灣總部與英國總部對於疫情期間,中職英語轉播政策理念發生嚴重衝突而導致異動。而這一異動對之後的英語轉播以及該臺的體育轉播政策,確有極大影響,但這面向與有價運動閱聽人的關聯較小,本研究割捨不做討論。但在媒介化的大理論概念下,以形構(figuration)的方式發展,或許可以再搜集更多的資料進行分析,找出在疫情期間的重大事件是否與媒體運動複合體的整體變化有關。

可用媒介化(Mediatization)與媒介邏輯(Media Logic)的視角觀察,也可用替代、延伸、合併、適應四個構面觀察媒介化與運動之間的關係(Skey et al., 2018)。媒體運動複合體的整體變化,是「媒介與傳播的變化」與「社會和文化的變化」之間長期相互關係的過程。媒介不斷變更體裁,美學與呈現方式,與社會環境互動,並具體呈現在收視率的表現上,此時,長期被媒體運動複合體所培養出來的有價運動閱聽人,已擁有其收視的慣習。

以媒介邏輯視角出發,媒介邏輯可與其他邏輯兼容並蓄,結合成另一種 現象呈現(Krotz, 2018),例如媒介邏輯與商業邏輯,雖然這兩種邏輯本質 上就有所不同,但,皆可以透過媒介具體呈現,這一特性不就跟媒體運動複 合體中的「複合」特性相同。而學界對於臺灣的媒體運動複合體的媒體邏輯 的特性,較少探討,既然不知道以往的特性,又怎與疫情後或是未來發展的 媒體運動複合體的媒體邏輯做相互比較,而驗證假設?所以媒介邏輯在疫情 前後對照也是個可以發展研究的方向。

媒體運動複合體在疫情初發時,兵慌馬亂,各種測試都是為了迎合運動 閱聽人的慣習。當發展出最適賽事組合安排,確認能維持著運動閱聽人的收 視慣習後,疫情下媒體運動複合體的作為,與疫情前的作為或有小異,但大 致無不同,並會竭力敦促環境恢復疫情前的運動制度,以配合有價運動閱聽 人的慣習。

參考文獻

- 王真魚(2020年3月23日)。〈猿洋投威拉諾、卡本特開季一軍 尼寇力、 霸能擇一〉,《ET TODAY 新聞雲》。上網日期:2021年1月15日, 取自 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674701
- 王翊亘 (2020 年 3 月 19 日)。〈睽違 21 年龍象大戰 part 2 二軍賽先對決〉, 《蘋果日報》,第16版。
- 王怡翔(2020年4月10日)。〈中職開幕戰領先全球世界關注 外國媒體將 到場採訪〉,《SETN 三立新聞網》。上網日期:2021年1月13日,取 自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23244
- 王建興、黃國軒(2015)。〈中華職棒更換轉播權及增設轉播平臺之影響〉,《中 華體育季刊》,29(1):19-28。
- 宇 研(2020年4月14日)。〈臺灣相對防疫成功,職棒、足球賽事照常舉 辦〉,《臺灣英語新聞》。上網日期:2021年1月12日,取自 https:// 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915907
- 自由時報體育中心(2020年5月28日)。〈英語轉播熱度不再 外國球迷臺 灣職棒的國際關注度相失〉、《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1年1月20日, 取自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79615
- 李俞麟、黃蕙娟(2011)。〈中美、日、韓及臺灣職業棒球運動發展之探討〉, 《大專體育》,116:7-13。
- 邱建章(2008)。《運動全球化對在地運動主體價值的衝擊與回應》。臺灣師 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
- 邱繡霞(2001)。《媒體運動的全球策略——以 NBA 在臺灣的發展為例》。淡 江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 林緯平(2020年4月2日)。〈新冠肺炎肆虐 ATP與WTA聯合聲明:網 球巡迴賽繼續停擺〉,《ET TODAY 新聞雲》。上網日期:2021年1月 25 日,取自 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682540
- 林曉慧(2020年4月22日)。〈中職樂天紅到國外英語轉播吸5百萬人次〉,《公 視新聞網》。上網日期: 2021年1月18日,取自https://news.pts.org. tw/article/475719
- 周敏鴻(2020年4月22日)。〈桃市政府補助兩百萬樂天桃猿英語轉播賽事 到全世界〉,《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1年1月19日,取自 https://

- 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41602
- 周毓洵(2020年12月17日)。〈民視投入 PLG 轉播 19日起多平臺同步播出〉,《青年日報》。上網日期: 2022年5月3日,取自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nsidePage?chapterID=1300414
- 施致平(2000)。〈媒體與運動商業化互動關係之研究〉,《體育學報》,28: 87-100。
- 徐正揚(2020年4月21日)。〈海外吸粉3球隊都要撂英文〉,《自由體育》。上網時間:2021年1月3日,取自https://sports.ltn.com.tw/news/paper/1367684
- 婁靖平(2020年4月21日)。〈全世界首戰因雨延賽看場職棒好難〉,《聯合報》,第14版。
- 陳子軒(1998)。《美,臺棒球發展之比較研究——以媒體為中心觀點》。臺 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2012)。《臺灣運動轉播史——國族運動複合體》(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研究報告,PF10101-230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_____(2013)。《世界體系下的東亞轉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 PF10301-061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陳鴻嘉(2018)。《跨國運動的文化中介:NBA 在臺灣的擴展歷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是祈(2020年9月28日)。〈縮短賽事、改革賽制 美職棒推新政策〉, 《yahoo!新聞》。上網日期:2021年11月10日,取自https://tw.news. yahoo.com/縮短賽事-改革賽制-美職棒推新政策-100338789.html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0年12月16日)。〈NCC 裁處違法節目,呼籲媒體落實專業自律〉。上網日期:2022年1月11日,取自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5450
- 連思晨(2007)。《從運動產業複合體看運動節目的性別偏差——以 SBL 及 WSBL 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啟芳(2020年4月16日)。〈中職英語轉播全球65萬觀賞美國球迷最多〉, 《中央通訊社》。上網日期:2021年1月11日,取自https://www.cna. com.tw/news/firstnews/202004160153.aspx
- 趙晉文(2008)。《臺灣棒球運動電視轉播之歷史分析:1964-200》。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運動視界編輯(2020年10月19日)。〈P.LEAGUE+新竹熱身賽 有線電視與 Youtube 轉播寫下亮眼佳績〉,《運動視界》。上網日期:2022年5月3日, 取自 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78442
- 蔡佳齡(2020年5月19日)。〈喬丹紀錄片平均收視560萬 創ESPN紀錄〉, 《聯合新聞網》。上網日期:2022年1月11日,取自https://nba.udn. com/nba/story/6780/4575235
- 劉昌德(1998)。〈媒體在運動商品化過程中的角色〉,《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32:215-247。
- _____(2005)。〈電視運動轉播市場之分析:臺,美、英三國職業運動轉播 權利金的發展〉,《廣播與電視》,25:25-27。
- _____(2017)。〈停滯的媒體運動複合體:2014 職棒轉播權爭議中運動與 電視產業的困境〉,《傳播、文化與政治》,6:127-161。
- _____(2020)。《傳播科技變遷中的運動媒體:臺灣職棒轉播發展的文化產業分析》(科技部研究報告,MOST109-2511-H-004-009-MY2)。行政院科技部。
- 賴德剛(2020年5月8日)。〈收看中職要收費被罵翻 11 sports 再改為免費〉, 《蘋果即時》。上網日期:2021年1月25日,取自 https://tw.appledaily. com/sports/20200508/3UT32JJKZTCDW2U466OFNR7QE4/
- 謝靜雯(2020年6月15日)。〈日職完整賽成公布 央聯取消季後賽洋聯則縮減〉,《中央通訊社》。上網日期:2021年11月10日,取自http://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6150246.aspx
- 聯合報體育組(2020年12月31日)。〈2020 10大體育新聞〉,《聯合報》。上網日期: 2021年1月27日,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7005/5135221
- 體路專刊(2020年10月5日)。〈ABL上週開會 新賽季或延至2022上演〉, 《香港體育新聞平臺》。上網日期:2021年11月3日,取自http://www.sportsroad.hk/archives/312446
- 羅世宏、徐福德譯(2017)。《社群媒體批判理論》。五南。(原書 Fuchs, C. [2013] .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age.)
- 羅志朋(2020年5月2日)。〈又一好消息!統一獅主場賽事全都有英語轉播〉,《自由體育》。上網日期:2021年1月26日,取自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152971

- Fuchs, C.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tledge.
- Jhally, S. (1984). The spectacle of accumulation: Mater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ports/media complex. *Critical Sociology, 12*(3), 41-57.
- _____ (1987). The code of advertising. Routledge.
- Krotz, F. (2018). Media logic and the mediatization approach: A good partnership, a mésalliance, or a misunderstanding?. In C. Thimm, M. Anastasiadis, & J. Einspänner-Pflock (Eds.), *Media logic(s) revisited* (pp. 41-61). Palgrave Macmillan.
- Livant, B. (1981). On a historical turning-point in marking audiences-ascommodities. Brooklyn College.
- Maguire, J. (1991). The media-sport production complex: The case of American Football in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315-355.
- Skey, M., Stone, C., Jenzen, O., & Mangan, A. (2018). Mediatization and sport: A bottom-up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 Sport*, 6(5), 588-604. https://doi.org/10.1177/2167479517734850
- USA Today (2020, October 8). Falling TV rating across most sports? Here are four reasons to explain drop during pandemic. Retrieved October 23, 2021, from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sports/media/2020/10/08/pandemic-why-tv-ratings-sports-have-been-down-since-returning/591372 0002/?fbclid=IwAR2WiIbTgt6w5nWHQmRB36 YwFIflckVor0J_wPGcdIu1N_XqxM9NFHi9wo

本文引用格式

- 許彥輝(2022)。〈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在新冠疫情下之變化歷程:以中華職 棒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2(2):35-65。http://dx.doi.org/10.5 3106/222114112022071202003
- Hsu, Y. H. (2022). The changing course of media-sport complex in Taiwan under the COVID-19: The case of CPB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35-65.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 2003 [Text in Chinese]

附錄問卷

臺灣媒體運動複合體在新冠疫情下之 變化歷程

訪談大綱

電視平臺業者與工作者

- (1) 請問電視平臺於 2020 年 COVID-19 疫情之下營收現況與展望?
- (2) 請問電視平臺之主要觀眾人口特質?主要廣告主類型?在 2020 年 3-6 月前後,有何實質不同?
- (3) 請問請問電視平臺之 2020 年賽事轉播概況? 尤其是在 2020 年 3-6 月前後,有何實質不同?
- (4) 請問電視平臺 2020 年轉播之營收概況(廣告收入、收視率、收視觀眾人口特質、廣告主類型等)在 2020年 3-6 月的狀況又如何?
- (5) 請問電視平臺在遇到 COVID-19 後的應對策略 (如與其他國內運動頻 道之區隔、轉播賽事尋找規劃、廣告策略因應、閱聽人的策略)?
- (6) 請問目前製播過程概況與內容策略?
- (7) 請問臺灣運動轉播電視在 COVID-19 之下,對於市場前景的看法?

The Changing Course of Media-Sport Complex in Taiwan Under the COVID-19: The Case of CPBL

HSU, Yen-Hui Alex*

PhD Student,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COVID-19 from March to May 2020, the shortage of sports games weakened the links among media-sports complexes,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advertisers. The profitable audience thus became significantly more important. Sports organizations followed the changes initiated by media-sports complexes for two purposes. First, they want to maintain their profitable audience (or fans). Second, they want to continue earning broadcasting royalties. The media-sports complexes experimented boldly with a variety of programs to maintain the viewing habits of the profitable audienc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during the pandemic, there was a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profitable audience, and the audience became more influential. Thus, maintaining the viewing habits of the profitable audience became the current focus of media-sports complexes. Under the epidemic, CPBL was the only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in the world that was still running its regular season. In addition, CPBL even created its English-language broadcast. However, the goal of the English-language broadcast was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brand recognition rather than to attract more oversea viewers to become its profitable audience. Twitter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nglish-language broadcast did not gain popularity among its foreign audience. This was the main reason why English broadcasting was discontinued in 2021.

Keywords: CPBL, profitable audience, English-language broadcast, media-sports complex, broadcasting royalties

* E-mail: oceangreat999@hotmail.com Received: 2021.09.07; Accepted: 2022.05.14







串流運動:新冠疫情下臺灣運動紀錄片之 發展脈絡與契機 *

安碧芸**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副教授

摘要

在疫情期間,講述籃球的《最後之舞》(The Last Dance)紀錄片掀起一股觀看風潮,本研究藉此契機,梳理臺灣運動紀錄片發展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條件,再則透過文本分析及深度訪談,發掘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及策略。研究發現,臺灣運動紀錄片拍攝項目雖以「棒球」居多,但整體上仍具備多樣性與獨特性;議題則多偏向於偏鄉青少年教育困境及運動輸贏「價值」,不若國外同類型影片的取材廣泛。而在臺灣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間,因為強烈的商業考量,被播放的本土運動紀錄片重覆性極高,因此實難做為發展臺灣運動文化的常態播映管道,一如在主流院線播放;拍攝、行銷等關注者應當依據影片特性及目的,將規模較小且具專業特色的影音串流平臺,以及社群影片分享平臺納入推廣選項,以達到觸及更多網路觀眾之目的。

關鍵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運動紀錄片、臺灣運動文化、影音串流平臺

投稿日期: 2021年02月28日;接受日期: 2022年07月05日







本作者誠摯感謝接受訪談之紀錄片工作者、匿名審稿委員、主編夏春祥教授、客座主編陳子軒教授的寶貴建議,以及《傳播研究與實踐》編務、出版團隊的協助。

^{**} E-mail: piyunan@gm.cyut.edu.tw

壹、緒論

2020年3月11日,美國職業籃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猶他爵士隊(Utah Jazz)中鋒魯迪·戈貝爾(Rudy Gobert)檢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陽性反應後,NBA隨即宣佈無限期停賽。隨後,美國其餘職業聯盟及世界體壇各項賽事主辦單位相繼做出停賽或延後的決定。突然之間,全世界的運動賽事幾乎都因為疫情而暫停。對於全世界運動經濟而言,無疑是歷來遭遇過的最大衝擊。除了主辦單位的收入或聯盟及球團的營收受到影響之外,需付出高額轉播權利金購買轉播權的媒體,尤其是專門轉播運動賽事的運動頻道更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對於以觀看運動賽事作為習慣性休閒活動的觀眾而言,也難以接受没有球賽的生活日常。

在全世界的運動賽事幾近停擺的狀態下,美國有線電視運動頻道 ESPN (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 將原訂於 2020 年 6 月 推出 與 Netflix 聯合製作,記錄麥可·喬丹(Michael Jordan)在芝加哥公牛隊 (Chicago Bulls)1997-1998 賽季爭取第六度 NBA 總冠軍過程的運動紀錄片《最後之舞》(The Last Dance),提前至 4 月 19 日播出。影片播出後的高收 視率,以及在社群媒體上引發的各類討論話題,更掀起一股運動紀錄片風潮。這樣的背景是本文的動機緣起,期望促成運動紀錄片的凝視與更多的討論。

經對照「Taiwan Docs 臺灣紀錄片資料庫」、邱建章(2020a)的研究資料以及報章雜誌相關報導,在過往20年間,臺灣至少製作58部曾在院線、電視臺、影展或網路播出之運動紀錄片,其中也不乏在票房或口碑上獲得肯定的作品。在受疫情影響而延期至2021年舉行的東京奧運上,因為李智凱在男子個人鞍馬項目拿下銀牌,讓其參與的運動紀錄片再度受到關注。他過往參與的兩部紀錄片包括9歲時就立志參加奧運的《翻滾吧!男孩》及21歲時展現對體操努力及堅持的《翻滾吧!男人》,在奪牌後隨即登上國內影音串流平臺的排行榜片單。如同傳播學者魏玓在一篇運動紀錄片文化分析的文章中寫道:「紀錄片以真實人物爲對象,也讓觀眾對主要人物的競賽輸贏結果更多一份參與感和期待感」(魏玓,2010,頁136)。

然而,無論是國外的《最後之舞》或是國內的《翻滾吧!男孩》,都讓 運動紀錄片在疫情期間成為臺灣觀眾談論的話題之一。

另一方面,電影映演業受到疫情影響,多間影城相繼停業,在地中小型 戲院也宣告關閉(郭一,2022)。疫情期間,原有一部關於拳擊的運動紀錄 片《逆者》預定於 2021 年 4 月底在院線上映,但因國內疫情轉為嚴峻,因而被迫延期。以致於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3 月之間的 25 個月中,並無任何臺灣運動紀錄片於院線上映。

基於上述,本文探究始於疫情期間出現的運動紀錄片風潮,再以國際與臺灣兩相比對的方式,分別描述美國紀錄片型態蓬勃發展與成熟社會的關聯,以及在1999年上映的第一部具有作者觀點的臺灣運動紀錄片《紅葉傳奇》以來,包含在公共頻道、商業電視臺、戲院與數位平臺上的各類播映情形,以迄於在疫情階段中,經歷東京奧運轉播等產生的運動文化發展等,終極關懷則期待藉由運動紀錄片的討論與反思,指向不斷變化中的臺灣社會。

貳、文獻探討

一、西方運動紀錄片的發展背景

電影與電視具備兩項主要功能,其一是通俗娛樂的大眾文化,其二是訊息傳遞和記錄功能。運動成為電影記錄的內容可追溯到 1897 年《科貝特一菲茨西蒙斯冠軍爭奪戰》(The Corbett-Fitzsimmons Fight),¹ 整場賽事被當作一部電影拍攝,由於長度超過 90 分鐘,還被視為史上第一部長片(Library of Congress, 2021)。在電視機及衛星直播尚未問世前,紀錄片是觀賞比賽的唯一途徑,因此,大型賽事如奧運及世界盃等,均會被拍攝下來,日後再於戲院放映(李卓倫,2008)。

當奧運透過電視衛星實況轉播後,觀眾可從電視上觀賞到更快、更直接以及更近距離的賽事內容,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仍委託舉辦城市製作官方紀錄片。其中,由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1902-2003)執導的《奧林匹克》(Olympia)以及市川昆(Ichikawa Kon,1915-2008)拍攝的《東京世運會》(Tokyo Olympiad),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奧運紀錄片。有別於賽事轉播被賦予涵蓋比賽過程與結果的目的性,兩部紀錄片除了在運動美學上的貢獻外,1936年柏林奧運及 1964 年東京奧運特殊的時代背景——納粹威權壯大崛起的宣示以及二戰侵略國兼戰敗國的重生(李卓倫,2008),透過紀錄片的拍攝與剪

¹ 影片內容為兩位拳擊選手 James Corbett(1866-1933)和 Bob Fitzsimmons(1863-1917)當時於內華達州(Nevada)所進行的重量級拳王爭霸賽。

輯,呈現出具有觀點的歷史意義及運動賽會背後所代表的意識型態。

當電視成為運動賽事主要的收視載體後,紀錄片與運動之間便不再侷限 在賽事記錄、回顧或集錦,進而成為種族、性別或階級弱勢的發聲管道(李 展鵬,2014),並透過觀察運動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和意義,探究 運動相關的價值、規範、權力運作和社會階層如何形成限制與創造的可能性, 促使觀眾對特定議題或人物進行深度檢視與思辨,進而產生行動的意圖。

北美與歐洲國家是全球紀錄片最主要的生產地與消費市場,主要成因包括悠久的發展歷史與健全的產業環境(洪健倫,2016),例如,強大的公共電視系統或官方組織,提供高額資金補助紀錄片製作(林木材,2006)。1994年美國公共電視臺(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推出由肯·伯恩斯(Ken Burns)執導的運動紀錄片 Baseball,仿效棒球「九局」的概念,全片分成9集。除「第一局」介紹十九世紀的美國職棒發展外,其餘各集皆以10年為一個單位,將該時期的棒球發展與同時間美國發生的重大事件連結,藉以說明棒球對美國人甚至對美國文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其中涉及種族、勞資關係等議題,共吸引 4,500 萬人次觀看,成為 PBS 史上最多人觀看的節目(王思捷,2018年11月24日)。

同年,PBS 播出由導演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以 5 年的時間 跟拍兩名對籃球懷有憧憬的芝加哥(Chicago)青少年的《籃球夢》(*Hoop Dreams*),影片反應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非裔居民所面對的困頓與磨難,將 未來都寄託在上大學、打籃球,或是進入 NBA,但是最終能達成夢想的人 卻是少之又少。英國紀錄片研究者弗雷澤(Nick Fraser)觀影後的感受是:

一小時過後,我感覺我認識了他們;一個半小時後,我覺得對 Chicago 的教育體系有了通盤的理解 (王冠人,2013)。

就如紀錄片學者郭力昕所強調,紀錄片可以帶觀眾進一步理解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進而將議題拉到下一個層次的問題意識,而非問題的表面而已(洪健倫,2014a)。該片因廣獲好評,也在院線進行商業映演,因此開啓其他探討社會議題的紀錄片在戲院上映的機會(Ellis & Betsy, 2006;轉引自李道明,2013)。廖金鳳(2010)指出,《籃球夢》讓紀錄片的敍事自此之後趨向劇情片化。

1990年以後,隨著有線電視壯大,多頻道的特性提供紀錄片更多製作、播出的機會,例如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以及沒有廣告干擾的付

費有線電視頻道,如 HBO(Home Box Office)。而其中最積極投入運動紀錄片的有線電視頻道為 HBO 與 ESPN。HBO 為建立頻道之獨特性,於成立初期大量購買電影版權,但因獨家版權競爭激烈,形成成本壓力,便開始轉向製作原創內容,包括運動紀錄片。拍攝內容涵蓋甚廣,從主流運動一籃球、美式足球、棒球等到拳擊、網球及女子足球,記錄對象包括各領域球星、單一球隊或是世仇對抗。由於付費頻道的特質,在內容上也相對較為開放,挖掘其他頻道不願觸碰的社會敏感話題,包括社會偏見與歧視、社會衝突及體壇醜聞等。

以製播運動娛樂為主的 ESPN,除了轉播運動賽事外,另一方面也對版 權內容進行再次運用,加強賽事周邊報導 (傳媒深度報告,2018)。在二十 世紀結束前,ESPN 製作一個系列節目——SportsCentury, 選出該世紀最重 要的 50 位運動選手,透過訪談及比賽歷史片段回顧,印證其地位及貢獻。 此外,於2008年播出長度4小時的紀錄片——Black Magic,呈現種族隔離 時期就讀或服務於傳統黑人大學(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BCU)的籃球選手及教練的生活和遭遇。Richmond (2008, March 13) 認 為,這部影片將運動置放於它應屬於的革命性社會脈絡中,突顯出在 1940 到 1960 年間美國黑人所經歷鮮為人知但慘痛、漫長日悲苦的歲月,以及黑 人球員在追求平等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ESPN 透過運動紀錄片找 到拓展新觀眾、穩固原有觀眾以及建立品牌形象的方向(唐思思、肖儼衍、 2018)。2009年, ESPN 推出 30 for 30 系列節目, 2 雖收視率無法與賽事直播 相比,但較低的製作預算,卻能獲得專業影視獎項的肯定以及提昇品牌價值。 其中由埃拉·艾德曼(Ezra Edelman)執導的《辛普森:美國製造》(O. I.: Made in America),以7小時47分鐘的篇幅講述 O. J. Simpson 在1995年震 驚全美的弑妻案,另也透過 O. J. Simpson 的崛起及敗落,分析美國長期的種 族糾結,進而觸及到社會問題、司法體制以及大眾心態。該片獲得2017年 第 89 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成為繼 2012 年的《再接再厲》(Undefeated) 後, 另一部獲得此獎項的運動紀錄片。

王思予(2016)將紀錄片歸類為文化鑲嵌強之電影類型,意即影片中帶 有較強母國之文化特質,若非當地生活者,可能較不易理解。因此《辛普森: 美國製造》及《再接再厲》也並未因奧斯卡獎項的肯定而獲得在臺灣院線戲

² 此系列節目為30部運動紀錄片,每部長度為1小時,並邀請到各方創作者參與拍攝,使得這30部紀錄片透過紀實及反思提供觀眾不同的角度審視運動以及以及其中所衍生出的社會文化。

院上映的機會。1990年代中後期,HBO及 ESPN 進入臺灣有線電視市場,卻也鮮少播映美國母公司製作的運動紀錄片。鄭淑文(2007)認為跨國頻道需透過節目內容引起民眾的興趣及共鳴,進而產生廣告收益,因此在挑選、編排節目時,需考量節目輸入國的市場及觀眾喜好、需求及輸入國與輸出國間的文化差異。

全球化趨勢下,好萊塢的運動電影及主流職業運動賽事,經由全球的播映,傳遞美式價值如個人英雄主義、勝利主義,或是以「美國夢」為形式的國家主義。各方在探究全球化時代的運動影像相關議題時,多著眼於跨國媒體集團構成的媒體/運動複合體所造成之影響,以及好萊塢運動電影文本所展現的文化意涵,紀錄片相較之下鮮少被提起或討論。也由於多數紀錄片不具海外市場或缺少票房營收,偏向處於本土化狀態,整體而言,並不具明顯的全球化特徵,直至影音串流平臺的崛起。

二、跨國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上的運動紀錄片

2006年,全球電商龍頭亞馬遜 (Amazon) 決定跨足影音服務,推出 Amazon Prime Video 串流平臺。隔年,全球線上最大 DVD 租片業者 Netflix 也啓動線上串流媒體服務,並取名為 Watch Now, 訂戶每個月只需支付8到 10 美元,便可從個人電腦上無限制觀看電影與電視影集。2008 年由美國國 家廣播環球公司(NBC Universal)、新聞集團(News Corp.)及其他多家媒 體共同成立的葫蘆(Hulu)也加入競爭行列(吳凱琳,2012 年 7 月 6 日)。 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影音串流平臺產業快速成長,並對有線電視產業產生 直接的衝擊。2018年全球影音串流平臺服務訂戶達到6.13億,首度超越有 線電視的 5.56 億訂戶 (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9)。 2021 年底,全球最多人使用的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Netflix,全球訂閱 戶已經高達 2.2 億, 其中 7,520 萬用戶(佔總數 34%)位於北美洲(Netflix, 2022)。影音串流平臺對有線電視產業造成巨大威脅,但對某些內容類型的 影響卻相對有限,例如具有即時線性播放需求的新聞頻道及提供運動賽事實 況轉播的體育頻道(賴逸芳、林韋葳,2020)。直播運動賽事更是有線電視 服務組合中最主要賣點,甚至被形容為有線電視最後的「堡壘」之一(中央 通訊社,2019 年 10 月 29 日)。

多年來,各平臺便希望能把觸角伸進運動轉播市場。但在轉播權利金及

技術投入等營運成本考量下,運動紀錄片因而成為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踏入運動領域的第一步。2015 年 Amazon Prime Video 跟拍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亞利桑那紅雀隊(Arizona Cardinals)完整16 場季賽與季後賽,並推出紀錄片 All or Nothing: A Season with the Arizona Cardinals。有別於賽事轉播,觀眾透過紀錄片清楚看到球隊在球季前到結束間在場上及場下的起伏。推出後獲得好評,後再以同樣的製作型態轉向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Premier League),以曼徹斯特城足球俱樂部(Manchester City Football Club)為拍攝對象,製作成 All or Nothing: Manchester City,之後也持續推出 This is Football 等足球相關紀錄片。

Netflix 對於運動紀錄片的投入也毫無遲疑。2016 年推出首部原創紀錄片《最後機會大學》(Last Chance U),³但影片並非記錄球員們的人生翻轉,而是觸及到美國社會,教育及大學運動員多項層面的問題。之後 Netflix 也將鏡頭轉向足球,將義大利足球甲級聯賽(Lega Serie A)尤文圖斯足球俱樂部(Juventus Football Club)於 2017 至 2018 年球季達成七連霸的過程,拍攝成 First Team: Juventus,類似 Amazon Prime Video 的 All or Nothing。同年也推出《桑德蘭球魂不滅》(Sunderland 'Til I Die)及《博卡青年:場外機密》(Boca Juniors Confidential)等足球紀錄片。

在 2018 年第 90 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由布萊恩·福格爾(Bryan Fogel)執導,講述俄羅斯禁藥風波的《伊卡洛斯》(*Icarus*),成為第一部代表影音串流平臺獲得奧斯卡的運動紀錄片,⁴ 也是接續在《辛普森:美國製造》之後,連續獲獎的運動紀錄片。而次年,則由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出資,記錄攀岩運動家亞歷克斯·霍諾爾德(Alex Honnold)征服 3,200 英呎「酋長岩」(El Capitan)的《赤手登峰》(*Free Solo*)獲獎。將向來鼓勵議題性導向作品的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一連三年頒予運動紀錄片,顯現運動題材多元而豐富的面貌以及故事性與議題性兼具的特質,成為具備商業價值的影片類型。

³ 本片講述 East Mississippi Community College (EMCC) 的美式足球隊教練 Buddy Stephens 招募在學業、經濟及生活發生問題的球員,協助他們獲得四年制大學獎學金,甚至進入職業聯盟。

⁴ 本片為 Netflix 在 2017 年於全球最大獨立電影節 Sundance Film Festival 以 500 萬美元購入。

三、疫情下的國際運動紀錄片

最能吸引有線電視付費用戶的「運動賽事轉播」,在 2020 年 3 月無預警的陸續「消失」。受到疫情造成的社交隔離所限,以往的休閒活動方式多不被允許,於是人們黏著在各式螢幕前的時間也隨之增加。提供豐富多元節目內容並又賦予觀眾高度時間及內容自主權的影音串流平臺,已然成為疫情期間居家娛樂的重點選擇之一。美國市場調查公司 Morning Consult (2020)於疫情爆發初期針對自認為「球迷」的民眾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41% 受訪者在無賽事可看期間,將運動紀錄片列為首選的替代品,其次為報導與新冠肺炎相關的體育新聞,第三則是經典賽事回顧。

在NBA宣佈停賽的 40 天後,2020 年 4 月 19 日,ESPN 播出與 Netflix 聯合製作的《最後之舞》。這部 10 集的紀錄片影集,以每週兩集,連續五周的方式播映。第一集及第二集分別吸引全美 630 萬及 580 萬名觀眾收看,成為 ESPN 史上收視率最高及最多人觀看的紀錄片(Lopez, 2020, April 20)。在《最後之舞》結束一週後,ESPN 連續兩週播出因使用禁藥而極具爭議性的自行車選手藍斯·阿姆斯壯(Lance Armstrong)的紀錄片——Lance。同一天,美國高爾夫頻道(Golf Channel)則是推出老虎伍茲(Tiger Woods)在 2000 年到 2001 年之間,於 294 天內贏得四大滿貫賽頭銜過程的紀錄片——《老虎大滿貫》(Tiger Slam)。9 個月後,HBO HD 頻道及 HBO GO 影音串流平臺則推出另一部伍茲的紀錄片——《老虎伍茲》(Tiger)。2020 年 11 月 25 日足球明星迪亞哥·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1960-2020)去世,Discovery 頻道在一個半月後推出《球王馬拉度納的殞落》(What Kills Maradona)。以往在運動頻道或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皆未被視為主打節目的運動紀錄片,瞬時成為疫情期間各方的宣傳重點。

因為疫情,各大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獲得突如其來增加的訂閱人數,但如何維持與提昇節目內容的多元性、數量以及品質則是伴隨而至的挑戰。無論是 Netflix 或 Amazon Prime Video,在疫情期間均積極尋找各種題材。因此,在製作過程中不需用到大量的工作人員與演員、製作成本較小且製作週期較短的節目類型,便成為首要選擇(Chan,2020 年 12 月 17 日)。紀實創作型態加上《最後之舞》的催化,運動紀錄片因而成為疫情下最受關注的影視內容類型之一。

在 2020 年, Netflix 新增付費訂閱戶中, 83% 來自北美以外地區, 其

中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佔41%,亞太地區居次,佔25%(Andre, 2021)。 事實上,Netflix 早在疫情發生之前,便將促進國際成長列為首要目標,並 制定國際市場的原創內容在地化策略。Netflix 創辦人里德·海斯汀(Reed Hastings)於2019年韓國東協特別峰會上就揭示:

Netflix 的走向和多數電視公司或製片廠大相逕庭。以美國娛樂公司爲例,他們一般都將海外市場視爲美國內容的輸出地。但 Netflix 早已深刻認知,任何地方都能孕育出精彩的故事,好的內容 也能跨越地理疆界,獲得全球觀眾的喜愛(Netflix 臺灣,2019 年 11月26日)。

疫情發生後,Netflix更確認「在地化」或「在地全球化」的發展策略(楊卓翰、林佳誼,2020)。但相較於劇情片,紀錄片的原生性與在地性又更為明顯,不論是在地觀眾的接納程度抑或是向外輸出,都相對不易。疫情期間引發熱議的《最後之舞》是以Jordan 在全球運動市場影響力、球技以及個人魅力為賣點,其他運動紀錄片應難以創造相同效應。而運動本身所激發的歸屬感或認同感,使得運動紀錄片在文化流動上更具特殊性,因而也值得更多的討論。

四、臺灣運動紀錄片的發展脈絡

在194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臺灣紀錄片的拍攝單位僅限於政府機構,與三家無線電視臺,拍攝內容也以國家建設、節慶典禮及政令宣傳等為主(王慰慈,2007)。1968年,獲得全省少棒冠軍的紅葉少棒隊以7比0擊敗訪臺的關西代表隊,隨後在臺灣掀起風潮。具有公營身份,當時負責攝製臺灣省政府相關新聞片、紀錄片與教育片的臺灣省新聞處電影製片廠,便接獲指示拍攝關於紅葉棒球隊奮鬥故事的紀錄片(謝仕淵、謝佳芬,2003)。此時棒球在臺灣不只是一項運動,也被賦予國族宣傳的功能。同時期其他與運動相關的影像記錄還包括《亞洲鐵人楊傳廣》、《楊傳廣與紀政一人一元運動》等。李道明(2007)指出當時所拍攝的記錄影像,多以熱門時事為主,缺乏探討較深刻的社會、心理及文化層面的各種問題。王慰慈也對此時的紀錄片表達個人看法:

由於戒嚴的體制,新聞片的製作類型以配合政策之報導體爲主要風格,幾乎不觸及任何有關個人觀點的分析或以人性爲出發點的議題討論。……觀眾都是處在單一接收訊息的觀影地位,被告知了很多事情,卻無法深入去體驗這些影像中的人、事物,也缺乏探討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感情上的交流(王慰慈,2007,頁11)。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電影產業因經濟自由化造成產量及票房下滑,片廠制度逐漸瓦解,無論是劇情片或是紀錄片,開始進入獨立製片時代。1998年公共電視開播,隔年便開設一週一集,每集一小時的《紀錄觀點》節目,成為當時臺灣唯一常態播映紀錄片的平臺,也成為紀錄片主要製作源頭及映演場所(范宜如,2013)。此後,臺灣紀錄片走向由民間產製,並成為為底層社會與社運場合發聲的公共平臺,進入到電視紀錄片與獨立紀錄片階段。

1999年由蕭菊貞導演拍攝的《紅葉傳奇》,雖以臺灣棒球風潮的起源——紅葉少棒隊為主題,但不再是形構國家認同的統治者意識形態,而是以回顧當年叱咋球場的選手長大後的際遇,從過往美好回憶與現今殘酷事實中反思臺灣棒球夢及教育現場實境(范宜如,2013)。該片獲得1999年第36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為臺灣運動紀錄片揭開序幕。隔年出現同樣關於棒球運動、教育及價值觀的紀錄片——《冠軍之後》,曾文珍導演呈現被世界冠軍及國家榮譽綁架的少棒選手,其童年時期的生活如何因成人世界的價值觀而幾乎被剝奪殆盡(林木材,2012)。

然而由於《紀錄觀點》長期收視率不佳,再加上播放頻率偏低及首播後的重播時段冷門(洪健倫,2013a),無法達到紀錄片工作者所期望能與大眾溝通之目的,紀錄片工作者開始思索以院線上映的方式拓展映演管道。在2001年國片全年票房市佔率僅有0.2%(文化部,2020),國片產業長期陷入谷底。吳乙峰導演在2004年以921地震為題材的紀錄片《生命》獲得千萬票房,交出超越劇情片的亮眼成績。自此之後每年便有許多紀錄片依循商業模式於院線上映。國內劇情片的沉寂讓臺灣紀錄片順勢從邊緣文本進入到舞臺中央,適時填補市場空缺(邱莉玲,2017年9月25日)。最早登上院線的運動紀錄片為2005年林育賢導演以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小7位體操隊學生訓練過程為拍攝內容的《翻滚吧!男孩》,不只一舉取得票房上的成功,更獲得2005年第42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隔年,楊力州導演與張榮吉導演拍攝的《奇蹟的夏天》,延續運動紀錄片的氣勢,創下近新臺幣300萬左右的

票房(行政院新聞局,2007),也獲得 2006 年第 43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2008年共有3部運動紀錄片在院線上映,包括《態度》5、《征服北極》6 及《野球孩子》,前兩部是國內運動紀錄片首次以具有知名度的團隊或選手為拍攝對象。影評人林木材(2009)認為,《態度》僅能稱為幕後紀實,而《征服北極》則因未能提供較深刻的觀點,而成為一部講述北極冒險的家庭娛樂片。對於國內紀錄片學者或影評人而言,這類以較通俗敍事手法,訴諸感性或夢想的運動紀錄片是為了在現實的商業環境中生存,因而迴避對被攝議題進一步的深層討論,已逐漸失去紀錄片之本質(洪健倫,2013b)。

《野球孩子》則採取截然不同的敍事方式。雖是以棒球作為拍攝題材,但沈可尚導演及廖敬堯導演表達的並非熱血與追夢,而是透過記錄國小球員的童年,呈現出當時臺灣社會中「教育」、「原住民」、「城鄉差距」等議題(楊皓鈞,2008)。本月雖入圍2009年第46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但票房卻不如預期。沈可尚導演指出,由於一開始就設定以電影形式發行,已經比較靠攏商業、大眾,並不是全然採作者形式(楊皓鈞,2008),「我以爲我那樣同時兼顧我藝術形式的需要,但實際上印證到票房上是非常慘烈的……」(張士達,2013)。沈可尚形容自己在進行《野球孩子》剪接時的左右為難:

站在「藝術紀錄片之形式」以及「站在觀眾理解的角度」兩艘船上,不曉得哪邊比較好,有點像暈船(林木材、Kite,2009)。

2013年再有運動紀錄片登上院線,分別為《看不見的跑道》、《正面迎擊》以及《拔一條河》,前兩部在臺北地區的票房並不理想,但《拔一條河》卻達千萬票房,並入圍 2013年第5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正面迎擊》記錄臺灣業餘摔角聯盟成員的人生際遇,讓觀眾透過鏡頭窺見被攝者在尋求自我認同時內心的摸索、困惑以及挫折,被形容為「近年院線難得一見的題材」,加上對於「真實」的辯證,因而帶入電影美學上的思考(洪健倫,2013b)。鄭秉泓給予《正面迎擊》的評價是:

許多環島風光紀錄片或熱血運動接案片永遠達不到的尺度,因 爲它是如此活生生,如此血淋淋(鄭秉泓,2019,頁166)。

⁵ 以臺啤籃球隊為主軸,記錄時間從2006年球季該隊在總冠軍賽失利的那一刻起,直到隔年於總 冠軍賽逆轉勝,奪下冠軍為止。

⁶ 記錄運動健將林義傑與劉柏園、陳彥博,三人挑戰攝氏零下 40 度、長達 650 公里、預計費時 21 天的北極極限長征之旅。

但特殊的選題卻也造成缺乏基礎受眾,因而在票房上受挫(洪健倫,2013a)。鐘權導演認為《正面迎擊》已經是具有商業的製作方式及思維,但因定位不清,而導致商業失敗(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2016)。當時負責發行的李亞梅則指出,《正面迎擊》屬於冷門題材,並不適合走院線發行的管道,只因受限於國內輔導金規定,必須上院線放映(洪健倫,2014b)。

當年與《正面迎擊》在敍事方式及票房成果形成強烈對比的《拔一條河》,卻被評論者認為是遵循著 2004 年以來臺灣紀錄片的「溫情」 路線(黃香,2013)。針對國內運動紀錄片,林木材提出他的看法:

歡笑、淚水、努力、挫敗、勵志的正面價值,總在這些以「競賽」爲主軸的紀錄片裡成爲主角。雖然我們總強調著,勝敗不是最重要的,但競爭落敗後的失落,或競爭奪勝後的歡樂,卻總是被戲劇性的手法強化,「比賽」彷彿成爲了一種拍攝前提。以比賽爲始,也以比賽落幕。拍攝初衷的侷限性自然地迫使影片裡的「勵志」成分提高,甚至成爲單一的終極價值,其他面向的複雜問題也因此被簡化了(林木材,2009)。

在《拔一條河》之後,較受討論的運動紀錄片則有《翻滾吧!男人》、《後勁》及《出發》。《翻滾吧!男人》是《翻滾吧!男孩》的延續,雖票房没有前部亮眼,但卻是國內第一次拉長時間跨度的運動紀錄片。《後勁:王建民》記錄王建民球員生涯後期,尋求重返大聯盟的過程,票房達 600 餘萬,也入圍 2018 年第 55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本片屬傳記紀錄片,拍攝對象也是國內運動紀錄片中,最具知名度的王建民,也由於美國職棒的背景,使得本片具有不同於其他國內運動紀錄片的優勢。而記錄極地超馬運動員陳彥博的《出發》,則創下 1,500 萬的票房成績,也成為疫情爆發前,最後一部在院線上映的運動紀錄片。

事實上,紀錄片要進入院線並非易事,國內電影院排片向來以美商優先,再來依序是獨立片商劇情片、藝術片,最後才考慮紀錄片(李盈穎,2018)。1999-2020年間未在院線上映的臺灣運動紀錄片至少有43部,包括14種運動項目,其中又以棒球為最大宗,共15部,其次登山、足球以及排球各有3部。綜合國內院線和非院線的運動紀錄片後發現,2005年的《翻滚吧!男孩》可被視為分水嶺,在此之前臺灣僅出現4部運動紀錄片,但在之後,幾乎每一年都有運動紀錄片問世。可見《翻滚吧!男孩》不僅激勵運動

紀錄片登上院線,也鼓勵更多創作者投入拍攝運動紀錄片的行列。

公共電視《紀錄觀點》以播映委外製作影片為主,多部運動紀錄片也都曾於此播出,在 2007 至 2010 年間便有《下一秒無限》、《場外之內》、《聽見 2009》及《揮棒》等片。在自製節目方面,則僅有 2006 年適逢臺灣棒球發展百年推出的《臺灣棒球百年風雲》系列。除公共電視外,另有 3 部運動紀錄片於國家地理頻道播出——2 部為公部門委製標案及 1 部政府合作計畫。前者為偏向宣傳性質的《透視內幕:臺北聽障奧運》及《透視內幕:臺北世大運》;後者則為由新聞局、外交部聯手製作,探討臺灣年輕棒球選手逐夢美國大聯盟過程的《綻放真臺灣 6:終極英雄—邁向大聯盟》。由於國際紀錄片頻道是以全球觀眾為目標對象,為讓觀眾可得到統一性的感受,著重敘事與鋪陳的系統化,屬於「看不到導演」的製片平臺(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2013)。與臺灣紀錄片一向由導演主導片長、敍事方式及鏡頭美學,朝向獨立發展的形式有顯著不同。

此外,電視臺一向嚴格的規範節目時間長度,以《紀錄觀點》播放的運動紀錄片為例,每部長度均在50-60分鐘之內;國家地理頻道則訂在45分鐘,如此一來也會限縮創作者的自由度。此外,電視觀眾所追求的並非深度的藝術作品,較偏向大眾化,因此間接影響紀錄片創作端的類型定位、創作邏輯與美學形式(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2019);電影型態紀錄片則在美學上朝向獨立發展,較不受限制。另也因為觀影空間的不同,電視紀錄片必須要更有效率,或更有策略的去論述創作者意圖呈現的議題,讓觀眾較容易理解和接受(傅榆,2007)。

近年來部份國內運動紀錄片開始在免費影音分享平臺播放,如YouTube。其大量、隨時、不斷累積、低成本的分享傳送特質,為資源有限的國內運動紀錄片開拓另一個播映管道。楊力州導演直言,在新媒體上,影像連結可以被不停地複製轉發分享,影片被觀看的數字將會非常驚人,所以紀錄片創作者一定不能缺席(張景泓、施佑倫,2020)。目前約有6部臺灣運動紀錄片可在YouTube上觀看,分別為《夢想離我4公尺》、《夢想的角落》、《被看見之前》、《那一年》、《那年·南山》以及《夢想打擊出去》。國內最先上傳到YouTube的運動紀錄片為企業贊助拍攝的《夢想離我4公尺》。除了企業之外,地方政府也開始利用運動紀錄片進行政績宣傳,例如《那一年》便是桃園市政府以平鎮高中棒球隊,宣傳其棒球推廣政策。

國內提供線上賽事轉播的麥卡貝網路電視也曾嘗試拍攝運動紀錄片,

《那年·南山》記錄南山高中男子籃球隊參加 108 學年度高中籃球聯賽,最終獲得季軍的過程。《那年·南山》與《那一年》皆效法 Netflix 的系列影集方式,兩部的各集長度皆在 20 至 25 分鐘左右,也就是將內容分割為數個簡單模組,易於閱聽眾沉浸。CNEX 創辦人蔣顯斌認為,影像走向輕薄短小將成必然,網路世代觀眾也將更習慣碎片性的內容(吳尚軒,2019)。紀錄片美學勢必也將因網路時代而產生改變,如同陳亮丰(2000)所提到的,新的藝術生產力問世,主流業界之外的生產空間被打開,新的紀錄片將會出現。

國內在運動紀錄片上的研究一直較為缺乏,直至王思閎(2009)以《翻滾吧!男孩》及《態度》進行有關情節、語意素及意涵的討論。陳冠云(2009)探索在臺灣紀錄片發展的可能策略時,提及《翻滾吧!男孩》在產製、發行及映演時遭遇到的困境,包括觀眾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以及映演場域與拍攝資金的缺乏。蘇威銘(2014)則以楊力州導演的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奇蹟的夏天》及《征服北極》。研究結果發現楊力州的紀錄片從電視跨入院線後,在產製、敍事及文本內容風格與形式上均有所轉變,因此認為「播映場域的轉換對於楊力州而言的確造成許多影響,使其紀錄片在院線市場形成許多限制與壓力」(同上引,頁95)。

邱建章(2020a)也察覺以利潤為重的商業邏輯可能逐漸邊緣化傳播媒介的公共利益原則,但不同於蘇威銘(2014)擔憂院線的制約,將造成紀錄片從影像的實踐性意義上抽離,邱建章(2020a)反而認為進入院線的《奇蹟的夏天》及《翻滾吧!男孩》可讓與運動相關的公共議題引發文化反思、行動而成為改變的利器。也因為爭取到媒體流通版面,將可使更多社會大眾接觸近用,進而實質擴散運動紀錄片的影響範圍(邱建章,2020b)。

在議題方面,相關研究特別偏重在兒少、青少年及原住民運動員的生活情境探究,包括《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魏玓,2010)、《由運動紀錄片《奇蹟的夏天》反思男童運動社會化歷程與教育意涵》(許貞雯,2010)、《紀錄原鄉:臺灣運動紀錄片的再現模式分析》(陳中淋,2013)、《臺灣紀錄片中的兒童形象:論《野球孩子》、《翻滾吧!男孩》、《拔一條河》》(許家綾,2017)、《看見兒少——臺灣棒球紀錄片研究》(楊尚謙,2020)。上述研究經常採用影像文本分析或符號學分析,試圖了解運動紀錄片中呈現的社會文化意義及再現模式,以及對於國家體制進行的反思與批判。魏玓(2010)便透過分析《翻滾吧!男孩》、《奇蹟的夏天》及《野球的孩子》直指臺灣運動紀錄片因顧及「好看」而淡化影片中青/少年背後

的社會階級問題。

回顧臺灣運動紀錄片發展的途程,1999年在《紅葉傳奇》的帶領下揭開序幕,後續的導演們也都試圖透過運動題材,探究臺灣運動環境及教育制度層面的問題。由於運動紀錄片在歐美國家的播映管道多為電視和影展,所以得以保有紀錄片的社會意義、社會責任、美學形式與敍事觀點。但在臺灣,電視作為紀錄片傳播管道的重要性卻一直未獲重視,以致部份運動紀錄片在院線上映時,商業利益、藝術品味價值、參與社會改革與實踐及創作自由之間的矛盾也就因此產生。臺灣運動紀錄片在電視產業脈絡中一直難以有所發揮,故也無助於解決紀錄片選擇在院線上映時所面對的困境。隨著網路的普及、行動網速的提昇再加上疫情的催化,大眾的收視行為由電視、電影,已經轉移到影音串流平臺。臺灣運動紀錄片在新舊媒體交替之際,或可開始嘗試更多不同的敍事方式,尋求轉型及在新媒體時代尋找定位。

參、研究方法

具體而言,本文之研究目的有二。首先,梳理臺灣運動紀錄片發展的歷 史脈絡與社會條件,著重於映演管道、形式與內容、商業市場、文化價值及 社會責任等各方力量的交錯過程,以期作為瞭解臺灣運動紀錄片的發展基 礎。其次,透過國內、外運動紀錄片在影音串流平臺上的發展現況,發掘臺 灣運動紀錄片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及策略,尤其是在帶動臺灣運動文化的發 展上,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法為主,深度訪談法為輔,進行在跨國影音串流平臺—Netflix、國內 4 間主要影音串流平臺及 YouTube 上之國內外運動紀錄片的文本分析以及訪談 3 位較少出現於資料內容中之運動紀錄片創作者。受訪者包括運動紀錄片《教練》的李家驊導演、《那年·南山》的呂權紘導演以及《後勁:王建民》的吳海韜攝影師。李家驊導演早期的紀錄片作品曾於公視放映,近年的作品則進入院線放映,也在國內主要影音串流平臺上架;呂權紘導演則曾於網路運動平臺服務;吳海韜攝影師除了拍攝工作外,也參與《後勁:王建民》在國內外的推廣、發行,3 人的經驗均有助於理解運動紀錄片在串流平臺發展上的重要背景與關鍵因素。透過深度訪談期能獲得更詳細的第一手資料,以利探討臺灣運動紀錄片未來的發展及策略。同時,為增進研究的信實性,亦蒐集與國內、外運動紀錄片相關之專書、報章雜誌資

料、學術論文研究及政府資料來源,例如行政院文化部之出版品、論壇及專 屬網頁資料等,與文本資料及訪談內容,進行對照及相互佐證。

肆、研究分析及結果

一、 運動紀錄片在 Netflix 的現況與分析

在跨國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方面,本研究將以在臺灣訂閱戶所佔比例高達 49.1%的 Netflix (文化內容策進院,2021)為研究對象。根據於 2022年3月15日所做的統計,⁷在臺灣 Netflix 上架的運動紀錄片,共計 64部,其中單集運動紀錄片為 41部,系列影集則有 23部。其發行年份分佈如圖 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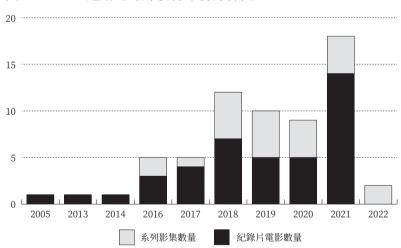


圖 1: Netflix 運動紀錄片發行年份分佈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自 2016 年第一部運動紀錄片系列影集問世後, Netflix 其後每一年都維持製作一定數量的系列影集,特別是 2018 年可視為是重要的分水嶺。即便在疫情籠罩的 2020 年及 2021 年, Netflix 仍持續推出全新/新一季系列影集。

⁷ Netflix 授權的節目與電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製片公司,除了 Netflix 的原創作品外,其他作品皆有可能因為授權協議的因素而下架。故統計結果並不完全呈現該年度之運動紀錄片製作情形。

系列影集單季集數從 3 到 9 集不等,每集長度也無明確規定,例如《Formula 1: 飆速求生》(Formula 1: Drive to Survive)每集約 40 分鐘,《亞倫·赫南德茲:美國橄欖球星殺人案》(Killer Inside: The Mind of Aaron Hernandez)則是 66-68 分鐘,相較於電視臺對於節目長度的限制,影音串流平臺顯得較有彈性。Netflix 第一部原創運動紀錄片系列影集《最後機會大學》至 2020 年已播出 5 季,是目前平臺上歷時最長的系列影集。系列影集含括的題材有賽車、啦啦隊、籃球、足球、美式足球、網球、格鬥、板球、鬥牛及其他類共計 10 項,其中以足球為主題的最多(6 部),美式足球與其他類皆為 4 部,賽車及籃球則是 2 部。運動類型分佈如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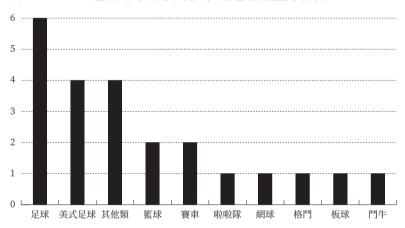


圖 2: Netflix 運動紀錄片系列影集之運動類型分佈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凱度洞察臺灣(2020)分析用戶觀看習慣時發現,觀眾對於「影集/連續劇」黏著度高,是 76%的觀眾會選擇的節目類型。因此在運動紀錄片發展路徑中,Netflix 也遵循「原創影集」、「原創電影」的既定策略。

在運動紀錄片電影(單集)方面,多為 2016 年至 2021 年間所製作,其中又以 2021 年的 14 部最多。電影的拍攝題材較系列影集更顯多元,高達 23項,足球同樣是被拍攝最多的題材,共計 5部,其他依序為籃球 4部,拳擊、體操及棒球皆為 3部,田徑、健美、單車及摔角則為 2部(圖 3)。

不論是電影或系列影集,拍攝題材還是多以歐美主流運動項目為主, 特別是全世界興趣人口最高的足球,早已成為 Netflix 最主要的拍攝重點主 題。另針對全世界運動人口僅次於足球,92% 愛好者來自南亞的板球運動(Reuters, 2021, August 10), Netflix 則是在 2019 年製作過一部系列影集《板球狂熱》(Cricket Fever: Mumbai Indians)。此外,也透過每集 20-30 分鐘的系列影集《全球競賽之旅》(Home Game)介紹包括吉爾吉斯(Kyrgyzstan)、剛果(Congo)等 8 處極為特殊並具地方特色的傳統運動項目。

進一步分析 Netflix 上運動紀錄片之來源國別後發現,美國佔最多數, 共計 42 部,所佔比率達 65.6%,居次的法國、印度及臺灣皆僅 3 部,英國、 義大利及墨西哥則為 2 部 (圖 4)。

臺灣運動紀錄片想要進到 Netflix,事實上並不容易:

因爲國外的紀錄片就夠多啦!我的解釋啦,就是他們的在地化,其實還是要看市場,還是要挑可以吸眼球的。然後如果要拍運動,就是他會拍 Michael Jordan,我拍周柏臣,那要怎麼比呢?就大家一定會看 Michael Jordan 。還有,院線片如果(下片後)要進Netflix,你要有相當的票房成績,他才會覺得這個是有觀眾要看的,沒有觀眾要看的東西 Netflix 不要(李家驊,2021)。8

Netflix 在評估與在地創作者或內容商合作時,主要考量的兩項重要因素,其一為創作者過往是否已有傑出作品,其二是敘事方法與內容是否可以跨越國界、能夠引發集體共鳴(Chen, 2016)。攝影師吳海韜談到《後勁:王建民》在臺灣 Netflix 的上架經驗:

《後勁》是牽猴子(電影發行商)去簽的,牽猴子丢給 Netflix,他們懂得這些。如果是我們自己(製作團隊)丢給美國 的 Netflix,他不會看,因爲我們只是一個過氣的球星(吳海韜, 2021)。⁹

若再針對 23 部系列影集的來源國別分析,發現集中於 6 個國家,其中 又以美國 17 部 (73.9%) 最多,其次為英國 2 部 (圖 5)。顯見運動紀錄片 系列影集目前尚無法如同戲劇節目一般,擴大在地化內容版圖,例如韓國電 視劇/影集,形成 Netflix 所期待的「在地全球化」。不論是運動紀錄片的運 動類型或來源國別,都顯示出美國影視工業在影音串流平臺上的強勢主控。

⁸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 年 09 月 24 日。

⁹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 年 06 月 2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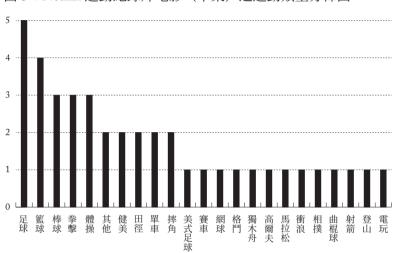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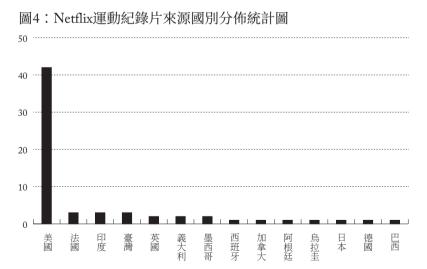


圖 3: Netflix 運動紀錄片電影(單集)之運動類型分佈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即使 Netflix 為了進入各國市場,推出在地性內容,但實際上也只占內容資料庫的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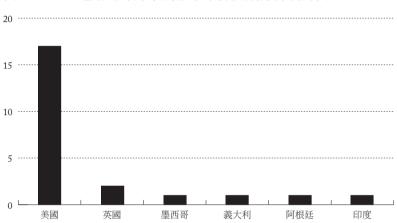


圖5: Netflix運動紀錄片系列影集來源國別分佈統計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目前在臺灣 Netflix 上的亞洲運動紀錄片共計 7 部,其中 3 部來自印度,分別為《板球狂熱》及《女人我最強》(Ladies First)、《兆分之一籃球夢》(One in a Billion),1 部日本運動紀錄片《相撲小姐》(Little Miss Sumo),3 部臺灣運動紀錄片——《翻滾吧!男孩》、《翻滾吧!男人》及《後勁:王建民》。《翻滾吧!》系列在 2021 年東京奧運舉行前並未在 Netflix 上架,而是當李智凱在東京奧運獲得體操男子鞍馬賽事銀牌後,才吸引 Netflix 的目光,進而購買播映權。然而,上架到 Netflix 並不等同於邁向國際市場,因有許多作品 Netflix 僅是購買臺灣地區的播映權。

《後勁:王建民》則是在地運動明星參與全球化職業運動項目的題材模式,此一模式也可在其他亞洲運動紀錄片中發現。例如《兆分之一籃球夢》講述 19 歲的印度籃球選手 Satnam Singh Bhamara 參加 2015 年美國 NBA 選秀的過程,最終成為首位在印度出生、入選 NBA 的球員。上述兩位球員既是全球化運動體系下的一份子,但同時又受到在地的認同所牽引。透過在地熟悉、認同的選手較易於打入當地市場,另一方面西方主流職業運動背景,或也有助於將紀錄片帶向全球。

亞洲選手近年來雖在國際競賽中獲得可觀成果,多位選手亦在世界各大

職業運動聯盟表現出色。但在某種程度上,亞洲仍處於運動邊陲地帶,歐美則佔據核心位置。現階段臺灣選手在國際運動紀錄片市場上仍缺乏號召力:

臺灣沒有國際型的運動明星。如果鈴木一朗的話,臺灣人會想看,韓國人也會想看,但陳金鋒對日本人就沒有吸引力了……。然後臺灣最紅有國際性的是戴資穎,可是羽球沒有商業市場,所以要拍戴資穎也很難有(外國)人看,除非就是你要拍到很熱血,我覺得還是有難度(李家驊,2021)。10

我不希望《後勁:王建民》只是一個華人電影,建民是洋基的主力投手,爲什麼只是一個華人的電影。只是那個時候這部片被接受的影展都只是亞裔。我們是 Los Angeles Asian Pacific Film Festival 觀眾票選、Vancouver Asian Film Festival、Asia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的 Centerpiece,但這些都是 Asian,爲什麼只是這些人接受(吳海韜,2021)。¹¹

二、運動紀錄片在國內主要影音串流平臺上的現況與分析

臺灣目前約有 25 家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其中 70% 為國內平臺。國內平臺可分為三種經營模式: (1) 電信經營模式,包括 Hami Video、FriDay 影音、MyVideo, (2) 集團經營模式,則有 Catchplay+ 與 KKTV, (3) 有線電視或頻道商經營,包括公視+、Vidol TV、ELTA.TV等(唐子晴,2020)。其中又以屬於電信三雄的 Hami Video、MyVideo 與 FriDay 影音及積極投資臺灣原創內容並與華納(WarnerMedia)旗下串流影音平臺 HBO GO 合作的 Catchplay+ 為國內主要的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根據本研究於2022年4月1日的統計,在上述4個影音平臺上架的運動紀錄片,如圖6所示:

¹⁰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年09月24日。

¹¹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年06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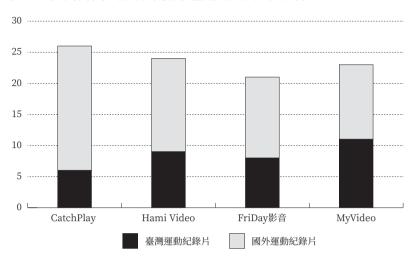


圖 6:國內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運動紀錄片統計圖

4家平臺在運動紀錄片的數量上並無太大差異,皆為 20 餘部,但與Netflix 的 64 部相去甚遠。上架數量最多的為 CatchPlay+ 的 26 部,其次為Hami Video 的 24 部,MyVideo 則有 23 部,FriDay 影音最少,為 21 部。但若只聚焦國內運動紀錄片,上架最多的是 MyVideo 影音的 11 部;最少的則為 CatchPlay+ 的 6 部。各平臺上的國內運動紀錄片呈現高度重覆(表 1),其中 7 部在 4 個平臺上均有出現。¹²

對臺灣運動紀錄片而言,國內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顯然成為下了院線後另一個販賣作品的長期管道。從現實層面來說,曾於戲院放映的作品在後續的推廣及發行上明顯有較多機會。預算及知名度較低,題材也因較不符商業取向而未能在戲院上映的運動紀錄片,對於以「流量的基礎下尋找投資內容」的平臺經營者而言,並不是優先的選擇對象。但在上述 11 部國內作品中,除了具有歷史定位的《紅葉傳奇》外,在 2022 年上架的《出口:夢想肢戰》及《我們的球場》,則是平臺上僅有不曾在戲院上映的作品。前者是以身障棒球隊為拍攝對象;後者則是關於臺灣女子棒球發展 20 年的過程,特別是女性在棒球運動上所遭遇的性別標籤。過往未在院線上映的運動紀錄片,可直接走向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的並不多見,或許此種模式在未來可成為國內運動紀錄片的播映常態。

^{12 《}後勁:王建民》在2021年之前亦在4家國內影音串流平臺上架,後因授權到期而下架。

月名 平臺	Hami Video	FriDay	MyVideo	Catchplay+
紅葉傳奇	✓	√	√	√
翻滾吧! 男孩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奇蹟的夏天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征服北極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拔一條河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單車天使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翻滾吧! 男人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出發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夢想海洋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出口:夢想肢戰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我們的球場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checkmark

表 1:國內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上的臺灣運動紀錄片

在 Hami Video、FriDay 影音及 MyVideo 上,不只國內運動紀錄片的雷同性高,國外紀錄片亦是如此(圖 7)。在 Myvideo 上的 12 部國外運動紀錄片,都可在其他平臺上看到;獨特性最高的則為 CatchPlay+,共有 15 部是獨家上架,主要是因與華納媒體的合作,因此片單中多為 HBO 製作的運動紀錄片,其中也包括系列影集,例如 8 集的《瘋運動》(State of Play)系列。題材上涵蓋全球知名球星,如《大鳥與魔術強生:不是冤家不聚頭》(Magic & Bird: A Courtship of Rivals)、《天鉤賈霸傳奇》(Kareem: Minority Of One)等,影片內容必然也充滿著西方價值觀及運動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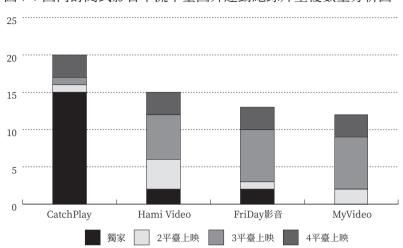


圖 7:國內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國外運動紀錄片重覆數量分析圖

在國外運動紀錄片方面,其中有3部在四個平臺均有上架,分別為《球神梅西》(Messi)、《平昌冬季奧運》(Yes Pyeong Chang)、及《千錘百煉》(China Heavy Weight)。《球神梅西》是一部半紀錄半劇情片,主角本身也是高度全球商業化的職業足球明星;《平昌冬季奧運》雖是韓國紀錄片,但記錄內容也是極具全球化特徵的奧運賽事。而獲得2012年第49屆金馬獎的《千錘百煉》則是記錄兩位年輕中國拳擊選手及其教練三人在拳擊路上的人生片段。這部由中國與加拿大合作拍攝的運動紀錄片,不僅展現全球化及在地化的實踐,也證明具藝術性及批判性的運動紀錄片在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上的可能性。影評人鄭秉泓將《千錘百煉》與強調「夢想」及「熱血」的臺灣運動紀錄片做了比較:

《千錘百煉》似乎又是一部在臺灣早已司空見慣、講述夢想理當如何如何的熱血運動紀錄片。張僑勇花了不少篇幅去勾勒片中三個(嚴格來說應是兩個)核心被記錄者的夢想,可喜的是《千錘百煉》並未像多數把「夢想」兩字無限上綱的臺灣紀錄片那般,粗率地、狡詐地、懶惰地用「夢想」來概括一切……。張僑勇再一次地藉由不同個體相異的人生際遇,折射了變動中國所面臨的處處矛盾(鄭秉泓,2014)。

針對本十題材的運動紀錄片要如何跨越文化差異,讓世界其他角度的觀 眾也可以接受,張僑勇導演的看法是:

一部好的國際紀錄片須要能後 (夠) 和全世界的當代議題展開 對話。對《千錘百煉》而言,我們的亮點在於影片呈現了東西方世 界對於拳擊運動不同的視角,透過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從微觀的角 度出發,透過拳擊這個非常洋派的運動來探索當代的中國(洪健 倫,2014c)。

另一方面《千錘百煉》的製作成本約為 90 餘萬美金, 是臺灣紀錄片的 十倍以上(鄭秉泓,2014)。團隊因此參加多個國際紀錄片市場展和影展尋 找資金挹注,張僑勇導演很明確的知道,作品必須「要讓投資者覺得拍攝 主題有觸及全球觀眾的潛力,而不僅只吸引太特定區域的觀眾」(洪健倫, 2014c)。而李家驊導演在國外提案的經驗則是:

如果是電視臺的提案,很明顯,比方說日本的 NHK 或是韓國 的 KBS。就是他們的第一個考量都是,我的本土觀眾對這個有沒有 興趣? (李家驊, 2021)。13

國內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折年來開始將觸角延伸至原創內容,但多偏向 戲劇,特別是電視劇集。可從 Catchplay+ 執行長楊麗貞及 MyVideo 影音事 業處副處長邵珮如的訪談中可找到原因:

.....戲劇能讓消費者產生黏性,一個故事能讓消費者停留更 久、忠誠度更高,戲劇的質感一直在進步,拍攝的預算、品質都有 顯著進步,有時候跟電影不相上下,所以我們覺得要稍微轉型 (邱 莉玲,2019年3月14日)。

目前投入的内容以戲劇爲主,因爲流量比較大,電影也有,只 是電影對 OTT 平臺的關聯性比較沒那麼直接 (芬多經, 2021)。

至於紀錄片,除了 MyVideo 宣佈與 Discovery 合作時,稱雙方未來或有 機會合作本土自製節目(林淑惠,2020年8月27日),其他國內平臺則未見 有關自製紀錄片的具體規劃。

¹³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年09月24日。

國內有 3 個偏向知識影像的平臺也可看到臺灣運動紀錄片,分別為公視 +、想映電影院以及 Giloo 紀實影音平臺。公視 + 將公視成立至今所累積擁有版權的影音內容納入,因此在平臺上有曾在《紀錄觀點》中播出的《揮棒》、《軌道之外》、《登峰造極》以及《夢想巔峰》等 4 部運動紀錄片。由佳映娛樂電影發行公司創立的影音平臺——想映電影院,則是以全球的獨立製片、藝術電影、影展片和紀錄片為主要片型。但目前僅有《出發》一部國內運動紀錄片及 4 部與其他影音串流平臺重覆的國外運動紀錄片。另外,以影展片與紀實影像為主體的 Giloo 紀實影音平臺,在「運動」類別中,可搜尋到 4 部國內運動紀錄片,包括《軌道之外》、《出發》、《翻滾吧!男孩》及《翻滾吧!男人》及 2 部國外運動紀錄片——《千錘百煉》及《日本摔角女》(Gaea Girls)。

在這些串流平臺,你會發現在裡面紀錄片真的都是配角。原本 是要專心做紀錄片的 Giloo,現在也有劇情片了,他們已經有一些 盈利壓力的時候,最後還是只能屈服 (李家驊,2021)。¹⁴

三、 國內運動紀錄片在 YouTube 上的現況與分析

依據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統計,共計有 6 部臺灣運動紀錄片可在 YouTube 上觀看,觀看人次統計如表 2 所示:

衣 2. 連動紀球片 You Tube 上觀有人 数統計衣				
片名	上傳日期	(集次) 觀看次數		
夢想離我 4 公尺	2012年5月31日	205,948		
夢想的角落	2016年8月28日	197,905		
被看見之前	2018年10月26日	130,291		
那年・南山	2020年3月20日	(第一集) 221,832		
	2020年3月27日	(第二集) 181,375		
	2020年4月03日	(第三集) 129,034		
	2020年4月10日	(第四集)125,268		
	2020年4月17日	(第五集) 157,283		
	2020年4月24日	(第六集) 135,680		

表 2: 運動紀錄片 YouTube 上觀看人數統計表

¹⁴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 年 09 月 24 日。

片名	上傳日期	(集次) 觀看次數
夢想打擊出去	2020年8月31日	1,646,472
那一年	2020年11月30日	(第一集) 90,964
	2020年11月30日	(第二集)44,497
	2020年11月30日	(第三集) 62,963
	2020年11月30日	(第四集)36,777

在 YouTube 上的 6 部臺灣運動紀錄片,每部或每集都有累積超過 35,000 觀看次數,單集累積觀看次數最高的為《夢想打擊出去》,超過1,600,000次。 依國家電影中心公告,票房達 1,500 萬的《出發》,累積票數為 68,064 張, 《翻滾吧!男孩》及《奇蹟的夏天》當時在臺北市的總票數分別為 16,665 及 14,802 張(李道明,2013)。若以《夢想打擊出去》的觸及率計算,相當於 可獲得超過4億的票房。15 楊力州也看到影音分享平臺對於紀錄片所帶來的 可能幫助:

電視與新興媒體的確是紀錄片最好的平臺,因爲免費,而且觸 角廣泛。……假如今天一家四口想到電影院看「拔一條河」,要怎 麼做?他們必項勻出一個空檔,至少三小時,移動、買票,光票價 就一千多元。觀眾到電影院看一部紀錄片對他們而言代價是非常大 的。……在這個節骨眼,我們有兩條路可走:繼續發展院線紀錄片, 或將電視與新興媒體的紀錄片的平臺做起來(楊力州,2014,頁 221-222) •

累積近 95 萬觀看次數的《那年‧南山》,也是國內最早以系列影集方式 呈現的運動紀錄片之一。該片導演呂權紘提到當初的製作動機:

我覺得運動紀錄片需要不一樣的型態被大家看見。這樣的型態 很少人去這樣做。可是如果有一個人去這樣做,兩個人也這樣做, 或許未來是一個可以做的常態。因爲我很喜歡看 Netflix,我老闆 也喜歡。我就有跟他討論說 Netflix 的《Formula 1: 飆速求生》這 個型熊很棒,他看的是《最後機會大學》。就是說這樣一個類型是 比較美式影集的方式,然後短短的。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決定這樣進

¹⁵ 若票價以每人 250 元計算,一億票房相當於 40 萬觀影人次。

行。那時候就設定5到6集,因爲我們公司(麥卡貝)是網路電視,以我們對於觀眾的了解來說,網路上大家習慣就是20-30分鐘。所以我們就設定20-30分鐘的情況下,去交待每一集的故事(呂權紘,2021)。16

美國運動紀錄片透過豐富的資源以及高度商業化的管道進入臺灣,雖可能形成對於媒體產業或社會文化的威脅與入侵。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臺灣的觀眾,包括運動紀錄片工作者有機會接觸更多元的運動影像型態,或也可能有助於臺灣運動紀錄片的創新。《後勁:王建民》的導演陳惟揚在開拍前也參考以蝴蝶球高手提姆·威克菲爾(Tim Wakefield)及迪奇(R. A. Dickey)為拍攝對象的 Knuckleball,還有關於原本被受期待的籃球選手克里斯·赫倫(Chris Herren)如何克服毒癮,找尋重生的 Unguarded(江佩凌,2019)。攝影師吳海韜補充說明透過觀看國外運動紀錄片尋找靈感的過程:

我那時候先看了一堆什麼 Knuckleball 啊,都是一些基本的大聯盟出版的棒球紀錄片。後來我發現我們不應該看棒球紀錄片。 It's not a baseball documentary,它是一個 human story。後來他(導演陳惟揚)給我看 Steve Nash 就是那時候太陽隊的控球,他那時候受傷然後出錢跟拍的一部紀錄片,非常簡單,搞不好可能就一個小機器這樣拍,然後很大膽。你要講缺點,它有一大堆缺點,但它就是好看。它的 raw energy,就是惟揚要的(吳海韜,2021)。¹⁷

最後,對於臺灣運動紀錄片的未來,呂權紘認為新興媒體並非是絕對的 答案:

我們(麥卡貝)在播運動紀錄片其實完全沒有優勢,網路上太多影片被觀看,我們在網路上的平臺其實很小眾。因爲其實在網路看東西的都是速食主義者,我覺得臺灣紀錄片市場真的很小(呂權紘,2021)。18

而李家驊則是認為相較於其他類型,運動紀錄片其實是有較多機會,但 問題的癥結點是臺灣紀錄片的環境。

¹⁶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 年 07 月 05 日。

¹⁷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年06月27日。

¹⁸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 年 07 月 05 日。

運動紀錄片相對是討喜的,因爲它視覺的動態比較夠,也就是 說它在視覺上看起來比較活潑,所以相對容易吸引觀眾進場。但是 說運動紀錄片做不做得起來,我覺得算是相對有機會的,但問題是 臺灣整體的紀錄片環境太差了。所以我覺得要做運動紀錄片之前, 紀錄片的 base 要先建立起來,對運動紀錄片才會更有幫助(李家 驊,2021)。19

伍、結論

疫情期間《最後之舞》填補當時運動賽事留下的空缺,帶動收視及話題, 也展現運動在西方社會中如何深化成為凝聚社會文化主體的動能。運動紀錄 片的適時發揮,除了西方深厚的運動文化底蘊外,還要歸功於歐美電視產業 長期以來稱職扮演主要製作源頭及映演場所,使其產業高度成熟發展,進而 在影音串流平臺崛起後,得以延續過往所累積的基礎,開發更多商業價值。 本研究藉此契機,重新檢視臺灣運動紀錄片的發展脈絡與未來的可能。也由 於運動紀錄片的發展與該國家的歷史、政經環境、社會制度及影視與運動產 業發展密不可分。因此,先將其置於所處的脈絡後,再試圖從其發展歷程及 現況中觀察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獨特性及可能性。

本研究發現,在跨國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上的運動紀錄片,以西方主流 運動項目為主要選材對象,例如足球、美式足球及籃球,也多為美國製作出 品。即便是以「在地全球化」為發展策略的 Netflix, 亞洲運動紀錄片並無

¹⁹ 摘自訪談內容, 訪談日期: 2020年 09月 24日。

較多上架的機會。在臺灣 Netflix 上的三部本土運動紀錄片——《翻滾吧!男孩》、《翻滾吧!男人》及《後勁:王建民》,皆有其特殊背景,前兩者是受到東京奧運銀牌的加持,後者則因故事主角的美國職業棒球經歷。在缺乏具號召力的國際運動明星或亮眼的運動成就之情況下,跨國影音串流平臺不易成為臺灣運動紀錄片的常態播映管道。

本研究也發現,在跨國或國內各大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上的臺灣運動紀錄片,平臺間重覆性極高,也未有單一平臺的獨家內容。上架的運動紀錄片絕大多數是先在院線上映,後再進到串流平臺上,平臺成為後端版權銷售管道。在影音串流平臺尚未問世時,運動紀錄片之所以爭取院線商業放映,多是製作方希望爭取更多的關注,進而讓影片強調的議題可以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力。事實上,對於不具商業優勢的運動紀錄片,院線放映其實是沉重的成本負擔。隨著串流平臺的普及,臺灣運動紀錄片或能考慮放棄不符效益的院線票房收入,直接進入影音串流平臺,以符合商業邏輯。經分析六部在YouTube 上架的臺灣運動紀錄片後發現,除了兩部採以影集型式,其他四部的長度皆未達一般認定能在院線發行所需的片長—90分鐘左右。對於資源條件及攝製規模更為受限的運動紀錄片,例如學生作品等非傳統運動紀錄片,YouTube 所開創的使用者原創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商業模式,成為另一個選項。

國內運動紀錄片在戒嚴期間扮演政府政令或社教宣傳的工具,至解嚴後走向闡述個人觀點或以社會批判為出發的獨立製片作品,後再因臺灣電影產業接近崩盤的困境,而有機會在院線播映。但後來卻因在商業性、娛樂性、藝術性、社會批判及社會責任上的拉扯,因而陷入是否要登上院線的討論,以致於在藝術取向及商業取向之間的融和與衝突上顯得動向不明。影音科技的發展增加了影片放映管道,使得臺灣運動紀錄片創作者在制定放映和推廣策略上也增加了選擇性。

對於強調紀錄片需具備議題性、批判性及藝術價值的專業獨立紀錄片創作者,具商業考量的院線及主流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或許不是最為合宜的播映管道。除了以往依賴的影展及巡迴放映外,規模較小但具專業特色的影音串流頻道或能協助觸及更多臺灣及全世界的網路觀眾,達到推廣之目的。而規劃於院線上映的運動紀錄片,則需從本土運動題材中找出能與社會大眾產生共鳴的共同語言或議題,並配合商業市場的操作機制。院線放映後,再以口碑或票房成績為後盾,尋求於國內及跨國主流訂閱式影音串流平臺上架機

會,創造更多商業價值。而製作規模及技術水準無法與主流媒體影像或專業的獨立創作作品相比的非傳統運動紀錄片,則可透過影片搜尋和 YouTube 等影音串流分享平臺傳散。然因影片分享平臺上競爭者眾,若非對紀錄對象或運動項目具高度關注及興趣,一般觀眾較不易產生強烈觀看動機,影片曝光量也相對有限。然而,這些非傳統運動紀錄片最重要的貢獻並非為點擊率,而是將臺灣各處有關運動的人、事及物留下影像紀錄,未來將會成為見證臺灣整體運動文化發展及累積過程的重要檔案。

在全球運動傳播的同質化趨勢中,在地運動紀錄影片有其重要的價值與 意義。國內運動紀錄片創作者需以更多元的規格、題材,以及利用運動紀錄 片在視覺上具備足夠動態感的優勢,吸引觀眾目光。透過影像的承載與各類 傳統及新興媒體管道的中介,跨越地理與文化疆界產生影響力。

參考文獻

- 王慰慈 (2007)。〈1960-2000 年臺灣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王慰慈 (編),《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 1930-2003》,頁 10-37。同喜文 化。
- 王思閎(2009)。《臺灣運動紀錄長片之研究——以《翻滾吧!男孩》及《態度》 為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所碩士論文。
- 王冠人(2013)。〈紀錄片為何重要?專訪 BBC 紀錄片頻道「故事村」主編 尼克弗萊瑟〉,《放映週報》,433。上網日期:2022年3月21日,取 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486
- 王思予(2016)。《文化與消費者偏好之關係:以好萊塢電影出口為例》。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思捷(2018年11月24日)。〈運動紀錄片:挖掘真實與多元 開往運動 迷內心深處的直達車〉,中央社。上網日期:2022年1月30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181124w002
- 中央通訊社(2019 年 10 月 29 日)。〈串流服務平臺大戰 體育賽事直播有望成新利器〉。上網日期:2021 年 10 月 17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290126.aspx
- 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2013)。〈看不見的跑道〉。上網日期:2021 年 7月21日,取自 http://mpfroc.org/movie.php?action=show&func=1&id=176
- 文化部 (2020)。〈臺灣電影簡史〉。上網日期: 2021 年 7 月 16 日,取自 https://toolkit.culture.tw/content_133.html
- 文化內容策進院(2021)。《2020 臺灣文化內容消費趨勢調查計畫》。上網日期: 2021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taicca.tw/article/6ed44bb4
- 行政院新聞局 (2007)。《臺灣電影年鑑 2007 年》。上網日期: 2021 年 8 月 1 日, 取自 https://www.tfai.org.tw/zh/downloads/yearBook
- 江佩凌(2019)。〈《後勁》背後——王建民紀錄片的誕生〉,《全球中央》, 121:60-63。
- 李道明(2007)。〈戰後半世紀臺灣紀錄片與文化變遷〉,王慰慈(編),《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 1930-2003》,頁 168-186。同喜文化。 (2013)。《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三民。
- 李卓倫(2008)。〈國家就是奧運——《築夢 2008》〉,《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 上網日期: 2021 年 8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filmcritics.org.hk/index.php
- 李展鵬(2014)。〈紀錄片不存在於真空狀態〉,《放映週報》,490。上網日期: 2021 年 8 月 5 日 , 取 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 NO=448
- 李盈穎 (2018)。〈走過憂鬱深谷 楊力州十年磨出《紅盒子》〉,《商業周刊》, 1611。上網日期: 2021 年 7 月 20 日,取自 https://today.line.me/tw/v2/ article/vPa87Q
- 吳凱琳(2012年7月6日)。〈雅虎 CEO 新人選,挖角影音網站 Hulu〉,《天下雜誌》。上網日期: 2021年12月22日,取自 https://www.cw.com.tw/index.php/article/5039608?from=search
- 吳尚軒(2019)。〈「紀錄片是臺灣的好牌!」CNEX 董事長蔣顯斌:把這張牌打好,就會是華人世界標竿〉,《風傳媒》。上網日期:2021年7月26日,取自https://www.storm.mg/article/1605854?page=1
- 林木材(2006)。〈耕耘的旅程:回望國藝會與紀錄片 20 年〉,《國藝會「20 年回顧與前瞻論壇」會議手冊》,頁 78-88。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 金會。
- _____(2009)。〈質樸而真誠——《野球孩子》〉,《Taiwan Docs》。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https://docs.tfi.org.tw/zh-hant/note/182(2012)。《景框之外:臺灣紀錄片群像》。遠流。
- 林木材、Kite (2009)。〈關於棒球的兒童電影,專訪沈可尚導演談《野球孩子》〉,《紀工報》,11。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9/09/kite.html
- 林淑惠(2020年8月27日)。〈林之晨: MyVideo 會員數 兩年衝千萬〉, 《工商時報》。上網日期: 2021年7月31日,取自 https://ctee.com.tw/ news/tech/324977.html
- 邱莉玲(2017年9月25日)。〈CNEX 打造紀錄片生態圈 臺灣成領頭 羊〉,《工商時報》。上網日期: 2021年7月20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25000096-260210?chdtv
- _____(2019年3月14日)。〈陸OTT登臺 CATCHPLAY影、劇雙拚應 戰〉,《工商時報》。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314000300-260202?chdtv

- 邱建章(2020a)。〈紀錄運動——紀錄片創作者的影像實踐及其公共文化的生產〉,《運動文化研究》,36:75-137。
 ——(2020b)。〈臺灣運動紀錄影片的議題發展與回顧(1999~2020)〉,《身體文化學報》,28:41-86。
 芬多經(2021)。〈MyVideo 邵珮如:推動《火神的眼淚》等熱門臺劇,如何
- 芬多經(2021)。〈MyVideo 邵珮如:推動《火神的眼淚》等熱門臺劇,如何「以投代購」投資臺灣影視?〉,《關鍵評論》。上網日期:2021 年 7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8952
- 范宜如(2013)。〈影像發聲· 再現島嶼——紀錄片在臺灣〉,《國文天地》, 29(3):21-27。
- 洪健倫(2013a)。〈影評人林木材:期待電視提供紀錄片更健全的舞臺〉, 《放映週報》,440。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364
- _____(2013b)。〈奇蹟的一年過後——2013 臺灣紀錄片在院線〉,《放映週報》,439。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492
- _____(2014a)。〈「好看」只是基本要素:郭力昕談臺灣紀錄片〉,《放映 週 報》,444。上 網 日 期:2021 年 7 月 20 日,取 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369
- _____(2014b)。〈上院線需要尊重商業操作:李亞梅談紀錄片的院線發展〉,《放映週報》,444。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370
- _____(2014c)。〈專訪紀錄片《千錘百煉》導演張僑勇拍紀錄片就像一場賭博〉,《放映週報》,448。上網日期:2022年2月27日,取自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501
 - ____(2016)。〈如何用紀錄片丈量世界:近年紀實電影國際趨勢的變 與不變〉,《國藝會線上誌》。上網日期:2022年2月20日,取自 https://mag.ncafroc.org.tw/article_detail.html?id=297ef722707b8a0401709 ed062310043
- 唐思思、肖儼衍 (2018)。〈ESPN:體育媒體之王——我的地盤聽我的〉,《中信傳媒》。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https://www.sohu.com/a/251455384_313170
- 唐子晴(2020)。〈OTT專法來了!法規5大重點、催生始末、臺灣產業生

- 態〉,《數位時代》。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8626/how-to-regulate-ott-streaming-services-intaiwan
-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2019)。〈我國紀錄片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專訪 紀錄片職業工會蔡崇隆理事〉,《國內外文化產業訊息及趨勢分析》, 2:20-22。上網日期:2021年7月22日,取自https://stat.moc.gov.tw/ StatisticsResearchList.aspx
- 許貞雯(2010)。《由運動紀錄片《奇蹟的夏天》反思男童運動社會化歷程與 教育意涵》。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家綾(2017)。《臺灣紀錄片中的兒童形象:論《野球孩子》、《翻滾吧!男孩》和《拔一條河》》。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亮丰(2000)。〈紀錄片生產的平民化——95-98 年「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 訓練計畫」的經驗研究〉,李道明、張昌彥(編),《紀錄臺灣:臺灣 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下)》,頁 581-613。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 陳冠云(2009)。《臺灣紀錄片未來策略之研究——以策略相關理論為框架》。 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 陳中淋(2013)。《紀錄原鄉:臺灣運動紀錄片的再現模式分析》。臺北教育 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
- 傅 榆 (2007)。〈深度訪談蔡崇隆〉,《紀工報》,21。上網日期:2021年7月22日,取自 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12/11/blog-post_24. html?view=classic
- 張士達(2013)。〈「逃」與「受」之間的拉扯:專訪《築巢人》導演沈可尚(下)〉,《獨立評論@天下》。上網日期:2021年7月23日,取自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11/article/858
- 黃 香 (2013)。〈紀錄月可以改變世界!?《拔一條河》〉,《放映週報》, 421。上網日期: 2021 年 7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funscreen.com. tw/review.asp?RV_id=816
- 張景泓、施佑倫(2020)。《完成之後——臺灣紀錄片發行及行銷經驗研

- 究》。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成果檔案庫」https://archive.ncafroc.org.tw/upload/result/7897-G2009/7897-G2009_%E5%8 5%A7%E5%AE%B9%E6%91%98%E9%8C%84_%E7%A0%94%E7%A9 %B6%E5%A0%B1%E5%91%8A%E7%AF%80%E9%8C%84%E5%85% A7%E5%AE%B9_%E5%8F%AF%E5%85%AC%E9%96%8B%E5%85% A7%E5%AE%B9_%E5%AE%8C%E6%88%90%E4%B9%8B%E5%BE% 8C 1612162000610.pdf
- 凱度洞察臺灣(2020)。〈臺灣 OTT 市場隨選影視戰況分析(上篇)〉。上 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 https://kantar.com.tw/MailSources/ InfoPulse/2020/03/2020_March_Kantar_Taiwan_and_LifePoints_Report_ OTT_trend_report(PART_I).pdf
- 楊皓鈞(2008)。〈臺北電影節看見國片新勢力《野球孩子》沈可尚、《夏午》何蔚庭導演專訪〉,《放映週報》,164。上網日期:2021 年 7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
- 楊力州(2014)。《青春:獻給他們的情書》。天下文化。
- 楊尚謙(2020)。《看見兒少——臺灣棒球紀錄片研究》。臺灣大學臺灣文學 研所碩士論文。
- 楊卓翰、林佳誼(2020)。〈超夯美股 Netflix 其實還在賠錢? CEO 獨家開示: 我們有殺手級祕密武器〉,《天下雜誌》,712。上網日期:2022 年 1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2983?template=transforme rs
- 傳媒深度報告(2018)。〈ESPN 的崛起之路:優質版權 + 內容深耕,締造全球體育傳媒第一品牌〉。上網日期:2021年7月20日,取自 http://pdf.dfcfw.com/pdf/H3_AP201809291204781959_1.pdf
- 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2016)。〈2015 臺灣國際紀錄片巡迴展「紀錄片講堂」: 臺灣紀錄片進行式〉。上網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 tidf.org.tw/zh-hant/reportsandarticle/19326
- 廖金鳳(2010)。〈從「大臺中紀事」看臺灣紀錄片創作:跨越「在地主義」〉, 廖金鳳、林寶元、邱貴芬、李泳泉、王慰慈、魏玓(編),《2010臺灣 紀錄片美學論壇》,頁 8-25。國立臺灣美術館。
- 鄭淑文(2007)。《紀實娛樂頻道節目全球在地化歷程探析——以 Discovery 在臺灣的發展為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 鄭秉泓 (2014)。〈《千錘百煉》不廉價地說夢想〉,《放映週報》,450。上 網日期:2022年3月22日,取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review. asp?RV_id=859
- (2019)。《臺灣電影變幻時:尋找臺灣魂》。書林。
- 賴逸芳、林韋葳(2020)。《影視產業現況及發展趨勢》。臺灣經濟研究院。 上網日期: 2021 年 8 月 5 日,取自http://www.stba.org.tw/download/ communicationworkshop/1060907.pdf
- 謝仕淵、謝佳芬(2003)。《臺灣棒球一百年》。果實。
- 魏 玓(2010)。〈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 廖金鳳、林寶元、邱貴芬、李泳泉、王慰慈、魏玓(編),《2010臺灣 紀錄片美學論壇》,頁 135-157。國立臺灣美術館。
- 蘇威銘(2014)。《臺灣當代院線記錄片的革新與困境——以楊力州的作品為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Andre, L. (2021). 60 compelling Netflix statistics for 2021: User demographics & revenue. *FinancesOnline*. Retrieved July 22, 2021, from https://financesonline.com/netflix-statistics/
- Chan, E. (2020 年 12 月 17 日)。〈疫情時代宅經濟的市場大贏家! Netflix、HBO GO、Apple TV+等全球串流平臺的機會崛起〉,《LaVie 電子報》。 上網日期: 2021 年 7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2002060
- Chen, L. (2016)。〈為什麼沒有紙牌屋?為什麼電影這麼舊? Netflix 高層來臺說分明〉,《關鍵評論網》。上網日期:2021年7月22日,取自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4953-aws-devday-oct82021
- Library of Congress (2021). The Corbett-Fitzsimmons fight. Retrieved July 22, 2021, from https://www.loc.gov/item/mbrs00064432/
- Lopez, I. (2020, April 20). The Last Dance series premiere episodes are the most-viewed ESPN documentary content ever, averaging 6.1 million viewers. *ESPN Press Room.* Retrieved July 21, 2021, from https://espnpressroom.com/us/press-releases/2020/04/the-last-dance-series-premiere-episodes-are-the-most-viewed-espn-documentary-content-ever-averaging-6-1-million-viewers/
- Morning Consult (2020). With live games sidelined, here's what sports fans

- want to watch. Retrieved March 22, 2022, from https://morningconsult.com/2020/03/23/with-live-games-sidelined-heres-what-sports-fans-want-to-watch/
- Netflix 臺灣(2019 年 11 月 26 日)。〈亞洲創造,全球共賞〉。上網日期: 2022 年 1 月 22 日,取自 https://about.netflix.com/zh_tw/news/made-in-asia-watched-by-the-world
- Netflix (2022). Netflix Q4 2021 investor letter. Retrieved March 21, 2022, from https://s22.q4cdn.com/959853165/files/doc_financials/2021/q4/FINAL-Q4-21-Shareholder-Letter.pdf
- Reuters (2021, August 10). ICC prepares bid for cricket's inclusion in 2028 LA Games. *The Daily Star*. Retrieved August 20, 2021, from https://www.thedailystar.net/sports/cricket/news/cc-prepares-bid-crickets-inclusion-2028-la-games-2149151
- Richmond, R. (2008, March 13). Black magic. *The Holly Reporter*. Retrieved February 23, 2021, from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review/black-magic-126092
- 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9). 2018 theme report. Retrieved July 22, 2021, from https://www.motionpictures.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MPAA-THEME-Report-2018.pdf

本文引用格式

- 安碧芸(2022)。〈串流運動:新冠疫情下臺灣運動紀錄片之發展脈絡與契機〉, 《傳播研究與實踐》,12(2):67-105。http://dx.doi.org/10.53106/2221 14112022071202004
- An, P. Y. (2022). Stream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opportunities of Taiwan sports documentarie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67-105. http://dx.doi.org/10. 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4 [Text in Chinese]

Stream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Opportunities of Taiwan Sports Documentarie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Pi-Yu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the basketball documentary The Last Dance during the pandemic w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is study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documentaries in Taiwa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and strategies of future development for Taiwanese sports documentaries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aseball was the most popular type of sports in Taiwan's sports documentaries, although the overall types of sports presented in the films were diversified and unique. The issues presented in the documentaries centered mostly on the education for rural youth and the values of winnings and sportsmanship and were not as diversified as those in the foreign sports documentaries. Due to business concerns, the available Taiwanese sports documentaries on the Taiwanese subscription-based streaming platforms overlapped highl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sports culture in Taiwan, subscription-based streaming platforms and mainstream movie theaters should not be the primary venues for Taiwanese sports documentaries. Filmmakers and marketing professionals should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s for each documentary film and include small-scale documentary streaming platforms and social media video platforms as options of screening venues in order to reach more online audience.

Keywords: the COVID-19 pandemic, sports documentaries, Taiwan sports culture, streaming media

* E-mail: piyunan@gm.cyut.edu.tw Received: 2021.02.28; Accepted: 2022.07.05







新聞史論、時事評析與新聞教育: 卓南生的傳播研究與實踐

陽美燕*

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傑瓊**

北京工商大學傳媒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劉 揚**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秘書長

摘要

學者卓南生以新聞史研究和國際時評知名,歷任新加坡《星洲日報》社論委員與《聯合早報》東京特派員;而從上世紀80年代末在日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任教開始,投身中、日新聞教育三十餘年,迄今仍然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為平臺,與青年學子保持對話。代表性著作為1990年、1998年、2002年及2015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與2010年、2020年出版的《東亞新聞事業論》等。本文從他幼年時期目睹南洋政治的經歷出發,並在日本與亞洲社會的變遷背景下,勾勒出卓南生在史論治學、時評寫作和新聞教育方面的思想觀點;而從中國報業的新聞發生史開始,經過長時期對日本社會、華文報業的親身經驗,及在時事評析與新聞教育中,發展出清晰穩固的亞洲視角,與論從史出的歷史是非觀。

關鍵字:日本研究、亞洲視角、問題意識、新聞發生史

* E-mail: 1291627558@qq.com ** E-mail: sunnydaisylee@163.com *** E-mail: 1014182423@qq.com







卓南生出生於日據時期的新加坡,受教於東南亞反帝反殖民運動中的華文中學 ¹ 和南洋大學 ²,留學於戰敗後的日本。後回返新加坡參與《星洲日報》和《聯合早報》筆政,歷任社論委員與東京特派員,先後在東京大學(1989-1992)、名古屋大學(1992-1993)和龍谷大學(1994-2010)任教。他以生活經驗出發,兼有國際視野與在地關懷,同時在報史研究、時評寫作、新聞教育等領域耕耘。

1989年聘為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係該所首名外籍專職教學人員;1990年,首次於東京百利堅社出版《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日文版著作。此書中文版《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先後於1998年在臺北正中書局、2002年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增訂版、201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增訂新版。1994年,轉任龍谷大學教授,參與籌辦國際文化學部,長期負責主編《國際文化研究》,力促不同地區相異文化的當代交流。

在與兩岸中國新聞史研究者的學術交流中,積極發表意見,彰顯東南亞 視野的亞洲華人觀點;2006年,於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卓南生日本時論文 集》(《日本政治》、《日本外交》、《日本社會》)。2010年,他從日本大學 提前退休,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³為交流平臺,在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 學、廈門大學等校服務,投身新聞教育及新聞史論研究梯隊的培育。2020年,

¹ 在東南亞,華文教育始終風雨飄搖,全靠熱心教育的華社(包括社會賢達和勞苦大眾)支持。面對英國殖民當局的歧視與不公待遇,自力更生的新馬華文中學生很早就將爭取母語學習、維護華文教育地位視為天職,並結合時局,積極參與運動。卓南生就讀的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簡稱華中)創立於1919年,在南洋大學成立前,為「南洋最高學府」,也是新馬華文教育的堡壘。他們對於任何旨在削弱母語教育根基的改制十分敏感,並予以抵制和反抗。1961年,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決定實行中學改制,從三三制(初、高中各三年)改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二年),便被視為意圖改變華校、讓它與英校接軌的措施,並引發學生罷考。為順利推行政策,1961年的華中有同學700餘人同時畢業(包含初中四生、高中三生,和提前畢業的高中二生)。與馬來西亞的民營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在經濟上自食其力、勉為其難求存的艱苦處境不同,接受官方全面改制的新加坡華文中學雖無經濟上憂慮,卻逐步改變為英校。自1987年起,華文小學停辦,新加坡進入沒有傳統華文中小學的年代。卓南生此時經歷的1960年代,正是發展前期;今日新加坡的政治架構,尚未完全成形。

^{2 1953}年,在新加坡福建會館會長陳六使捐贈與倡議下,東南亞華社開展了興建南洋大學的熱潮與運動。這所 1956年開學、1980年被強行與新加坡大學合併、變相「亡校」的民辦大學在 25年間先後培養了 1.2 萬多名南大人,在國內外教育界、文化藝術、政治、經濟、醫學、法律、工農商等領域作出貢獻。南洋大學是一所海外華人為捍衛母語文化,在英殖民政府百般阻撓下,至由民間支撐而建立的唯一海外華文大學。南大興亡史實際上也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盛衰史的縮影與象徵。卓南生就讀期間,正逢南洋大學面臨諸多旨在改制、變質南大的「報告書」出籠,及南大師生相應抵抗和反對的時期,也是認識「南大精神」的最佳時刻。

³ 研究會成立於 1918 年 10 月 14 日,由北京大學時任校長蔡元培發起並擔任會長,聘請留美研習新聞學歸國的徐寶璜、《京報》社長邵飄萍擔任研究會導師。是中國第一個系統講授並集體研究新聞學的團體,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新聞學》,創辦了中國第一份新聞學期刊《新聞週刊》,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開端。(方漢奇先生語)2008 年 4 月 15 日,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恢復成立,由時任北大校長許智宏任會長,後由程曼麗教授接任執行會長。

他在 2010 年於東京彩流社出版日文版《東亞新聞事業論——從官版漢字新聞、戰時傀儡政權的新聞統制到現代》的基礎上,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東亞新聞事業論》,彙集新聞史研究、國際時局觀察相關論文,以更完整的方式闡述學術觀點(卓南生完整年表,參見文末附錄)。

在前述背景中,1950年代、1960年代的新(新加坡)馬(馬來亞聯合邦或1963年成立的馬來西亞),1960年代、1970年代的日本社會是刺激卓南生學思發展的物質環境,1980年代、1990年代以後的東亞地區,特別是華人所在的兩岸四地則是他學思觀點主要分享、推廣的場域。

這份論文由三位青年學者共同完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卓南生大量原文稿件與各類評論、文獻為基礎,輔以口述歷史的釐清。論文分四個部份展開書寫,分別是成長經歷、新聞史論、日本時評與新聞教育,以期完整揭示卓南生的實踐歷程與學術思考。

壹、時代與個人:卓南生的成長經歷

一、「激動的年代」與「南洋意識」形成

卓南生入讀的南洋華僑中學,以「自強不息」為校訓,是東南亞第一所華文中學,為陳嘉庚倡辦成立於五四運動爆發前夕的 1919 年 3 月。1956-1961 年間,他在此完成基礎教育;此時東南亞的華文教育欣欣向榮,師資多為南來文化人,其中不乏國家級名家(卓南生,2021)。卓南生回憶指出,在赤道土地上認真地受教於這些老師,讓他滿滿地吸收著中華文化的正能量(卓南生,2019)。

東南亞各國有著被西方國家殖民和被日本侵略的沉痛記憶,二十世紀50、60年代,反帝反殖、民族獨立運動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泛興起。1955年在印尼召開的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所形成的「萬隆精神」鼓舞著各國民眾發起爭取民族自決的獨立運動及建國事業。不少曾受五四運動洗禮的中國知識份子於二戰前來到東南亞各國,加入當地的文教事業,傳遞了以反帝、愛國為主要內容的「五四精神」,正與此時東南亞各國民眾的需求契合;會議召開當年,卓南生在光洋小學(創辦於1918年)讀六年級。他的班主任以講故事的方式將會議情況傳達給同學們,他們由此知道了印尼的蘇加諾(Bung Sukarno,1901-

1970)總統、印度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總理、緬甸的 吳努(U Nu, 1907-1995)總理和中國的周恩來(1898-1976)總理,懵懂中接受「萬隆精神」,他小學時製作的第一本剪報就是萬隆會議的圖片集。⁴

卓南生指出,中、小學裡不少老師直接或間接受到「五四運動」影響; 作為學生的他們,學習非常認真,歷經身份認同的掙扎(指從「華僑意識」 逐步轉為「華人意識」,但主張維護華文母語教育在新興國家中應有的地 位),都以自己是華校生為豪(陳禹蒙,2014)。他回顧這段經歷說到:

「五四精神」(1919)與「萬隆精神」(1955)是當時東南亞 青年的兩面鮮明旗幟,國民意識與身份認同感的改變並不會影響新 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對這兩面旗幟的認同和堅守(賀心穎,2020,頁 7)。

卓南生將二十世紀 50、60 年代,稱之為東南亞地區「激動的年代」。一邊是民眾獨立呼聲熱火朝天,一邊是殖民統治者為既得利益做著最後部署(卓南生,2020)。置身於這一時代,在五四精神放射下,新馬華族青年加入了反帝、反殖、爭取獨立運動和建設新興國家的高潮中,激發出濃厚的「南洋意識」。從落葉歸根的「華僑意識」轉為在東南亞各所在國落地生根的「華人意識」,是時代投射在新馬華族青年身上的集體印痕。

為解決華校生當地升學和師資問題,時任新加坡福建會館會長的陳六使 (1897-1972) 登高一呼,各地華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掀起一股支持創辦海外華文大學——南洋大學的熱潮。1956年,南洋大學正式開學。1962年卓南生考入該校,並選擇政治學專業,在這所多災多難的校園中接受「南大精神」薫陶。

此時正是新加坡、馬來亞爭取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不論是英國殖民者 還是日本侵略者,都把華文視作實施殖民統治的障礙。在風雨飄搖中,卓南 生接受了相對完整的養成教育。新加坡同代人對這段歷史可能有著不同看 法,但他們都從親身經歷中深刻認識到,文化教育對於政治統治、社會思潮、 價值觀念之重要,也體會到還原歷史真相與發掘歷史真實的艱難。這段經歷 讓他重視基於研究者主體性的「問題意識」,強調分析問題既要看到強勢者 所說的一面,更要努力探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另一面,在歷史大背

⁴ 卓南生回憶道:「我們從小學六年級到初中的時候,到處可以看到各個政黨群眾大會慷慨激昂的場面,最後大家都會齊聲高喊『孟迪卡』(即馬來語「獨立」)」(卓南生,2013,頁4-5)。

景下進行觀察、思考、辨析。讓這種文化自覺和責任感紮根在知識份子心中 是教育的重要目的。基礎教育時期所獲得的中華文化資源、受到的文化薫陶, 以及反殖運動催生的東南亞華人身份認同意識,為卓南生在研究中堅持亞洲 視角和歷史是非論史觀埋下伏筆。

二、日本「國論二分」中的「文化震撼」

1966年,卓南生負笈東瀛。為了在亞洲研究亞洲,到日本研究日本,探 明戰後的日本與戰前有著怎樣的變和不變,他開始「在日本摸索新聞學」的 歷程; 這與他的成長背景不無關係。1942 年 4 月卓南生出生時,新加坡已是 日本殖民地,被改名為「昭南島」。時代和時勢孕育了這一代人的問題意識。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同年代的人一出生就和日本結下了不 解之緣。我們必須瞭解,爲什麼日本兵來到新加坡?新加坡爲何被 唇稱爲「昭南島」?「昭南島」時期又爲何被視爲「新加坡史上最 黑暗的日子」(卓南生,2013,頁9)?

帶著這一關懷,他於1966年轉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新聞學科—— 二十世紀 50-60 年代日本最好的新聞學科之一,成為二年級插班生。彼時日 本教育體制尚未受到英美實用主義影響,鼓勵學生尋找問題並形成研究撰 題。比他略早赴日的新加坡留日大學畢業生協會創會會長范介璋曾說:

日本教育不是由需求情況來決定,而是自由教育,你要讀什麼 就讀什麼,向興趣的那方面發展(卓南生,2006c,頁 495)。

在這樣的環境中,卓南生可以較自由地選擇老師與課程。某些課程是在 「喫茶店」中進行的;某些課程密切聯繫時事,討論、發表成為教學的重要 方式;某些課程還會鼓勵學生客串講授。

二十世紀 60 年代,日本戰敗的景象殘留在街頭。斷手斷腳的舊「皇軍」 在鬧市奏著軍歌乞討;神保町的舊書店裏,30-40 年代為配合「大東亞聖戰」 出版的刊物和書籍堆積如山。在美國監管下推行民主化改革二十多年後,許 多戰前的理論和思維方式依然普遍。不論是在大學校園裏和同學對話,還是 與普通日本市民交談,卓南牛感受到日本人對亞洲(特別是東南亞)缺乏基 本常識且不關心。

一個典型案例是:在早稻田大學講授《現代新聞論》的酒井寅吉 (1909-1969),曾是《朝日新聞》從軍記者,極力讚美「大東亞『聖』戰」,也是日本新聞傳播學界知名的《綜合新聞事業研究》季刊創刊主編;新加坡淪陷時期,他親身目睹並報導了日軍將領山下奉文 (1885-1946) ⁵ 勸降英國司令官白思華將軍 (Arthur Ernest Percival, 1887-1966) ⁶ 的轟動新聞。酒井在課堂上大講「客觀報導」和追求「真相」理論,卻對自己曾經美化戰爭的報導未有絲毫檢視,他甚至撰文肯定和緬懷相關報導。日本教師這種停留於戰前的基本態度與思維,實為巨大的文化震撼(卓南生,2020)。

另個參照案例是:抵日後,卓南生最初想研究新加坡和馬來半島的報業史,特別是日占時期報史。1969年早稻田大學新聞系關閉之際,他恰好成為最後一屆畢業生。他先到京都同志社大學短暫學習、後轉到當時處於日本新聞學研究主導地位的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準備攻讀碩士。他曾考慮師從時任新聞研究所資深教授(曾任該所所長)、戰爭期間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派往馬來半島作隨軍記者的殿木圭一(1909-1994)。遺憾的是,當他向這位會說幾句中文普通話和粵語、待留學生十分親切的教授談起要研究日本佔領新馬時期的新聞史題目時,對方卻皺起眉頭,一周後告知有關資料已「完全佚失」,建議換個題目(卓南生,2008)。在殿木那裏,卓南生也未聽到任何有關日軍統治馬來半島新聞真相的話題。

上述日本老師,還有在立教大學執教、戰前德國法西斯主義新聞論旗手和戰後美國大眾傳播功能主義論的鼓吹者小山榮三(1899-1983),都對卓南生新聞史研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反向作用:既促使他轉向從東南亞起步的近代中文報史方向,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審視殖民主義和侵略戰爭「是非論」的學術史觀。卓南生用「踽踽獨行」來形容在日本從事新聞史研究的狀況;這種境況,也給了他獨立摸索新聞史治學道路的定力和意志。

從社會面來看,當時讓他和許多東南亞留日學生感到驚憾的是,在談論太平洋戰爭時,有那麼多日本人都深信日本當局為發動戰爭而炮製的「ABCD包圍圈論」,即日本是在美國(America)、英國(Britain)、中國

⁵ 日本帝國陸軍將領。太平洋戰爭期間負責指揮日本第25軍進攻英屬馬來亞,花2個多月的時間 佔領整個馬來半島,攻陷英國在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中心新加坡,被稱為「馬來之虎」。佔領新加 坡期間,曾以"肅清"為名對當地華人進行大屠殺。1944年任第14方面軍司令,被派往菲律賓 作戰,直到日本投降。1945年12月7日以大屠殺罪被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46年2月 23日執行。

⁶ 英國陸軍將領,1941 年 5 月至 1942 年 2 月擔任馬來亞陸軍總司令,1942 年 2 月 15 日因戰敗率 8 萬軍隊向日本投降,標誌著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整個馬來亞半島全境淪日軍統治。

(China) 與荷蘭(Dutch)包圍下被迫開戰的。換句話說,太平洋戰爭被認為是一場日本「自我保衛」的戰爭,而非對亞洲的侵略。保守陣營甚至提出「日本在這場戰爭中,難道一無是處」的議題,力證所謂「日本侵略東南亞(部分)有功論」。上述觀點共用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學者提出「近代的超克」的認識論,強調(一)日本打垮白種人的歐美帝國,給亞洲人帶來信心;(二)從結果看,東南亞各國紛紛擺脫歐美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不能不歸功於日本(卓南生,2006a,2020)。

二十世紀 60-70 年代,日本處於「國論二分」時代,新舊思潮針對日本何去何從展開激烈爭論。在以大眾傳媒為主要管道的文化空間裏,有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聲音,有支持的吶喊;有主張日本對歷史進一步反思的觀點,也有堅持戰前「皇國史觀」的論調。這對於想瞭解日本「變」與「不變」的卓南生來說,既帶來了思想衝擊,也提供了諸多有助於建立富含歷史意識的認知參照系統。卓南生反覆提及,他的日本觀一定程度上形成於留日時期。7在新聞傳播學界,當時有不少學者主張在反思日本侵略戰爭的基礎上探索戰後出路;對於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如何利用媒體進行法西斯輿論宣傳,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內川芳美(1926-2004)、荒瀬豊、香內三郎(1931-2006)和高木教典(1931-2015)等都進行了深入研究。

在上述背景下,卓南生認真探索新聞業與文化侵略和文化反抗之間的關係。他同時從內川芳美和香內三郎那裏學到了精準處理史料的嚴謹態度。課堂之外,日本社會的「國論二分」成為他的「第二課堂」。

在那個時期,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許多有爭議性的問題都被提出來,並成爲全民辯論的大課題……我在早稻田大學念書的那幾年,真正上課沒有幾天,因爲同學們經常罷課(卓南生,2013,頁7)。

曾任《朝日雜誌》(Asahi Journal) 主編的立教大學教授影山三郎(1911-1992) 是少有的對戰爭問題不迴避, 肯正面具體回答提問的老師。1970年11月25日,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1925-1970) 在闖入自衛隊總部進行演說後切腹自殺。這一震撼日本社會並在亞洲引起廣泛關注的事件,不僅說明日本國內正掀起一股狹隘沙文主義的情緒,同時釋放出日本軍國主義意識死灰

⁷ 這正如卓南生所言:「往後我在寫有關新聞或評論時,腦中並不是一張白紙,而是多少知道它 的來龍去脈。」(卓南生,2013,頁8)。

復燃的政治信號。「三島由紀夫事件」發生當天,⁸ 影山曾以沉重心情分析 了法西斯時代日本類似事件的發展過程,和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思潮的概 況,這情境至今仍印刻在卓南生的記憶中。

影山提醒到,1946年《和平憲法》剛剛制定,1947年日本就出現了想要扭轉形勢的「空氣」。1940年代末期以後,各種懷古情調在日本社會陸續浮現。知情者都明瞭,這其中包含著特定歷史時空和語境下孕育出來的特殊感情。類似蛛絲馬跡說明,日本社會戰前、戰後在精神方面是藕斷絲連、一脈相承(吳學文、卓南生,2005)。

影山對日本戰時與戰後輿論連續性的關注,對戰後日本「逆時針轉」現象的批判,為卓南生提供了觀察日本社會的重要線索。留日期間,他注意到大眾傳媒大談「日本傳統文化」、緬懷「日本國粹」、強調「日本民族色彩的東西」及「大和精神之必須提倡與發揚」,已成為「文化日」不可缺少的重要節目。

戰前日本的某些紀念日與天皇中心思想、軍國主義精神是分不開的。戰後,這些充滿侵略意識的紀念日照理應該被完全廢除。然而,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並沒有全面剷除舊有侵略亞洲之陰魂。戰後的「祝祭日」雖不敢像戰前那樣明目張膽,公開鼓吹軍國思想,但一開始就很巧妙地埋下「復活」之伏線了(卓南生,2006a,頁21-26)。

「戰後的日本到底改變了沒有?」構成了卓南生日本時評寫作的問題原 點;對日本政治、文化、社會「變」與「不變」的持續觀察與追問,構成了 他日本時評寫作的動力。

眼看著那跌宕起伏的日本政治連續劇與虛虛實實的外交遊戲,及日本傳媒擅長的輿論誘導與造勢,仍難以抗拒發抒己見的誘惑力,而每每有奔赴現場,追蹤大事件及其演變,進而剖析其緣由的衝動(卓南生,2006a,2006b,2006c,頁9)。

從大學開始,他就認為,新聞學是同社會現實緊密聯繫的學問,應當兩

⁸ 有關「三島由紀夫切腹事件」及其在日本社會的影響,可參見以下三篇時評文章。〈震撼日本的三島切腹事件〉(卓南生,2006a,頁 240-244);〈三島事件以後的動向〉(同上引,頁 257-260);〈揭開「三島美學」的面紗——評《三島切腹事件之思想上解釋》〉(同上引,頁 261-268)。

條腿走路,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從學界到報界,再從報界到學界,他始終要求自己「做學問不忘記現場,在現場當一線新聞工作者也不忘記研究」 (卓南生,2013,頁1),以鮮明的問題意識貫通教學、研究和實踐。

貳、深耕新聞發生史

卓南生在新聞史領域的耕耘,可以「精深細作」來形容,並因此被方漢 奇先生喻為「中國境外學者研究中國新聞史的新的高峰」(卓南生,2015, 頁 33)。從最初準備研究日據時期新、馬報業史,到在日本碰壁後轉向摸索 近代中文報業發生史;從在日本踽踽獨行的華文報史淵源摸索,到逐步擴大 至中國新聞史學界主流的學術交流,卓南生始終堅持東南亞華人視角,以及 歷史是非論。他深耕新聞發生史,在一手史料論證下發掘大量報刊原件,取 得以《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先後在東京、臺北和北京出版) 和《東亞新聞事業論》(先後在東京和北京出版)為代表的系列成果,形成 領域聚焦、史觀鮮明、方法論貫通、視野國際化、主體性突出的治學路徑。

一、摸索新聞發生中的師承與影響

卓南生基本拜遍當時日本新聞學界的名師。前述給他帶來「文化震撼」的三位老師,無一不是日本新聞學界響噹噹的人物。從這些老師的反應中,他感到在日本做日據時期的新馬新聞史研究行不通。所以,他轉向以新馬地區報刊為出發點的近代中文報史研究。《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 年在馬來半島馬六甲創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則是 1833 年在廣州創辦,1837年轉到新加坡續辦。

二十世紀 60-70 年代,是日本反戰思想最濃厚、知識界開明思潮高漲時期。他回憶道:在反戰浪潮中,東京各高校基本處於半停學狀態。這給了他自由探求的機會,其中包括去選擇契合自己學術思想意識的名師。1969 年4 月他從東京的早稻田大學轉至京都,準備去新聞學大師(城戶又一、鶴見俊輔)薈萃的同志社大學師從開明派學者——日本新聞史學史權威和田洋一(1903-1993)攻讀碩士。從狹義新聞學而言,當時日本只有東京大學社會學研究院和同志社大學文學研究院開辦新聞學碩士課程。同志社大學因學潮長期停課,兩個月後他返回東京,在時任東大新聞研究所所長池內一(1920-

1976) 安排下跟隨殿木圭一學習了十個月。1970年,卓南生決定投考立教大學研究院,攻讀應用社會學(主修新聞學)碩士學位,師從「瓦版」新聞史權威平井隆太郎(1921-2015)(「瓦版」即日本江戶時期的新聞類似物)。他從流傳於日本早期華文報部分原件和幕府末期的「官版翻刻漢字新聞」的線索出發,完成了碩士和博士論文。

平井是日本新聞學開山鼻祖小野秀雄教授戰後的嫡系大弟子,在他推薦下,卓南生得以兩次拜訪年逾八十、正在撰寫回憶錄《新聞研究五十年》的小野先生。在書房裏,小野取出用布巾精心包裹的資料、私藏的《遐邇貫珍》原件及其密密麻麻的讀報筆記,向卓南生講述自己兩度前往大英博物館內圖書館查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等的經過,啟發他查找早期華文報刊資料的線索(卓南生,2015)。他也從小野秀雄於戰前、1922年出版的《日本新聞發達史》及其學術回憶錄中,獲得原件史料追蹤的靈感。

在這種師承的啟蒙與啟發中,卓南生對「新聞發生史」產生並保持著濃厚興趣(卓南生,2020)。1973 年秋,修畢博士課程、應邀到新加坡《星洲日報》工作兩年多後,他向報館請假、停薪留職並跨越東西兩大洋,遍訪大英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等尋找原件資料。1972 年,提交碩士論文《關於 19 世紀華字新聞紙產生之緣由與特徵的考察(1815-1856)——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遐邇貫珍》為中心》;1986 年,提交博士論文《近代型中文報紙的形成過程與確立——從1815 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至1874 年《循環日報》的誕生》。以此為基礎,他持續鑽研,陸續於1990年及2020 年完成《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與《東亞新聞事業論》。這些成果都是「新聞發生史」研究的「補充與延伸」,後來在1998 年、2002 年和2015 年不斷增訂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也是日本兩代宗師治學精神的傳承。

經平井允許和推薦,卓南生在東大同時修讀香內三郎和荒瀨豊的課,並 獲得立教大學碩、博士課程認可的學分。香內、荒瀨兩位老師及內川芳美、 高木教典等東大新聞研究所的學者,對日本戰前法西斯新聞學的反思和批 判,⁹都給他的新聞史研究帶來深刻影響。而他與東大新聞研究所的學術緣

⁹ 如【日】荒瀨豊於 1957 年發表的〈日本軍國主義とマス・メディア〉(〈日本軍國主義與大眾傳媒〉)、【日】內川芳美、荒瀨豊、香內三郎等人於 1959 年發表的〈日本フアシズム言論統制に関する研究 1〉(關於〈日本法西斯言論統制的研究①〉)。對此,卓南生指出:「在戦後的民主化運動與反戰運動邁向高潮的二十世紀 50、60 年代乃至 70 年代,日本的新聞學者和報人也曾有過一段反思的時期。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諸多名師及優秀的新聞工作者的帶動下,日本戦時的法西斯新聞體制及其淵源與影響曾被解剖和批判,就是佳例。」(卓南生,2020,頁 9)。

分,在1989年高木教典任所長時,迎來了最受矚目的時刻:特聘卓南生為 專職「文部教官助教授」,即教育部國立大學教官副教授,打破東大社會學 研究院不聘請外國學者的慣例,成為當時新聞熱點。

二、 研究成果引起新聞史學界「轟動」

關於「新聞發生史」研究的由來,在〈中國近代報業史研究的線索與誤 區——兼論日本「官版翻刻漢字新聞」與戈公振的困惑〉一文中,卓南生清 楚指出主要涉及日本官版翻刻漌字報紙,以及中文同一報紙原件之異同及由 此產生的相關問題(卓南生,2020)。「官版翻刻漢字新聞」是指幕府末年、 明治維新前,在西學東漸背景下,日本當局急需獲取海外資訊,遂將西人在 香港(已淪為英國殖民地)和中國對外通商口岸上海、寧波等地所辦的漢字 報紙,經過當時日本知識份子(即「蕃書調所」、後易名為「洋書調所」的 御用官僚)的審閱,加以若干刪減,重新翻刻成自己所需、改頭換面的小冊 子(新聞紙)(同上引),小野秀雄稱之為日本近代報業的「老祖宗」之一。

在翻刻版出現前,日本民間流傳著一些私人手抄本。傳入最早、流傳最 廣的是香港《遐邇貫珍》的手抄本。之後,經官家陸續特許翻刻的有《官板 中外新報》、《官板六合叢談刪定本》、《官版香港新聞》,以及《官板中外雜 誌》等。平井降太郎便指出,即使在江戶時代(即日本文化向中國一邊倒的 時代),日本對中國資訊傳媒的瞭解也十分有限(卓南生,2015)。可想而知, 幕末和明治初年,日本傾心於歐洲「蘭學」和西方近代化模式;官版翻刻漢 字新聞,無論是作為中國人日本知識的重要來源,還是作為近代日本與中文 報業的特殊關聯物都獨具意義。

雖意義獨特,但研究者寥寥。只有小野秀雄從日本新聞史的角度作了拓 荒式的資料查證和推論。他在《日本新聞發達史》中梳理日本近代新聞史的 源流時,簡潔介紹了中國漢字新聞紙對日本報紙的影響,後來又花了不少精 力梳理和推論諸如日本版《香港新聞》等與《香港船頭貨價紙》係同份報紙, 前者只是後者的日本手抄翻刻版或翻譯本。除這些研究外,對官版翻刻漢字 新聞原件的追蹤與深入分析,基本是空白。研究中國「邸報」與小報史的足 立利雄在評價卓南生貢獻時指出:

日本的中國研究,從古至今在各個領域都開展得深入且詳盡,

唯獨關於中國社會的資訊傳播狀況——例如從「古代報紙(新聞)」到「新聞類似物」,再到現代的報紙、廣播等等——相關的歷史研究幾近空白,即便有,也只是停留於片斷的研究(足立利雄,1991,頁121)。

正是從這「片斷研究」中得到啟發,卓南生敏銳覺察到,這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日本官版翻刻漢字新聞(小冊子),會是解開中國近代報紙源流謎底的一個入口。他將這些日本官版翻刻版稱為近代中文報刊的「準原件」。¹⁰ 他將此作為一種有力論據,最大限度覓得原件並進行比較和分析,探求「近代型中文報紙的形成過程與確立」。這種曲徑通幽的「新聞發生史」研究影響深遠,平井對此指出:

首次填補了日本在這研究領域之空白並發出光芒。實際上,在 國際學術界裏,對本書所涉及的中國報業史有關時期的研究或論 著,甚至比日本還更爲貧乏。從這個角度來看,……具有極其重大 意義,毫不過分(卓南生,2002,頁43)。

遵循著日本新聞史學者小野秀雄和中國報史專家戈公振的步伐,卓南生踏上了尋根究底、發掘早期中文報刊原件和準原件的學術歷程。他尋遍日本各大圖書館、舊書店、私人收藏家,到處打聽早期流入日本的中文報紙。他利用回返新加坡途經港、臺的機會,遍訪兩地圖書館和書坊,拜訪多位報史研究者。後來,他又從新加坡報館停薪留職前往英倫,並輾轉英、德、法、美、港、臺等地,開始一番在世界各地「大翻書報」的作業,發現了一系列尚未被挖掘和利用的一手史料,其中就包括十分關鍵的早期中文報刊原件。

他將日本版(包括手抄本、翻譯版和翻刻版)與中文原件從報頭、出版時間、版面安排到內容刪減等一一比對和推斷。基於這些大量原件和「準原件」的發掘與縝密考證,卓南生得出有關早期中文報紙的一系列可靠發現, 訂正了長期以來以訛傳訛的史實錯誤,現略舉一二如下:

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發現《香港中外新報》1872年5月4日原件,這是迄 今為止所能看到的最早原件(卓南生,2002);在美國艾塞克斯文物院(Essex Institute),後易名為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發

¹⁰ 卓南生說:「筆者長期努力尋覓各種早期中文報刊的原件或準原件,從而摸索與探求各報刊之 創刊緣由與特徵,最終都回歸至如下的原點(即問題意識):近代中文報刊是『怎樣而來的』」 (卓南生,2015,頁2)。

現《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79份 1859 年的原件。 卓南生將這些珍貴原件與幕末流行於日本的手抄本《香港船頭貨價新聞紙》、 「洋書調所」翻刻的《官版香港新聞》、日文譯版《香港新聞紙》這三個版本 的「準原件」相比對,同時與該報母報《孖剌報》(The Daily Press)、1872 年5月4日《香港中外新報》原件相參照,推斷其關係與相關史實,最終推 翻了戈公振關於該報創刊於 1864 年之說,以及最初報名為《中外新報》的 「定論」。

他指出《香港新聞》並非香港另行出版的一份報紙之名,而係中文報紙 《香港船頭貨價紙》的日本版這一確切史實(即當時從未有《香港新聞》這 一中文報刊的出版),又發現日本近代新聞史和中國近代新聞史的起源交叉, 創立了新說。

在大英圖書館和歐美日圖書館及私人收藏家發掘到如下原件:美國在華 首家華文報刊——寧波《中外新報》的瑪高溫(Daniel Jarome Mac Gowan, 1814-1893) 主持時期 29 期原件,應思理(Elias B.Inslee, 1822-1871) 接續 主持時期4期原件,日本所翻刻應思理主持時期《官板中外新報》11期原件, 《鈴木大雜集十六》收錄該報的7期手抄本及其他多個日本手抄版。

涌渦比較,得出如下觀點和發現: (一) 日本手抄本比翻刻版更能忠實 於原報;(二)在報紙原件不足情況下,日本手抄版和翻刻版是窺見該報全 貌的重要線索;(三)指出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27 年和 1928 年版影本 插圖將原件與日本官版翻刻漢字新聞混為一談造成的混亂及原因,並糾正了 個別研究者依據不充分的資料或孤證便試圖輕易推翻戈公振關於該報創刊於 1854 年正確日期的論斷。

發現《德臣報》(The China Mail)中文專頁《中外新聞七日報》(《香 港華字日報》前身)——自 1871 年 3 月 11 日至 1872 年 4 月 6 日的原件, 從中證實「西學巨擘」陳靄廷在 1871 年才就職於《德臣報》;發掘在「七 日報」停刊前的最後數期,曾刊載有關「唐字新聞紙」即將面世的啟事,以 一手史料推翻了「《香港華字日報》創刊於 1864 年」的權威舊說,釐清了 該報的基本面貌(卓南生,2002);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他發掘出《香 港華字日報》初創期間長達兩年零三個多月的大量原件(1872年5月6日【第 9號】至1874年8月25日【第442號】),並將該報改版為日報的準確日期 訂正為 1874 年 2 月 21 日,結束了只能依靠「碩果僅存」的一份舊報影本進 行碎片化研究的窘境,使該報成為同年代香港華文報中原件保存最為完整的

一份報紙。

這樣的史實訂正還有多處,不一而足。對這些原始資料的發掘及其意義,中國新聞史學前輩方漢奇描述為「引起轟動的新聞史論新著」。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卓南生教授的一些論文,開始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內地的專業雜誌上刊出,立即引起了中國新聞史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視。……引起了中國新聞史研究工作者的震驚。……(方漢奇,2002年12月12日)。

方漢奇進一步指出這些成果「引起轟動」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出現上述的情況(按:指戈著中的失誤和錯誤),是因 爲前面提到的那些報紙和刊物,除了少數幾家在中國國內有少量存 留外,大部分都已失藏……這也正是卓南生教授的那些論文引起轟 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方漢奇,2002年12月12日)。

復旦大學新聞史學家寧樹藩仔細閱讀這部 1998 年中正書局出版的繁體 字版「新加坡人對中國報業史研究的新突破」後,對這「發掘原件正本清源」 之作評價道:

在這裏,不容有無根之談和主觀臆測,一切裁斷必依事實。凡屬存疑記述,不論來自權威,出自眾口,或爲當事者所寫……都必須將其置於事實前面一一加以檢驗。孤證不立,證據力求充分……就是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地,攻克一個又一個疑難陣地,澄清了中國早期新聞史研究的上述種種混亂狀況,撥開迷霧,顯露真容。中國的中文報紙、中文日報究竟是「怎樣而來的」?現在得到了滿意的回答。卓教授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新聞史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功不可沒(卓南生,2015,頁 274)。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土屋禮子將卓南生的《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及之後的寧波《中外新報》等研究,置於東亞新聞史學術史發展的坐標上來評價。她認為卓氏的研究成果與北根豊編的64卷《日本初期新聞全集》出版已經:

突破了1920年代構築起來的初期新聞史研究的水準。換言之,

這此研究成果已經擺脱了小野秀雄的《日本新聞發達史》(大阪每 日報社、東京日日報社,1922)、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上海商 務印書館,1927) 以及明治文化研究會的研究框架,開拓邁向東亞 新聞史的研究之道(土屋禮子,2011,頁295)。

卓南生的學術成就帶給學界的貢獻,並不只是堅持訂正報史研究種種錯 誤和補充疏漏的「史料派」考據功夫,更重要的是通過「上窮碧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學問精神和科學探求,11 點滴成篇,對中國近代報業發 生史作出基於「有多少證據,便說多少話」的體系性、整體性闡述。在書評 〈一字一汗滴,十年心血盡成書〉中,臺灣政治大學新聞學者彭家發寫到:

各篇章皆按主要報刊創刊年份,依序排列,蔚成一頗爲完整體 系和結構。故本書系以緒論作爲導讀,簡略地點出中國「邸報」(京 報) 這類「古代報紙」源流,作爲「滑入」近代「新報」之「時光 隧道 | 。這樣的一種跨時空大動作……這一鉅觀式的整合,便賦予 華文報業的世界觀,從而由一個建制性架構,得窺華文報業階段性 發展,可謂用心良苦(彭家發,1999,頁290)。

在嚴密考證中,體現報刊創辦歷史背景、辦報由來、資金來源、主編主 筆、人脈關係的「中觀」考察,進一步結合報刊自身的成長變化,將報刊個 案結成報刊群,從中揭橥近代中文報業從萌芽到誕生、從源流到譜系、從成 長到演變等「新聞發生史」的「鉅觀式」結構,「微考據」與「大動作」嚴 絲縫合,正本清源,充滿著歷史發展的邏輯感與歷史正義的價值觀。

「亞洲新聞史學家怎樣才會獲得國際學界的尊重?」 \equiv

亞洲新聞史學家怎樣才會獲得國際學界的尊重?這是卓南生新聞史研究 亞洲視角之問題意識,也是其新聞史書寫的最高立意。

卓南牛強調,各國的新聞牛產及其發展過程不盡相同,中國的新聞史研 究者大可不必將歐美新聞史研究的典範當作「金科玉律」。他認為,不論是 歐美、日本或中國,努力發掘本國早期原有資訊媒體(新聞類似物),深入 探討其形態、特徵與發展,作為考察折代報紙起源的原點,辨析其連續性與

¹¹ 香港學者黃仲鳴稱為「卓南生精神」(黃仲鳴,2010年3月13日)。

非連續性,應值得尊敬。他表示,方漢奇 1978 年撰寫的〈從不列顛圖書館 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一文,深入解讀了世界上最古 老報紙——進奏院狀,意義非凡。¹²

他以此為例指出,以「邸報」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報紙」(或曰「新聞信」),在世界新聞史上是佔有一定地位的。歐美新聞史學家將其「新聞信」, 視為「近代報業」的雛形,小野秀雄及其弟子們則發現,江戶時代將新聞或 風聞印成單張或小冊子、報販沿街邊讀邊叫賣的「讀賣瓦版」,其實就是日 本獨特的「新聞類似物」,頗有德國「飛紙」¹³ 性質,從而記載入日本新聞 史冊。

這說明日本新聞史學家並不樣樣以西說爲衡量本國新聞發展史的唯一依據和標準。恰恰相反,怎樣努力發掘本國確切有力的史料,如何從中辨析本國新聞發生史的特徵及其與歐美的差異,是新聞史研究者被賦予的重大課題和使命。也惟其如此,亞洲(其他非歐美源流的國家亦然)的新聞史學家才會獲得歐美學界的尊重(卓南生,2020,頁177)。

這段充滿史家正氣之語, 道出了新聞史學家的研究主體性從何而來、如何而來, 也是卓南生在各個場合都強調的「新聞史為誰研究、為何研究」的根本問題。這就能夠理解為何多年來他把中國「古代報紙」置入中國近代「新聞發生史」的研究視野。他在《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新版自序」(卓南生, 2015, 頁 1-79)和〈中國近代新聞史研究的虛像與實像〉(卓南生, 2020, 頁 357-406)中, 反覆提出如下論題:

- (一) 焦點:近代報紙跟「古代報紙」有沒有關聯性?
- (二)從概念到概念的誤區:「近代報紙」才是報紙?
- (三) 近代化中文報紙的萌芽期特徵:「報紙」與「雜誌」尚未嚴格區分
- (四) 宗教月刊(編者) 如何看待中國「古代報紙」?
- (五)早期商業報紙如何安置邸報?

上述論題的研究結論是:西方在向中國引進「新報」這種「近代型」報紙的概念時,從一開始就注意到流傳於中國上層社會的傳統資訊媒介——

¹² 在該文中,方漢奇 (2018,頁125) 指出:「它有點近似於西方中世紀的新聞信,然後卻比西方 最早的新聞信還要早上好幾百年。所不同的是,新聞信主要是爲早期的西方資產階級傳達經濟 情報服務的,而早期的邸報,則主要是爲封建地方政權瞭解朝廷消息,鞏固和維護他們的統治 地位服務的」。

¹³ 德國沿街販賣的新聞類似物 Flugblatt, 德文原義是 Flying page。

《京報》,故洋人稱自己所辦的報紙為「新報」,並一度讓《京報》成為「新 報」新聞版最主要的組成部分,這說明他們心中有著中國「古代報紙」的影 子。為吸引閱讀《京報》的讀者群,宣傳西方的「道」與「理」,在辦報宗 旨與典節上,從宗教月刊時開始,就表明其首要宗旨是「必載道」而非「傳 新知 | ; 他們在華辦 「新報 | 從不忘記配合母國國策 , 推行 「國益 | 優先與 「雙 重標準」的典範(卓南生,2015,2020)。

卓南牛不僅發現西人在華中文報刊的首要宗旨為「載道」,還指出他們 白始至終推行「國益論」與「雙重標準」,後者是歐美新聞業至今仍在奉行 的「金科玉律」。他進一步抛出了這些結論依存的「研究範疇」及研究方法論: 錨定中國「古代報紙」與「近代報紙」、宗教月刊與「新報」這兩對「矛盾物」 的存在,強調既要看到它們之間的差異,又不輕易否定其連續性。

日本琉球大學西里喜行為《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1990 年日文版)撰寫書評時,談到原生於歐美文明的「近代化」文化機制及其意 識形態的資訊媒介,指出:

19世紀以降中國與歐美接觸的過程,是歐美試圖依照自身模 式改造傳統中國的過程,也是傳統中國以歐美強加給自己的「近代 化|爲槓桿,促進自身變革;並逆其道而行之,以反侵略、反殖民 地化的手段進行改造和轉化的過程。報紙、雜誌作爲歐美「近代化」 的象徵,獲得傳統中國的接納。19世紀後半期以降,由中國人自 己主辦的、以中國讀者爲對象的華文報紙開始發行。這也是中國自 我變革、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個範例(卓南生, 2020,頁180)(原刊於日本《中國研究月報》,【東京:中國研究所】 1991年5月號【第519號】,頁35-36)。

上述觀點與卓南生的研究結論不謀而合。換句話說,正是西人帶來的舶 來品——「新報」所奉行的「國益」至上和「雙重標準」的辦報典節,促使 早期接觸和參與「新報」或「準新報」活動的中國報業先驅王韜(1828-1897) 等決定自籌款項自辦新報。從這角度看,萌芽期中國近代報業史正是一部中 國人要求擺脫外國勢力對傳媒控制、爭取言論自由,從而表達國家民族意識 的鬥爭史(卓南生,2015)。卓南生高度概括了這一歷史過程:

從米憐於 1815 年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介紹西

方「定期刊物」的報刊概念與形式到中國,直到王韜掌握報紙這一傳播媒介,倡辦「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循環日報》,藉以維護華人的利益及喚醒其國人與當局力圖革新,以應西力東漸之變化,充分反映了這60年間中西關係變化的巨大。這60年間的變化,其實也正是中文報刊從誕生、萌芽、成長而演變爲「近代報紙」的過程。《循環日報》在版面編排與內容方面的成熟,正標誌著近代中文報業邁入新的里程碑(卓南生,2015,頁210)。

這一甲子的滄桑巨變,成就了中國人於 1874 年自辦成功的第一份中文 日報《循環日報》,後者成為中國近代報史上一篇華章,對這一「前奏」到「華 章」的演變過程所作濃墨重彩的著筆,彰顯出卓南生作為亞洲華人新聞史學 家的研究主體性。

在歐美強加的「近代化」或曰「現代化」槓桿面前,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的新聞史論研究者,應該以鮮明的主體意識,建立自己的國家民族主體性,唯有如此,才有跟歐美學界展開平等對話的可能。縱觀卓南生以考證為基、以審視為軸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及作為它補充與延伸的《東亞新聞事業論》,無不彰顯著鮮明的亞洲視角、對西學引進予以審慎的吸收與辨析,堅持理性批判的態度和歷史是非論的價值觀。

參、日本時評寫作

「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的信念,不僅體現於卓南生的新聞史研究,也 貫徹在他近60年的日本時評寫作中。1967年,他開始為新加坡《星洲日報》 和《南洋商報》撰寫通訊稿。他認為:

在有關日本的資訊還不那麼多的時代裏,這些一手的體驗記或 來自日本的通訊稿,不失爲當時人們瞭解日本的一個管道(卓南 生,2008,頁2)。

二十世紀 60 年代中期,因特定的歷史原因,新加坡的青年人大多前往 英國留學。「到日本,到底能學些什麼?」面對親朋師友的不解甚至反對, 卓南生抱定「在亞洲研究亞洲問題」的殷切願望踏上了留日攻讀新聞學的道 路,他坦陳:

正如不少同年代的朋友一般,作爲一個想挑戰困難的年輕人, 我想「走一條少人走的道路」,想用自己的雙眼、用自己親身的體 會,將戰後新生日本的真實情況告訴親友。作爲新聞系學生,爲了 學以致用,我在1967年就開始寫東京通訊(卓南生,2013,頁9)。

1973 年,卓南牛返回新加坡出任《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兼研究部主任。 1983 年 3 月,新加坡《星洲日報》與《南洋商報》合併為《南洋‧星洲聯合 早報》(簡稱《聯合早報》)。1987年10月,他出任《聯合早報》首任駐日 特派員。1989 年 4 月,他被聘為東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副教授,轉入學界後 仍筆耕不輟。

自 1967 年至今,由他執筆的日本時評,陸續見刊於新加坡《星洲日報》、 《南洋商報》、《聯合早報》等華文報紙,也有不少文章曾同時或分別見刊於 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香港的《信報》、《明報》、《大公報》、臺灣的《聯 合報》、《中國時報》、《中時晚報》、《日本文摘》、中國大陸的人民網日本 版、《世界知識》、《中國青年報》與《參考消息》等。在绣析日本政治、外 交和社會思潮的走向上,這些時評文章不僅及時提供詳實資訊和深刻見解, 同時也為研究日本和亞洲問題積累了有力文獻。

一、日本社會的「變」與「不變」

卓南生日本時評的中心主線從未離開對日本「變」與「不變」的思考, 尤其是對日本的社會思潮及其亞洲報導在戰前、戰後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 檢視,具體的問題是:戰後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別於戰前?日本是怎樣看待 亞洲的?日本的大眾傳媒怎樣報導亞洲?促使日本國策變與不變的因素究竟 為何?

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近代化道路和「皇國史觀」的檢討、對日本亞洲觀 的視野盲點及其外交政策的批判、對日本大眾傳媒報導特徵和輿論誘導機制 的剖析,構成了他日本時評思想脈絡的三個重要支點。

如何辯證地評價明治維新的歷史影響,與如何看待另一個問題緊密相 關,即「日本的近代化模式」是否值得提倡?中國和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 是否應借鑒日本明治維新當年「近代化」模式的道路?在1968年「明治維 新百年祭」時,日本國內對這一問題掀起了熱烈討論。

日本知識界對近代日本的發展道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持正面評價者往往支持日本的近代化模式,忽略其侵略行徑給亞洲和日本人民帶來的災難。不少日本開明知識份子在正面評價明治維新的同時,也強調近代日本史本質上是對外膨脹和擴張侵略的歷程,主張應充分反思明治維新促使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慘痛教訓(毛章清等人,2021;吳學文、卓南生,2005;卓南生,2020)。

卓南生指出,日本政府為何要大張旗鼓舉辦「明治維新百年祭」,日本知識界為何針對明治維新的歷史評價呈現不同看法等,都需要立足「國論二分」的時代背景才能把握問題根本。所謂「國論二分」,就是輿論界圍繞日本的國家走向分為兩個陣營,保守陣營主張堅持日美安保體制,主張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革新陣營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反對修改「和平憲法」,主張獨立自主,維護和平路線。簡單來說,「國論二分」可以視為「親安保」與「反安保」、「修憲派」與「護憲派」圍繞日本國家發展道路選擇的論爭。

戰後日本為防止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在憲法前文強調和平主義,並於第九條作出明確規定:(一)日本國民誠實地希求以正義和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通過發動國際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等手段解決國際紛爭。(二)為了達到前項目的,(日本)不能擁有陸海空軍以及其他軍事力量。同時,也不承認國家有交戰權(卓南生,2006a)。是否堅持維護「和平憲法」第九條,與是否能夠正確評價明治維新百年來「日本的近代化模式與歷史道路」的這個問題息息相關,更關係到戰後日本是否在充分反思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做出未來的道路選擇。

為分化國內反戰力量,治療國民「恐戰」、「厭戰」情緒,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策略:篡改教科書內容,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編造「出兵有理」或「迫不得已」的理論和故事;操縱大眾傳媒,渲染復古情調,提倡戰前精神;營造「輿情」、「空氣」,先後策劃舉辦「東京奧運會」(1964年)、「明治維新百年祭」(1968年)和「大阪萬國博覽會」(1970年)等三場活動(卓南生,2020;毛章清等人,2021)。親歷過這些活動也見證了日本當局、保守派知識份子和大眾傳媒虛虛實的輿論誘導,卓南生指出:

日本官方希望推廣的歷史敘事,旨在強調明治維新的光明面, 炫耀近代日本的成就與「國威」,重塑「大和民族的榮光與信心」。 1970年的特殊性體現在,日美軍事同盟條約在這一年即將期滿。 在反對續簽《日美安保條約》的呼聲中,保守陣營同時希望借助上 述大型「演出」,通過誘導輿論,轉移公眾的注意力。從結果上看, 日本當局的這波操作取得了效果(卓南生,2006a,頁5-7、8-10)。

日本是否會重蹈覆轍?日本將往何處去?類似的憂慮和警示經常出現在 卓南牛的日本時評中。他憑著鮮明的問題意識、敏銳的觀察能力和肯於鑽研 的治學態度,捕捉到日本社會思潮的諸多症候,進而可以做到「見一葉落而 知歲之將暮」。他深刻意識到,即便在戰後革新陣營最能發揮制衡作用的時 期,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效仿西方列強,奉行「脫亞入歐」、「富國強兵」、「弱 肉強食」路線,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及其近代化模式,並沒有得到徹底 反思。戰前遺毒仍頑強存續在戰後日本的知識結構乃至精神構造中。

在「國論二分」時代,日本社會內部尚有一股開明、進步的力量與保守、 倒狠的力量進行抗爭,發揮著重要的制衡作用。遺憾的是,這股制衡力量日 漸微弱。二十世紀 90 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愈發難以聽到不同的聲音。1994 年以後,日本政壇進入「總執政黨化」和「總保守化」時代,保守陣營與革 新陣營的勢力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卓南生,2006b)。卓南生經常提醒人們 注意:

由於缺少制衡力量,戰前的史觀與諸多理論,在日本官方的鼓 吹和保守陣營的回應下,經過重新包裝和再生產,不僅被日本國民 廣泛認可和接納,還對亞洲鄰國的歷史認知產生了影響。這些「新 瓶裝舊酒 | 的論調,或通過「部分有功論 | 爲日本對亞洲的侵略行 徑正名,或通過爲「近代的超克」翻案進而美化「大東亞戰爭」, 或通過形形色色的「亞細亞主義」誘人障入「大國夢」的思維陷阱 (毛章清等人,2021,頁193-197)。

二、 祛除「亞細亞主義」 迷思與傳達亞洲心聲

通過從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中期的持續觀察,卓南生明確指出,戰前 的「亞細亞主義」其實就是「日本主義」,其中心思想是「日本是亞洲的當 然盟主」。戰後,由於戰前的「盟主論」未被清算,在一個事事講究次序排 列和力量對比(即弱肉強食有理),且自居亞洲第一的日本社會裏,任何形 式的亞細亞主義實際上都難挑「日本乃亞洲當然盟主」的結論與命運(卓南

生,2006a)。

明治維新以來,「脫亞論」和「興亞論」則是影響日本國策的兩股重要 思潮。「脫亞論」的中心思想是恥與亞洲人為伍,要「脫亞入歐」。「興亞 論」雖標榜「解放亞洲」,其實質是由日本作為「盟主」取代西方白色人種 奴役亞洲人民。這兩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均以日本對亞洲的控制作 為邏輯起點。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的膨脹期,雖將「脫亞論」作為主導思想, 但出於戰略需要,特別是發現憑一己之力難以同西方諸國對抗,或在亞洲其 他國家和地區遭受抵抗時,就會舉起「興亞論」的迷惑性招牌,提倡「亞細 亞主義」。日本大眾傳媒上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以及日本的亞洲政策走向, 遂成為他撰寫時評、從事教研工作不可或缺的課題。他多次直言:

也許正是因爲這樣的政治土壤與氣候,戰前、戰時日本「從軍記者」「報導員」的「戰記」及當時新聞理論家們的輿論宣傳活動和理論,在戰後也原封不動,而未受到應有的反思和「檢證」(驗證)。因此從亞洲人的角度來看戰後日本知識界的言論,便有時難免有格格不入之感(卓南生,2008,頁7-9)。

1940年至1945年,日本媒體上曾出現過一段短暫的「南方報導」熱。 卓南生指出,在那個報紙跟隨著戰爭成長的時代裏,日本「南方報導」的興 起與結束,始終與其侵略亞洲的國家政策緊密掛鉤。

日本的「南方報導」隨著日本南進步伐的加速與軍事力量的膨脹匆匆而來,也隨著日本軍力的衰微而有如退潮般匆匆而去。從事「南方報導」的大批新聞記者和文化人,在對東南亞缺乏基本認識的背景下,在所謂日本「國運」與「國益」的指引下,扮演著「文化尖兵」的角色(卓南生,2008,頁25、33)。

戰後的日本大眾傳媒應該從「南方報導」中汲取怎樣的教訓(卓南生,2006a)?帶著這個問題,審視觀察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東南亞報導的論調與特徵,卓南生遺憾地發現,「南方報導」的遺產(包括當時為服務日本「國策」而散佈的東南亞觀)在有意無意中得到繼承,日本戰前的「南方報導」與戰後「東南亞報導」在立場、理念與角度等方面都具有內在連續性。這體現在,未擺脫以日本「國益」與「日本企業利益」的立場和思考,在日本經濟勢力以美國為保護傘重返東南亞的背景下,扮演著「刺探東南亞人民

的對日感情」的「文化尖兵」角色。未擺脫戰前「北人南物論」(卓南生, 2006a)的認知視角,只重視市場、資源等經濟議題,對東南亞爭取民族獨 立和國家獨立的主體性實踐及其合理訴求視若無睹。未擺脫戰前「盟主論」 的影響,以日本為中心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期待與不安論」在維入 二十一世紀後,逐漸簡化為東南亞各「弱小國家」對亞洲「大國日本」的「期 待論 | 。14

卓南生注意到,日本的大眾傳媒緊跟政府步調展開輿論誘導,以日本的 「國家利益」、「企業利益」或日本人為中心進行報導,這些原則在戰前、戰 後始終如一。他因而將日本大眾傳媒的報導特徵總結為三點,即「劃一性」*、* 「集中豪雨型」和「激情主義」(毛章清等人,2021;卓南生,2020)。他喜 歡引用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關於日本大眾傳媒的作用:

今人惋惜的是, 戰後日本的國民仍然容易盲從政府。在戰後, 國定的教科書已經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卻是影響力巨大的大眾 傳媒。國民仍然是金太郎糖(東洋經濟週刊,1991;轉引自卓南生, 2008, 頁 22)。

「金太郎糖」是一種棒狀的糖果,無論用刀切哪一段,其截面的圖案都 是相同的金太郎的臉孔,比喻沒有個性的群體(卓南生,2008,頁 22)。這 個例子說明,在日本媒體統一口徑、不斷、反覆地以煽情方式集中報導的影 響下,日本社會對某些問題(特別是外國的問題)能夠很快形成統一看法。 日本特有的記者俱樂部制度,促使記者與採訪對象的關係密切,加上「政、 官、商、媒」的鐵四角關係,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媒體報導和言論的同質性。

面對日本大眾傳媒同質化、大規模、富有煽情性的輿論誘導,卓南生強 調,要提高警惕,審慎辨析,避免落入日方議題設置的圈套。對於日本社會 思潮和輿論氣候的變化,必須長期追蹤和觀察,從日本當局刻意放出的一些 試探風球中嗅出其真意與動向,才能從亂象與虛像中把握真相。事實上,戰 前的歷史道路和思想遺產在戰後日本未得到徹底清算,隨著政治「總保守化」 和制衡力量的喪失,日本的大眾傳媒經常歪曲歷史事件,鼓吹狹隘的民族主 義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為軍國主義招魂。

¹⁴ 參見〈日本戰前「南方報導」與戰後「東南亞報導」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卓南生,2008,頁 46-47)。同時可參考〈亞洲眼中的日本日本眼中的亞洲——什麼是真正的國際性?〉(同上引, 頁 224-231)。

實際上,動輒使用「反日」「排日」「侮日」這類詞語,是戰前日本傳媒的一大特點,目的無非是要把外國人對日本國策贊否的是非問題,轉變成民族對立或「國益」的衝突(吳學文、卓南生,2005,頁172;卓南生,2008,頁217-223)。

不分是非對錯,只將是否符合日本「國策」、「國益」作為判斷標準,以「親日」或「反日」這種貼標籤的方式轉移問題焦點的思考和輿論誘導方式,在戰後的日本理應銷聲匿跡。但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從這個角度看,戰後日本的新聞工作者與戰前日本的從軍記者是相似的。卓南生不斷地探尋著相關的問題:戰後的日本究竟與戰前有何不同?日本究竟在哪一方面變?哪一方面不變?

在讀到 1992 年出版的《日本政治評論二十年》時,《人民日報》記者蔣亞平高度評價卓南生的日本時評能夠「以批判眼光把握日本政治發展」,能夠「對日本政府戰後政策的種種蹊蹺之處,提出尖銳、坦率的批評」,能夠傳達「亞洲的心聲」(蔣亞平,1993)。2006 年,《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三卷本)在北京出版。這部文集收錄了卓南生自 1967 年以來對日本時政、外交與社會動向的觀察與思索,總字數多達 180 萬。馬來西亞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在賀電中誠摯指出:

字裡行間,讀得到卓教授屬於赤道青年特有的執著與熱情;讀得到卓南生先生曾爲新聞記者的敏感;讀得到卓南生先生身爲學者的視野。他的這份「固執」,卻得以爲亞洲歷史留下寶貴的資訊(卓南生,2013,頁353)。

三、堅持「亞洲視角」和「歷史是非論」

受到「萬隆精神」和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影響,「亞洲意識」和「亞洲視角」構成了卓南生歷史觀與問題意識的內核。他以日本時評寫作為基點,持續解構旨在合理化帝國主義侵略歷史的各種理論和觀念,不斷揭露深受文明等級論影響的各種世界觀,以對日本保守陣營在話語實踐領域中建構出來的神話祛魅。基於對「世界範圍內的帝國主義文化和歷史上對帝國主義的反抗」(Said,1993/李琨譯,2003)的關注,他的日本時評(包括以時評文章的材料和觀點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對談文章、研究論文)得以和諸多站在知識

去殖民化立場的研究形成對話。他駁斥日本形形色色的「亞細亞主義」和所 謂「太平洋戰爭(部分)有功論」。

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苦難時代(各國教科書稱之爲「史上最 黑暗的日子」),東南亞各民族深刻地體會到只有團結一致,把形 形色色的殖民統治者趕出去,彼此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才會有所保 障。換句話說,殘暴的日本「皇軍」統治時期,是刺激東南亞民族 主義情緒高度成長,促使每一個東南亞人決心當家做主,建立多元 民族國家的重要因素(卓南生,2008,頁38)。

他批評一廂情願以日本為中心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期待與不安 論」,完全忽視了「期待與不安」是雙方共同存在的問題(卓南牛,2008)。 他批評日本的「東南亞通」基於戰前「華僑利用論」的思維框架,將已經擁 有當地國籍、對所在國具有強烈認同感和歸屬感的華人定位為中國「援軍」, 企圖挑撥東南亞華人與當地各民族間的不和,為以後煽動當地「排華」、「反 華」情緒進行輿論鋪墊(吳學文、卓南生,2005;卓南生,2008)。

他不認同西方媒體(包括日本媒體)將亞洲的民族主義視為「洪水猛獸」 的論調。從亞洲人民的歷史實踐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 趕走了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因此,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實際上 是最害怕民族主義。他審慎提醒,民族主義走過頭就變成了狹隘的國家主義, 或者是排外主義,都是不行的。他認為應該區分正當、正常的民族主義和排 外的民粹主義(卓南生,2013)。

他將歷史研究的諸多習慣移植到時評寫作中。「為誰報導?為何報 導?」,是他從事報業史研究時考察、評價各類報刊的標準,也是他撰寫日 本時評遵循的實踐原則。對基本事實(中實)的掌握要力求準確,辦免脫離 時空脈絡對材料進行主觀、片面的解讀。這個新聞史論研究的方法也貫徹在 他的時評寫作中。他強調不論是做學術研究,還是從事新聞報導與時評寫作, 都要在明確的問題意識的指引下,充分佔有資料,辨析資料的準確性,以正 確的歷史觀將碎片化的資料串聯起來,才能全面展現歷史事件(新聞事件) 的面貌,卓南生認為,歷史觀是有關「正義」與「非正義」、「黑」與「白」、 「是」與「非」的重要問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裡,他的日本時評堅持「歷 史是非論」,傳達「亞洲的心聲」。

對於我們研究亞洲近現代史的人來說,在殺人者和被殺者之間,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肯定是有能正面和不能正面評價的「人」與「事」(卓南生,2013,頁5-6)。

肆、新聞史論教育

卓南生在看待為何而學、如何來學、學些什麼等有關問題時,常保持著批判態度。這與他所處的歷史環境及個人求學、從教經歷相關,且可以概括為兩個階段和兩種身份——二十世紀 40 年代至 80 年代初,作為一位受教者,在新加坡及日本長期求學和在英國相對短暫的留學經歷;80 年代末至今,他主要是從教者,在日本和中國多所高校教學,從而有了更多的比較觀察。他將這些得來的思考帶入教育的具體實踐,推動新聞史論的研究與教學。

一、 在日本新聞學國際化浪潮中步上講臺

1986年9月卓南生在日本立教大學獲取該校首個社會學(主修新聞學)博士學位,1989年他作為第一位外籍專職教員從《聯合早報》東京特派員轉到東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所任副教授,都成為日本新聞學界國際化發展的標誌性事件。在日本新聞學國際化的背後是該學科對其存在地位與未來出路的困惑。

在東京大學弱肉強食的學科博弈中,作爲校内的一個小單位——新聞研究所必須求新求變才能生存和發展 (陳娜,2014,頁59)。

在全球各地,新聞學的設立多是因為新聞業務的發展引發社會關注,新聞行業也力圖提高業務水準與社會威望。作為一個後起且與實踐密切相關的領域,其學術地位一直受到挑戰,「新聞無學」、「新聞無用」的質疑不侷限於一國一地。這給新聞學帶來兩重影響:新聞學與社會輿論及意識形態相關部門關係緊密,更容易受到各種權力和利益因素的影響;新聞學不斷從其他學科借鑒和引入理論與方法,力圖證明自身學術存在的獨特價值。

在多個場合,被問及新聞學研究和教育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時,卓南生表示「新聞自由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課題」。他所說的新聞自由並不囿於西方主

流概念中的新聞自由,而更重視在縱觀新聞業與近代化歷史關係的基礎上, 通過檢討誰出資、誰操權、為何、為誰等基本問題形成的對新聞自由的追尋。 在新聞學三支柱——新聞理論、新聞倫理與新聞史中,卓南生堅定表示,新 聞史起著重要的基礎作用。新聞學科的獨特優勢在於新聞史的發掘與思考。

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源自 1929 年成立的東京帝國大學新聞研究室,以 培養研究人員為重點,超脫具體的新聞實務,期待能推行新聞理論與新聞中 的研究。隨著戰後美國「大眾傳播學」(mass communication) 典範的引入, 日本的新聞學逐漸大眾傳播學化。二十世紀80年代,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 在其日文名稱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英文名稱悄然轉換為「新聞與傳播研究 所」(卓南生,2020)。二十世紀 90 年代,大眾傳播似乎也不能完全概括行 業在全球的發展情況,「情報」(information)成為學術流行語。為了緊跟國 際潮流,也為了獲取更多社會資源,1992年,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正式更名 為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擁抱時代潮流、改變名 稱十年後,日本文部省認為研究所成果欠佳,「無太大作為」,最終被併入東 京大學情報學環(陳娜,2014)。對於這一結果,卓南生引用日本新聞傳播 學者新井直之的一段話加以解釋:

要不斷地思考爲什麼與爲誰而搞「傳播」與「情報」的課題, 如果離開了「爲什麼」與「爲誰(服務)」的觀點來談「傳播」與 「情報」,無疑成爲「時代的奴隸」(卓南生,2020,頁209)。

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易名與閉所令人遺憾,鑒於研究所摸索出路和易 名的過程恰好發生於卓南生在職期間,他後來常以該所的盛衰史作為新聞學 研究「誘惑」與「陷阱」的案例,警示新聞學研究不要迷失學科的自我定位。 他因而引導和鼓勵學生在廣泛涉獵的基礎上,要在新聞史專題上不斷深入, 舉一反三、以一敵百,形成對普遍規律的把握。他曾笑言,自己有關近代中 國報業發展史的研究也關注了「新媒體」, 只不過是屬於王韜等人那個時代 的「新媒體」,其中涉及的「誰來辦報、為何辦報」等關鍵問題則已超越具 體時代與媒介技術的各種形態。

二、涉足中國大陸的新聞史論教學與研究

1994 年轉至龍谷大學後,卓南牛招收留學牛、激請中國學者訪學,積極

推動與中國學界的交流。

2000年,他利用學術年假在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講授「日本政治與外交」、「日本政治與日本傳媒」等課程。他的授課以教師講授與學生發表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一大特點是「不設限」,話題不設限,討論不設限,結論不設限。對於課堂上同學的發言,他很少輕易直接肯定或否定,更多情況下,他會圍繞同學的發言補充分享他所知道的事實。課堂上熱烈討論的氛圍讓卓南生對中國新聞學教育充滿期待。

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大學生求知欲的強烈和探求真理的精神,相比當時已逐漸消失「夢想」的日本大學生,顯然有著明顯的差異。 北大生的學習熱忱與求知精神遠在東大生之上(陽美燕,2015,頁 1-2)。

課堂之外,卓南生還安排各種與同學溝通交流的活動,傾聽他們關於學 術乃至中國社會眾多話題的看法。通過交流,他越發意識到:

儘管北大生學習熱忱高、思維敏捷和開放,但從他們交來的期 末報告等來看,未經思考的整合性、非原創性的論文佔絕大多數。 說白了,同學們都欠缺「問題意識」,基本上都不是帶著問題去寫 論文或報告,而是在等待老師分配研究題目(陽美燕,2015,頁2)。

卓南生絕不給學生分配研究題目,在他看來,如果自己連要研究什麼都不知道,根本沒有資格修讀深造。學生應弄清楚「為何研究、為誰研究」的基本問題,通過「大翻書、亂翻書」形成對學科領域的鳥瞰圖並找到自己所要研究的問題。

他利用各種機會引導學生形成「問題意識」。2002年,他圍繞「日本佔領與中國新聞事業」課題, ¹⁵ 與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師生開展共同研究。在他親身示範下,其中部分學生(如劉揚)對新聞史研究產生興趣並找到長期關注的研究問題與方向。

2004年,他受時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院長吳廷俊教授之

¹⁵ 該課題為日本龍谷大學國際社會文化研究所 2002-2004 年度共同研究課題。參加這項課題研究的有:當時任職於該校國際文化學院的卓南生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程曼麗教授和北京大學陳昌鳳副教授及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劉揚、楊瑾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劉波、殷新宇。該課題第一部分的初步研究成果三篇論文日本版於 2004 年刊於龍谷大學《國際社會文化研究所紀要》第6號,中文版刊於 2004 年程曼麗主編《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一輯)》。

託,承擔副指導教授任務,接受吳教授名下博士研究生馬嘉到龍谷大學進修數月。在卓南生的引導下,馬嘉以同志社大學為個案研究,著重探討日本新聞傳播教育的體制。藉此機會,卓南生在龍谷大學深草校區附近的喫茶店,以每週一次頻率,面向京都地區講華語的師生開設討論課。在課上,碩士生、博士生輪流分享研究的階段進展,或共讀一本書,又或圍繞熱門新聞話題展開探討。這使他對中國留學生的問題意識與寫作能力有了更深認識(陽美燕,2015)。

2005年,卓南生受聘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教師陽美燕成為他的博士研究生。卓南生耐心引導並非專攻新聞史的陽美燕,鼓勵她從湖南湖北兩地新聞史入手進行個案研究。陽美燕通過閱讀大量材料,選擇研究晚清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購買《字林漢報》後而出版的《漢報》,探討日本在華設立的首份政論報紙如何誘導輿論、服務日本「國益」,最終形成她的博士論文和專著。中南民族大學教師汪前軍也在華中科技大學接受卓南生指導,完成了少人問津的《大公報》廣告史的博士論文,獲博士學位。

同時,卓南生在龍谷大學先後招收呂艷宏和孫曉萌兩位碩士研究生。呂艷宏專注於對「滿映」與李香蘭的研究。當中國大陸部分學者關注「滿映」如何影響了中國現代電影工業、李香蘭如何促進中日關係時,呂艷宏則深層探討「滿映」與李香蘭在日本對華文化侵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孫曉萌關注日據時期淪陷區的中文報紙,結合自己來自中國天津的經歷,選擇日據時期在天津乃至華北都有影響力的《庸報》作為研究對象,系統梳理了誕生於北洋軍閥統治末期的報紙產生與發展歷程,最終如何一步步成為受日本侵略者控制。

卓南生對學生的指導看似寬鬆,但是從他給這些青年學人專著寫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指導學生有著嚴格的判斷標準,他們必須對自己所研究的課題充滿興趣,能夠主動克服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難並完全沉浸在研究的快樂之中。只是具備這些素質的學生都可遇而不可求,一些深受卓南生影響而醉心於新聞史研究領域的年輕學者與他結緣也多處於偶然。廈門大學的年輕教師毛章清在卓南生首次為廈門大學新聞學系作報告時與其相識,並在其指導下選取了日本人在中國華南出版的第一張中文報紙《閩報》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勾勒出該報發展概貌,反映了日本在華報紙的發展與演變。2005年,卓南生再次利用學術年假到北大講學,同時編纂《卓南生日本時論文

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程曼麗教授指派本科生李傑瓊予以協助,而她也在與卓南生互動過程中,明確了繼續攻讀博士研究生的目標並選取管翼賢所辦《實報》作為研究對象,並一路取得碩士、博士。與大陸部分學者刻意迴避管翼賢附逆而強調其「嗜」報如命不同,李傑瓊的研究則將《實報》的報格斷裂現象置於「半殖民主義語境」下進行考察,揭示了私營報紙的妥協性與報格上的內在矛盾(李傑瓊,2015)。

同樣的,作為副指導老師,卓南生也協助程曼麗教授指導李松蕾,探討《大公報》對日俄戰爭(1904-1905)的報導姿態,完成其碩士、博士學位。2010年,北京首都經貿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年輕教師賀心穎前往北京大學開始為期一年的訪學交流,並參加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舉辦的第二屆全國新聞史論師資特訓班,逐步對「第三勢力」¹⁶ 代表報人曹聚仁(1900-1972)產生興趣並將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這份論文批判了「第三勢力」的搖擺,與中國大陸學界炒作的「民國熱」和歷史人物寫作「一刀切」潮流不很協調,但在卓南生及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同窗支持下,賀心穎順利完成博士論文並出版專著。

對中國大陸新聞史研究,卓南生始終充滿希冀,但也抱有深深擔憂。他與中國新聞學界建立聯繫之時,也是傳播學快速進入中國大陸之日。從二十世紀 50 年代作為批判對象的大眾傳播學到二十世紀 80-90 年代傳播學被系統引進,先是實證研究方法,後是主流傳播理論典範引入和採納,「新聞與傳播」學院系如兩後春筍般增長,「言必稱希臘」現象在研究文章中越發普遍,對「國際化」的追求日漸強烈,「新聞無學」的聲音則持續湧現,「跨界」、「出圈」成為中國大陸新聞學界的趨勢……卓南生在日本所目睹的一幕似乎又在另一個國度重演。在此過程中,新聞史研究乃至歷史研究受到的衝擊最為明顯。重實務輕歷史的現象大量存在,在課程設置上,新聞史課程學時被壓縮,新聞史課程在某些院校由必修課轉為選修課,大量講授新聞史論課程的老師也紛紛轉移到傳播或媒體經營等領域,合格的新聞史師資人才短缺。在新聞史觀上,歷史的客體化、相對論等觀點成為一種時髦,「歷史是任人裝扮的小姑娘」、「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等都被不加解釋和批判地引用,抽象演繹所產生的研究成果遠高於基於具體詳實的歷史分析成果。更驚人的是,作為對中國大陸主流革命典範歷史研究的反動,新聞史中一些歷

¹⁶ 第三勢力主要是指二十世紀 20 至 50 年代,以眾多性質相近的政治黨派和社會團體為依託,以 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以及自由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勢力(賀心穎,2020,頁 8)。

史階段的關注被異常地增強或減弱,對一些歷史人物的評價發生 180 度的轉變,「冷戰」背景下產生的、充斥另一種意識形態觀點的《報刊的四種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Siebert et al., 1956 / 戴鑫譯,2008),從被批判性參考變為新聞史課堂上的必讀經典書目,「複線歷史」等理論的引入更是模糊了本來清楚的歷史主線。

對此,卓南生利用各種場合給青年學人講述他自己的治學經歷和感悟,在 2002 年和 2017 年,相隔 15 年,兩次以「新聞傳播史研究的『誘惑』與『陷阱』」為題與青年分享治史苦樂,對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偏差,也直言不諱,耐心地勸導青年研究者要提防「新媒體研究熱」中「跨學科對話」的「誘惑」與「陷阱」,避免重蹈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閉所的覆轍。就某些觀點和事實,他不厭其煩地一講再講。當聽到有人抱怨說,卓南生怎麼總在重複講那些事,他只是置之一笑,回應說,講了那麼多次,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有所誤解,說明還不夠。同時,他以身示範,通過對自己關於寧波《中外新報》研究的階段性分享展示一項研究是如何在鍥而不捨努力下不斷深化。在他的引領下,很多學子被吸引到新聞史研究領域並沉醉在史實發掘之中。

三、 推動中國新聞史論研究人才隊伍建設

2004年,卓南生逐步將自己的教學和研究轉向中國大陸。他開始以點帶面,將有志於新聞史研究的個人特別是青年人彙聚成為一個學術團體,形成中國新聞史論研究的一股力量。2006年,時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程曼麗和卓南生在北京大學共同主持「北大新聞史論沙龍」,圍繞新聞史論進行分享或一起讀書交流,逐步匯聚了基本成員。

2008年,卓南生積極支持程曼麗教授推動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復會並協助開展其會務活動。這個曾在歷史上有過三年短暫活動的研究組織曾開創了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多項第一。程曼麗和卓南生希望通過這個平臺延續中國新聞學的光榮傳統,讓新聞史學、史觀的研究行駛在正確軌道上。在對象上,卓南生選擇以培養聯絡青年教師為主;2009年起,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連續五年在暑期舉辦「新聞史論師資特訓班」,吸引大量在新聞學領域從事教學與研究的青年參與,先後培訓的學員共計100人。學員來自高校、研究機構、媒體。除中國大陸外,還有來自日本、澳門的學員,體現了有教無類。在培訓班的基礎上,學員們成立了師資特訓班同窗會,成為長期

保持聯繫、共同進步的同儕學術群體。2010年起,先後在北京、廈門、長春、 吉首、南京、長沙舉辦了九屆新聞史論青年論壇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年 會,成為同窗會會員與新聞史論研究者年度交流的重要活動,不僅推動了個 人學術研究的持續深入,也密切了學術共同體內成員間的關係。

2010年春天,卓南生提前從龍谷大學退休,轉移至北京大學繼續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在他與程曼麗教授共同宣導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世界華文傳媒研究中心定期舉辦「北大新聞學茶座」與「北大華文傳媒讀書會」,為從事新聞史研究與教學者提供了學術交流平臺。

「北大新聞學茶座」的設計接近卓南生新聞學教育理想,既要廣泛交流、自由討論,汲取百家之長,又要切入現實關鍵問題,在一個領域進行深入研究、不斷積累素材、深化思考。藉助「北大新聞學茶座」的平臺,除邀請中國大陸新聞學界與業界專家外,他通過個人關係或友人推薦,先後邀請著名時事評論員、鳳凰衛視總編輯阮次山(1946-2020),路透社前北京分社社長、時任中國首席記者林洸耀,臺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時任系主任夏春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梁麗娟,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教授趙月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資訊學院教授郝曉鳴,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土屋禮子,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教授朱立,美國明州默士達學院(Macalester College)教授譚汝謙,臺灣政治大學教授汪琪,香港大學榮譽教授薛鳳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總編輯孫立川,前日本津田塾大學教授蔡史君等來茶座主講。講座者來源、觀點、角度多樣凸顯了茶座的開放性與多元性,拓展了茶座參與者的視野。

「北大華文傳媒讀書會」通過批判性的閱讀鞏固史觀、凝聚共識。圍繞部分研究者對民國歷史和近代化的追捧,卓南生推薦讀書會成員閱讀了曹聚仁的《中國近百年史話》(曹聚仁,2008)、《中國近代史》(蔣廷黻,2010)、《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胡繩,2001)、《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Duara, 1995/王憲明等人譯,2009)、《作為方法的中國》(溝口雄三,1989/孫軍悅譯,2011),在對比中認清不同的史觀如何看待近代化,如何認識侵略、歷史主線及中國的道路選擇。為了幫助大家瞭解冷戰歷史背景對社會科學特別是新聞傳播學的影響,卓南生組織大家先後閱讀了《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1945-1960)》(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Simpson,

1994)、《冷戰與大學: 通向戰後知識史》 (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Chomsky et al., 1997) 和《臺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林麗雲,2004)。部分讀 書報告發表後,與單純「膜拜」類、摘抄類的讀後感形成了鮮明反差。

2014年,卓南生同時擔任廈門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將教學、科研的重 心逐步由北京移至廈門,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積累的成熟模式也隨之被帶到廈 門大學。廈門大學新聞學茶座與北大新聞學茶座南北呼應,兩地讀書會在卓 南牛的指導下開枝散葉。2021年,卓南牛與夫人蔡史君教授被馬來西亞新紀 元大學學院聘為榮譽教授兼博士生導師。他們出身南洋大學,而新紀元大學 學院有「小南大」之稱。他們決定設立「南賢研究基金」,以支持該校研究 牛進行田野研究、參加學術會議及成果發表。幼年受教於南洋,而在暮年再 回饋、支持南洋的華文教育,卓南生的教育理念也因此不斷持續著。

參考文獻

- 土屋禮子(2011)。〈東亞研究的前沿—媒介史研究的現狀與展望〉,和田春 樹、後藤乾一、山室信一、趙景達、中野聰、川島真(編),《岩波講 座 東亞近現代史別券 亞洲研究的來歷與展望》, 頁 291-312。岩波書 店。
- 方漢奇(2002年12月12日)。〈引起轟動的新聞史新著〉,《光明日報》,第 8版。
- (2018)。《方漢奇文集》(增訂版)。清華大學出版社。
- 毛章清、曹立新、呂豔宏(2021)。《廈大新聞學茶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李點譯(2009)。《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江蘇 人民出版社。 (原書 Duara, P.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足立利雄(1991)。〈卓南生著《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東 亞月刊》,5:121-122。
- 吳學文、卓南生(2005)。《中日關係出了什麼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傑瓊(2015)。《半殖民主義語境中的「斷裂」報格:北方小型報先驅《實報》 與報人管翼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琨譯(2003)。《文化與帝國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Chatto & Windus.)
- 林麗雲(2004)。《臺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巨流圖書 公司。
- 卓南生(2002)。《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
- (2006a)。《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社會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6b)。《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政治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6c)。《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外交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8)。《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3)。《日本的亂象與真相:從安倍到安倍》。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5)。《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新版)。中國
- (2019)。〈素描與考卷〉,華中董事部、華中校友會(編),《百年華

社會科學出版社。

- 中情:1919-2019》,頁376-379。新加坡: 華中董事部、華中校友會(非 賣品)。
- (2020)。《東亞新聞事業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21)。〈動盪年代裡的華中山崗歲月(1956-1961)〉,《甲子回顧》, 頁 94-99。新加坡華僑中學 1961 年畢業班同學離校六十周年紀念特輯 (非賣品)。
- 胡 繩(2001)。《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
- 孫軍悅譯(2011)。《作為方法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 書溝口雄三 [1989]。《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大學出版會。)
- 曹聚仁(2008)。《中國近百年史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陳禹蒙(2014)。〈歷經身份認同的掙扎,以身為華校生為豪—訪問光洋學校 校友卓南生〉,潘星華(編),《消失的華校生:國家永遠的資產》,頁 86-87。新加坡: 華校校友會聯合會。
- 陳 娜(2014)。〈研究的起點是找準自我定位—訪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 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卓南生〉,《新聞愛好者》,435: 56-60 °
- 黃仲鳴(2010年3月13日)。〈卓南牛精神〉,《文匯報》,「琴台客聚」欄目。 彭家發(1999)。〈一字一汗滴,十年心血盡成書:談卓著《中國近代報業發 展史》成書歷程及其他〉,《新聞學研究》,58:289-290。
- 賀心穎(2020)。《報人曹聚仁的報刊活動與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陽美燕(2015)。《日本在華首家政論報紙《漢報》(1896-1900)研究》。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蔣亞平(1993)。〈「亞洲的心聲」―記新加坡報人、學者卓南生〉,《新聞戰 線》,3:54-56。
- 蔣廷黻(2010)。《中國近代史》。嶽麓書社。
- 戴鑫譯(2008)。《報刊的四種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Siebert, F. S.,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56].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Chomsky, N., Lewontin, R. C., Katznelson, I., Nader, L., Ohmann, R., Montgomery, D., Wallerstein, I., Siever, R., & Zinn, H. (1997). 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The New Press.

Simpson, C. (1994).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 陽美燕、李傑瓊、劉揚(2022)。〈新聞史論、時事評析與新聞教育:卓南生的傳播研究與實踐〉,《傳播研究與實踐》,12(2):107-146。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5
- Yang, M. Y., Li, J. Q., & Liu, Y. (2022). Historiography of journalism,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ion,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Toh Lam Seng'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107-146.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5 [Text in Chinese]

附錄:卓南生簡歷

簡歷	大事表
1942 年 4 月 生於新加坡	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為「昭南島」,日本佔領新加坡三年八個月(1942-1945)。 1945年舊殖民統治者英國返回新馬,東南亞掀起反殖、 爭取獨立運動熱潮。
1950-1955 年 新加坡光洋小學	1955 年 29 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代表團在印尼的萬 隆舉行萬隆會議。
1956-1961 年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	1956 年 陳六使倡議、萬眾一心創辦的南洋大學正式開學。 1957 年 馬來亞聯合邦成立。 1959 年 新加坡自治邦成立。
1962-1964年新加坡南洋大學文學院攻讀政治學	1963 年 馬來西亞成立。 1964 年 東京舉辦奧運會。 1965 年 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獨立。
1966-1969 年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新聞學科 (獲經濟學士)。自 1967 年起為新加坡《星洲日報》 和《南洋商報》撰寫日本通訊稿。	1968 年 日本隆重紀念明治維新一百年,全國史學界對明治百年功過展開大論戰。 1969 年 1 月 警備部隊沖入日本學運據點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驅散抵抗的學生,史稱「安田講堂攻防戰」。
1970-1972 年 日本立教大學社會學研究生院,獲社會學碩士(主修新聞學),探索新聞發生史研究。	1970年 大阪舉行萬國博覽會。日美安保條約自動延長。 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
1972-1986 年 同校社會學研究生院獲該校首名社會學博士學位(1986 年),主修新聞學。期間曾在《朝日新聞》研習,系該報戰後首名外國人研修生。 1973-1983 年 任新加坡《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兼研究部主任或執行編輯。其間曾停薪留職,到英國大英圖書館等收集報史原始資料,並在 Sussex University 修讀國際關係學。	1972 年 9 月 日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日關係正常化。 1974 年 1 月 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引發雅加達「反日暴動」。 1977 年 8 月 福田赳夫首相在馬尼拉發表不做軍事大國等的「福田主義三原則」。 1978 年 8 月 中、日在北京簽署和平友好條約。 1982 年 日本篡改教科書事件。
1983-1987年任《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合併後《南 洋·星洲聯合早報》的社論委員。	198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率全體閣僚正式參拜靖國神社。
1987-1989 年 作為《聯合早報》海外特派員試點,被派往東京任特派員,從事東北亞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的報導和分析。此後,先後或同時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南洋商報》、香港《信報》、臺灣《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聯合報》《日本文摘》和日本《東京新聞》《每日新聞》《東洋經濟週刊》《信濃每日新聞》等開闢時事專欄並出版若干中、日文時論文集。	1988年12月 韓國舉行16年來首次直接民選總統選舉,「三金一盧」展開激烈爭奪戰。 1989年1月日本裕仁天皇逝世。

簡歷 大事表

1989-1992 年 任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為該所首名外籍專職教學人員。1990 年,出版《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 1815-1874》日文版著作。

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象徵東西冷戰告一個段落。

1992-1993 年 名古屋大學國際開發研究生院客座研究員。期間撰寫大量時評,剖析日本新政黨林立、日本政壇大洗牌的「表」與「裡」,並擔任《東京新聞》「媒體評論」欄每月一評、為期兩年的評閱人,部分作品收錄於《大國夢與盟主論——總保守化的日本政治與外交》(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和日文版《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論》(東京:東洋新報社,2003)。

1994-1996 年 作為「新學部國際文化學部籌備委員」,轉任為京都龍谷大學教授。

1993-1995 年 日本政壇大洗牌,由「保(守)革(新) 對峙」的「1955 年體制」轉為「保保體制」的「總保 守化」時代。

1996-2010 年 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部、國際文化研究生院教授。長期負責主編《國際文化研究》。其間同時在東京法政大學、廣島大學等研究生院兼課。也利用學術年假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學,並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顧問和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導師。中文版《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先後在臺北(1998年)、北京(2002年增訂版)出版。2006年、《卓本生中本時論文集》(《日本政治》《日本外交》《日本社會》)面世。另,中文版《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則先後在北京(2008)、臺北(2009)出版。

1997 年 7 月 香港回歸中國。 1998 年 5 月 北京大學舉行百年校慶。 2008 年 4 月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1918-1920 年) 復會。 2008 年 8 月,北京舉辦奧運會。

2010年 - 現在 提前退休,轉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座教授。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世界華文傳媒研究中心為平臺,開展各種學術交流活動。其間先後或同時在華中科技大學任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汕頭大學、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等高校任客座教授、講座教授或榮譽教授。先後出版《日本的亂象與真相——從要低到安倍》(世界15-1874》(2015年增訂新版)和《東亞新聞事業論》(2020年版)等專著。(與程曼麗教授)共同主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學術文庫」,現已出版近 20種。

2010 年 5 月 上海舉辦世博會。 2019 年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百年校慶。 2021 年 廈門大學百年校慶。

Historiography of Journalism,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ion,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Toh Lam Seng'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YANG, Mei-Yan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Hunan University

LI, Jie-Qio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LIU, Yang**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oh Lam Seng is a renowned scholar for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a famous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lumnist. He worked as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Singapore's Sin Chew Jit Poh and Lianhe Zaobao's Tokyo correspondent. Starting from the late 1980s, when he began teaching at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late 1980s, Dr. Toh has been devoting himself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Currently, he still participates in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Peking University and uses it as a platform to engage young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dialogue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1815-1874) published in 1990, 1998, 2002, 2015, and East Asian Journalism published in 2010 and 2020.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oh's childhood experience, in which he witnessed the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changes of Japan and other Asian societies, this study outlines Toh's thoughts and views on historiography, column writing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With his work o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 industry in China, his long year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newspaper industry, and his care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lumn writing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he developed a clear and stable Asian perspective and an emphasis on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history.

Keywords: Japanology, Asian perspective, problem awareness,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 industry

* E-mail: 1291627558@qq.com ** E-mail: sunnydaisylee@163.com *** E-mail: 1014182423@qq.com







新聞事業與戰爭責任: 論日本「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之新聞思想

林鴻亦*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卓南生 2020 年的專著《東亞新聞事業論》為起點,論述聚焦在「新聞學的戰爭責任」上;這焦點既是卓南生新聞史研究、時事評析,以及新聞教育的關鍵前提,更是了解當代日本不可或缺的實質範疇。戰前,日本新聞學著重傳播效能,許多菁英投身軍國主義宣傳,但在戰後,這批專業人士卻「轉向」成為協助美國建設民主日本、大眾傳播的執行要員;一時之間,言語雖能表達,但在傳播過程中無法有效傳達意義的「傳播隔閡」卻在大眾中普及開來。圍繞著 1946 年出版的雜誌《思想的科學》而於 1949 年成立的研究會,正是掌握這段歷史的關鍵角色,也能成為理解卓南生書寫脈絡的背景。結論揭示二戰後的新聞學如何成為日本的思想史課題,以有效參與當代文化建構的歷史變局。

關鍵字:《東亞新聞事業論》、《思想的科學》、新聞學、傳播隔閡、戰爭 責任

* E-mail: 075051@mail.fju.edu.tw

投稿日期: 2021年12月16日;接受日期: 2022年06月15日







壹、研究動機

近來在華人新聞史研究社群中,卓南生在 2020 年的新著《東亞新聞事業論》引發關注。一則是因為該書是資深學者退休前經驗傳承的力作,二則是他在書籍中不斷提及的兩個觀點:「新聞事業必須負起的戰爭責任」,以及「帝國主義操控報業言論的雙重標準」;在國際秩序面臨重組的此時此刻,這樣的堅持值得我們省思。

卓南生為新加坡籍華裔,早在二十世紀 60 年代留學日本,80 年代獲博士學位,先後於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以及京都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部任教;期間分別在 1990 年於日本、1998 年於台灣、2002 年及 2015 年於大陸出版專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奠定其研究中國報業發展史的重要地位,加上他 70 年代起長期擔任《星洲日報》、《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東京特派員、社論委員等,對日本政界的觀察與評論精準、辛辣,可說是徹頭徹尾的新聞人。2010 年,他提前從龍谷大學退休轉往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任教,帶領中國年輕學者扎根歷史科學的新聞史研究,其學術歷程足以列入中國新聞史的篇章。

《東亞新聞事業論》一書近500頁,共分四部分。有關新聞史研究者集中在第一部分「近現代華文新聞史的探源與發現」與第三部分「東南亞華文報業縱橫談」;其要旨為:動態地觀察帝國主義介入東亞、東南亞華文報業誕生、發展的歷史,¹ 進而思考近代報業萌芽之際中國面對的國際處境,以及報紙言論具有的跨國性² 特徵。藉由這些研究成果,卓順勢提出核心論述:戰前帝國主義侵略之時,報業追求國家利益,但戰敗後未痛徹反省,使得新聞論述的「雙重標準」極其明顯,因而產生一種歷史連續性。依此觀點,作者發展出第二部分「日本的新聞學與大眾傳媒」,除系統性地觀察日本的新聞傳播學發展,還同時以時評、輿論觀測的方式,向日本的大眾傳媒、右翼政客提出質疑:不論是二戰前還是敗戰後,日本新聞界對內都採取國家利益至上的標準,而在媒體再現(representation)亞洲時則多使用隱含侵略性、歧視性的言論。第四部分「與青年學者分享研究的苦與樂」,卓則從研究者

¹ 該書主要研析之報刊有《中外新報》、《中外雜誌》、《香港船頭貨價紙》、《遐邇貫珍》、《六合 叢談》、《察世俗每日統計傳》、《東西洋考每日統計傳》、《叻報》等。

² 一般在理解新媒體改變傳播環境時,常以國內媒介間的競爭與受眾對訊息的接受度來理解媒介 生態,卓南生研究的可貴之處在於發現,新媒體的開創期,無論在經營權或話語權上都必然具 備的跨國性特徵。

的自我定位開始,為年輕學者釐清面對史料、言說環境時可能遭遇的盲點, 並質樸地傳遞「論從史出」、「理論關照現實」的治學態度。

在東亞新聞事業(Journalism)發展的議題上,卓南生總結出兩個特徵提 供省思:第一,再次確認中、日兩國近代報刊的誕生並非單純出自國內因素, 而是有來自帝國主義擴張的國際因素。第二,這些在殖民地開拓港或租借地 由洋人開辦的報紙,其言論當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具體來說,這些華文 報紙背後由政治、宗教、商業等鐵三角加以支撐,其論調緊扣英、美國家利 益,對鴉片銷售中國的議題抱持道德上的雙重標準。在社會科學領域裡,雙 重標準多運用在性別研究中,但在新聞史的脈絡中,西方傳教十對鴉片問題 的看法,竟會因其在母國或在中國而有差異(卓南生,2020,頁 56-59); 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也貼近於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在〈宗教的拒世及其方向〉 (Religious Rejec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irections) 一文所論及的宗教共同體 (community) 在「對內道德與對 外道德的二元論」(Weber et al., 1946, p. 329)。換言之,是在區分內外的道 德觀上出現的「對內寬容、對外嚴厲」;或是「對內的道德標準並不適用於 共同體外部」的雙重標準(轉引自野村一夫,1996,頁1-3)。因此,這段東 亞新聞事業史可說是言論的鬥爭史,而其歷史特徵則是照映出核心關注:「帝 國主義者的雙重標準與新聞事業的戰爭責任」(卓南生,2020,頁 6-7)。

他的研究策略因而是持續揭露帝國主義者的雙重標準;譬如在第二部 分第八章〈「明治維新」與近代化論爭〉,對普遍被稱為開明、進步的中國 文學研究者、思想家竹内好(1910-1977)提出批判;他以親身經驗的「實 體的亞洲觀 | 抨擊竹内提出的「理念型亞洲觀 | ,並引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 ³ (1913-2001) 的批判:「即便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這也是 個可恥的戰爭」(卓南生,2020,頁10)。而竹内主張的「大東亞戰爭不僅 有侵略戰爭的面向,同時也具有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間戰爭的面向| (同上 引,頁 276)的「大東亞戰爭的二重性」論調,不僅顯示竹内並未反省戰爭, 其言論就是站在帝國主義者立場的雙重標準上。卓又以戰後日本重新評價明 治維新的例子說,這其實與大東亞戰爭當下新聞論調中師出有名的「義戰論」 相似,是以近代化的高低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值得尊重的雙重標準。卓南生

³ 馬克思史學家,1967年因支持中國共產黨發起的文化大革命而批評日本共產黨,遭開除黨籍。 專攻日本史,尤其對天皇制有不少研究成果的井上主張廢除天皇制,且在釣魚台的歷史及歸屬 問題的相關研究中主張琉球未曾擁有釣魚台,日本聲稱擁有釣魚台主權違反國際法等,自始至 終鮮明維持作為反帝國主義學者的立場。

認為即便敗戰後,日本仍舊藉由大眾媒介反覆合理化這個雙重標準,進而模糊了戰爭責任,也因此新聞事業應負起這個延續至今的戰爭責任。

但因卓南生問題意識清楚、立場分明,加上對「論從史出」的堅持,讓他忽視了經驗主義思維並不全然仰賴白紙黑字的史料,同時也會因個人戰爭體驗的不同而有所出入。正如同卓的問題意識或多或少來自其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而這摻雜了日帝統治下的記憶與傷痕一樣,忽視這些經驗與感知並不足以克服雙重標準。誠如井上清所說:「區別太平洋戰爭的二重性是重要的」(卓南生,2020,頁 285-286);但對一般日本民眾而言,在否定大東亞戰爭的侵略性之際,是否應一併否定因侵略事實而造成與亞洲在心情上一廂情願的連帶感呢?活在當下的民眾是否真的能揭穿(debunk)大眾媒體大力放送的敵我邏輯呢?「戰爭的二重性」的確因戰後初期日本民眾的戰爭體驗仍舊強烈而在論壇多所討論,這也如同卓與井上所言,有被右翼份子利用成為「東南亞侵略戰爭微妙論」的依據。卓也因此主張:「要真正反思戰爭,只有從全盤否定大東亞戰爭作為起點」(同上引,頁 11),但在否定侵略戰爭的起點,日本社會卻也引發論戰,且當中的思想複雜度似乎不足以用「日本並未反省戰爭」帶過,本文認為釐清這個複雜性或許能為今後戰爭與新聞事業(學)間串起理論的迴路與現實的關懷。

在日本,這些論戰不僅是新聞史的爭議,同時也是「思想史」的課題;換言之,反思新聞事業戰爭責任的思想史爭辯,在日本究竟如何成立?本文因而從新聞學的思想性談起,藉著梳理戰後「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以下簡稱為研究會)的活動,特別是卓南生求學時相識的哲學家、傳播學者鶴見俊輔(1922-2015)在新聞、傳播學的理論化工作與社會實踐,以及同為研究會重要成員的竹內好的文學精神、言說策略在該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探討戰爭責任如何成為戰後日本最重要的思想、新聞事業(學)課題。尤其該會系統性地研究建制派學者、新聞記者等如何迎合時局,而政治正確地出現思想的「轉向」⁴正是侵略戰爭無法徹底反省的關鍵,以及如何視新聞事業(學)作為反抗轉向的方法。整理這些後較能掌握卓南生於60年代末期甫到日本之際新聞論壇的樣態,更能一併回應前述井上清、卓南生對竹內好有關雙重標準的批判。也因此,本文採取「思想史」而非歷史學的取徑,藉以掌握思想運動過程中的浮動性。

⁴ 中文或可譯為變節。轉向一詞被廣泛使用在二戰期間日本政府大量拘捕共產黨員入獄,逼迫共黨轉向軍國主義一事;在當權者眼中帶有嘲諷日共屈服國家的意涵。

貳、新聞學、新聞事業與大眾傳播之間

《東亞新聞事業論》的原型,也就是日文版《東アジアジャーナリズム 論:官版漢字新聞から戦時中傀儡政権の新聞統制、現代まで》;卓南生將 英文 Journalism 的日文音讀「ジャーナリズム」譯為「新聞事業」,藉以體 現其中帶有負責任的專業義理或規範性意涵(卓南生,2010)。但不可否認 的,這詞語同時也有企業、機構的商業色彩。在日本,Journalism 依其語境 同時可譯為新聞産業、新聞學、ジャーナリズム等,卓並未清楚交代這些字 詞之間有何差異,只是以「新聞事業」的詞彙籠統涵蓋。但如果要以「新聞 事業」來取代ジャーナリズム的話,就不能不討論前述戰爭責任論中,新聞 學、新聞事業與思想之間的辯證關係。因為不同於英文世界,Journalism 多 半強調的是作為大眾媒體的工具性活動和專業發展。但在東方社會,近代報 業體現著西化思潮,也就是說,言論自由不時面臨來自政治、資本、宗教的 壓力,因此,Journalism 一詞亦指涉報人辦報的意志與思想;也因而才需衍 生出其從業之專業義理或規範性意涵。5 簡單說來,從日本近代報業發展之 初,Journalism 同時具有實用、規範與思想性的邏輯,但在現今產業化、學 科化過程中,思想性邏輯已日漸消逝。

在日本、相較於漢字「新聞學」的學術色彩、以片假名表記的ジャーナ リズム最早出現於明治初期,初始是不知如何翻譯而直接音讀的舶來品。 字義雖有記者親眼目睹的「現場主義」,但並不受限在記者身份上,也可對 應在活躍於文壇、論壇,仰賴投稿維生的民間知識份子。在此,ジャーナリ ズム泛指包括立基在文學、哲學、思想在內的評論與日常生活點滴的紀錄 (journal);而記錄作為再現的形式也必然帶有民俗文化的意涵。因此ジャ ーナリズム一詞學科性格較弱,以瓦版新聞之民俗文化史研究聞名的小野秀 雄(1885-1977),在 1929 年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創辦新聞學研究室時,就高 度重視新聞學的職能,而有意無意地抹去報業誕生初期的民俗學色彩。他雖 承認ジャーナリズム具思想性意涵,卻仍將 Journalism 譯為「新聞學」以爭 取學術建制的話語權。在《新聞原論》(1949)中,小野就主張新聞學應循

⁵ 從卓南生關注意識形態、言論的流變與傾向皆可看出他並非無視 Journalism 的思想性邏輯,其 「新聞事業論」是兼容了實用、規範與思想性邏輯。但如果要在中文語境中來加以定義的話,日 後這幾個邏輯之間的辯證、相生關係就須加以釐清。而以下 Journalism 如在日本論壇語境,而 涵蓋實用、規範、思想性邏輯的話,就以ジャーナリズム表記之。在此,本文暫不將卓南生提 示的「新聞事業」等同於ジャーナリズム,畢竟近年大陸學界對於「新聞思想」的討論有日趨 熱絡之勢,詞彙間的磨合仍有待時間考驗。

著偏重時間的經驗主義(史學)態度,重視組織產製新聞內容的實務技能,而提出記者「應具備特定之能力」。另一方面,他也強調這些重製事實(再現)的文本作為社會的言論,勢必有其意識形態的強度及演變歷程,而將「言論生產的時間軸」視為:「內在於報紙的精神力,而與國家發展高度相關」(小野秀雄,1949,頁4)。

與之相對,卓南生立教大學的老師小山榮三(1899-1983),則是以空間向度為新聞學定位;他曾在東京大學新聞學研究室擔任研究員,不僅於二戰期間參與了大東亞戰爭的宣傳工作,戰後也是協助聯軍監控國內輿論的要員。而在《新聞社會學》中,小山則以媒介空間性想像來理解社會的「媒介生態學」一詞(小山榮三,1951),處理了傳播過程中都市化、人口學相關變項,奠定了日本現代大眾傳播學的基礎。

總之,在新聞學的學術建制過程中,ジャーナリズム內涵民間言論、思 潮與民俗文化的思想面向是被刻意忽視的。畢竟,「思想」一詞帶著改變社 會的能量,自明治維新以來便為社會高度重視;日文的這一詞彙來自漢文古 籍,一般在用法上與中文無異,是西化過程中新造之概念,從而反向輸入中 國。在二戰前後,對思想的學術性解釋收斂在:「根據理性、思考、情感、 意志等心理作用所形成或其形成物」(黑住真,2014,頁21),而有別於思想 在中文語境中仰賴西方哲學強調之概念性意義。日本論壇對思想的用法較為 寬鬆,具美國實證主義哲學背景的鶴見俊輔就認為:思想是一種仰賴「日常 生活話語」的思考,具體說來就是一種「自我內部的對話」(久野収、鶴見 俊輔編,1969,頁 330、669);而這也呼應了 Journalism 字義中帶有日常生 活紀錄的意涵。對此東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教授内川芳美(1926-2004)、創 價大學教授新井直之(1929-1999)於1983年編著的《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ズ ム:大衆の心をつかんだか》中、就深刻描繪了ジャーナリズム隱含日本人 在近代化過程,人們對於感受信念、態度的堅持,透過日常紀錄時事與思想 的軌跡,ジャーナリズム必然與政治、經濟力之間蘊含著緊張關係,其社會 性又與當下的文化極為密切(内川芳美、新井直之編,1983)。該書其實反 映了論壇長期探討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究竟是存於個人還是組織,又其思 想是否有其社會性等問題(根津朝彦,2019),加上戰後反思新聞學、報業 是否應負起戰爭責任,而歷經了概念上的磨合,都讓具民間色彩的ジャーナ リズム蘊含獨特的思想史意涵。

對ジャーナリズム之於政經權力的理解,内川芳美多少繼承了小野秀

雄、小山榮三對新聞學的解釋。(內川芳美、新井直之編,1983,頁 ii),但書中對大眾社會等「較具人味」的描寫卻是隱含內川這輩年輕學者反思過去新聞學服務國家權力的歷史。戰後在盟軍最高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 GHQ)的主導下,不僅是新聞學界,大眾傳播機構的要員們也都重新披上民主的外衣繼續盤據權力核心,導致日本整體言論環境急速惡化。不僅是小野與小山,另一位宣傳學大師、慶應大學教授米山桂三也是在二戰期間以新聞學、宣傳學報效國家的智囊。但戰後卻在 GHQ 民間情報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Section,簡稱 CIE)的指導下,宣傳學一轉成為民主主義的「大眾傳播學」重新出發;米山也與小山共同參與美國政府主導的與情觀測,接著各大學等先後成立新聞、傳播相關學科的背後都有美國霸權運作的痕跡(吉見俊哉,1999;佐藤卓己,2008)。

而在業界則有戰前曾任朝日新聞記者,同時也是政府經濟智囊的笠信太 郎(1900-1967);戰爭之中,他身為推動國家總動員法的核心人物,戰後 卻繼續擔任朝日新聞論說委員、董事等,而他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簡稱 CIA) 合作的經歷至今仍有多處等待釐清。戰前 擔任讀賣新聞社長、情報機構高官,敗戰初期身為甲級戰犯的正力松太郎 (1885-1969), 戰後卻與 CIA 合作, 搖身成為日本電視台的創辦人(有馬哲 夫,2008)。這都顯示戰前效忠軍國主義的新聞學者、新聞媒體機構,戰後 毫不掩飾其政治正確而「轉向」服務美國主導的大眾傳播、民主主義。加上 戰後日本強化國內公安、與美國簽訂「相互防衛援助協定」、成立自衛隊、 打擊日本共產黨等,都被民間知識份子稱作「逆進程」(reverse course)而高 度警覺。尤其保守派在轉向後,繼承了戰前軍國主義迫害共產黨的思維,他 們主導的「赤色清洗」(red purge)更是徹底將日共污名化。而這也讓多數 日共認定日本至今未曾改變帝國主義態度,淡化了對亞洲共產國家的戰爭責 任。總之,當時的知識份子不僅憂心大眾傳播的反共宣傳會打擊革新派,更 認為這些二戰期間鼓吹國民參戰的要員們輕易地承認發動戰爭的錯誤,只是 表面上反省了侵略戰爭,目的是為了重回政治舞台。也因此,知識份子普遍 期盼相對於大眾傳播的ジャーナリズム能為社會顯露「民間言論的人性面」, 藉民間思想以警覺國家、資本帶來的暴力,而ジャーナリズム也在實踐過程 中逐漸獲得了學術話語權。

⁶ 尤其内川芳美認為,ジャーナリズム發生在近代社會的形成過程中,作為政治社會的神經系統、 輿論的控制裝置,其概念應獨立於大眾傳播。

所以,卓南生於日文版使用的ジャーナリズム可說是依從戰後的學術常規,但建立常規的並非盤據權力核心的學術大老,因為他們對戰爭的反省帶有追隨美國、戀棧權力的政治正確,反而是由戰後民間學術社團「思想的科學研究會」核心成員,以及少數任教於新聞學系所教師們的共同努力下,讓ジャーナリズム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獲得學術話語權。正如卓於書中高度評價的內川芳美、稻葉三千男、香內三郎、荒瀨豐、鶴見俊輔、日高六郎、城戶又一等人,他們不僅在戰後新聞、傳播學的發展上貢獻所長,也與研究會有著或多或少的互動,甚至鶴見長年擔任《思想的科學》主編,荒瀨也曾加入編務工作。

這些新生代學者與小野秀雄、小山榮三最大的不同是世代差距,也因此 在參戰內容和程度,以及對戰爭的認知都有所差異。觀察其學術訓練,他們 多半能理解當時美式行動主義對受眾的關注,另一方面也重視戰前馬克思主 義思想家戶坂潤(1900-1945)對傳播環境的解讀。其中戶坂在〈新聞現象 的分析〉 將ジャーナリズム解釋為: 在社會意識形態的其中一個樣態與契機。 其基本特徵是:它會包含特定的思想性格或傾向,而思想本就需要主體的意 圖才得以純粹化。所以戶坂的定義並非主張新聞應中立、客觀,而是強調主 體對日常生活的再現與反思,以及言論的獨立性上(戶坂潤,1932;轉引自 根津朝彦,2019,頁129)。加上戶坂在〈ジャーナリズム與哲學的交渉〉主 張: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特徴絕不只在報導,也在於知識份子的主體性思想與 批判性論述。他修正現象學哲學大師西田幾多郎(1870-1945)所指的「純 粹經驗」來思考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功能;將西田「純粹經驗」中主體與客體 兩端連為一直線的「主客不分」邏輯,進一步修正為只有主客兩項並無法充 分認識現代社會,應有第三項ジャーナリズム來媒介主、客體才是。所以ジ ャーナリズム並非只有傳達資訊的報導行為而已,而應同時具備「再現」報 導、評論時事的特性 7 (戶坂潤,1936)。在戰後大眾傳播產業蓬勃發展之際, 重讀戶坂的確讓過去重視國家層級的ジャーナリズム理解,轉為由下而上的 民間社會活動。

^{7 〈}ジャーナリズム與哲學的交渉〉一文收錄在《思想としての文学》中,本文認為,其通篇脈絡說明了文學、藝術活動中,ジャーナリズム有其媒介主、客觀的機能,而作為一種再現的形式,文中也對ジャーナリズム作為社會意識的代表型態有深入地說明。

參、作為民眾思想課題的ジャーナリズム與轉向

這群新生代學者不論是戰前受德國宣傳學、馬克思主義影響,還是戰後接受美式行動主義思潮,他們都是在反省了戰爭的非人性面後,期盼新聞學、報業內在的「精神力」並非僅服務國家,而應內在於民眾、知識份子的言論、思想中;而他們仰賴的正是如前述,藉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反思能量讓戰前「人」極端受限的主體性獲得解放。而在回復主體性時,前述產官學要人們的思想「轉向」就是無法逃避的課題。依照鶴見在《轉向:共同研究》的定義:

轉向的特徵在於依從權力的強制而產生的思想變化……。不僅 是戰前的共產、社會主義者在國家權力下轉向國粹主義,在自由主 義者跟國家主義者身上也都能看到轉向的例子(思想の科学研究会 編,1959,頁1)。

正如聯軍接管日本時,CIE 觀察敗戰後日本人普遍有著「思想上的真空」,建議應趁機填補才得以讓日本人理解民主主義;而這正可說是美國試圖讓多數日本人思想轉向的具體例子。在作法上,CIE 認為首先應為日本守住國體的核心「天皇制」,以免受共產勢力赤化;接著是讓學者導入美國思想、學術研究與行政制度,並透過大眾傳播建立「形式上的民主主義」(松田武,2008,頁193-195);而這首先須藉由大批佔據權力核心的要員們轉向,才得以確保美、日兩國政府對日本全境的控制能力。雖然戰後反動派雜誌也關注轉向議題,但論述卻集中在戰前共產黨人士被捕入獄一事來提升日共領袖的道德高度,而這也因此強化轉向有罪的刻板印象,而失去了深思戰爭責任的機會(橫尾夏織,2009)。

對此,不做道德判斷,且系統性地研究知識份子、新聞記者、媒體企業轉向的民間學術社團就屬 1949 年結成的「思想的科學研究會」。該會自詡具民間ジャーナリズム精神,在成立前先是於 1946 年以出版雜誌《思想的科學》的形式出發,召集多位新生代學者們共同參與編務與撰文。文章不僅批判性探討歐美人文社會科學在日本活用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他們極為重視橫跨二戰前後的言論發展,而這就無法避開包括「轉向」在內的思想動態。雖說如此,成員們普遍認為轉向是個尷尬的議題,並未在戰後第一時間處理

是因為需要時間醞釀。直到 1959 年 1 月鶴見俊輔⁸ 才在研究會中成立了小型研究團體「轉向研究會」,研究對象包括 50 位知識份子、新聞記者,成果於 1959 年集結成《共同研究:轉向 上中下卷》一書。鶴見更在 1965 年《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定位了「轉向」在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的重要性。雖然研究追究了政治人物重返權力寶座的責任,同時也成為未來反戰活動中市民組織運作之際的參考,但卻在較為年長的知識份子中評價兩極,批判集中在:研究未能做出價值判斷而欠缺立場與階級觀點,且成員因世代差距等而有戰爭體驗不盡相同等情況(橫尾夏織,2009)。

作為進步派知識份子的重要論壇,《思想的科學》不僅引入西方思潮,也在核心成員鶴見俊輔主導下從語言學、傳播學的角度,以小說、電影、落語、翻唱、浪花節、9 搞笑等日本大眾文化為素材,廣泛研究、記錄日本民間的思想與文化領域;他們主張這種草根性的知識、文化運動才是克服轉向的作法。譬如該雜誌訪談在文化面有功績的民間人物,這種在台灣被視為民俗史、口述歷史的工作,他們卻認為如能從中抽取反思日常生活的素材,那他們就籠統地視相關言論具ジャーナリズム色彩,而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反思、對言論壟斷的抵抗將能有效打擊菁英們的轉向。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們並非從史料的角度來判斷日常紀錄的價值,主張其價值應在於能否作為不斷推敲琢磨民間思想的素材才是。加上在第三任主編兼會長竹內好的推動下,雜誌以平易近人的文體試圖增進讀者對話,其編輯方針是標榜與民眾站在一起的「反菁英主義」,因而受到不少左翼社會活動家青睞。其後研究會成立就吸引不少左翼知識份子、運動家加入,而引發路線之爭;也曾出現美國資金贊助、日本公安介入「天皇制特集」出刊等情事而歷經改組、停復刊後,成為日本社會一股民間知識份子的進步力量。

從《思想的科學》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們籠統地認為知識份子對日常時局的針貶具有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特徵,即便是哲學、歷史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也認同學術與ジャーナリズム有其相通之處,也常視ジャーナリズム為再現民間思想的形態之一。但同時也關注美國大眾傳播學,以及符號學運用在行動科學的研究等對人性的掌握方式。只是相較於大眾傳播中易受符號左右的「大眾」,ジャーナリズム代表的卻是著重在「民眾」思想的人性面與在地文

⁸ 鶴見生於精英階層,16歲就通過入學測驗而留學哈佛大學哲學系;其父佑輔是戰前自由派國會議員。討論轉向其實也是鶴見俊輔對於父親佑輔於二戰期間轉向支持翼贊體制的批評。

⁹ 江戶末期發展出的一種大眾藝能,是以三味線為說書、評論、文藝談話等伴奏的即席說唱。

化潛能上,具有守護人性尊嚴的意涵。長期擔任主編的鶴見俊輔就是明確將 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性託付於日本民間社會的代表人物,他主編的《ジャ ーナリズム的思想》就將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發展視為思想與言論的歷史,並 從文化史觀點理解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意涵。內容包括戰前至今產學界對ジャ ーナリズム的思想性探索與實踐;前述内川芳美對ジャーナリズム的解釋就 多少有該書的影子。

在理解ジャーナリズム一詞時,鶴見主張應著重 journal 這個具有記錄每天公、私領域的「日常性意義」;這點近似幕府末期民間社會發展出私領域紀錄的「日記文學」。鶴見由此推敲,對私領域或當時民間社會的紀錄應可理解為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本質。這種持續累積言論的工作並非一次性的,所以吾人應理解「紀錄的持續性」本身就是「有意義的思想活動」。對記(錄)者來說,應致力追究、觀測何為現今ジャーナリズム無法表現的內容。換言之,不光要正確紀錄當代事物,更要考察到底是什麼力量阻擋了民眾藉由「紀錄當代」抽取存於民間的思想。所以鶴見將委身「大眾傳播」的新聞工作稱之為「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而放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對立面。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會輕易地依從政經勢力而不斷出現言論、立場的轉向,且在大眾傳播計劃性生產大量訊息的情況下,大眾傳播事實上成了一種加速社會遺忘的意識形態裝置(有山輝雄,1995);反倒是戰後創立的小報、雜誌記者較能為自己的報導負責。雖然批判社會通常是為了喚醒人們的記憶與思考,卻也背離了當代的言論風向,但這才是真正還原ジャーナリズム原有機能的作法(鶴見俊輔編,1965)。

然而近代報業在資本化、國族化後,日本社會就不再將ジャーナリズム 比擬為日記了。鶴見認為明治時代大型報業的登場造就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小報的重要性下降,ジャーナリズム被理解為報紙、雜誌企業化後的工 作職能,從而帶有企業言論特權的意涵。¹⁰ 不同於前述幕府末年到明治初期 有段言論的百花齊放,政府在穩定時局後開始壓制報人言論,同時大眾報紙 的出現造就大眾導向的ジャーナリズム,加上「講談俱樂部」將口語言談直 接放入文本,都創造出連載偵探小說在「大眾時代」的銷售佳績;緊接「大 眾雜誌」的成功讓報刊累積資本成為中大型企業。但煽情化的大眾化報刊也 讓「新聞公害」層出不窮,又報刊為了生存而與政府共創軍國主義的美談,

¹⁰ 這可說是呼應了小野秀雄的新聞學建制工作。而相對於小野對「新聞學」的執著,遍讀鶴見著 作卻不見「新聞學」一詞。

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増幅的人性慾望終將日本推向了萬劫不復的侵略戰爭 (鶴見俊輔編,1965)。

二戰後雖然進步派知識份子盼能改革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但迫於美國 佔領軍管制輿論的壓力,日本新聞協會於 1948 年發表有關「確保新聞編輯 權的聲明」,仍讓編輯權落在企業主手中,這斬斷了記者與ジャーナリズム 間的連結(鶴見俊輔編,1965,頁 28)。接著50-60年代日本大眾傳播產業 蓬勃發展,為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提供合理的存在條件,且美國傳入的大眾 傳播一詞也廣泛被日本社會視為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同時大眾傳播似乎指向 的是新聞、廣播、電視、電影、大型雜誌等從業人員,其他人則成了「烏合 的受眾」。鶴見批判該現象為「傳播萬能主義」,11代表著從明治維新至今大 眾傳播(報業)在面對國家與資本的暴力時,老是背棄民眾的態度(同上引, 頁8)。不光是鶴見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提到大眾傳播與ジャーナリ ズム的二元對立,1959年時任《思想的科學》雜誌主編竹内好所發起的「小 報的會」,更是力主ジャーナリズム在市民社會的必要性。參與讀書會的有 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教師城戶又一、稻葉三千男、共同新聞社記者新井直之, 以及日後創立日本出版協會的吉田公彥等,其他也有新聞記者、年輕學者加 入。除了討論時事、新聞史等,會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民眾自發創辦,極具批 判精神的小報寄予厚望。竹内好自己也於《思想的科學》發表了〈小報的可 能性〉,論及大報內容細分化現象正是小報崛起的好機。其他竹内也多次撰 文舉例:對抗大報言論操作的學生報、《讀書新聞》在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甚至是讚揚主婦社團對報紙漲價的抗議等(竹内好,1981),都可看出研究 會的態度是期待民眾能在報業發展史中扮演要角。

但在研究會呼籲重視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當下,卻有著 60 年代言論環境日趨複雜的背景。首先政、財界對高度商業化的報業進行了一連串的「偏向攻擊」。這是對不利自己的新聞報導,透過公關宣傳的手法大肆批判,並製造其他新聞觀點來混淆視聽;最後則是將特定媒體貼上「偏向媒體」的標籤化做法。且美國政府也會直接對反越戰的新聞媒體展開言論攻擊。對此,大型媒體企業多半傾向自我規範,而強調新聞報導之中立性而非獨立性;這也間接導致主流媒體逐漸接受美日軍事同盟的立場。緊接著保守勢力以投入大量廣告贊助的方式,強化與媒體管理階層的合作關係,1970年又在商界主

¹¹ 經由記者等專業人員生產的內容必能傳遞到每個人心中;或是把寫好的文稿經由大眾傳播機構 向社會傳遞,就能達成社會進步的幻想。

導下成立了政府外部法人機構「日本公關中心」,負責政府、商界的輿情操作;尤其利用新媒體「電視」操控言論大獲成功。總之,從1960年代的日本言論史來看,最重要的特徵是大眾傳播媒體缺乏獨立性,大環境並不存在拒絕言論壓力,並對壓力採取明確對抗態度的經營者(内川芳美、新井直之編,1983;根津朝彦,2019)。

肆、作為抵抗的傳播隔閡

伴隨大眾傳播環境惡化而來的是 1960 年 5 月美國強壓下通過的新安保條約。當時研究會除了公開批判政府獨斷,也因鶴見俊輔呼籲多元思想交流的「無黨派市民革命」而受到社會矚目。鶴見隨後也與夥伴創立了象徵民眾聲音的「無聲之聲的會」,強調落實憲法保障市民權,提升市民個人生活福祉的目標。在法治的前提下,鶴見反對當前知識界將日本社會的主要爭論放在:究竟應走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上,主張應時時刻刻與現狀互相對照、組合、協調,進而找出政治、社會運作的折衷辦法,才能建設性推動社會發展。他稱之為出自民眾多元性思想的「折衷主義」,盼民間力量能反制政府在安保締約前後不斷強調的美國軍事力。而這也是他歷經轉向的共同研究後所得出的一種「消除對立的辯證法」。這點可從研究會並無會員的「除名制」看出,如果為了維持理念的正統性而將會員除名,就無異於獨佔「真理」的日共了。加上他們認為自己既是知識份子,也是身處日常生活的民眾,彼此間應存有共同的對話基礎與實際感覺才是。這與左翼運動中堅持的理論鬥爭,將知識份子與大眾區分的主張大相徑庭(橫尾夏織,2006)。

「無聲之聲的會」後來促成 1965 年「越南和平市民聯合」的創立,這個戰後最具代表性的市民反戰團體雖逐漸左傾、暴力化,甚至接受 KGB 的金援等,這些都非鶴見俊輔樂見,但廣納多元參與者的態度與研究會揭橥的理念相同。在參與街頭運動的同時,鶴見同時致力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理論化工作。他從美學家中井正一 1936 年發表的〈委員會的邏輯〉獲得啟發,揭示了說話、書寫、印刷因各自媒介特性不同,其產生的邏輯也有所差異的角度申論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思想。他認為日常生活中民眾說出的言語是一次性的,具有當下時空脈絡產生的特別意義;如果言語成為被寫、被印刷的文章,就是從這個特別的生活史脈絡中脫離,而成為具備解釋功能的符號。該符號的目的只是為了傳達明確的主張而已(鶴見俊輔編,1965)。然而,

言語被紀錄後文本並非就此完成,鶴見進一步申論,說話、書寫、印刷之間, 相互關聯的每個階段都應該是動態的言語過程才是。

換言之,生活中透過言語,或通過各階段不斷往復的傳播會形成民眾傳播活動的循環,當時研究會就致力將這個循環做成生活紀錄。如果想記錄民眾談論自己的思想轉向與否,就必須試圖捕捉思想的動態;而這正是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重要工作與特徵。在50年代的當下,同為研究會成員的竹內好就力促民眾「戰時體驗」的文字化工作。以鶴見來說,他自白戰爭期間擔任軍職時,曾在心裡盤算:如果長官叫我殺俘虜,自己該怎麼做?是起身反抗呢?還是自殺?抑或是依從呢?他慶幸自己並未遭遇這個難題,雖然內心希望日本戰敗,但他也擔心被同事識破,到時應如何決斷呢?這種心理現象也反映在鶴見對戰爭責任的看法,就是對「個人」戰爭責任的重視。他反對以歷史來規避個人責任:「因為在歷史的洪流中大多數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也只是跟著大家一樣而已」(橫尾夏織,2009,頁184)。

總之,研究會關注描述戰爭的個人體驗與責任,其內容有著濃厚的情感對話色彩。譬如他們認為研究者應靠近、觀察轉向者的狀況,將這種理解個人戰爭體驗的方式稱之為「追尋體驗」,藉此來達成「戰爭體驗的一般化」(竹內好,1980,頁 231)。這種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作法是希望藉此繼承戰爭、轉向的親身體驗,以成為後代的遺產。「追尋體驗」雖看似缺乏科學方法,但鶴見倒是認為這種為當事人設想的方式較能深刻解讀資料,也可說是承認「思想浮動性」的思想史方法論。當然,這種作法與當時同為反帝國主義陣營的日共知識份子有明顯的差異。尤其日本左派運動中有著自我批判的傳統,認為一旦自我批判就能得到救贖,鶴見反批評這只不過是順應歷史隨波逐流的「轉向」罷了。加上自省的傳統卻被戰中少數入獄的「非轉向者」的情操綁架,又戰後日共過度專注理論鬥爭以爭奪黨內主導權等,都導致馬克思主義信仰被僵化為「原理」、「原則」旗幟下的思想操作,並無法理解當下民眾的狀況(藤田省三,1998;轉引自橫尾夏織,2009,頁 189)。

為何鶴見、竹内等研究會成員堅持立基在個人體驗的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民眾思想,以及這些在追遡戰爭責任時的有效性呢?以鶴見的角度來說,除前述參與的市民運動外,也與他在語言學、傳播學、民俗學的研究有關。1946年在《思想的科學》雜誌創刊號中他就發表〈針對言語的自保性使用〉一文,關注戰爭前後人們的思考、行為如何被當時「言語的使用」所影響。其研究動機來自於戰爭體驗,反省戰爭時期日常言語被政府、媒體操作,推

而限制民眾思考與行動的現象。在方法論上他採取留美習得的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研究戰爭時期代表性的假命題「鬼畜(泯滅人性的)美英」一詞。他認為這是將「假命題」視為「真實」,讓日本國民藉著使用「鬼畜美英」來達成極權主義下日常生活的自保。雖然「英美是鬼畜」形式上是作為主張的命題,但實際上說話的人憎恨英美的情感狀態卻是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下被表現,而非陳述自親身經驗的事實;但人們卻無自覺地將該陳述視為事實的命題,顯示言語本該代表的意義並未被清楚且自律地使用,反而是作為當下為求自保的假命題。這種用法來自社會霸權認可的價值體系,相關言語的流通造成戰時民眾集體「不思考」,而戰後日本在美國接管下轉向為民主主義國家之際,「民主主義」也成為不假思索、只求自保的假命題(鈴木園已,2010)。

但隨後鶴見有關言語溝通的研究,開始從「邏輯實證主義」轉為「實證主義」取徑,主因是他在「菅季治自殺事件」後反省了方法論的限制,關於該事件的論述發表在〈兩個哲學家杜威與菅季治〉,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使用日式造語「傳播隔閡」(dis-communication),藉此反思前述傳播萬能主義的謬誤。傳播隔閡的詞彙,是鶴見藉由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傳播理論所創造,一般指言語在傳播過程中出現意義與行為的偏差,以及無法傳達意義的現象。這雖非英語學術圈的正式詞彙,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在日本社會學界的溝通理論、印象論,以及心理學中也是常被論及的概念(寺田征也,2018)。

曾在京都大學專攻哲學的菅季治(1917-1950)在敗戰後成了蘇聯俘虜,因通曉俄語而在蘇聯收容所擔任翻譯,他在引揚歸國¹² 的隔年被眾議院傳喚作證後自殺。事件背景是美國佔領政策逐漸向右靠攏,日本國內出現「赤色清洗」風潮,而當時在蘇聯歸國者間卻普遍流傳:「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曾要求蘇聯說,日本俘虜中有反動人士,別讓他們歸國」的謠言。菅被國會要求證明是否屬實。菅說,他在蘇聯居留地被日人俘虜問到何時能歸國,他將蘇聯政治部的回答直接翻譯成日文說:「你們在這邊正直的勞動,在成爲『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後就可以回日本了」。實際上德田是否如此說,他無從得知,但議員們卻要求菅對這個脫離事實的問題做出解釋。「真正的民

¹² 此詞彙日語為「引き揚げ/ひきあげ」,原意為「拔出」,引申為「撤退」之意,在歷史背景下 特指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原居於日本在海外各殖民地及佔領地的日本國民陸續 遭遣送回日本的歷史事件,而回到日本者又被稱為「引揚者」。戰後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稱為「日僑遣送」、「日俘僑歸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稱作「日本僑俘遣返」。

主主義者到底是什麼意思」、「這真正意思是將共產主義視為民主主義吧」, 議員們早已認定管是共產黨員,他的翻譯必定會扭曲事實。管在極度絕望下 帶著《蘇格拉底的申辯》一書臥軌自殺;鶴見認為這象徵著「說了就會懂」 的傳播神話破滅,管與杜威理想的傳播過程並不存在(鈴木園已,2010)。

杜威認為傳播是人類運用言語相互傳達思想與情感,並為雙方帶來共同意義的一種全身性活動;而他將傳播稱作文化樣式的說法啟發鶴見日後的研究,尤其是民眾經由日常生活溝通而內化形成的民眾思想,是否在傳播學有發展的可能性。然而,鶴見的傳播隔閡論卻是藉著菅季治的悲劇來批判杜威的傳播理想。鶴見說:他可以理解杜威想以傳播連結人心、實現社會進步的善意,但社會的衣食住行勞動的基礎條件並未改善,優化傳播條件只能說是次要手段(寺田征也,2018)。鶴見對「傳播」的用法可說更仰賴日常生活中社會互動的經驗與文化樣式。他認為思想、宗教、藝術等文化領域的言語問題都與傳播相關;而傳播是將心情、想法向外傳遞的方式,也是兩個以上的動物間彼此共有意義的狀態。所以傳播當下必然會帶出區分你我的認同問題,這與參與者在生活水準、階級、民族、國家、性別的差異高度相關。

當然不只是杜威,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一直到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都希望能以理想的對話模式追求真理、形成共識。但傳播場域本 質上就有易受權力影響的特性,加上參與者慣習的差異,以及對話中有意無 意的摩擦與誤解都會造成意義無法相通;即便是合理的傳播也常有情感上無 法接受的情况(井上俊,2009;轉引自寺田征也,2018,頁29-30)。總之, 意義的共有會不斷出現龜裂,所謂理想的傳播模式或藉理性對話達成相互理 解只能說是「傳播的神話」,而過度仰賴傳播效果可說是對傳播萬能主義的 信仰了。所以鶴見主張傳播活動並非以追求傳播效果為目標,反而應以傳播 隔閡的樣態顯現出來,當然在此就會出現因立場不同,而在言說場域中不斷 再現雙重標準的情況。從國會議員對菅季治的質詢就可以看出,傳播過程中 敵我間的傳播隔閡必然帶有對內寬容、對外嚴厲的雙重標準。所以傳播隔閡 是世界的常態,不應視為傳播過程中應排除的脫序或噪音(noise)。因而主 張所有傳播問題的研析都應同時納入傳播隔閡的觀點,才能積極讀取傳播過 程的支配性符碼,並以參與者的角度與對方身後的場所、言語、世界對峙才 是傳播本身。這個近似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觀點再次確認了社會的 弱勢、少數族裔在傳播過程中的積極意義。

所以,要去除雙重標準除了理解整個傳播過程中的權力作用,更重要的

是接納傳播隔閡的觀點,進一步策略性地重新生產傳播內容才得以抵抗傳播萬能主義下意義被宰制的情況。他總結過去的研究認為,記號反映的現實並非只是單純的反映,其中也會顯示出社會利害關係的交錯;而言語與其指示對象間的連結,也並非是明確且安定的,反而應將言語視為與支配性力量相互衝突,爭奪意義解釋權的場域才是。所以在面對傳播現場中壓倒性的權力失衡時,藉由傳播隔閡的觀點可說是否定了意義的共有狀態,非主流在面對主流單方的壓倒性論述也應積極地作出策略性詮釋,來抵抗傳播過程中意義被掌控且對傳播效果過度追求的現象。而這種方式不同於日共、女性主義者明確區分敵我,再造屬於自己詮釋世界的「雙重標準」,形成永續對立的局面。反而是以在地文化重新生產意義、刻意誤讀的方式不斷再現日常生活,進而反轉詮釋的霸權。

在此,鶴見借用在地文化、次文化內部本來就具有抵抗「普遍性意義 (主流文化)」的傳統,說明墨西哥人藉在地化方式重新再現、詮釋天主教 的象徵性儀式就是一種積極運用傳播隔閡的方式(鈴木園已,2010,頁 277-278)。從鶴見當時面臨的歷史情境而言,提出傳播隔閡可藉此意識傳播場 域中運作的權力,再以在地民眾思想與行動來推動歷史的進步與變革;具體 來說就是超克戰後美國帶來的近代化,以及前述企業ジャーナリズム(大眾 傳播)帶來的支配性力量。同時傳播隔閡也揭示了傳播過程中「批判」的合 理性,以及重視與多元他者間的協調,而避免宛如戰時軍國主義過度強調集 體認同的傾向。加上他在 50-60 年代參與社會運動鍛鍊出的行動力,並從中 發現民眾存立的基礎來自人們日常傳播活動的連結性與多元性,藉此才得以 發展出前述市民運動的「折衷主義」。總之,在當時「逆進程」的情境下, 他的傳播隔閡論並非是純粹的理論或主題式探討,而是藉由親身參與、體驗 的一連串事件中不斷修正得來的。

當然,傳播隔閡也要民眾能意識到日常生活中有源源不絕的言說「素材」,才足以對抗支配性的言語控制;而這也促成他當時對民俗、次文化的關注。他舉塗鴉、祭典、繞口令、改編歌詞、哼唱歌曲、展演等日常生活重複的儀態或言語活動,這些廣泛在日常生活中再現的審美經驗,也是生活與藝術重疊的「邊緣」美學(鶴見俊輔,1967),都充分反映在他堅持的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上。其後在1988年編輯《傳播事典》一書時他更大量編入有關場所表意的詞彙,其中對日語「動詞」的解釋生動描述各種日常生活場所的思想動態,都可謂是日本民眾ジャーナリズム的基礎(鶴見俊輔、粉川

哲夫編,1988)。對照小野秀雄將濃厚民俗色彩的「瓦版」新聞史導向具學術建制、國家統制色彩的「新聞發達史」研究;鶴見的工作可說是再次讓新聞學重拾再現民眾生活紀錄的初衷,這些紀錄也成為探索民眾思想,反抗意義受宰制的重要言論素材。

伍、竹内好的ジャーナリズム與戰爭責任

至此可看出,反思戰爭、追究戰爭責任是戰後知識份子面對學問與時局的重要課題。鶴見俊輔是以實證主義哲學追究與時代交關的言語、傳播、文化議題來參與時局;也因此他極為重視ジャーナリズム這個再現民眾思想的重要型態。這種立基在地民眾日常經驗的治學態度與同為研究會成員的竹內好頗為相似,只是竹內的做法更為激進,尤其在面對自己的戰爭責任時,竹內更以製造「傳播隔閡」的方式開展獨特的ジャーナリズム思想。雖然鶴見並未言明自己的論述是否受竹內影響,但在研究會中鶴見與年長12歲的竹內互動頻繁,鶴見也承認遍讀竹內作品,足見竹內引發的言語風暴必然會刺激鶴見。雖然耕耘的學術土壤不同,但從兩人極力反對美日安保的態度來看,他們都是站在民眾立場而積極參與時局、對抗美日政府。13當1960年竹內為抗議日本政府而辭去東京都立大學教職的「公務員」身份時,鶴見雖表震驚,卻隨後跟進辭去京都大學教職。兩人採取的都是民間知識份子在體驗戰爭後,無法將自己置身事外的做法;同時也是他們不求自保,將自己置於時局中心而負起戰爭責任的獨特方法。

關於竹內好的研究,華人學界大多藉他詮釋的亞洲主義、近代超克等這些在戰前饒富侵略意涵的字彙與論述,理解戰爭發動背後的思想動能。不過,具浪漫主義色彩的竹內藉著魯迅的自我否定思想,形成獨特的文學態度,由他重新建構的這些爭議性極高的語彙,當然也引起包括日本、大陸學界對軍國主義復辟的警戒。如同開頭所述,卓南生藉井上清質疑竹內「戰爭二重性」與「戰爭責任」的雙重標準立場等,反映了華人學界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憂心。但從井上於《戰後日本的歷史》一書中批判竹內的原文來看,井上並非僅質疑竹內,而是將鶴見俊輔與竹內好歸為一類,顯見井上並不贊同兩人在「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中呼籲莫將投入戰爭的犧牲浪費,活下來的人應繼承這場戰爭體驗進而形成思想等(竹內好,1980,頁212),井上反駁:

¹³ 兩人對美日安保的討論可參照《状況的:竹内好対談集》(竹内好,1970)。

首要之務應是全面否定戰爭……難道是要用帝國主義的傳統來 形成帝國主義的思想嗎?還是要從反帝國主義來形成反帝國主義的 思想呢(井上清,1966,頁20)。

且竹内在戰後初期一邊與日共合作,一邊又強烈批判日共在思想和行動理念中隱含的進步主義、奴隸性、天皇制色彩(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2007,頁62),自然會引來不少撻伐。加上文學家、思想家與史學家各自描述、參與戰爭的經驗都有所差異,其相互批判不足為奇。

雖說如此,竹內好的文學性的確高度爭議,就連鶴見俊輔也曾一邊提及竹內加入研究會的重要性,一邊又指竹內是支持大東亞戰爭的爭議性人物(鶴見俊輔,2005,頁 220)。且鶴見的哲學背景讓他在戰爭體驗的相關論述中對情感的描述較為保守,也曾對竹內的「戰爭的二重性」抱以懷疑卻又未全然否定的曖昧態度。總之,即便是戰友都曾質疑,更不用說是論敵的井上清了。在《戰後日本的歷史》中,井上對竹內等人的批判清楚明快。他說,放眼戰後日本產官學菁英所推進的「逆進程」,顯示日本並未深切反省戰爭,尤其論壇或學界都瀰漫著:大東亞戰爭是從歐美帝國主義手中解放亞洲的聖戰。這種為帝國主義辯護的手法也包括竹內、鶴見所主張:「到頭來結果是好的」類型。井上批評竹內將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包裝為大東亞戰爭是意圖實現亞洲各民族共榮共存、解放亞洲的聖戰,將導致無法區別這究竟是「侵略戰爭」還是「民族解放戰爭」。他強調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並無法實現解放,應在與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中獲得勝利才能達成解放;他反對竹內好所說:大東亞戰爭同時具有「對殖民地的侵略」與「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二重性」,認為兩者應有區隔(井上清,1966)。

對井上清的說法,竹內好以 1966 年發表的〈針對學者的責任〉¹⁴一文回應,批判井上在引用時並不了解文章整體脈絡,而在抽離片段後曲解了原意。竹內批評將侵略與連帶切割的二分法來自日共獨善其身的黨派特性,論述有可能「被支配者的意識形態利用,而有發動攻擊的危險性」,也有可能「作為支配者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但這兩者是不同的。竹內說,也許對馬克思史學家而言,「人類的動機與手段的區別是明確的,是可以由他者完整掌握的透明實體」(竹內好,1980,頁 273)。但對竹內而言,人類是處在流動且不斷變化中才得以掌握自我與他者。也因此他認為歷史是可塑且得以分解的

¹⁴ 原文〈学者の責任について〉刊登於 1966 年《展望》雑誌 90 號,本文引用於 1980 年出版之《竹内好全集(第 8 巻)》。

建構物(竹內好,1980,頁273)。但從當時「逆進程」中戰後歷史學、歷史教育發展的混亂期來看(遠山茂樹,1968),竹內的說法對井上而言卻是「歷史修正主義」的常套。又如卓南生當時觀察,新聞媒體的議題設定也巧妙呼應戰前皇國史觀,加上當時社會對舉辦「明治維新百年慶典」熱烈討論(1968年),美國駐日大使愛德溫·賴肖爾(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盛讚「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與中國近代化的失敗」,言詞顯露的美國近代化史觀,都同樣受到竹內、井上在內的進步派知識份子高度警戒。

在傳出日本政府有意慶祝明治維新百年前,其實早在1960年,竹內好就撰文贊同評論家桑田武夫於1955年重新評價明治維新的主張,並在《思想的科學》引發了一連串討論。而這正反映當時日本社會意圖回復民族自信的集體心態,竹內一邊為此感到困惑,一邊也為文說明如何評價明治維新,將反映出日本近代化的矛盾爭議。

明治維新還未結束……而明治維新形成的國族主義也未被清楚的解釋,而這可說是國家形成的失敗案例(竹內好,1980,頁 242)。¹⁵

竹内表示重新評價明治維新「並非懷舊的興趣,而是一種邁向未來的戰略性提案」。針對這個具有ジャーナリズム特徵的問題意識,當時進步派的批判集中在竹内右傾的立場問題上,加上當時社會有著不再是「戰後」的氛圍,而深化了知識份子對淡化戰爭記憶的不安等;都讓批評者無法理解竹内所言:「日本當下對明治維新成果的理解只是其中的一種可能性而已」(竹內好,1980,頁 238);或是竹內明確反對明治維新本身代表「日本近代化成功而中國近代化失敗」的賴肖爾式語境,尤其他指出「討論明治維新就必須討論敗北」更是一反歷史常規的反語式陳述。他以《孫文選集》中「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而中國革命是日本的第二步」,高度評價中國革命失敗的價值,藉此論證革命失敗的必然性。他認為「辛亥革命是名符其實的革命,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正因爲明治維新是反革命的革命」(同上引,頁 344-357)。換言之,竹內認為戰後中國近代化的停滯是為了抵抗西洋文明,反而日本是在沒有抵抗下成功文明化,也因此自我消失了;而自我認同不存在的狀況就不會出現混亂,國家只要專注經濟發展就好(柄谷行人,

¹⁵ 原文刊登於 1965 年 5 月 17-18 日《東京新聞》,本文引用於 1981 年出版之《竹内好全集(第 8 巻)》。

1995) 。

所以,竹內好當下所指「中國革命才是成功的近代化,而日本的反革命卻是失敗的近代化」是一種對現況的完全否定,也是與主流社會認知的意義完全相反的議題設定。這看似無謀的舉措是出自於他意圖反對安保條約讓日本處於「精神上的奴隸」狀態,他將自己置於宛如前述鶴見俊輔所言「傳播隔閡」的主角菅季治一樣;竹內反對官僚主義宰制言語的常套,而刻意將自己投身言語風暴中心,這不僅帶有其浪漫主義的文學思維,在當下更有擾動社會、喚起運動的意圖。他認為美日安保不僅會將亞洲的戰爭固定化,而協助美國讓亞洲處於冷戰狀態也代表日本並未反省戰爭。

所以,竹内好主張日本對亞洲各國應保持政治的獨立性,在反對安保的 當下他寫了〈日本與亞洲〉、〈日本的亞洲主義〉兩篇頗受爭議的文章,內 容不僅提出亞洲作為對抗西洋根據地的理念,也透露過去日本面對亞洲有其 自主性,而這也導致其言說有被右翼援用的尷尬。文中雖提及過去日本亞洲 主義者所言的「亞洲主義」事實上就是侵略(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 2007, 頁 107);而阜國日本轉為法西斯主義、大東亞新秩序建設轉為殖民 侵略、鬼畜美英轉為民主自由等,都是在戰爭下言語被當權者、官僚主義反 轉、侵蝕的結果(同上引,頁 112)。不過,他也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 洲的現實上,自己同時主張「亞洲主義」具有孫文所指的連帶意涵,的確有 其矛盾。也因此他說:從明治維新時「征韓論」被提出以來,日本與西歐主 導的近代世界都是站在帝國主義秩序的基礎上發動殖民地侵略戰爭,這與日 本同時主張超越西歐近代,站在東亞建立獨自價值是相互矛盾的(岡山麻子, 2002,頁 271)。然而,為解決這個「戰爭二重性」的矛盾,竹内認為不應單 純的從結果來看,簡言之,他不認為將「侵略的錯誤性」與「連帶的正確性」 視為兩種分開的邏輯,而將批判的砲火集中在侵略的錯誤上;反而應承認兩 者具有相生相剋的特徵,藉此思考侵略戰爭的本質,當然這也為他帶來並未 全然否定戰爭的批評。

為面對這個日本近代思想史的難題,他採取的是當時亟需勇氣的言說策略,以一名中國文學研究者、評論家的立場試圖打破官僚主義 ¹⁶ 壟斷下言語的常套用法。他認為延伸戰前饒富軍國主義色彩的「近代的超克」相關論述, 能為戰後民主萌芽之際的日本建構近代的自我、個人的主體性,如此一來民

¹⁶ 這是由國家、政府、學界、產業界的合作下對言語、知識的掌握與支配,意圖由上而下的傳遞 訊息,而非民眾由下而上的理解方式。

眾就不會如同戰前一樣配合高層發動侵略戰爭了。另一方面,為立足亞洲, 他將亞洲相關論述立腳在與日本近代化路徑完全相反的中國,他認為日本既 要立足東洋,又要靠攏歐美,所以日本變得什麼都不是,日本應徹底站在亞 洲,尤其是站在曾經侵略的中國立場上才是。在亞洲,近代的指標不應單以 歐美為基準,他觀察中國的革命,認為中國是同時通過保存、否定自己才得 以在內部形成新的主體性,他稱之為仰賴內部力量的內發(展)型「回心」 文化,是奠基在民眾內部自律性的近代化路線。反之,日本則是易受外力改 變的外發型「轉向」文化(岡山麻子,2002,頁 272)。他將回心的理論據點 置於魯迅的相對自律性的論述上,而強烈排斥論述的絕對性(鶴見俊輔、加々 美光行編,2007)。對竹內來說,徹底反省戰爭責任當然不會是錯的,但如 果這絕對化成為菁英獲取政經利益的「政治正確」,而僵化了反省戰爭的方 式,那與戰前言論極端受限的情況就無二致了。

所以,竹內並不撤回他在〈大東亞戰爭吾等之決意〉中具參戰浪漫主義的言論,而選擇接受論壇的批判。他對自己當時陳述的戰爭體驗並不感到羞恥,反而認為真正的屈辱是未深刻地從民眾思想的角度反省戰爭(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2007)。所以他負起戰爭責任的方式就是徹底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因為這延續了二戰期間視中國為假想敵的狀態。這點也可從他戰後解甲歸國一個多月就批判《中國文學》雜誌看出;他認為該誌副刊以「戰前的文學歌頌太平洋戰爭是一個愚蠢的錯覺,是一時的興奮」反省了文學家的戰爭責任,但竹內卻認為這反倒省去檢視個人在當時為何會做出如此判斷的過程。這與全盤否定歷史、戰後盤據政經高位的轉向者一般,反省戰爭只是想從中獲利而已,並非從思想、實際感受上,細緻地處理戰爭責任(岡山麻子,2002),當然,轉向終將無法回復日本的主體性;不論日本是轉向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對竹內來說都是西方強逼自己表態的近代化方式罷了。

但如同思想家柄谷行人所言,當時日本亞洲的論述只剩下脫亞論跟馬克思主義的亞洲觀而已,而這兩種觀點都過於強調亞洲在近代化的落後性上。在日本與亞洲處於分隔,且在逼人表態的言論環境下,竹內好提出的戰爭有其侵略、連帶的二重性,極為容易被貼上肯定侵略的標籤。這是一種愈是憎惡侵略的事實,愈是不易關注侵略過程中相生出的連帶感,而將之一併否定的逃避心理(柄谷行人,1995)。而竹內認為醞釀與亞洲的連帶感正是戰後緊貼美國的日本所需要的。雖然竹內的連帶論的確具有回復國族主義的意涵,但卻是藉由文化改革來反思近代化在日本帶出的問題,盼能從民眾的戰

爭體驗中「由下而上」地找回屬於日本的國族主義。以鶴見俊輔的說法就是 意圖回復立基在民眾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而竹内的做法卻是:

要避免落入極端國族主義,就應進入極端國族主義的論述脈絡裡,把隱身其中眞實的、健全的國族主義抽離出來(遠山茂樹, 1968,頁115)。

尤其應從否定一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語彙用法與解釋開始。包括「明治維新」、「超國族主義」、「亞洲主義」,以及文學評論中竹內對「國民文學」、「支那」等字眼的使用,都是固執地延續戰前的論述脈絡,再重新以民眾的日常生活與戰爭體驗來加以思索、詮釋,而非一刀切開的全盤否定這些語彙。然而,這也因此讓自己成為井上清們所攻擊的極端國族主義者。竹內主動、刻意地將自己置於言語風暴中心,不僅以參與、挑起論辯的方式,更採取民眾敘述戰爭體驗的方式來打破產官學、黨派對言語、意義的限制與宰制。這種幾乎是與世界為敵的言語策略正是盼望能回復言語在歷史中的脈絡,而非戰後「轉向」的去脈絡語境。

但如竹内好研究者孫歌所說竹内設定的目標極為困難:

竹內注定失敗。戰爭作爲一個伴隨血腥和死亡以及人類獸性暴力白熱化的複雜事件,很難直接爲竹內好提供以『文學』代替哲學的機會……世界的文學化,意味著世界在自我否定的過程中不斷自我更新和創造,只有建立了這樣的基點,這個世界才會真正理解文學(孫歌,2001,頁 173)。

從竹内好重新建構語彙在思想上的脈絡來看,主流社會不僅藉由(侵略的)歷史否定了歷史的脈絡,也運用大眾傳播否定了民眾藉由日常生活體驗的、反思的、文學的ジャーナリズム,限制了今日民眾思想「再脈絡化」的可能性。從前述鶴見俊輔對傳播隔閡的理解推論,鶴見應能同意竹内試圖對抗「官僚主義」對意義的掌控,期能創造意義的連續性與延展性。但鶴見的哲學訓練讓他在理智上並無法同意竹内「將世界文學化」的做法,只能從自身對傳播隔閡的關注,來理解、描述大眾傳播追求傳播萬能主義的暴力性。鶴見尤其以傳播本質上無法完全傳遞意義這點,強調ジャーナリズム作為思想活動的重要意義。

而從兩人的共同主張來說,思想、言論的價值應在於作為掌握思想動態

的素材,而非單純作為明辨是非對錯的史料。「思想的科學研究會」這種試圖以文學、民眾思想史取徑描述日本人內心的糾結與感受,與主張歷史早有答案只待發掘的唯物史學家井上清,以及遵循「論從史出」的新聞史學家卓南生看法完全平行,卻也著實揭櫫戰後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作為民眾思想再現,對抗意義宰制的另一篇章。

陸、重建新聞學的思想性邏輯

在《東亞新聞事業論》中,卓南生的核心關注為:「帝國主義者的雙重標準與新聞事業(學)的戰爭責任」;這精準地指出戰後日本最重要的思想課題。他也藉其新聞史研究、時事評論貫徹其實踐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精神;尤其數十年旅居日本期間以時評呼籲日本人反省戰爭、破解日本保守派政客延續二戰時的軍國主義思維,再再顯示他作為知識份子的勇氣與意志。然而,本文也認為書中引用井上清批判竹內好提出的「戰爭的二重性」等論述,並無助於日本社會破除敵我間「對內寬容、對外嚴厲」的雙重標準。於此,藉著梳理「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尤其是鶴見俊輔、竹內好的理論與實踐工作,說明研究會在處理「戰爭責任」的態度與作法與ジャーナリズム高度相關。若能將這段歷史結合《東亞新聞事業論》提出的核心關注與相關論述,¹⁷應可為華人社會回復新聞學的思想性邏輯提供參考。

雖然井上清、家永三郎(1913-2002)¹⁸ 等左翼史家在當時一致批判竹 內好立場模糊,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自覺不夠,卓南生更直指這將墮入歷史虛 無主義的歧路。但對於發動戰爭的日本人而言,竹內好與鶴見俊輔認為要做 的不單是否定侵略戰爭的歷史而已,一刀兩斷的否定反倒合理化了「轉向」 的過程。日本在聯軍佔領、美日軍事同盟的壓力下做出民主、自由、進步的 歷史選擇之後,也就模糊了對共產、專制、落後的亞洲諸國的戰爭責任了。 換言之,「轉向」作為一種「利用歷史來否定歷史的工具」讓日本社會失去 徹底反省戰爭的機會。在此,研究會主張應進一步反思合理化戰爭行為的現

¹⁷ 以本文的論述來說,卓南生的言論今後也將成為竹內好、鶴見俊輔所言:「思想的材料」。

¹⁸ 家永三郎自1955年以來就因文部省介入歷史教科書內容而與政府針鋒相對,他與日本政府針對教科書內容檢定的裁判受國際矚目,成為討論言論自由的重要案例。雖未與竹內好深交,卻於爭訟期間收到竹內鼓勵的書信。日後家永三郎於1985年出版的《戰爭責任》一書詳實紀錄日本於侵略戰爭中造成的傷害,明確說明日本應負的戰爭責任,而批評竹內好的抽象論述不易理解(家永三郎,1985)。而家永三郎也是日本少數願意證明日軍二戰時期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暴行的歷史學者。

代化知識體系,以及以體系為生的知識份子、新聞人在二戰前後的轉向。而 戰後的ジャーナリズム就是從反思現代化「新聞學」的學術建制開始,回過 頭從西化以前的民俗學視角,視ジャーナリズム作為日常生活記錄的思想實 踐,進而反思社會集體轉向的謬論。在戰後各方政經勢力逼人表態的情況下, 研究會梳理知識份子的轉向歷程可說是反思社會的精準做法,充分展現ジャ ーナリズム的批判性精神。

但因每個人的戰爭體驗不盡相同,對戰爭責任的理解也有差異,因此研 究會藉由對戰時思想狀態的描述,收斂在以個人為單位,主體性地回顧戰爭 體驗上。這些體驗扎實地反映在竹内好與鶴見俊輔各自表述的「傳播隔閡」 之中,不同於竹内以「世界的文學化」將自己置於言語風暴中心的「火中取 栗」做法;鶴見則是進一步聚焦在文化的再生產上,為形成民眾思想提出建 設性做法。在面對言說霸權採取雙重標準的策略時,傳播隔閡以日常民俗、 藝術、文學、ジャーナリズム等,重新再現、詮釋主流社會中被視為理所當 然的事物與話語;但其再現路徑卻是循著政經權力的周邊,由下而上的處理 戰爭、西化帶來的思想課題。而在現今資訊操作激烈的「傳播萬能主義」環 境下,民眾思想、ジャーナリズム仍舊散見於電視節目中搞笑藝人的閒聊、 雜談與落語,19 以及在民俗文化活動中對生活的反思,社區報紙、學生、社 會團體的刊物、漫畫、小說等出版中,甚至是隱身於主流媒體中不起眼的版 面裡都有其蹤跡。而過去鶴見俊輔提出的「廁所塗鴉」則是能對應網路社群 媒體的留言。這些作為民眾思想的材料,不斷傳承著對抗主流言說的能量。 但即便如此,區隔內外的雙重標準依舊不會消失,這是因為言論被主流社會 霸權宰制的情況仍會存在,以竹内、鶴見的體認來說,面對這個狀況應運用 傳播隔閡的原理與日常生活中被宰制的言語搏鬥,這不僅再現言語霸權,也 能讓民眾理解東洋與西洋、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甚至是男性與女性間二元對 立的思想浮動性質。

所以,卓南生強調的「雙重標準」是二元對立下設定區分你、我邊界的問題。而這個邊界的形成來自主流社會的慣習,包括了既有的世界觀與內化成民族意識的現代化知識體系。也因此東方社會的學術在現代化過程中除應體認吾人工作不僅是從西方帶進新的、科學的、優勢的作法外,應可關注竹內好所言,明治維新只是日本現代化的其中一種可能性而已;而日本既有的

¹⁹ 這宛如華人世界過去以相聲、雙簧等民間藝能評論日常生活、政治時局一般,其言論更能激發 民眾思考。

文化成果大部分都是由外部移植而實現,文化生產缺乏主體性意志,這種未經與傳統價值對立過程的轉向並無法產生新的價值等批判。卓於書中也多次提到:過度追求西方理論的舶來品並無法脫離西方的宰制;也提醒新報²⁰稱揚西方知識先進性的同時,也建構了帝國主義的雙重標準。知識份子應隨時警覺西方知識體系的暴力性,反抗的首要之務應立基在歷史學考證調查而來的事實之上;以歷史作為認清現實狀況的基礎,進而建構批判的邏輯。

卓南生不贊成新聞學追求的事實能以抽象或觀念性的討論來探究,但如果新聞文本可以作為解析思想、辨別是非的材料,那就無法全然否定竹內好這種強調思想的浮動性、無窮性,以及再現的事實並沒有絕對答案的說法。若且華人學界中「新聞事業(學)」作為思想實踐的可能性還在的話,那新聞的文學化、文化化、民俗化的想像力、感受性就應然存在。如同「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實踐的,也或如左派先行者成露茜倡導社會文化取向的新聞史研究一樣(夏春祥等人,2010),新聞事業(學)除了強調實務、規範性邏輯外,於思想性邏輯的再生,應得以讓新聞事業(學)作在地思想浮動性的觀察者,進而成為民眾由下而上參與文化改革的助力。

²⁰ 因有別於過去政府發行的官報而稱之為新報。

參考文獻

小山榮三(1951)。《新聞社會學》。有斐閣。

小野秀雄(1949)。《新聞原論》。東京堂。

久野収、鶴見俊輔編(1969)。《思想の科学事典》。勁草書房。

内川芳美、新井直之編(1983)。《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ズム:大衆の心をつか んだか》。有斐閣。

戶坂潤(1936)。《思想としての文学》。三笠書房。

井上清(1966)。《戦後日本の歴史》。現代評論社。

竹内好(1970)。《状況的:竹内好対談集》。合同出版。

(1980)。《竹内好全集(第 8 巻)》。筑摩書房。

(1981)。《竹内好全集(第 12 巻)》。 筑摩書房。

吉見俊哉(1999)。〈東京帝大新聞研究室と初期新聞学的知の形成をめぐっ て〉、《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紀要》、58:45-71。

寺田征也(2018)。〈鶴見俊輔のディ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論の検討〉,《明 星大学社会学研究紀要》,38:29-41。

有山輝雄(1995)。《近代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構造:大阪朝日新聞白虹事 件前後》。東京出版。

有馬哲夫 (2008)。《原発·正力·CIA: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

佐藤卓己(2008)。《輿論と世論:日本的民意の系譜学》。新潮社。

岡山麻子(2002)。《竹内好の文学精神》。論創社。

柄谷行人(1995)。《終焉をめぐって》。講談社。

松田武(2008)。《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半永久的 依存の起源》。岩波書店。

卓南生(2010)。《東アジアジャーナリズム論:官版漢字新聞から戦時中傀 儡政権の新聞統制、現代まで》。彩流社。

(2020)。《東亞新聞事業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1959)。《転向:共同研究上巻》。平凡社。

家永三郎(1985)。《戦争責任》。岩波書店。

根津朝彦(2019)。《戦後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思想》。東京大学出版会。

夏春祥、唐志宏、李明哲(2010)。〈記成露茜教授(1939-2010)的中國新 聞史研究〉,《中華傳播學刊》,17:75-91。

- 孫 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巨流。
- 野村一夫(1996)。〈ダブルスタンダードの理論のために〉,《法政大学教養 部紀要》,98:1-30。
- 黑住真(2014)。〈日本思想とはなにか〉, 苅部直、黒住真、佐藤弘夫、末 木文美士(編),《岩波講座日本の思想第一巻「日本」と日本思想》, 頁 3-30, 岩波書店。
- 鈴木園巳 (2010)。〈ディ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鶴見俊輔の戦後と言語への関心〉,《言語社会》,4:267-281。
- 遠山茂樹(1968)。《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岩波書店。
- 横尾夏織(2006)。〈「思想の科学」における多元主義の展開と大衆へのア プローチ〉,《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部創設 40 周年記念学生論文集》, 199-208。
- _____ (2009)。〈思想の科学の転向研究〉,《社学研論集》,14:180-195。 鶴見俊輔(1965)。《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思想》。筑摩書房。
- (1967)。《限界芸術論》。勁草書房。
- 鶴見俊輔、粉川哲夫主編(1988)。《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事典》。平凡社。
- 鶴見俊輔主編(2005)。《源流から未来へ:『思想の科学』五十年》。思想 の科学社。
- 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主編(2007)。《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 内好を再考する》。日本評論社。
- Weber, M., Gerth, H. H., & Mills, C.W. (Eds.).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 林鴻亦(2022)。〈新聞事業與戰爭責任:論日本「思想的科學研究會」之新聞思想〉,《傳播研究與實踐》,12(2):147-175。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6
- Lin, H. Y. (2022). Journalism and war responsibility: On the thoughts of Journalism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Shiso no Kagaku" in Jap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147-175.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6 [Text in Chinese]

Journalism and War Responsibility: On the Thoughts of Journalism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Shiso no Kagaku" in Japan

LIN, Hung-Y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oh Lam Seng's latest book titled "East Asian Journalism",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war responsibility of journalism, which is the key premise of Toh's journalism history research,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ve domain that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Japan. Before World War II, Japanese journalism focus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 with many elites devoting themselves to militarism propaganda. However, after World War II, these elites became key executives in assis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turning Japan into a democracy with mass communication. However, at that time, a "communication gap" emerged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s a result of ineffective delivery of meanings dur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despite the use of language for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grasp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key role played by the magazine Shiso no Kagaku (1946) and later by the Society for the Shiso no Kagaku (1949). This also constitutes the context in which Toh's writings can be understood. The conclusion revealed how journalism after World War II became a subject of Japan's intellectual history, which allows for its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East Asian Journalism", "Shiso no Kagaku", Journalism, dis-communication, war responsibility

* E-mail: 075051@mail.fju.edu.tw Received: 2021.12.16; Accepted: 2022.06.15







從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論 「對話論」另解:以變性敘事為例^{*}

王孝勇**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特聘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從巴赫汀學圈對於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推敲「對話論」的另條解釋路徑與應用性,亦即心理一衝突模式的對話。首先,透過對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一書進行理論回顧與批判閱讀,本研究將指出Bakhtin 針對精神分析恐懼歷史、去意識化的評述雖揭櫫「對話論」的社會一互動性和互為主體性,卻恐難以擺脫某種決定論的結構主義觀。有鑑於此,Bakhtin「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則有助於重拾對主體內在話語與自我意識的強調。在此,維繫「我一經驗」在本體論上不同於「我們一經驗」的物質性並非本質主義,而是從「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轉向「自我與自我的關係」,並推敲後者所體現的心理一衝突如何凝聚其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語藝處境或困境。變性敘事得適切地說明此理論模式。

關鍵字:心理一衝突、巴赫汀、佛洛伊德主義、對話、變性敘事

投稿日期: 2021年06月15日;接受日期: 2021年09月07日







^{*} 本文為作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MOST 110-2410-H-126-026-MY2)。作者非常感謝《傳播研究與實踐》兩位匿名評審提供的修改建議和鼓勵。

^{**} E-mail: hywang2@pu.edu.tw

壹、前言

1927 年以伏羅希洛夫(Valentin Vološinov,1895–1936)之名出版的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Vološinov, 1927/1987;以下簡稱 Freudianism)一書,是巴赫汀(Mikhail Bakhtin,1895–1975)最豐富多產時期的第一本著作。當時俄國歷經十月革命的政治洗禮,整個文化思想界都極為活躍和積極入世。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由 Bakhtin 與其友人們所組織的巴赫汀學圈(the Bakhtin Circle)於列寧格勒透過積極籌辦各種讀書會,以論辯對話、集體創作的方式針對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流行於歐陸的諸多思潮,進行深刻又厚實的閱讀和反思。而針對佛洛伊德主義(Freudianism)¹的觀點立場、推論方式和知識特性進行的批判,首先累積了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問世。該書的內容由於涉及人類意識在言談回應(verbal reactions)中方得彼此成就的討論,這些觀點同時也構築了 Bakhtin 本人的思想從早期鑽研的古典政治哲學、美學,到此刻青壯年時期逐漸轉向「語言」這個更具社會性、物質性和政治性範疇的分水嶺。Bakhtin 的「語言學的轉向」(劉康,1995,頁 52)於本時期另外兩本於 1929 年出版的著作中,²已臻成熟。

Freudianism 一書中的論述除了對 Bakhtin 畢生最為關鍵的「對話論」 具有思想上的啟迪 (Wertsch, 1987),這使得吾人若欲更有脈絡地理解 Bakhtin,實難略過巴赫汀學圈如何藉由批判佛洛伊德主義的機械因果論、過 度在意潛意識 (unconsciousness) 與漠視歷史變遷等問題建立其話語唯物論

¹ 必須強調的是,由於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處理某些社會文化主題的書寫出版於 1920 年代之後。因此以 Bakhtin 為首的巴赫汀學圈當時所閱讀和批判的,並非佛洛伊德主義的思想體系全貌(Wertsch, 1987)。論者甚至指出,以佛洛伊德主義為箭靶的 Bakhtin 批判論述,更大的旨趣實乃指出實驗心理學於 1860 年代始於俄國知識界占主導地位的態勢,使得當時的知識典範慣性地僅從生理學的角度思考社會、政治與倫理問題。佛洛伊德主義只是這個學術旨趣下的一個例說(Clark & Holquist, 1984)。不過本研究限於篇幅,無法處理佛洛伊德如何兼顧人的心理機制與「複雜的生物、社會、文化因素的交織影響」(劉毓秀,2000,頁 166)以打造精神分析,更無法論及當時蘇聯知識界整體性的、大規模的學術諸觀點之間的論辯。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巴赫汀學圈如何在 1920 年代可以接觸到的知識論述中,建立與佛洛伊德主義不同的典範。

² 這兩本著作一本是再度以 Vološinov(1929/1986)名字發行的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另一本則是首度以 Bakhtin(1963/1984)真名出版的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Art(後於 1963 年書名改為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再版,亦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這裡值得交代的是,雖然現階段國際巴赫汀學界對於相關著作的作者問題多半傾向將 Vološinov 為名的著作視為 Bakhtin 所寫,或認定 Bakhtin 至少有相當程度的投入,只是或許是因為 Bakhtin 當時默默無名,以真名較難獲得出版的機會(劉康,1995;Clark & Holquist, 1984; Wertsch, 1987)。然而,至今仍有學者堅持署名 Vološinov 出版的著作應該不是 Bakhtin 本人所寫(見 Morson & Emerson, 1990; Titunik, 1987)。對此,本研究雖傾向從集體創作的角度將署名 Vološinov 的著作視為由 Bakhtin 主導或主筆,因此相關論述仍可視為 Bakhtin 的觀點。但為免進一步落入作者爭議的泥沼,本研究在引述時,仍會以實際出版所列的作者姓名進行標示。

與辯證觀。更重要的是,Bakhtin 在字裡行間所呈現的兩個推論上的偏好或 盲點,以及兩個慧心安排的性/別例子,似乎透露出至今已廣為人知的「對 話論」尚有另條解釋路徑。

第一點,當 Bakhtin 用內在話語(inner speech)、外在話語(outward speech)的命名重新界定佛洛伊德的潛意識(unconsciousness)和意識(consciousness),並旋即藉由重新賦予內在話語、潛意識特定的內在社會性(inner sociality),³ 使之脫離精神分析下僅關乎情感(emotion)、動機(motive)、感覺(feeling)、夢境(dream)、性慾(sexuality)的生理學和主觀心理學狀態時,Bakhtin 明確地肯定潛意識並非唯心論,更有其「物質性」(Vološinov, 1927/1987, p. 21)。然而在 Freudianism 書中的他處,Bakhtin 卻又話鋒一轉,指出潛意識在某些時候乃係「非語言的、厭棄話語的」(同上引,頁 37),更無法藉由內在話語的運作幫助我們認知自己的社會性。兩相對比,究竟 Bakhtin 如何思考內在話語、潛意識的性質? Bakhtin 難道把他在修正佛洛伊德主義時所提出的應具有社會性的內在話語、潛意識推往一個進入語言之前的歷史先驗存在,和「個體」身處社會對話之前的本質狀態?在「對話論」所揭橥的意義互動、主體建構與存在事件中,內在話語、潛

[「]內在社會性」是 Speech Genre & Other Late Essays —書譯者 Vern McGee (Bakhtin, 2004, p. 101)的用語,用以陳述當人類在話語行為中的表述形成了某些相對穩定的、具有特定邏輯和規 則的言說類型,那麼即便是任何一個發話者或接收者的內心話語、思想、感受、衝突或意識, 都已經超越了個體自主的「我一經驗」(I-experience)的範疇,而立即進入了語言社群集體性的 「我們一經驗」(We-experience)之中,是為「超語言學」(translinguistics)。在 Bakhtin(1994b; 亦見王孝勇,2009)的語言哲學中,他甚至基於話語互動的每一個片刻都已經奠基於前人表述 (包括語言規則、社會文化成規) 之基礎,且無人誕生於聖經中的創世紀當然也沒有語言創始者 (例如亞當) 這個角色存在的認識論,主張在對話論中的「個體」成為「言說主體」以行使話語 行為並成就自我存在價值的過程,並無時間差。易言之,對話論所投射和預示的,乃是情境脈 絡化、物質性的、歷史性的社會對話,且根本性地否定有一種個體或主體的狀態「先於」言談 回應而本體存在。對此,本研究雖然同意 Bakhtin 從社會一互動論的視角來論述日常性語言的 「常態」與一般性景況,也充分認知到 Bakhtin 對於歷史先驗性和超驗性的拒斥,以及這樣的立 場如何啟發後結構主義的語言與文化思想;但是,本研究亦將透過 Bakhtin 佛洛伊德主義研究所 流洩的偏向和可能的盲點,直指一種縱非關乎日常性語言「常態」,卻更能瞄準個體或言說主體 的思想在「轉化為」(turn into)社會一互動對話過程之際(而非進入社會對話之「前」),所確 切體現的身、心衝突感,以及這樣的感受如何揭橥心理一衝突性的(非常態的)對話,亦即本 研究題目所示之另解的「對話論」。本研究後續更將透過「變性敘事」(transsexual narratives)的 分析,探索心理一衝突模式對話之應用性和解釋力。

意識有沒有一個相對的理論位置? ⁴ 第二點,當 Bakhtin 以非官方意識形態(unofficial ideology)、官方意識型態(official ideology)的語彙再詮釋內在話語 vs. 外在話語,並創造出「行為意識形態」(behavioral ideology)此一原創性的術語用以描述人類主體話語行為中涉及內在話語和外在話語的所有動態關係時,他一方面宣稱行為意識形態因其敏感、生動和回應性,得以適時地裂解官方意識形態並創造法律、道德和世界觀的變遷革命; ⁵ 但另一方面,Bakhtin 旋即火速地改口指出在「健康的社群和社會個體中」(Vološinov,1927/1987, p. 89),行為意識形態能展現官方與非官方之間「沒有分歧」(同上引)的社會經濟基礎。我們如何面對這樣的看似內在矛盾? Bakhtin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到底採取何種政治立場?

對此,劉康(1995,頁 126)語帶浪漫地緩頰,認為 Bakhtin 此處「所希望的,乃是一種健全的理性社會,……也曲折的反映了他對於蘇聯社會日益僵化、強硬的史達林文化專制主義的擔憂和抗議」。本研究不甚同意這個說法。因為史達林對於蘇聯知識文化界的「大清洗」(the Great Purge)始於1930 年代,而 Bakhtin 被政治迫害和流放亦迅雷不急掩耳地始於那時。要說Bakhtin 研究佛洛伊德主義的當下已經充分感受到外在政治局勢從原本的開放到大幅度地限縮,可能需要更多的舉證。6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同意 Clark

⁴ 這裡必須針對潛意識、內在話語 vs. 意識、外在話語在本研究中的呈現,作一交代。首先,潛意識、意識是佛洛伊德的用語,而內在話語、外在話語則是 Bakhtin (Vološinov, 1927/1987) 所鑄造的詞彙。當 Bakhtin 要對佛洛伊德主義進行理論攻防時,他確實會將潛意識、意識掛在嘴邊。然而,由於 Bakhtin 主張精神分析在認識論上的問題,在於後者雖提及但較不重視「語言」、言談回應,此舉使得個體經驗的表達,乃至於性、本能、感覺、慾望的抒發缺乏物質性與社會性,而停留在個人心理學與生理學的層次。Bakhtin 更直指若無語言的幫忙,則我們無法讓自己「意識」到任何事情,違論對「潛意識」進行推敲甚或排除。這裡,內在話語和外在話語的命名(以及本研究馬上會提到的「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隨之出現。內在話語指涉的是佛洛伊德所述的潛意識的脈絡化。這部份因為相對而言(並非絕對)比較容易牴觸主流官方的所費會所述的潛意識的脈絡化。這的因為相對而言(並非絕對)比較容易牴觸主流官方的所背書的法律、道德與世界觀。據此,至少在 Bakhtin 的書寫脈絡下,我們可以說潛意識、內在話語是相對決律、道德與世界觀。據此,至少在 Bakhtin 的書寫脈絡下,我們可以說潛意識、內在話語是相對說。外在話語、为在話語人內是話語、內在話語上相對。如於佛洛伊德的原意較不強調語言,因此 Bakhtin 仍比較傾向使用內在話語、外在話語進行陳述。本研究基本上亦延續這樣的書寫偏好。而當內在話語、潛意識(或外在話語、意識)須同時出現方能清楚表意時,本研究則以頓號加以隔開。

⁵ 正文這段文字體現的未了性(unfinalizability)、開放性基本上貫穿了 Bakhtin 一生的知識信仰,也是他對後輩學者在「對話論」的理論演繹(Farsi, 2015; Sućeska, 2018; Xu, 2013)和觀念應用(Capizzo, 2018; Collado & Besoain, 2020; Dey, 2015; Guillemette, 2017; Milthorpe, 2015; Schwarz-Franco, 2018; Suárez, 2015; Vitanova, 2013; Zou, 2018)上最為關鍵的民主啟發。一般認為,Bakhtin 揭櫫的透過某種形式的對話互動,得以凝聚持續進行社會改革、解構僵固認同、置換權威教條主義的語藝動能,實乃「對話論」的政治寓意與核心要旨。

⁶ Titunik(1987)指出,在 Freudianism —書於 1927 年出版前,巴赫汀學圈至少在兩年前就已經以 Vološinov 之名出版了討論佛洛伊德思想的文章 "Beyond the Social"。雖然該文並未論及語言以及後續在專書中提及的「言談回應」,但可見 Bakhtin 與學圈成員對佛洛伊德乃至於當時歐陸思想的批判研究,最晚於 1924 年 Bakhtin 遷往列寧格勒時即開始。當時的蘇聯基本上是一個相對開放的政治社會。

& Holquist(1984, p. 183)所言, Bakhtin 對於開放政治修辭亦即非官方話 語意識如何挑戰官方思維的堅持不容置疑, 只是在他研究佛洛伊德主義的階 段, 確實對於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周旋折衝描述, 顯得「初探和不成熟」?

事實上,若僅從 Bakhtin 佛洛伊德主義批評中的一些矛盾修辭論斷其不在乎主體的內在話語、甚至是向官方意識形態的暴力性質輸誠,確實言過其實且過於嚴苛。因為在 Freudianism 一書的字裡行間,Bakhtin 曾罕見地提及兩個與性/別議題相關的例說,展現其既關注個人心理面向又嚮往開放社會的態度。

首先, Bakhtin 說佛洛伊德主義過度高估了生活與意識形態中的「性」, 尤其是性的「非社會」面向,是一種極度片面的理解方式。甚至,當「性」 成為了「社會」的替代品,則「所有人皆被區分爲非男即女,其他的次類 目都將被認定爲不具意義」(Vološinov, 1927/1987, p. 90)。這裡清楚揭示出 Bakhtin 對於破除主流社會性/別二分法的企圖。更重要的是,此舉並非拒 斥談論人的「性」,而是不滿「性」被去社會化地解釋掉(explained away)。 我們可以說,「性」這個在 Bakhtin 的佛洛伊德主義研究中被初步歸類為內 在話語、潛意識、非官方意識形態範疇的基調,不但應被重新正視(而非被 視為非語言的、生物學的部分),其中更值得關注和放大的是內在話語與外 在話語之間的對話「矛盾」。例如特定性/別主體在體會外在世界的主流性 別價值觀之際,反身性地認知到自我無法被置入其中的困境也難以逃逸抽 離,因而產生相應的言談回應或外顯的身體打造。在此,個體的「心理—衝 突性」(psychic-conflictual model)而非個體因為欲求獲得社會肯認的存在身 分而被無縫接軌地整併入、「轉化為」(turn into)外在話語之中的「社會一 互動性 | (social-interactional model),或許是 Bakhtin 此刻所想的另番(微弱) 光暑。

其次,我們是否能夠期待官方意識形態的運作在特定的歷史時間和階級中,得以體現並實踐法律、道德和世界觀的偶然性(incidental character)而非獨白性?亦即外在話語的思想體系並不是全然絕對的霸道,迫使每一個與官方意識形態相左或衝突的動機或行為,都必然產生退化或妥協?對此,Bakhtin (Vološinov, 1927/1987)舉的例子是柏拉圖《會飲篇》(Symposium)中,古希臘統治階級流行時興的同性戀傾向或行為,陳述在許多脈絡與文化中因不見容於當道而被監視、壓抑為潛意識的內在話語或性慾望,縱使發展於一個小型的、檯面下的社會環境(而非僅關乎單一個體的動機),仍有主

體得順從其內在話語意識或自我真理進而產生某種效應的機會。Bakhtin 特別強調,這裡所述的並不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完全瓦解或者吾人對於解放、抵抗、革命的一般性想像,亦非由下而上的策略擘劃與解構行動,而是內在話語的確切存在,還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官方意識形態所意圖造就的更廣泛、更持續、更定型的社會連結之不易得,或至少是絕非一蹴可及。

這裡,Bakhtin似有借助原屬精神分析的用語(例如潛意識、動機、慾望)去論述內在話語從何而來?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的心理—衝突為何?以及內在話語的某種存在「本體」如何「非故意為之地」折射出吾人慣習的外在話語乃至於社會經濟基礎之相對偶然性?等議題。只不過,此時 Bakhtin的推論尚待更具體和直接的鋪陳。

事實上,嘗試接合 Bakhtin「對話論」與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部分用語的理論或經驗研究,確實是西方學術界逐漸萌芽的知識計畫。論者指出有別於過去精神分析可能因為在臨床診斷和文化哲學上流於獨白主義,傾向在身、心與外在世界之間劃出某種距離,「對話論」的互為主體性有助於吾人另闢蹊徑,以探索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滲透性以及語言於其中扮演的建構功能(Kristeva, 1980; Muller, 2016)。延續這樣的主張,亦有學者指出 Bakhtin「對話論」的精神分析意涵,在於其直指個體的心理、精神衝突可透過語言而展現和轉化(Macaskie, 2016)。因此,人的主觀情感、感受不僅應是對話互動之際的重要母題(Hinchion & Hall, 2016),精神分析強調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乃彼此作用而投射於個體心理層面的實質討論,當能挹注後續論者從佛洛伊德對於主體的內在關係營造(intrapersonal relationship)延伸至團體成員間彼此透過互動以建構某種契約關係的對話過程分析(Lamarche, 2017; Yanchuk, 2018)。7

相關研究成果的累積至今雖然並不真的非常多,但本研究認為現階段融合兩大典範所欲提出的觀點建構,已經逐步揭示出 Bakhtin「對話論」的利

⁷ 不過,這些相關論述大多數是來自精神分析派,或以精神分析為本位的研究。巴赫汀學圈中至今少有後繼者系統性地重新檢視 Vološinov。間接相關的可能是 Emerson(2015)的專文。她認為 Bakhtin 在精神分析經典個案伊底帕斯情結(the Oedipus complex)的舉例中,似乎暗示著在作者一中心論(author-centric)之外,尚有一種角色一中心論(hero-centric)的設定。前者容易被清晰劃界、辨識且缺乏政治甚或自我意識,後者卻有難以被抑制、抹煞的「內在性」。 Emerson 雖然並未就此一內在性進行更多的推敲,也坦承 Bakhtin 的「對話論」較傾向從外部、互為主體的角度思索戲劇與表演藝術的舞台性,但 Emerson 說 Bakhtin 並不鼓勵和期待各種內在性在封閉體系中退化瓦解。本研究認為,Emerson 從一種否定「極端內在性」(同上引,頁200)的意識或拒斥「保護主義的內在自我」(同上引,頁201)的角度思考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採取的觀點,確實有助於將精神分析的性、本能、感覺、慾望之不可化約性,進一步連結至 Bakhtin 的思想體系。本研究可能的理論貢獻,也在於此。

基與可能的囿限。Bakhtin 擅於論述主體與他者在話語交織過程中的互為鑲嵌。他將這樣的互動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話語片刻,想像其中的意義生成與話語意識的挪用(王孝勇,2009,2012),其中更有突破僵局、挑戰權威的民主化意涵(王孝勇,2011,2013,2014),甚或是互為主體性的理解並非獲致某種定論和共識的主張(王孝勇,2019)。但是 Bakhtin 因為醉心、著述於人類話語意識生成的社會一互動論,並且試圖藉此跟精神分析建立不同的學術品牌,因此其「對話論」雖然意識到人的心理機制、內在話語與非官方意識形態亦具有難以抹滅的物質性,仍傾向將人類主體形構過程中的心理一衝突性給淡化處理甚至輕視其存在價值。

本研究據此提出的初步觀察是,Bakhtin「對話論」擅長分析「自我與他者」的語言常態互動,但在面對「自我與自我」的特殊對話關係或心理一衝突性時,則顯得捉襟見肘。而內在話語意識與自我意識建構的理論化,以及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化如何落實在具體的現象分析,是本研究重要的問題意識。心理一衝突的對話可被定義為主體的行為意識形態因其內在話語的自覺,而無法進入社會一互動性的一般日常對話場域並「轉化為」外在話語之語藝處境或困境。

某種程度地呼應 Freudianism 一書所提及的兩個性/別舉例,「變性敘事」(transsexual narratives)主張以變性者說故事的方式建立一種與主流社會順性別(cisgender)認同有異的性別腳本,於 1990 年代至今逐漸成為性/別與跨性別研究的新興視野。提出此一概念的學者 Jay Prosser(1997, 2006;亦見趙庭輝,2019)強調,變性的心理動機來自於特定性/別主體對於出生時所被賦予的生理性別產生矛盾。身、心的不一致除了意味著主體對於內在意識的感覺形成認知與堅持,更需要透過外表能夠被看見、目睹、見證、辨識的姿態與身形而被確認,方能化解。Prosser(1998, p. 6)更說,變性過程(transition)除了挑戰了酷兒理論側重性別、性別展演而忽視性(to disembody sex)、感覺、慾望、心理的偏向,更有相當深刻的物質性。因為透過變性敘事所揭橥的變性過程,我們有機會看見跨性別如何浮現為一個亦可被分類的主體(a classifiable subject),並據此建構「融合心理、身體和社會變遷」(同上引,頁 4)的文化理論與政治。

變性敘事現階段所展現出的理論意涵,尤其是其視角聚焦於將「身體」 視為一個必須被「靈魂」給激活的場域,據此強調變性主體「內在、精神生活」(Reinsmith-Jones, 2013, p. 65)的重要性,更與 Bakhtin 在佛洛伊德主義 研究中提及的諸如內在話語、外在話語等詞彙有相當的呼應,其細部的意涵 值得仔細推敲。對此,本研究將嘗試透過變性敘事的研究案例,對 Bakhtin 「對話論」應涉及卻至今仍為人所輕忽的心理一衝突性進行理論說明和應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從巴赫汀學圈對於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推敲「對話論」的另條解釋路徑與應用性,亦即心理一衝突模式的對話。首先,透過對 Freudianism 一書進行理論回顧與批判閱讀,本研究將指出 Bakhtin 對精神分析強調衝突性的肯認,及其流洩出的恐懼歷史、去意識化的評述確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更得藉此揭橥了「對話論」強調社會一互動性的理論偏好。然而,過度熱切、單方面地強調言談回應的互為主體性,卻也矛盾弔詭地將話語行為的內在話語意識推往一個無關乎社會、不涉及語言的真空狀態(linguistic nonzone)。社會一互動性的對話恐因此難擺脫某種決定論的結構主義觀。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透過巴赫汀學圈在佛洛伊德主義研究中所提出的「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重新拾回「對話論」對主體內在話語與自我意識的強調,並主張 Bakhtin 所提出的語言景觀在某種程度上仍保有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的斷裂矛盾,而非對話整合或互為主體。巴赫汀學圈 (Vološinov, 1929/1986, p. 88) 經常性地將「我一經驗」看作是「我們一經驗」據此傾向否決前者的存在,在此得到了一種修正主義式的平反,更暴露出 Bakhtin 雖實際點出某種內在衝突的對話態勢,卻對此語帶保留甚至是前後不一的狀況。

最後,本研究將從具體的研究案例說明「對話論」的心理一衝突性。受到變性敘事研究的啟發,本研究將指出跨性別的自我認知浮現於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持續矛盾的可理解性的邊界(limits of intelligibility)。內在話語或者精神分析所宣稱的被壓抑為潛意識的心理部分,除了建立一種並非將「我一經驗」與生物生理學和解剖學上的性/別二分法畫上等號,或傾向從後者界定前者的另種語法,亦與變性敘事研究對於心/內在、身/外在矛盾性的關懷(Reinsmith-Jones, 2013)多所疊合,或至少具有意義上的互為指涉性。

貳、巴赫汀學圈論對佛洛伊德主義的勾勒

以下,本研究將透過 Vološinov 對佛洛伊德主觀心理學的脈絡化與其潛 意識和性本能理論的定調,推敲巴赫汀學圈所勾勒的佛洛伊德主義。

一、佛洛伊德主義的提出脈絡與潛意識觀

按照 Vološinov(1927/1987)的觀察,佛洛伊德主義於歐陸的起源,可追溯至 1893 年。最初它僅是一種初探性的、謙遜的臨床心理治療法。但在短短的數十年間,精神分析的心理學理論被歐洲小資產階級(petit bourgeois)⁸ 擴大應用至藝術、宗教乃至於社會和政治生活諸多層面。⁹ 此舉使然,Vološinov 指出最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精神分析逐漸脫離了其最初純粹的精神病學內涵,而建立了屬於自身的文化哲學。精神分析的影響力更於 1920 年代晚期擴散至美國。它如何藉由與現代心理學中的客觀主義派別在知識上進行區隔並建立自身的主觀主義心理學,是巴赫汀學圈感興趣的點。

Vološinov(1927/1987)指出,當代歐洲心理學大致有兩大派別:客觀心理學 vs. 主觀心理學。前者包括了巴夫洛夫(Ivan Pavlov,1894-1936)古典制約論的反射學派(reflexology)以及盛行於美國的行為主義效果研究;後者則是實驗心理學以及稍晚出現的佛洛伊德主義。

客觀心理學主張若欲探討人的內在心理,則必須透過一個局外的、科學

⁸ Vološinov(1927/1987)曾經不只一次地指出佛洛伊德主義與當代歐洲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兩者在基本前提上有著堅固的連結。這個連結一是佛洛伊德極為高估「性母素」(sexual factor;同上引,頁 89)並以之作為論述的預設,這在資本主義社會現行的社會分化和區隔(disintegration)中亦是相當明顯的現象;另一點是佛洛伊德對於「監看」(censorship;同上引)的討論明顯地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的行為意識形態,而無法適用於描述古希臘或中世紀農夫的心理動力學。因此 Vološinov(同上引,頁 127)宣稱:「佛洛伊德主義的意識形態觀點,聚馬克思主義是水火不容的」。不過由於 Vološinov 凸顯佛洛伊德主義的特定階級意識的討論並未持續地在他的書寫中深化,本研究無法對此提出更多的推敲。但可以肯定的是,Vološinov 藉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判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論點旨在陳述後者缺乏社會性與歷史感,使其對於心理動力的動態性乃至於辯證性缺乏了物質基礎。而這裡所提出的諸多概念,都將陸續出現於本研究的正文內容中。

⁹ Freudianism 的第六章,就在陳述佛洛伊德主義所言與先民時期各民族神話之間的驚人巧合,尤其是伊底帕斯情結和閹割焦慮(the castration complex)的普遍解釋性與文化體現。例如某些建築形式、古代雕像中呈現或站或坐的人體姿態乃至於葬禮儀式,都彰顯出死亡作為回歸母親子宮的潛意識理念。這些討論不難看出 Vološinov(1927/1987)有意藉此提陳精神分析從生理學走向哲學的變遷,並據此化身為當代盛行的知識典範之趨勢,以及更重要的是與此一趨勢對話和對峙的迫切性——即便 Vološinov 也發現精神分析在二十世紀初德國知識界受到的關注,並不如其在蘇聯所帶來的影響力。

性的領會方式,讓每件事物得以被計算、被測量並且被因果化。而「唯有這種物質上得以展現的人類和動物的行為,方能建立心理學中的研究對象,並維繫其精確性與客觀性」(Vološinov, 1927/1987, p. 20)。從這個立場出發,客觀心理學認為主觀心理學派雖也操作心理學實驗,卻過度仰賴實驗對象內在的自我觀察和自我報告,恐流於唯心論,亦無法面對實驗對象的內在話語與實驗者的外部理解產生矛盾的狀況。

然而,客觀心理學這個看似「比較接近馬克思主義唯物論」(Vološinov, 1927/1987, p. 21)的流派,卻因其發展才剛剛起步,使得在方法論上明顯流露出一種「天真的、機械性的唯物論」(同上引,頁 23)和「生物一元論」(biological monism)(同上引,頁 129)。它務求將實驗對象的內在經驗全然地轉化翻譯至某種外部理解的語言之中以便讓實驗者掌握。相對於此,佛洛伊德主義則透過強調人類語言範疇中的心理現象之衝突性,一方面修正過去主觀心理學的某些偏向,另一方面更提出自身的潛意識論與性本能論,建立了與客觀心理學甚至是當時主流的主觀心理學派皆有所差異的知識路徑與推論方式。

首先,不同於稍早實驗心理學與其他主觀心理學等舊心理學(old psychology)從「心理學樂觀論」(the psychological optimism)(Vološinov, 1927/1987, p. 76)的角度想像心理生活乃是「所有事情皆和平、安靜,每件事情都被放在對的地方,沒有危險更沒有災難;人從生到死,皆走著一條平靜安穩的直路,有目的性地往前邁進」(同上引,頁 75-76),佛洛伊德主義帶來的思想震撼性是其特別強調心理生活的「衝突、混亂與不安」(同上引,頁 75)。這種立場偏向使得佛洛伊德在實驗心理學當道的年代,確實在心理觀上示現一個最基進的改變。也正是本於心理—衝突模式的觀點,佛洛伊德主義雖奠基於人類的口語表述與言談回應,但卻旋即表現出對於「人基於自身意識而對外進行語言表達」這個主觀和客觀心理學都論及的機制,某種程度的懷疑。10

Vološinov (1927/1987) 指陳,有別於一般認為所有的表述皆建立在「意識」的領域,佛洛伊德主義並不相信意識的表面動機,反而選擇深入心理的

¹⁰ Vološinov(1927/1987)說明,當時歐陸的主觀與客觀心理學派雖然在知識論上有所不同,但兩者卻皆仰賴透過實驗法的刺激反應探索實驗對象的「內在自省」(introspection);且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內在自省被視為是探索人類「意識」的重要和唯一依據。這點與佛洛伊德主義雖仰賴內省法蒐集治療歇斯底里症和各種恐慌症的素材,但傾向從「潛意識」的層次理解人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和自我敘述,有根本的差異。

深處。這裡,佛洛伊德並未從客觀的面向思考語言行為,亦未尋求表述的社會背景;相反地,他嘗試去尋找「潛意識」並將其界定為「在表述之中,行為的真正動機」(同上引,頁76)。以下這個例子清楚呈現出佛洛伊德主義的潛意識觀。

Vološinov(1927/1987)提到,1889年的佛洛伊德是一位年輕的維也納醫生。他對於著名催眠家伊波利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的實驗感到印象深刻。這個實驗是說一個年輕的女人在被催眠後,接收了一個指令:在清醒後的一段特定的時間,要走到房間的角落,拿起放在那兒的一把傘。清醒後,在指定的時間內,那個女人真的執行了指令。在回答自己的行為動機時,她表示她那樣做是想要確認兩傘是不是自己的。這個動機回答跟行為的真正原因並不一致,顯然是行為之後才想出來的。但這個回答卻可以滿足病人的意識,也讓她真切地相信自己打開兩傘是基於自我的意志,而其目的在確認兩傘是不是自己的。雖然該實驗的尾聲,Bernheim透過不斷的提問病人並且引導她的思考(即自由聯想法),最終才讓她想起來自己行為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被催眠下了指令。但這個年輕女人的心口不一、內在意識與外在行為動機之間的斷裂,卻也讓佛洛伊德充分認識了「意識」的侷限,更是他後續論述「潛意識」的基礎。11

對佛洛伊德而言,是「潛意識」而非在語言範疇內的「意識」方為探索心理失序、感覺、慾望的切入點。他甚至指出潛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乃是「非語文的」(nonverbal)。¹² 因此在臨床上若欲治療病患的歇斯底里症與各種恐慌,單純仰賴病患的自我「意識」或內省縱使得獲致一些線索,終究難以到抵人心深處最黑暗的境地。易言之,人基於道德良心而壓抑進潛意識的部分情結,無法僅透過內在自省而充分地揭露和排除(live out),以治癒心理疾病或創傷。潛意識的重要位階,在佛洛伊德進一步提出的性本能理論(theory of sexual instincts)及其中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與現實原則(reality

¹¹ 這裡所提出的潛意識觀點,按照 Vološinov(1927/1987)的說法乃是佛洛伊德早期的主張(1890-1897),更型塑了當時佛洛伊德與醫師同儕 Breuer 在面對歇斯底里症病患所使用的「浄化治療法」(cathartic method)(同上引,頁 33)。亦即藉由持續的提問和長期觀察,醫生試圖探索那些潛藏在病患潛意識深處的羞愧和恐懼經驗,並把它們帶回意識層,讓其自然地宣洩和排除(Freud & Breuer, 1895)。Vološinov(1927/1987)同時也指出精神分析在之後的發展更趨系統化,當中也有些實質的轉變和拓展,但不變的乃是對於潛意識的強調。

¹² 在 Freudianism 書中的頁 37 與 48, Vološinov(1927/1987)兩次提及潛意識的非語文性。前處 Vološinov 指出潛意識無法用語言這個基本上被認為是意識端所結晶匯聚的系統給清楚言明,後 者則強調人的自我仍勉力尋求合宜的語文與潛意識產生連結,使其「轉化為」準備進入意識層 並尋求化解的言談回應。兩處的書寫呈現一致性,更揭櫫精神分析雖以潛意識為本,卻更在意的是潛意識與意識之間的交鋒。

principle) 間的折衝動態裏,有更為明顯的樣貌。

二、 佛洛伊德主義的心理—衝突論

佛洛伊德主張心理活動的運作,奠基於我們的感官所體驗到的肉身刺激,亦即天生固有的性本能。他指出人在孩童階段時的性本能,建立在「一切皆允許」(Vološinov, 1927/1987, p. 40)的享樂原則。且由於生殖器官在性慾生活中的主宰性尚未建立,孩童的性區分、性慾望因為未蒙受社會道德律法的規範,於是可以自由地與任何過程(例如:哺乳)或器官感受(例如:排便)加以連結並從中獲得性快感。這裡 Vološinov(1927/1987, p. 41)提醒我們,佛洛伊德所示的人類心理發展歷程的整個早期階段,確實被放置於「意識之外」。無怪乎佛洛伊德把成年人的性倒錯(sexual perversions)視為「退化的正常現象」(retarded normal phenomenon)(同上引)。

然而,伊底帕斯情結繼之迸生。此一佛洛伊德主義最重要的認識論所體現的閹割焦慮,使得孩童因為對母親的愛戀以及伴隨而至的對父親的憎恨,逐漸妥協於父親律法所揭橥的現實原則。父親聲音連同其中的禁制(例如以閹割威脅摧毀孩童意圖與母親亂倫的慾望)接著轉變為孩童所擁有的良心(conscience)。良心與亂倫慾望之間難解的、持續的鬥爭使然,後者更因恐懼感、羞恥心而必然被壓抑至「潛意識」之中,使得伊底帕斯情結從屬於全然的失憶。這裡,佛洛伊德主義具體點出了「監看」(censorship)(Vološinov, 1927/1987, p. 42)亦即超我(super ego)的規範化力量。官方意識、父親律法於現實原則中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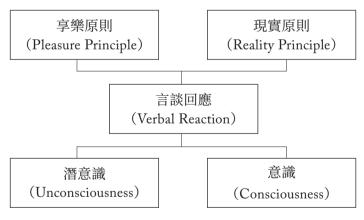
Vološinov(1927/1987)進一步指出,從佛洛伊德主義對伊底帕斯情結的揭露看各民族間都廣泛流傳著亂倫的神話故事迷思,可見人基於享樂主義的感官、慾望、經驗滿足由於面對官方意識的監看而產生某種內在壓抑,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普遍性。這種心理一衝突性可能導致各種各樣的精神病、恐懼症和噩夢。吾人唯有透過對「潛意識」加以推敲探索,方能有機會排除。自由聯想法(free association)的操作在此被直接地提出:

應該讓心理獲得充分的自由,所有意識的約束和批判能力應該 被放鬆。我們必須允許任何事情都能浮現於腦海,即使是那些最古 怪的思想或者與所分析的夢境看似沒有明顯關聯性的想法。……我 們必須努力地只去關注那些偶然地源於心理之中的東西 (Vološinov, 1927/1987, p. 50)。

事實上,自由聯想法也是種內省法。它以實驗對象、病患、語言使用者的自我報告判斷主體的心理發展過程或創傷。只是這裡的話語行為由於遭逢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衝突拔河,使得其主題必然凸顯監看、超我、父親律法當道之際,慾望被壓抑至潛意識之中以成就良心的心理—衝突性與矛盾。自由聯想法下的內省修辭也似乎因其更允許毫無邏輯的線索浮現,且不放棄找到其中的關聯性索引,而使得潛意識的非語文素材有進入和介入由意識所操控的言談回應,進而被找到病因以排除。本研究將佛洛伊德主義的主觀心理學,繪製成圖 1:

圖 1: 佛洛伊德主義的主觀心理學圖示

伊底帕斯情結與性本能 (The Oedipus Complex and Sexual Instincts)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圖 1 所示,人類主觀心理的衝突運作模式,展現為言談回應中潛意識與意識之間的持續互動。本於現實原則的意識層在孩童社會化的繼之階段,會透過伊底帕斯情結的運作形成對孩童的警戒與威脅,逐漸形成孩童的良心。前期來自性本能的享樂原則因此被壓抑為潛意識,甚或形成人類心理深層的恐懼。但這些難以名狀的被壓抑的慾望、情感若有一天能透過自由聯想的內在自省找到宣洩管道,則歇斯底里乃至於整個文化中的集體焦慮,有

機會得以排除——儘管佛洛伊德認為當我們努力去關注那些源自心理深層的 慾望時,經常會面對由監看、超我、父親律法所統管的「我們的意識端」 (Vološinov, 1927/1987, p. 50) 敏感地加以抵抗和阻礙。

整體而言,佛洛伊德主義始自不滿客觀心理學的機械因果論,同時也對於時興的實驗心理學忽視人內在意識的心理一衝突性感到疑慮,據此提出從意識探究潛意識、從自由聯想的內省敘述找尋心理困境成因的主觀心理學,雖然看似仍有諸多的待解之謎,但它嘗試去探究人類此一整體存在的言談互動所型塑之諸過程與機制,仍使得精神分析與巴赫汀學圈所欲建立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在「人類意識的文化和歷史特殊性」(Wertsch, 1987, p. viii)上,有共通的關懷。

以下本研究將指出,巴赫汀學圈所欲建構取而代之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雖然強調社會一互動性的對話,但確實蘊藏著心理一衝突模式的身影。 只是,後者這條路徑在 Freudianism 一書中顯得語帶保留甚至是多所矛盾。

參、從佛洛伊德主義到 Bakhtin 典範,及其餘數

Freudianism 一書的撰寫,旨在植基於客觀的方法對人類意識形構的辯證性和內在社會性進行系統性的勾勒,此即馬克思主義心理學(the Marxist psychology)。所謂的客觀方法,源自古典馬克思的唯物一元論(material monism)傳統但又修正其不在乎意識形態、思想、意義的基調,進而主張對話語行為、言談回應和人類心理的存在感與歷史性進行歸納整理。在此基礎上,Vološinov(1927/1987)藉由對佛洛伊德主義提出些許質疑,提出自身的物質論、互動論與意識論,並揭橥社會一互動模式的「對話論」偏向,或可稱之為 Bakhtin 典範。

一、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社會—互動模式偏向

Vološinov (1927/1987) 首先提問的是,精神分析是否如自身所言,與 其他心理學取徑之間的差異頗大,抑或是彼此其實殊途同歸?

Vološinov(1927/1987)說,無論是主觀或是客觀心理學,其對於人類心理生活的思考皆傾向將其拆解為感官(sensations)、呈現(presentations)、意志(will)、慾望和感覺等元素。而我們在精神分析的論著中看到的乃是一

樣的用語。對此, Vološinov 認為佛洛伊德主義事實上具體維持了那些在當時 心理學界所普遍使用的術語、定義和區分,可謂「教條式地挪用了心理現象 的舊有分類」(同上引,頁 68-69), 並未展現出其因轉而關注心理—衝突動 力學而重構思想體系的企圖心。甚至,「所有這些心理元素被毫不批判地轉 移至潛意識的範疇」(同上引,頁69),使得這樣的觀點實乃缺乏物質性而無 法被外在理解:

當一個人自我意識地開始其行動,當然他不可能說不出其感 覺、慾望或呈現;但一旦我們開始去「客觀地」分析那些行動,並 且努力地對其一致性和完整性加以外部理解時,我們將無法找到 任何組成該行為的元素。外在的、客觀的理解必須仰賴行為之不同 的——「物質的」——基本的組織(different-material-elementary components of behavior),這些組織成分和慾望、感覺、呈現毫無 任何共同點(Vološinov, 1927/1987, p. 69)。

承上所述, Vološinov (1927/1987, p. 71) 主張佛洛伊德主義從未也 無法有效地處理身體有機結構的物質組成和過程,而只尋求「心理中的 肉身反應」 (somatic reflections in the psyche)。這是種「肉身心理化」 (psychologization of the somatic;同上引)。在此,潛意識被轉變為一個自以 為牛動多樣的封閉世界,其中所有的慾望都有特定的對應。13 精神分析難挑 機械性的困境,更無法走出意識、潛意識和前意識(preconscious) 14 的無盡 循環短路。

再者, Vološinov (1927/1987) 質疑,當佛洛伊德將語言表述(例如病 人的自我敘事以及他和醫生對話時的陳述)置於其理論的基礎取材時,我們

¹³ 這裡, Vološinov (1927/1987, p. 71) 特別以佛洛伊德的「性感帶 (erogenous zones) 學說」為例, 指陳精神分析在解讀人格特質時的機械性。他說,佛洛伊德宣稱肛門區(anal zone)在孩童性 慾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那會對人一生的特殊傾向有所影響。因此,肛門性慾 (the anal erotic) 用以下的方式發展出節約(frugality)和節儉(parsimony):孩童夾住糞便並延長排便 的時間,目的在獲得最大的性快感;而這一點延續到成年期(肛門性慾已經從屬於壓抑且成為 了潛意識),就轉變為掌握和儲藏像屎(feces)—樣的黃金(錢)。這樣的解釋方式亦被精神分 析大量地運用於夢的解析。對此, Vološinov 直指性感帶學說「毫無談到內在於身體建構的任何 物質基礎,更沒有論及周遭環境所造成的物理性和客觀性的社會效應| (同上引)。這使得「人 格特質型塑的整個過程都座落在主觀心理範疇之內,而這個範疇是一個孤立的整體」(同上引, 百 71-72)。

¹⁴ 值得註記的是,雖然 Vološinov(1927/1987)確實提及佛洛伊德主義於人類心理的區分,可分成 意識、潛意識和前意識這三個區域,但他在實際進行論述時,多半僅從「意識與潛意識互相競 争和衝突的結果」(同上引,頁29)思考權力鬥爭和人類心理的發展。在少數提及「前意識」的 段落中,大致將其界定為從潛意識被帶回的記憶、慾望或感受,但尚未進入並等待進入意識層 或語言的中繼站。據此,本研究在論述時,也傾向暫時不論前意識的角色位置。

能夠認定這些表述就是病患個體心理的闡述嗎?又或者,佛洛伊德主義僅僅 是將外在世界的互動關係「投射進心理的世界」(同上引,頁 78)?

以醫病關係的對話為例,Vološinov(1927/1987)指出一個病人在求診時可能會對醫生隱瞞一些事情,或者主動提出自身對於病因的詮釋,以規避醫生提問的可能威脅。醫生則試圖藉由強調自己的權威性,盡力去迫使病人自白,對自身的疾病和徵狀提供「正確的」觀點。這樣的話語意識交鋒若再搭配著醫病之間的性、年齡、社會地位的差異和差距,則這場對話關係可說是鑲嵌在極端複雜的社會關聯與歷史脈絡中。對此,Vološinov宣稱人類話語行為從內在對話到與他人互動的每一種型態,都「並非來自言者主觀的經驗,而是來自表述所發生的社會情境」(同上引,頁79)和歷史;且更重要的是,「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一樣,都是同一種社會交際的產物和展現」(同上引),其間的衝突,「不是自然力量在衝突著,而是人與人的衝突」(同上引)。而無法關照語言的社會互動性之精神分析視角下的人類心理,只能是單面向的、簡化的對複雜社會現象的主觀斷言。15

此外,Vološinov(1927/1987)質疑當佛洛伊德主義一貫以來不相信意識,對於人基於意識而用來真誠地解釋或評論自己行為的動機採取根本的批判,並主張從潛意識的角度尋找人類內在話語的宣洩出口時,意識與潛意識真有根本的異質性?或者潛意識只是意識的另種表現形式?對此,Vološinov主張精神分析透過自由聯想法所揭露的潛意識的動機,僅僅是病人端的言談回應,它跟所有其他意識的一般性動機一樣。兩者就算有別,也只是內容上的差異,並非本質存在上的不同。這是因為在方法論上,潛意識的內容(也就是各種壓抑的情結)皆被佛洛伊德委任至一個人的過去,也就是早年的孩童時期。但這些早期發展的情結則建立在成人提供的證據之上。這種從早期孩童經驗中重構的回溯法,奠基於成人的回憶,對 Vološinov 而言乃是「從現在的觀點詮釋過去」(同上引,頁 81)的「意識」行為:

任何對我們過去內在經驗的客觀回憶,都是無稽之談。我們看 見的過去,只有對於現在而言重要的部分,只有對我們正在回憶過

¹⁵ 在針對臺灣變性評估的醫生和求診者間的對談研究中,陳美華、蔡靜宜(2013)提出了具體的 觀察足以輔助本研究此處的討論。她們發現,求診者在進入診間之前,必須先預先準備好一個 完整變性念頭的個人生命史,方能取信醫師。這是因為台灣現階段的精神評估只允許求診者為 「原發性變性慾」。被診斷為「續發性變性慾」者,則無法施以後續的荷爾蒙治療。而透過精神 分析找到求診者明確的「病因」以及天生「原發」並自覺與周遭他人「異樣」的變性需求,更 使得台灣變性評估與精神診斷的實務運作全然仰賴醫生自身僵化的、本質論的、真空的判斷, 難以關照不同變性主體的分疏差異與心理、精神、經驗的物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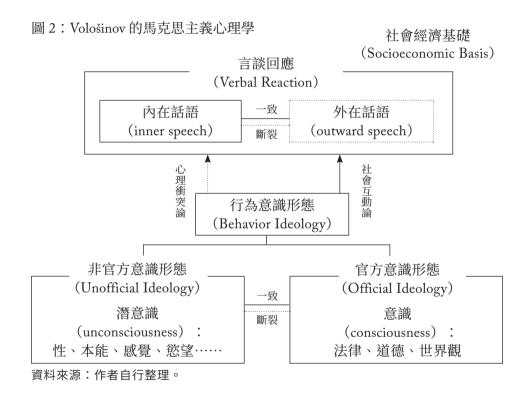
去的這個當下重要的部分。我們從現在當下轉移至幼兒前意識過去 的部分,僅僅是對現在而言具有思想價值的情結。「精神分析所做 的,是把]所有這些在我們意識生活中的價值、觀點、連結,都與 「愛」、「性吸引力」、「母親」等概念加以合併,並且賦予這些概念 其自身擁有的複雜情結……。然後我們將其援用來解釋孩童階段的 事情,並從中建立與成年時期一致的、有意義的事件(Vološinov. 1927/1987, p. 81) o

上述引文相當關鍵。這裡, Vološinov(1927/1987) 所架構的馬克思主 義心理學很清楚地揭示出人類行為中的內在話語和潛意識,在任何情況下都 無法孤立地說明個別主體。易言之,就算真有佛洛伊德所主張的潛意識,那 它也必然要被「轉化為」一個能展現其外在表現的意識,並在其間折射出社 會經濟力量的統管和限度。Vološinov 立基於人類心理的物質論、互動論與意 識論,進而提出了替代性的嶄新用語:行為意識形態。

二、 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

行為意識形態被定義為「瀰漫於我們行爲所有部分的內在話語與外在話 語」(Vološinov, 1927/1987, p. 88)。Vološinov 描述其在某些面向上較官方意 識形熊來得「更爲敏感、更具有回應性、更令人興奮且更爲生動。在其深處, 堆積著那些衝突,一旦達到了某些門檻,最終就會爆發並裂解官方意識形態 系統」(同上引)。同時,行為意識形態關乎社會經濟基礎,這裡與古典馬 克思所述的意識形態上層結構一樣具有物質性。而從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來 看,精神分析所述的潛意識與意識之間的衝突得以被客觀化,並展現在內在 話語與外在話語中。

Vološinov(1927/1987) 進一步主張行為意識形態同時具有官方與非官 方的屬性。與佛洛伊德主義所述的官方的、監看的「意識」相符的行為意識 形態,展現出最穩固、最具主導性的階級意識,並具體體現為「法律、道德 與世界觀」(同上引,頁 89)。在此,內在話語很容易形成秩序且「得以自 由地轉變爲外在話語」(同上引),因為「在任何狀況裡,內在話語並不畏 懼去變成外在話語」(同上引)。相對地,與佛洛伊德主義「潛意識」相符 的行為意識形態,看似證實了支配意識形態的統整性和整體性正在解體,但 Vološinov(或許因為立基於對佛洛伊德主義潛意識和性本能理論的不滿)認為這樣的言談回應「僅僅只是預設了個別個體社會階級處境的蜕變」(同上引),或者頂多只能預示著解體正在開始。在此,Vološinov提出了以下的小結:「在一個健康的社群和一個社會健康的個體中,行為意識形態奠基於社會經濟基礎之上,乃是強大的、牢固的——這裡,在官方意識和非官方意識之間,沒有分歧」(同上引)。



對 Bakhtin 思想有所涉獵的研究者不難發現上述說法確有令人再三思量之處。因為按照 Vološinov(1927/1987)所言,官方意識形態的解構並非不可期待,但其可能性僅被放置於潛意識的層次。而潛意識在巴赫汀學圈的佛洛伊德主義研究中,又被暗示是一個「否定意識」(同上引,頁 12)、「恐懼歷史」(同上引,頁 11)的境地。在那裏,思想體系的核心乃是生物學上的意義和主觀心理學,而非客觀的社會經濟類目。既是如此,我們如何想像人類藉由言談回應、內在話語的心理—衝突性而「持續地與官方意識形態進行鬥爭和衝突」(同上引,頁 90)?或者,Vološinov 此番透過揭示行為意識形

態同時具有官方與非官方的雙重性,除了用以揭示馬克思主義對於人類心理動力的理解相較於佛洛伊德主義來得更為周延,更意圖在字裡行間透露出其對於人類意識的外部化、內在話語的社會性以及言談回應的社會一互動模式之偏好遠高於佛洛伊德主義所論及的性、本能、感覺、慾望?本研究試圖統整 Vološinov 上述所言,將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整體運作繪製為圖 2。

圖 2 參考自圖 1 的灑輯。圖 2 中心為行為意識形態,這是 Vološinov (1927/1987) 論述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對話性的起點。而這樣的對話所 具體展現出的官方與非官方意識形態的鬥爭,在 Vološinov 的思想體系中取 代了佛洛伊德主義所使用的潛意識和意識等用語。圖 2 最外圍乃是社會經濟 基礎,用以彰顯唯物史觀。而官方 vs. 非官方意識形態、內在 vs. 外在話語之 間或一致或斷裂的可能性,則彰顯出馬克思主義心理學所強調的彈性與辯證 性。這樣的彈性辯證因 Vološinov 的確曾交代行為意識形態具有解構官方意 識形態的可能性,且這樣的可能性必得「銹過語言」而被再現或創造,因此 圖 2 右上方的「外在話語」宜以虛線呈現其不穩定性。¹⁶ 虛線的表現方式在 圖 2 更指陳當非官方的潛意識、內在話語與官方的意識、外在話語因無法產 生一致性而出現斷裂時,則外在話語所再現的法律、道德、世界觀恐有鬆動 或裂解之虞。甚至是,當內在話語在言談回應中展現出不可化約的性、本能、 慾望、感覺,則行為意識形態的心理—衝突論本就得以折射出外在話語的偶 然性特質而非必然性。這裡,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的互動實乃一種非常 低度的對話關係,它不以動員某種意識形態鬥爭為務,亦不訴諸在語藝策略 上有所擘劃以發起由下而上的論述行動並改造政治社會,而僅在彰顯確實存 在著無法在社會—互動中被理解和界定的內在話語。

¹⁶ 審查委員之一指出,真正不穩定的是官方意識形態,為何圖 2 右下方並未同樣以虛線呈現?對此,本研究一方面同意在 Bakhtin 不同時期的論述中,皆對官方、主流、既定、應然的價值體系與結構保有某種程度的敵意,因此若主張官方意識形態應具有某種開放性,言之成理;但另一方面,本研究亦有以下兩點主張和澄清。首先,在 Bakhtin 所想像和構築的開放社會中,官方體系的動態性並非本質先驗的客體,而必須「透過(包括身體)語言的運作或中介」方能體現。語言作為再現機制的重要性,及其挹注行為意識形態朝向更為敏銳、回應、活潑的態勢發展,也應被適時標示出來。因此,在行為意識形態所未鬆動的官方意識形態部分(也就是與佛洛伊德所述之與意識相符的區塊),本研究似以實線繪製為妥。再者,Bakhtin 事實上對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於歐洲的成功,是有所不滿的。他認為精神分析過度「去脈絡化」的論點將使得行為意識形態自行其事、七零八落、沒有定型,而生活中的每個面向、事物與對數形態的討論,確實級和社會價值」(Vološinov, 1927/1987, p. 90)。在此,Bakhtin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討論,確實,經報看值」(Vološinov, 1927/1987, p. 90)。在此,Bakhtin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討論,確實,一種極權話語、父親語言的狀態,而是等著被語言、行為意識形態給佔用、挪用甚至是某種程度(無法)轉化的相對的秩序,即圖 2 右上方之「外在話語」。

內在話語於此呈現出難以被整併,亦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符號曖昧性,使其既身處於社會經濟基礎的脈絡,卻又展現為一種將普遍性給個體化(individualizing universality)、將個體從集體身體中破解出來(breaking-out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collective body)的主體位置。內在話語據此絕非顧影自憐的內在性,而是解構性的自我肯認(destructive self-affirmation)。

只是,我們該如何思考這個一致或斷裂的屬性?或者我們可以更進一步 地追問的是:Bakhtin 是否充分地肯定或掌握這樣有別於社會一互動性的語 藝時機?答案可能要有所保留。Vološinov(1927/1987)有以下的說法:

官方與非官方意識的斷裂越廣越深,內在話語的動機就越難以轉化爲(to turn into)外在話語(口頭的、書寫的或印刷的……)並且形成定義、清晰性和嚴謹度。動機在這樣的處境下,就開始衰敗,失去其話語面目,並且逐漸地轉變爲心理、精神中的「異體」(a "foreign body" in the psyche)。整個有機彰顯的部分在這裡,也被排除在語言行爲的領域之外,且成爲了「與社會無關的東西」(asocial)(Vološinov, 1927/1987, p. 89)。

這段文字透露出幾個線索,亦幫助我們繼續說明前述尚未說明的圖 2 的其他部分。首先,Vološinov (1927/1987) 顯然在馬克思主義心理學中,欲透過於其物質論、互動論與意識論建立自身的學術品牌;更重要的是,藉此將佛洛伊德主義貶抑和退化為不具社會性甚至是無關乎語言的思想。雖然Vološinov 又說不見得所有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內在話語的心理—衝突皆會消逝,亦有可能在壓抑的狀態找到「有益的政治背景」(同上引,頁90)。但是內在話語的心理、精神區域「最容易成為社會退卻的基地」(同上引)、「最容易被孤立和轉化為一個空無一物的小字宙」(同上引),確實是Vološinov 不停覆誦的基調。

再者,上述基調若放在陳述言談回應如何在社會經濟基礎中展現社會連結,肯定具有解釋力。這條思考路徑也是巴赫汀學圈後續在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研究發揚光大的前身。在那裏,Bakhtin(1994a)直指表述中的「我一經驗」嚴格來說並不存在,因為「我們一經驗」所揭示的人類話語意識在彼此影響和挪用之際所成就的主體性,才是意義從何而來的所在。

然而,如果我們肯定言談回應的社會—互動論並非唯一思考人類心理發展的管道,也就是說個人心理的外在體現並非「自始自終都是單一的路徑」

(Vološinov, 1927/1987, p. 87),且透過佛洛伊德主義的觀點,我們確實看到某些內在話語在「轉化為」外在話語的對話過程中面臨難以為繼的心理一衝突,而這樣的心理一衝突所體現的性、本能、感覺、慾望並非與社會無涉、與語言脫勾,則我們可以說巴赫汀學圈在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性研究中,確實比較無法或不偏好將關愛眼光投以至「言談回應的立即場域」(the immediate context of utterance)——這是一個社會經濟基礎中,不務求一致性轉化而更看重潛意識、內在話語、非官方意識形態 vs. 意識、外在話語、官方意識形態之間難以化約也無法全然排除的斷裂對話關係。

在此,維繫「我一經驗」在本體論上不同於「我們一經驗」的物質性,並非擁護知識論上的本質主義、生物生理學或主觀心理學,更非一種進入語言之前的歷史先驗性或超驗性,而是嘗試推敲一種並不否定社會結構的存在運作力量,但重點卻從「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轉向「自我與自我的關係」,並探討後者所體現的心理—衝突模式的對話如何凝聚其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語藝處境或困境。圖 2 左半部所示,可以說在巴赫汀學圈的佛洛伊德主義研究時期,並未獲得與右半部同等的耕耘對待。此舉當然導致了後續學者在接收 Bakhtin 思想時,缺乏對於心理—衝突模式的「對話論」之關注。

對此,當代國際巴赫汀研究社群之重量級研究者邁克爾·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1935-2016)指出,Bakhtin 所想像的語言,其運作唯有在「超越自我與自我的範疇」(Holquist, 2002, p. 170)才得以可能。因此當我們被語言「佔據」(invade),或者說我們「進入」(enter)語言時,我們則銘刻於一個高度特殊的經濟、政治和歷史諸力量之中,被給予「適切的名字」(proper name)。雖然一個完整的語言具有「變動性/內容語意面向/言語行動」和「不可變動性/形式面向/語言系統」,亦即穩定性和動態性同時在語言中運作;但是,由於 Bakhtin 相信我們跟周遭環境的關係乃是一種「不完全是巧合的」(not completely coincidental)(同上引,頁 169)一致性,因此言語行動實難擺脫語言系統。人的表述、話語既受到抽象的、規範性的類目(語言系統)給影響,同時又體現一個「特殊的、顯得相對開放的類目」(同上引),即自我。這種狀態基本上仍是結構主義。

Holquist 的批評有些聳動,或許也太過嚴厲。因為如果我們確實肯認巴赫汀學圈在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研究中,對於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結構主義流於抽象客觀所展現的敵意與敵對(Vološinov, 1929/1986),則此番將 Bakhtin 界定為結構主義者,可能並不公

允。但 Bakhtin 因汲汲營營地在意表述與言談回應的內在社會性,確實也明白地指陳個體內在的經驗(experience)並無主導外在話語闡述(expression)的可能性。Bakhtin 甚至在其強調社會一互動性的「對話論」中,主張那些認定內在話語得影響外在話語的歐陸其他學說,乃是訴諸前者的歷史先驗性,而忽視語言的社會約定俗成(王孝勇,2009)。

同樣認為巴赫汀學圈不脫結構主義色彩的另一位批評者 Neal Bruss,有以下較為和緩的說法:

結構主義——Voloshinov,Saussure 與其他人——無法在語言獲致、修辭變化或歷史變遷中陳述衝突與其後果。約定俗成的預設並未伴隨著「解」或「反」約定俗成: [結構主義] 視溝通的混亂失序(communicative chaos)、非對立(not opposition),爲先於社會約定俗成之前的案例。其基本的預設將自身局限於對神話般的社會約定俗成之重述:將語言形式和一種或另一種社會—脈絡的特徵加以連結,無論是純粹的語言學脈絡、使用脈絡,或者是使用者的人口統計學(Bruss, 1987, pp. 135-136)。

Bruss 據此指出,巴赫汀學圈和其所批判的精神分析其實都有機會呈現出所謂的意義多重決定。尤其是精神分析對於徵狀的解讀在臨床上並非如 Vološinov(1927/1987)所指控的定於一尊和機械性,而是有各種可能的意義闡釋。這點與 Bakhtin 所述的言語行動的開放性並無二致。因此,社會性和心理性很可能只是術語上的側重有所不同,而精神分析對於心理一衝突性的推敲使其更擅長重構「衝突中的諸力量以及其中關乎主體意向(intentionality)的心理價值觀」(Bruss, 1987, p. 136),以及「人如何以內在話語或其他形式,認知和陳述衝突」(同上引)。Bruss 認為指出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若無心理一衝突性的勾勒,「對話論」與馬克思主義心理學所欲企及的多重決定論頂多只能有形無實。

Bruss(1987)的主張與 Holquist(2002)的嚴詞相當程度反映著本研究的立場。也正因如此,本研究此番對於巴赫汀學圈佛洛伊德主義的理論回顧,旨在彰顯圖 2 左半部的關鍵位階,及其經常為人忽略所導致的對「對話論」的另解缺乏意識。本研究主張若忽略此一另解,我們對於「對話論」的認識將僅停留在日常語言的一般性、普遍性的層次,而無法關照到主體無法輕易進入對話體系、卻又並非置身於語言世界之外的特殊景況。

延續上述,我們可以說,主體的自我敘述、內在話語並非活在一個孤立的個體意識之中;相反地,它同時具有「對自己」與「對世界」的雙重意向。這使得自白的自我表述力量得到了強化,使其能夠抵抗外在話語的定論、收編或批判。然而,這樣的主張在 Bakhtin 的書寫中尚待具體的例說。Bakhtin 在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性研究中也並未說明主體的認知,或者圖 2 左下方所呈現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所不屑蔑視的人的性、本能、感覺、慾望如何依境而生,成為了主角成就內在話語的媒介素材。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以 Judith Butler(2001)變性敘事研究所提及的一個經典個案,對心理一衝突模式的對話觀進行初步的理論補充、說明和接合。

肆、變性敘事的心理—衝突性(代結語)

Butler(2001)曾針對 1965 年加拿大的一起強制變性案例 "John/Joan Case" 進行研究。John 是假名,指稱一個生下來具有 XY 染色體的「正常」雙胞胎男孩。當他六個月大時,他的陰莖在割包皮手術中因為醫生不熟悉新的機器而被嚴重灼傷。事發一年後的某個傍晚,John 的父母從電視上看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約翰·曼尼(John Money,1921–2006)主張,假如一個小孩在開始社會化之前就接受變性手術,則他(她)未來將得以完美地適應變性後的新的性/別、開心生活。John 的父母透過管道聯繫上 Money教授,在後者的強烈建議下同意摘除孩子的睪丸,並初步重建了陰道,待改名為 Joan 的孩子年紀再大一點,再做全套性別重建。

Butler(2001)指出,Money的「幼兒性別中立論」所述的性別的可鍛造性(the malleability of gender)被之後的現代女性主義運動挪用來指稱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社會文化成規是可以被改變的,據此挑戰性別差異的生理學或解剖學基礎。然而,隨著 Joan 在八到九歲間開始發展出想要購買玩具槍的「慾望」、九到十一歲之間開始「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個女孩(用Vološinov的話說,這即是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產生斷裂),甚至開始在學校站著尿尿被人看到,這些舉措或者是 Joan 對於自我感受到的身、心矛盾所產生的言談回應,於是引來 Money 與其精神醫療團隊更緊密持續的「監看」。Joan 終於在十四歲那年開始接受男性荷爾蒙治療並移除乳房,隔年重建陰莖。這使得不同於性別中立論的另一種理論逐漸浮上檯面,亦即主張「連結至其原本生殖器官,有一個內在真理的必要場域,並不會被後天的社會化

改變撼動」(同上引,頁 625)。這個說法被視為比較接近本質化的性/別觀, 更是後續北美雙性人運動要求父母必須停止對雙性嬰兒作強制性的矯正手術,而應等孩子具備自我意識,依其內在話語的感覺、經驗和慾望自主選擇 是否動手術抑或維持雙性身體狀態的理論依據。

以反本質論和後結構主義享譽國際知識圈的 Butler,在此事件中站在哪個位置? Butler(2001)引述了兩段 John 的自我陳述、內在自省:

一開始有些小事。我開始覺得我的感覺和我被期待的樣子之間有些差距。但我並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我以爲我是怪胎。……我看著我自己,然後我說我不喜歡這樣的服裝打扮,我不喜歡這種玩具。我喜歡跟男孩們玩耍、爬樹,做些女孩們不喜歡做的事情。我看著鏡中自己的肩膀很寬,我是說我看起來一點都不女性化。除了我身形瘦弱,沒有其他的部分像是女生(Diamond & Sigmundson, 1997, pp. 299-300)。

醫生,……說,那會很艱難,你必須要挑選,你將會非常寂寞,除非你做了陰道手術並且以女人身分生活,否則你不會找到任何伴侶。你知道,當時我年紀很小,但我覺得那些人非常淺薄,因爲他們認定在我身上只有唯一一種選擇;也就是人們若得以結婚、有小孩、有具有生產力的人生,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在雙腿之間擁有的東西。……假如他們只是用這種角度看待我,以「雙腿之間的東西」衡量我的價值,那麼我將成爲一個徹底的失敗者(Diamond & Sigmundson, 1997, p. 301)。

兩段引文有以下幾個重點。首先,Butler(2001)肯定主體自我敘述的語言例證在變性敘事中來自主體的「內在真理」。而這種內在真理並非一種先驗存在的本質狀態,而是在性別的可鍛造性被暴力地強加於人的身、心,所回溯性地揭橥「天生自然」亦屬人為誘導的狀態。這裡,無論是性別本質論所述的性意識與身分認同關乎生殖系統,或是建構論與性別中立論所述的自我的性別認知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鍛造,皆無法清晰斷言 John 內在話語的迸生。變性敘事的個案與本研究欲探索的內在話語自我意識從何而來、以及內在話語的物質論,互相呼應。

亦即,內在話語透過內省和自白的方式陳述其所認知的真理,由此決定

了自己的樣貌。而內在話語的醞釀、外顯與再現更直指「性『始終是性別』」(sex is "gender all long")(Butler, 1990, p. 8)的主張明顯無法關照到那些(被迫)經歷生理性與社會性別之間創傷性分裂的變性者(Prosser, 1997)。因為對 John 而言,性的本能、感覺、慾望來自於醫病互動中對醫療論述及其背後所鞏固的社會經濟基礎感到懷疑,據此逐漸凝聚為某些身體內部歸屬的認知,此即「內在身體的感覺」(趙庭輝,2019,頁 30)或者 Bakhtin 所述之內在話語。內在話語在此一方面體現了變性者的性總是真實的、物質的、血肉之驅的心理一衝突而非唯意志論的個體自我意識和內在真理,另一方面縱使可能面臨與外在話語、「我們一經驗」之間的矛盾斷裂而受限,卻可能是充滿語藝動能的「我一經驗」主體性迸生之對話互動場域。本研究以實線而非虛線繪製圖 2 左上方的內在話語輪廓,至此得到了合理性。

再者,Butler 指出透過自我陳述,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自己想要被別人理解的部分」以及「外在世界早已充斥著規範」之間的隔閡難以化解。John的宣稱在最基本的程度上告訴我們他理解「就在那裏」有一個規範,即女性特質(femininity)。那個規範卻是他被期待要成為的樣子。但 John 對於那種強迫監看感到遙遠陌生與敵意排斥。這裡,規範或者 Vološinov(1929/1987)所說的社會經濟基礎和外在話語除了並非在理想的層次上被發現,亦有可能在規範欲傳遞的偏差和怪異上被看見(亦即內在話語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立即溝通情境)。因此當 John 宣稱自己不喜歡這身服裝打扮、不喜歡這種玩具時,他的內在話語與自我意識更切身地展現出外在世界觀、道德、法律的邏輯,以及這套邏輯本身乃係偶然性所以逼人照單全收的性/別暴力事實。這裡,變性敘事示現著跨性別主體冒著「本質化的風險」(the risk of essentialism)(Prosser, 1998, p. 17; Sedgwick & Frank, 1995, p. 513)所產製的行為意識形態,並非內在話語意識的本質化,而是脈絡化地折射出大寫文化再現和法律的欲蓋彌彰。

最後,Butler 指出雖然 John 最後重新獲得了男性身分進行陰莖重建,但「他早已經不是跟他現在的男性身體一樣的東西」(Butler, 2001, p. 633)。因為不同於主流的性/別二分法用生殖器官界定人的性身分,John 明白拒絕人們用「雙腿之間的東西」衡量他的價值。Butler 認為 John 此處的宣言並非關乎重建後的陰莖是否具有性快感或性功能這個生理學的討論,而是 John 早已經建立了一種不是把「我」與解剖學上的性/別規範畫上等號的存在價值,更是對「區分本身的絕對論」(同上引,頁 634)保持敵意。也就是說,單

靠有陰莖這件事情無法建構 John 的存在完整性,因為在「他現在是誰 (who he is) 和他擁有什麼 (what he has) 之間存在著不可共量性」(同上引)。

我們可以說,第二次變性手術的陰莖重建並未把 John 變成了妥協於性 / 別規範之人。因為陰莖重建使得 John 得以在象徵與物質層面擺脫被他人 決定的性 / 別處境與困境而重新獲得生理性的自決,他仍是那個具有言談回應、堅持和自我意識的跨性別主體,而並非被「我們一經驗」滲透浸潤的存在狀態。 John 的肉身存在所揭橥的內在話語本身難以「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衝突狀態,更可被視為跨性別行動主義(transactivism)對當代身分認同進行政治干預的行動模式。 ¹⁷ 變性敘事在此基礎上,得擴展並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對於內在話語及其心理一衝突對話性的勾勒,進一步對此提供兼具物質性、互動性與意識層面的例說。

對此 Butler 主張, John 的變性敘事匯聚為他透過話語,對諸多外在規範和可理解性本身(intelligibility itself)的批判觀點。John 基於內在意識而拒絕進入某種可理解性的範疇以便說話和被認知。他的存在現身是一種對環繞在其周遭的質問詞彙有意識地反轉:

John 並沒有佔據一個嶄新的世界,因為他甚至仍然在他所帶來的「我」的語法之中,仍然被定位在規範與其失效之間的某處。最終,他是一個以匿名身分存在的人類,因爲我們迄今尚不知道如何命名或者對於所有命名劃定界線。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匿名的——

¹⁷ 這裡可以提出的思考是:John 透過陰莖重建而重新獲得男性身分,為何可以算是主體性與不妥 協?沒有陰莖的男性不是更具有顛覆性嗎?這也是其中一位匿名評審的提問。事實上,在跨性 别社群內部,對於性別重建手術究竟是種抵抗,或其實是對性別秩序和性/別二元論的鞏固, 持續存在著辯論。晚近更有「後變性論」(posttranssexuality)的觀點,主張跨性別者不應該以變 性後回歸一般生活的「矇混過關」(passing)為務;相反地,被刻意辨識出主體的變性史或主動 選擇以變性者的身分出櫃、說話,方能瓦解傳統約定俗成的性/別論述(Feinberg, 2004/陳婷 譯,2006;Bolin, 1993;Stone, 1992)。對此,本研究有以下兩點想法。首先,在臨床上確實曾 發現部分的女變男變性者,在移除原先的女性生殖器官後,更傾向進行「非必要的」陰莖重建 (「非必要」是指重建後的人工陰莖並沒有辦法真正像原生生理男的陰莖具有充血勃起、高潮射 精等功能)。這主要是受限於父權文化所設定的男子氣概想像,認定「有陰莖」的人才能稱作男 性(王孝勇,2020)。我們亦可說這樣的心態比較貼近「我們一經驗」的性/別結構化。然而, 有越來越多的女變男因為擔心感染、拒絕自殘(Rees, 1996), 甚至是相當具有自我意識地質疑 「爲何性交必然涉及一根陰莖和一管陰道」(Califia, 1997, p. 5), 而在變性過程的某一個時間點上 拒絕陰莖成形術。所以,用是否動手術接受性別重建或是否做了全套變性來論斷變性者的主體 性,可能需要更考量到每一個主體依境而生的選擇與判斷。再者,本研究同意在身體改造上維 持一種無法置入性/別二分法的曖昧狀態確實具有相當的衝擊性。但擁有某種歸屬感、以自己 認定的自我和身體形貌被看見,也不能馬上被等同於性/別政治的失守(Prosser, 1997)。更何 況本研究所討論的個案 John,他的陰莖重建確實是一種性/別身體的自決與主導。在此,跨性 別主體的超越(beyond)或跨越(transing)如何可能?又意味著什麼?尚需要更多的理論和經 驗研究。

以及批判性的——人類存在條件,因爲人類存在條件僅在我們認爲 我們已知的界線內,提供自我陳述 (Butler, 2001, p. 635)。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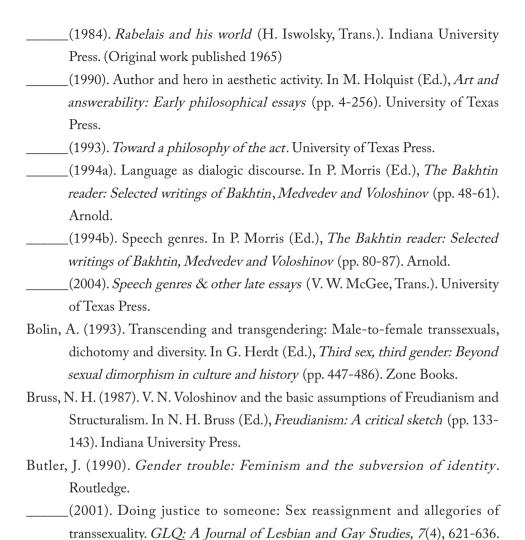
從上述變性敘事研究的討論回看巴赫汀學圈的佛洛伊德研究,我們可以說,1920年代的 Bakhtin 對於內在話語以及主體內在自我的思想、感覺、感官、嗜好、慾望的討論,傾向拒斥一種極端內在性的潛意識和意識的運作。這是因為他相信個體意識的內在化縱使以其自身的方式展現出差異,仍得與外在話語維繫一種極大化的親切稠密互動(McCaw,2014,2016)。然而,無論從 Bakhtin(1965/1984)晚期狂歡節研究中所描繪的飢餓之人可以盡情吃喝、朋友可以在毫無惡意的慾望中產生交際、權威得以被去冕,乃至於最重要的是身體內在的話語意識得以被慶賀……,或者是 Bakhtin(1963/1984,1993,2004)一貫地對個體在普遍化、外在化過程中不得喪失符號暧昧多義性的堅持,他對於言談回應、行為意識形態應具備的內在不可預測性和難以抑制性的暗示,足見「轉化為」某種「檯面上的觀點」(Bakhtin,1990,p.71)亦非「對話論」的唯一要旨。

現今國際巴赫汀研究社群之另一位重量級研究者 Caryl Emeson(2015, p. 190)說,1920 年代的 Bakhtin「尚未正式形成其『對話論』」。本研究會說,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似已開展出某種後續在「對話論」的全球擴散和接收中,雖較不被人重視或正視,卻更直接地關切主體內在的不可化約性之價值觀與世界觀。甚至,透過主體內在話語、感覺、慾望、動機在持續存在之際所展現出的與外在話語間的異質性和斷裂,以及內在話語難以「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語藝處境或困境,反而有機地建構出外在話語、官方意識形態本身的難以為繼。這樣的難以為繼並非文化轉型或政治權威未穩階段所釋出的官方虛假善意,而是奠基於社會經濟基礎的法律、道德與世界觀本就無法整全(not-whole)的事實,以及內在話語在心理一衝突的對話回應中所折射出的生活表現。

¹⁸ 值得說明的是,雖然從接受變性手術這個點上,本研究在正文的書寫中暫時傾向將 John 界定為變性者或跨性別。但 John 從被迫變性、重新選擇二度手術「變回來」,到他在變性敘事中明確交代自己對於性/別二分法的置疑,這個跨出去的整體語藝歷程與當代慣用的無論是變性或跨性別的概念,似有部分本質上的差異。 John 難以被名狀的性/別位置和困境,與本研究所詮釋的難以「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語藝處境,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參考文獻

- 王孝勇 (2009)。〈掙脫語言的枷鎖?從 Mikhail Bakhtin 論「表述」談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0:203-244。http://doi.org/10.6523/1684515320 09090030005
- ____ (2012)。〈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主義及其對批判論述分析的再延伸: 以白玫瑰運動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149-202。http://doi.org/10.6523/168451532012030040004
 - ___(2013)。〈從對話到對立的民主化實踐——Mikhail Bakhtin 對話主義 的理論轉折與政治方案之初探〉,《台灣民主季刊》,10(3):1-39。
 - ____(2014)。〈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從 Mikhail Bakhtin 的語藝觀談起〉, 《中華傳播學刊》,26:137-173。http://doi.org/10.6195/cjcr.2014.26.05
- ____(2019)。〈對話之外:從巴赫汀晚年「外部性」的觀點新義看理解的(不)可能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70:57-108。http://doi.
 - org/10.6523/SOCIETAS.201909_(70).002
- _____(2020)。〈「謝尖順事件」之媒體語藝框架分析:「跨性別國家主義」 的觀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7:47-111。
- 陳美華、蔡靜宜(2013)。〈說些醫生想聽的話——變性評估的性/別政治〉, 《台灣人權學刊》,2(2):3-39。
- 陳婷譯(2006)。《藍調石牆T》。商周。(原書 Feinberg, L. [2004]. *Stone butch blues*. Firebrand Books.)
- 趙庭輝(2019)。〈變性者電影的誕生:《男變女》變性敘事的文本分析〉,《藝術學報》,105:27-46。
- 劉 康(199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麥田。
- 劉毓秀(2000)。〈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探測陽具的版圖〉,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頁 159-200。女書文化。
- Bakhtin, M. M.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merson,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http://doi.org/10.5749/j.ctt22727z1



Califia, P. (1997). Sex changes: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Cleis Press.

https://doi.org/10.1215/10642684-7-4-621

- Capizzo, L. (2018). Reimagining dialogue in public relations: Bakhtin and open dialogue in the public spher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44*(4), 523-532.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18.07.007
- Clark, K., & Holquist, M. (1984). Mikhail Bakht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ado, S., & Besoain, C. (2020). Becoming in resistance: The (un)creative relation between non-heterosexu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50275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502755

- Dey, S. (2015). Re-contextualizing Mikhail Bakhtin's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Re-presentation of monological/dialogical conflicts in stud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n India*, 15(4), 203-210.
- Diamond, M., & Sigmundson, H. K. (1997). Sex reassignment at birth: A long term review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51, 298-304. http://doi.org/10.1001/archpedi.1997.02170470096022
- Emerson, C. (2015). Bakhtin and the actor (with constant reference to Shakespeare).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67(3), 183-207. http://doi.org/10.1007/s11212-015-9238-1
- Farsi, R. (2015). Biotext: Deleuze and Bakhtin. Language in India, 15(3), 66-84.
- Freud, S., & Breuer, J. (1895). Studies on hysteria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n Sigmund Freud, vol. 2. The Hogarth Press.
- Guillemette, D. (2017).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Towards a nonviolent mathematics educatio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96(3), 349-365. http://doi.org/10.1007/s10649-017-9774-3
- Hinchion, C., & Hall, K. (2016). The uncertainty and fragility of learning to teach: A Britzmanian lens on a student teacher story.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46(4), 417-433. http://doi.org/10.1080/0305764X.2015.1064095
- Holquist, M. (2002).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2nd ed.). Routledge.
- Kristeva, J.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marche, J. B. (2017). The elusive transpositions: A situational, dia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sychoanalysis. *Language & Dialogue*, 7(3), 432-451. https://doi.org/10.1075/ld.7.3.06lam
- Macaskie, J. (2016). A railway junction, two saints and a queen: Time and space in stories of psycho-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44(3), 325-334. https://doi.org/10.1080/03069885.2016.11693 65
- McCaw, D. (2014). Paradoxes of acting: Bakhtin and Stanislavsky. New Theatre

- Quarterly, 30(1), 29-39. https://doi.org/10.1017/S0266464X14000050
 _____(2016). Bakhtin and theatre: Dialogues with Stanislavsky, Meyerhold and Grotowski. Routledge.
- Milthorpe, N. (2015). "Heavy jokes": Festive unpleasure in the interwar novel.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38(3), 71-85. https://doi.org/10.2979/jmodelite.38.3.71
- Morson, G., & Emerson, C. (1990). *Mikhail Bakhtin: Creation of a prosa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ller, F. (2016). The dialogical self in psychoanalysis.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85(4), 929-961. https://doi.org/10.1002/psaq.12111
- Prosser, J. (1997). Transgender. In A. Medhurst & S. R. Munt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309-326). Cassell.
- _____(1998). Second skin: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6). Judith Butler: Queer feminism, transgender, and the transubstantiation of sex. In S. Stryker & S.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pp. 257-280). Routledge.
- Rees, M. (1996). Dear sir or madam: The autobiography of a female-to-male transsexual. Cassell.
- Reinsmith-Jones, K. (2013). Transsexualism as a model of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LGBT Family Studies*, *9*, 65-99. https://doi.org/10. 1080/1550428X.2013.748509
- Schwarz-Franco, O. (2018). Polyphonic teaching: The ability to facilitate multiple voices as a crucial teaching skill. *Educational Studies*, *54*(4), 429-447. https://doi.org/10.1080/00131946.2018.1474112
- Sedgwick, E. K., & Frank, A. (1995). Shame in the cybernetic fold: Reading Silvan Tomkins. *Critical Inquiry*, 21(2), 496-522. https://doi.org10.1086/448761
- Stone, S. (1992).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Camera Obscura: Feminism, Culture, and Media Studies, 10*(2), 150-176. https://doi.org/10.1215/02705346-10-2_29-150
- Suárez, J. A. (2015). The Kuchars, the 1960s and queer materiality. *Screen*, 56(1), 25-45. https://doi.org/10.1093/screen/hjv003

- Sućeska, A. (2018). A Gramscian reading of language in Bakhtin and Voloshinov. *Language Sciences*, 70, 179-192. https://doi.org/10.1016/j.langsci.2018.08.005
- Titunik, I. R. (1987).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N. H. Bruss (Ed.), *Freudianism:*A critical sketch (pp. xv-xxv).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rtsch, J. V. (1987). Foreword. In N. H. Bruss (Ed.),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pp. vii-xiv).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Vitanova, G. (2013). Dialogu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Language & Dialogue*, *3*(3), 388-402. https://doi.org/10.1075/ld.3.3.03vit
- Vološinov, V. N. (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______(1987).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I. R. Titunik, 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Xu, K. (2013). Theorizing differen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dialogic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0(3), 379-397. https:// doi.org/10.1080/03637751.2013.788250
- Yanchuk, V. A. (2018).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sociocultural-interdeterminist dialogical metatheory of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Russian &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55(2/3), 241-286. https://doi.org/10.1080/10610405.2018.1529531
- Zou, S. (2018). From inarticulacy to care: Exploring dialogical approaches to journalistic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Journalism Practice*, 12(4), 382-399.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6.2017.1299585

本文引用格式

- 王孝勇(2022)。〈從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論「對話論」另解: 以變性敘事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2(2):177-210。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7
- Wang, H. Y. (2022). Reviving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dialogue" from the Bakhtin Circle's critique of Freudianism: The case of transsexual narrativ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177-210.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7 [Text in Chinese]

Reviving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Dialogue" from the Bakhtin Circle's Critique of Freudianism: The Case of Transsexual Narratives

WANG, Hsiao-Yu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viv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orize "dialogue" from the Bakhtin Circle's critique of Freudianism and elaborates that how the psychicconflictual model of dialogue can be employed to analyze transsexual narratives. The study begins 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view and critical reading on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by Vološinov. Although Bakhtin criticized Freudianism as having the tendencies of "distrust of consciousness" and "fear of history"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theory of dialogue, Bakhtin's theories, paradoxically, cannot escape from the trap of deterministic structuralism. In light of this, the study argues that Bakhtin's idea of "behavior ideology" is useful in re-examining the emphasis on the inner speech and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subject. Here, the ontological materiality that makes the "I-experience" different from the "We-experience" is never an endorsement of essentialism. It is a shift from "the dialogue of self and other" to "the intrapersonal dialogue." The study shows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or predicament of how the inner speech of subject cannot successfully "turn into" outward speech and elaborates on how in the case of transsexual narratives this will be re-problematiz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psychic-conflictual model.

Keywords: psychic-conflictual model, Bakhtin, Freudianism, dialogue, transsexual narratives

* E-mail: hywang2@pu.edu.tw

Received: 2021.06.15; Accepted: 2021.09.07







一起同學當媽媽: 婦幼社群閱聽人之醫用協商與共能知識

平雨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

摘要

過往在婦幼傳播裡,醫療專家論述往往指導其中,建構母職典範;今日,隨著社會變遷與知識普及,母職實踐已多所變化,社群媒體與平台更讓這種情況蓬勃開展,但也帶來風險與挑戰。本文以兩個婦幼官網討論區資料進行文本分析,提煉共能知識(co-empowermental knowledge)。研究發現有三:(一)在閱聽人研究上,媽媽閱聽人以社群網路共構的母體知識,實踐主體意識共同覺醒,以及科學知識相互賦能等多重意義;(二)在媒體傳播演變裡,她們的知識來源與主體性再轉移,從口耳相傳到媒體中介,反映出臺灣母職非正式支持系統的演變;(三)在醫用關係中,新世紀女性可以在更自由的環境中使用知識、參與消費、實踐自我,然而也需要新時代的各類專家協助,共能知識將開展新一波的「醫」用協商。

關鍵字:母職、共能知識、社群媒體、閱聽人、醫用關係

* E-mail: deersnow1008@gmail.com

投稿日期: 2021年10月05日;接受日期: 2022年06月19日







壹、前言

若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所說,「女人不是 天生的,而是成為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De Beauvoir, 2011, p. 293),那麼,母親亦是「成為的」。如何成為媽媽?便是本 文起點。在一篇討論英國媒體與母職關係文章中,學者指出,縱然現今家 庭模式有所轉變,性行為與生育子女不再是婚姻的必然連結,但媒體卻可能 更嚴格審視女性的生育選擇模式,或檢視母親是否合乎「適齡生育」身分 (Hadfield et al., 2007)。如此一來,今日的母職實踐其實和媒體傳播與專家 論述極為密切,傳播學者陳婷玉(2010)分析臺灣《嬰兒與母親》雜誌時, 便發現雜誌充斥著以孩子為主體的言語,而模糊的母親形象,則是由懷孕須 知、營養攝取、身材管理、育養照料等醫療科學專家論述拼湊、建構出來。 各式「媽媽應該如何」的母職想像,彷彿唯有遵循專家論述做出「正確」生 育規劃,才能成為「好」媽媽。

然而,社會學者成令方(2002)提出之「醫用關係」,提醒我們醫療專 家與求診民眾互動的複雜圖像,包括醫療使用者憑藉個人經驗提出問題,得 以在求診互動時與醫生進行協商,而這種主動詮釋也開拓了一種社會文化展 演的過程。正如傅柯(Foucault,1926-1984)認為話語可以建構主體,因為 論述即是一種型塑或管控主體認同及情感意義的權力,所以論述能夠使人在 社會位置上展現主體;但同時,傅柯也指出主流話語或權力亦可能被挑戰或 抵抗(Weedon, 1987),可見論述權力不僅能建構主體,主體也有以論述建 構權力可能性。換言之,醫療專家論述往往去除母親扮演主體的摸索體認, 但母親亦可能藉由論述重拾主體詮釋與權力。特別是在網路脈絡下,過往媽 媽閱聽人多單一接收專家訊息,現今閱聽人則透過社群媒體網絡接觸訊息, 閱聽人的知識與經驗如何參與論述,以及藉由媒體管道重塑主體論說權力, 將會是當代探討媒體與社會關係的切入點。像 Paulussen & Ugille (2008) 探 究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之間,發現新聞工作者雖以專業角度,質疑或看待閱 聽人網路發文或留言,卻也注意相關反應以作為報導方向之一,而閱聽人分 享經驗或表達言論,也可能對主流媒體論述構成挑戰。在婦幼社群媒體場域 裡,媽媽們作為閱聽人,或許參與醫療專家論述過程,亦將發展主流論述所 忽略的常民知識系統,藉此向既有醫用知識協商母職主體,進而改變醫用形 式。因為她們既是資訊的接收/使用者,也是參與意義建構的行動者(Brun, 2008) 。

是以,雖然過往在技術專家主義下,身為母親的女性知識可能被抑制 (陳婷玉,2010),但近來社群媒體逐漸成為閱聽人互動管道(江義平等人, 2019),大眾知識經驗在社群媒體的重要性已有所轉變。因此,本文不否認 專家論述仍握有主流權力,但認為閱聽人亦有能動性。那麼,媽媽們如何在 社群媒體網絡中參與、看待、回應醫療專家論述,甚或以自身經驗製造知識? 而這樣的閱聽人知識有何特點,如何可能從醫療專家論述中另拓詮釋空間, 從中實踐或彰顯媽媽閱聽人身分特殊性?對此,本文在臺灣《嬰兒與母親》、 《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以下簡稱寶貝家庭)兩個婦幼網站討論區蒐 集資料,並以文本分析為取徑,探討在婦幼雜誌社群媒體場域裡,身為母親、 閱聽人、醫療使用者,女性網路使用者的集體言說經驗:(1)以母親為主 所共構的知識有何特點?(2)又如何詮釋或應對醫療科學為中心的專家論 述?(3)可能體現哪些母職樣貌與醫用策略的不/轉變?

貳、文獻回顧

一、從醫病關係到醫用關係

醫療專家與求醫者之間該如何互動才合宜?相關討論由來已久,在 1950 年代的美國,Szasz & Hollender(1956)即指出醫病關係(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中的醫療專家以醫師(physician)角色為核心,並可分為三個關係模型:(一)主動者與被動者模型(acti Weedon e-passive model),是傳統醫病關係,醫師以專業權威治療患者,患者往往被客體化,其意識與對話慾望被去除。(二)指導合作模式(guidance-cooperation model),醫師因具備醫學知識,其論述權威性能決定患者治療利益取向,並要求患者配合與遵守相關醫囑。(三)相互參與模式(mutual participation model),此模式為醫師與患者為夥伴關係,患者被視為參與過程的主體,醫師則以專業知識引導患者治療目標,雙方擁有溝通協商對等權力,但仍以醫師為關係主導。從上述三項醫病關係模型演變,可見患者從被動式客體,逐漸轉化成參與醫療行為主體,建立較為對等互動關係。

在臺灣,醫病權力關係中的問題,則是更晚近才受到關注和反省。成令方(2002)從臺灣脈絡出發,主張「醫病關係」應更名為「醫用關係」

(professional-users relationship)。如此突破有三。首先,是定義的開展。「醫用關係」中的醫療專家,不專指醫師,而是泛指醫療團隊成員或是凡具醫療科學專業人員;醫療使用者不專指病患,亦可用來指尋求醫療知識的一般民眾。其次,是醫療使用者具再詮釋醫療知識的能動性如:

在診療情境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加上醫療者和使用者都是「多重認同的主體」,他們之間的互動具有多樣知識的交流和微觀權力運作的關係……至於權力的運用,不是完全如我們預設的來自單方面醫療專業者,醫療使用者也會採取策略進行協商、挑戰甚至乾脆出走(成令方,2002,頁11)。

接著,在這種演進過程,成令方(2002)認為「反思的專業者一賦能¹的使用者」(reflexive professional-empowered user)乃是醫用關係的理想。也就是說,要達成這個理想,醫用雙方都須認知彼此是「多重認同的主體」(subjects with multiple identities),意識到雙方除認同普同化的生醫知識之外,互動過程也正受到社會文化影響。

這和近年西方學界遙相呼應,即是醫療知識或互動所產生的社會作用,不僅在於科學理論的傳遞,也承載著理解、關懷或溝通的任務。例如 Dang et al. (2017) 訪談 21 位感染愛滋病毒 (HIV) 患者,發現社會文化建構的污名影響,以及接收醫療專家艱澀難懂的專業知識,皆會加深患者求醫過程的徬徨;但若醫療專家貼近他們社會處境給予關懷,患者焦慮心境則能獲得緩解。疾病的社會意涵影響患者求醫處境,因此,若要讓患者在接收與使用醫療知識感到滿意,醫療知識傳達過程,則須具備專業工具性質(instrumental),也需具關懷與同理的情感性質(affective interaction) (Wu et al., 2018),若雙方提供立場達成相互性知識(mutual knowledge),有助於在容易涉及脆弱與信任問題的醫療資訊交流過程,奠定良好醫療溝通的基石(Chipidza et al., 2015; Ridd et al., 2009),但也可能成為挑戰彼此的角力。而雖然,西方相關研究亦有指稱患者為「使用者」(user),卻未如成令方(2002)將之具體定義為醫療使用關係;但事實上,這和「醫用關係」概念不謀而合,包括揭示社會文化對患者身分的連帶影響,接收和使用醫療知識行為當中,如何體現患者主體處境,及患者意識自身立場。

綜整上述,本文將醫療關係與醫用關係進行界定,並以醫用關係概念進

¹ Empower,成令方(2002)原譯為充權。本文為求譯文統一,均改為「賦能」。

行後續討論: (一)醫病關係:從醫療專家(醫師)握有知識權力的主體, 患者為被動與無知的客體,如此以主/客體二分關係,逐漸轉化為患者能參 與醫囑模式,但仍多以醫師為關係主導軸心。(二)醫用關係:強調社會結 構或場域文化,如何可能影響醫療知識交換,以及醫療關係建立過程,這過 程也讓「醫療專家」與「使用醫療民眾」兩者知識與權力產生複雜互動圖像。 其和醫病關係的相互參與模式不同處,在於不僅讓醫療使用者能參與醫囑, 更關注醫療使用者在接收、使用醫療知識時,產生何種應對策略樣貌,及背 後社會文化影響為何。

整體而言,只講求科學理論的知識,或是單以醫療專家引導的模式,在當代醫療互動已不足夠,因為傳遞與接收知識的「交換過程」(how),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知識的「內容」(what)。而若醫療服務與使用是當今重要課題,那麼社群媒體的特殊性,正是提供了新一波醫用關係再協商的場域。

二、社群媒體中的醫用知識接收與使用

「社群媒體」服務功能繽紛多元,但共同關鍵特徵,即是游梓翔(2018)所定義之「社群性」,指社群媒體具備共同建立關係(networking)與內容共同分享(content sharing)特性。在當代,人們開啟網路取用大量相關醫療訊息,藉以社群媒體共享醫療知識或經驗,已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實踐(Barreto & Whitehair, 2017; Harbishettar et al., 2019)。社群媒體提供醫療專家與閱聽人,能彼此在共同空間進行瀏覽或表述知識(Leppänen et al., 2017),也集結有相似問題閱聽人,讓他們共同接收、使用與互相補充醫療知識,並從中賦能產生自信(Benetoli et al., 2018)。這麼看來,社群媒體還有一特點,即是提供作為醫療使用者的閱聽人,能以自身立場詮釋並參與知識,如此過程,亦具有再調和醫療服務與使用的功能。就如同 Hermida & Thruman(2008)所指出:閱聽人的線上參與或詮釋論述,可能使媒體和專家共同建構的主流論述去菁英化。由此可見,社群媒體共同建立、共同分享內容的特性(游梓翔,2018),使醫療專家和醫療使用者沒有面對面「實體互動」,亦能透過社群媒體的網站、文章、影音等文本,進行更對等的醫療知識交換或分享。

雖然,社群媒體帶來更平等的醫用知識接收與交換,但也不能忽視其中的風險。由於社群媒體具有能夠快速、大量傳播知識特性,所以不準確、甚至錯誤的醫療知識也容易流傳(Duymuş et al., 2017)。這或許正呼應 Hardey

(1999) 所指出,社群媒體和醫療知識合作是一種雙面刃,一旦不可靠的知識在社群媒體管道流傳,並碰上醫療使用者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自主性(autonomy),反而也可能導致使用者質疑醫療專家知識,進而引發醫用關係衝突,或誤用醫療知識。也因此,面對假消息充斥,身為醫療使用者的閱聽人,勢必將做更多功課,辨別醫療訊息真偽——這無形中會提升他們的醫療知識,也連帶強化其在社群媒體上的話語權(Rohrich, 2017)。另一方面,也可能如 Asayesh & Sadeghzadeh(2020)所指出,醫療專家的重要性和權威會更加突顯,而人們也將更傾向信任具醫療科學光環的專家論述,進而使專家論述建構病理化過程更具正當性。

然而,若從既有研究進一步思考,社群媒體裡醫用關係的雙面刃,或許也暗藏新生機。如醫用知識的衝突,或許亦體現閱聽人的能動策略;醫療科學光環的專家論述,也可能和閱聽人共構光譜;醫療知識的誤用,暗示了新世代的協助需求。而過往較少研究同時討論社群媒體裡的醫用知識張力,本文即開展此面向之對話。但若從過往研究亦能窺見醫、用、社群媒體三方相互作用,使得醫用之間知識權力的相對位置,反覆拉扯和流動。那麼,基於社群媒體特性,當媽媽閱聽人面對媒體與醫療專家形構的母體/職樣貌,亦可能呈現接收與使用醫療知識後,再詮釋醫療知識的同建同享,或是呈現「同學」當媽媽之樣貌。

三、 母職的變或不變:從傳統媒體到社群媒體

女性從身為母親那一刻起,背負孩子的日常起居、飲食,提供心理支持和生涯規劃等任務,母職實踐需投注大量心力密集勞動(Brenton, 2017; Chodorow, 1978; Guerrina, 2001; Hays, 1996; Plaza, 1982),連帶影響女性的身心健康與全人發展,故「性別配置與日常勞動如何影響女性位置」,成為母職研究中方興未艾的經典議題。尤其在臺灣社會脈絡裡,「為人妻」與「為人母」是女性角色扮演分水嶺(潘淑滿,2005),母職對女性的自我實踐與型塑,有其重要性。母職是女性難以擺脫的社會角色,而女性在執行母職過程中,又易感受異化、自我被排除,成為邊緣的客體,導致焦慮卻無法言喻(潘淑滿,2005;Miller, 2020)。根據傅柯的觀點,論述是排除「異」(other)領域的事物,使人的潛意識及慾望受抑制,在固有論述系統中無法獲得解放。因此論述與權力之所以關係緊密,即在於論述具有排他性,以威嚇論述體系

裡踰越或違規者(黃道琳,1986; Foucault, 1979)。

事實上,歷來已有多項研究觀察到,傳統媒體中的專家論述往往壓抑女性和去除母親的主體性。例如 Kaplan(2013)指出文學、戲劇、甚或媽媽手冊裡的敘述,往往再製或切割母職形貌,把母親刻板化為不是「天使」(angel)就是「巫婆」(witch)。而本土研究如陳婷玉(2010),在剖析婦幼雜誌《嬰兒與母親》裡專家論述母職時,發現這套論述系統源於醫療科學準則、消費意識及母體身材管理等論述建構,不斷將母職浪漫化、美化,卻又簡化與淡化母親所承受之壓力與苦痛。據此結論,《嬰兒與母親》裡的醫療專家論述,宰制並擠壓著母親的主體性。

陳婷玉(2010)批判醫療專家論述霸權,並非空穴來風。從早先吳嘉苓(2000)田野資料亦可見,醫院視產婦身體與生產為患病狀態,包括在言語上稱產婦為「病人」,或如剃毛、灌腸、吊點滴、裝置胎兒監視器皆等醫療措施行為,使產婦猶如有疾患。而官晨怡(2013)也提點,其實醫師們也不斷面臨科技的極限與不確定性;雖然不可否認科技確實拯救許多婦女或胎兒,但現階段醫療體系仍須注意過度依賴科技。陳婷玉(2010)的貢獻,在於分析這些醫療行為與論述霸權如何透過傳統媒體來展示擴張。

那麼,當社群媒體逐漸取代傳統媒體成為主流,母職又如何可能變或不變?Rome (2020) 研究社群媒體與母職關係,觀察到 Facebook或 Instagram 作為女性用來證明執行「好」母職("good" motherhood)媒介,例如媽媽貼出自煮兒童餐照片,呈現自己和料理看起來既優異(good)又充滿幸福(happy)形象。從中可見,當代社群媒體興盛,女性仍可能禁錮於舊有傳統媒體打造的理想母職,如 Kaplan (2013) 所謂的「天使」包袱當中。然而,當閱聽人透過無所不在的社群媒體維繫人際關係(游梓翔,2018),也有助於她們再詮釋或實踐群體身分認同,因此注意閱聽人所聚集的社群媒體場域為何,亦為關鍵。如同 Utomo (2016) 研究在印尼中產階級女性,會在以手工製品為主的社群媒體場域中,藉由線上消費來和非都會/中產女性做品味區隔,重新詮釋、再製或實踐中產階級身分。而當媽媽閱聽人聚集在以醫療論述為大宗的婦幼社群媒體,並能共同實作「母親」角色脈絡下,亦有研究提出較為正向看法,主張社群媒體可賦能身為母親的醫療使用者,進而強化其主體性。

國外已有數項研究發現社群媒體如論壇、社團、Instagram等社群媒體 平台,成為媽媽們彼此尋求解答、製造訊息、實踐母職認同的重要支持空 間;女性閱聽人在社群媒體所發展之親密情感,更協助她們適應母親角色的各種過渡期,並從中獲得慰藉(Lupton, 2016; Mackenzie & Zhao, 2021; Newhouse & Blandford, 2016; Orton-Johnson, 2017)。特別是 Lupton(2016)指出,社群媒體提供的資訊既具即時性,又可反覆深入閱讀,這兩項特色對解決懷孕或初為人母的焦慮、孤獨、不安,尤其關鍵。並且,媽媽作為閱聽人,不僅單方從社群網路獲得資訊,也重新掌握日常母職行動,同時期待能藉此獲得更多專家建議。無獨有偶,Price et al.(2018)觀察到,媽媽們藉由社群媒體談論自己的經驗,形成了一種以母親為主體的母體知識(maternal knowing)。

儘管如此,這些透過社群媒體反映母親主體性的研究亦有未盡之處。綜觀之,其雖注意到媽媽閱聽人的參與,但卻幾乎未探討閱聽人如何可能在社群媒體中,既受醫療專家論述所形構之母體/職影響、又另有舉措之協商面向,也就是並未充分呈現:閱聽人集體接收醫療專家論述、使用並再詮釋醫療知識之複雜醫用圖像。另外,社群媒體裡的母體經驗有何特點,如何可能成為知識,甚或發酵為社群力量,又反映什麼樣的社會脈絡、母職型態與醫用協商演變?上述文獻亦未多著墨。綜整上述,閱聽人藉由日常生活參與社群媒體經驗,固然是不可或缺的探討方向(盧嵐蘭,2004),但閱聽人經驗之所以重要,不僅止於經驗的敘說描述,而是這些敘說描述背後,反應了什麼樣的新議題(Ang, 1996)以及新意義。回答這些問題,將是本文貢獻。

參、研究方法

本文採文本分析。誠如夏春祥(1997)指出文本作為載體(agent),文本說明了某種隱藏於社會的特性,也就是說,文本內容的論述,值得被看見與檢視其「為何這麼說」,因為那蘊含了社會性的性別、族群、階級等意義作用。這和傅柯(Foucault, 1979)論點相互輝映,傅柯指出知識與權力是透過論述互為援引建構而成,得以進行檢視知識論述與社會文化結構之間的關係。而文本分析能使事物化為研究對象,考察與分析其社會意義(同上引),依此,文本分析即能協助理解,婦幼社群媒體當中的醫療專家論述(醫療知識傳遞者)與閱聽人(醫療知識接收/使用者),兩者社會位置或詮釋論述,蘊含哪些醫用知識角力與再協商可能。

一、研究對象

本文以臺灣兩個婦幼官方網站為研究對象,資料搜尋工作共從 2020 年 10 月 11 日截止至 2022 年 5 月 12 日。首先是《嬰兒與母親》,其自 1976 年 創刊、穩定發行至今已近 45 年,至今亦設有官方網站,具傳播影響力及代表性。本文資料的主要蒐集來源,為網站中的「懷孕生產二三事討論區」,其精神與陳婷玉(2010)研究雜誌文章時是雷同的,以使兩造的探索成果能有所對話。由於陳婷玉曾探究《嬰兒與母親》雜誌中醫療專家論述如何建構母體/職,本文也輔以專家專欄論述內容進行對照分析,並將呈現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的結果差異。本文以年份作為資料範圍進行蒐集工作,因文本分析會突顯時間意義(夏春祥,1997),文本時間的相近性,可能反映某種「當代」的共同問題。而《嬰兒與母親》討論區資料會隨著年份更迭、覆蓋與取代,是以蒐集之資料年份範圍,最早一筆資料時間點是 2017 年,最新一筆資料時間點則落在 2020 年。

接者是《寶貝家庭》,約於 2003 年經營數位媒體起家,主打「華人最大親子社群」,而數位媒體融合了社群性與媒體性特長(游梓翔,2018),因此,《寶貝家庭》討論區即從 2003 年起開始累積大量貼文,但考量到另一研究對象《嬰兒與母親》資料時間範圍,本文在《寶貝家庭》官網以時間軸「一年內」、「三年內」、「全部」做討論區歸類中,選取「三年內」(2018 年至2020年)資料,並和《嬰兒與母親》資料性質相近的「懷孕話題」為蒐集來源,與《嬰兒與母親》文本內容相互檢視或對應分析。

《嬰兒與母親》為傳統媒體發展出社群媒體,《寶貝家庭》為 Web2.0 社群媒體(朱海成,2019),而根據游梓翔(2018)對社群媒體類型的整理,本文探討二者討論區,定位屬於論壇(forums),即是提供用戶問答、交換經驗想法、延時且公開的虛擬平台;雖兩者非當今更即時交流的社群媒體(如APP),但都具有呈現或反映與傳統媒體研究差異之特徵。除此之外,閱聽人透過社群媒體平台互動過程,能對建立社交關係具明顯貢獻意義(Kurtuluş et al., 2015),雖沒有回應、或回應少於兩則的貼文亦有其意義,但本文關注媽媽網友透過社群媒體同建同享、甚或同學的特性,如何接收或再詮釋醫療專家論述,故資料分析排除了摻雜其中的專家專文、沒有回應、或是回應只有一則之貼文。

二、資料處理

本文為質化研究,質化研究關注經驗背後衍生的社會互動意義,亦呼應文本分析特色。如 Daher et al. (2017)以語脈處境主軸(encounter context themes, ECT),指出人們論說之經驗與意義能觀照其生活世界。因此在編碼及資料分析過程,試圖緊扣媽媽閱聽人語脈裡的性別經驗及處境。首先將大量原始樣本資料語境(encounter)進行組織,從中找出並分類處境(context),再以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登錄至各主軸類目(theme),接著進行主軸編碼(axial coding)。資料呈現上,將以官網名稱首字為標記,如《嬰兒與母親》為「嬰」,2《寶貝家庭》為「寶」。3 考量資料倫理,內文中所提及可辨識之人名(如醫師)保留姓氏,商品、機構等皆以「某」字匿名處理。4

本文編碼過程,借鏡陳婷玉(2010)針對《嬰兒與母親》雜誌的分析作為參照,包括以技術專家主義為取向的醫療論述,以容貌身材管理為取向的醫美論述,及以母體/職處境(例如因孕育產生的壓力、消費、期許等)為取向的生活論述等三類型,並以此為分析基底。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本文以陳婷玉的研究作相互參照進行編碼,但由於本文主要探討社群媒體與閱聽人,相較前者編碼主題多為受抑制的母體,本文編碼主題則多見母體能動性,因此專家與閱聽人論述資料呈現鏡像(mirror)樣態,照映彼時此刻母職仍存在相似問題或處境,亦反映出常民與專家的醫用知識角力。

而即使《嬰兒與母親》與《寶貝家庭》為不同網站,討論區內容類型卻同樣可依醫療論述、醫美論述、生活論述類型編碼,或許體現了閱聽人接收媒體與專家對母體/職論述的系統性規則,同時對規則做出相因應的詮釋可能。那麼,閱聽人媽媽如何因應或詮釋?在反覆和資料對話、精緻化處理,本文提出共能知識(co-empowermental mothering),指出其具知識再轉移及場域演變特點。媽媽閱聽人亦藉以共能知識,實踐「遊走式母職」樣貌,共同學習協作女性/母親/醫療使用者角色,以及一面校正醫療主流論述,另一面也尋求醫療專家協助的多元型態。

² 範例:嬰,網友名,年月日。 3 範例:寶,網友名,年月日。

⁴ 範例:黃某某醫師,某牌維他命,某月子中心。

肆、研究結果

或許社會充斥父權文化凝視,使女性容易因性別位置遭受抑制,難以發聲,但也因此,女性在社會中實踐「能」(can)具重要意義。如同過去女性身/孕體往往被客體化,但 Young(2005)藉由懷孕歷程再詮釋女性經驗。她認為懷孕特殊歷程不只有使女性噤聲,或成為異化客體面向,更可以藉孕體發聲,能感受自己高漲性慾,能直面女性作為「我」的需求主體,懷孕能使女性進入「我」與「為母」的雙重位置(double positionality)。

而倘若母職是一種勞動或工作(Hays, 1996),女性意識自身感知更是重 要。如 Acker(1990)以勞動(work)研究視角,指出勞動結構裡並非性別 中立,性別中立的預設立場,可能使人的本質在「工作」概念下「去肉身化」 (disembodied), 5也就是人的異質或需求被同質化,其蘊含個人身體與經驗 的肉身化(embodied)被抹去。如此可見,母體感受除生理性,亦富含因性 別所經驗的社會性影響,女性們也可能在「母親」角色想像中,受媒體形構 或專家論述而去肉身化,其個人肉身經驗無法伸張。然而,本文發現在看似 鋪天蓋地的醫療專家論述裡,社群媒體平台作為節點(node),反倒能讓女 性們共同建立關係,共同分享肉身經驗,像同學那般共同學習實踐「母親」 角色,體現「能夠」(can)與「賦能」(empowerment)意義,突顯母親面對 醫療同質論述的異質策略。其中,「能夠」反映社群媒體提供閱聽人發聲特 性,「賦能」則體現媽媽集體知識與策略,交織成為合作者(collaborators), 以紮根姿態連結或體現彼此所需(Rappaport, 1987)。她們所共構之為母經 驗,得以推展成為母體知識的能量,本文稱之為共能知識:具媽媽閱聽人製 告主體意識共同覺醒、主體相互賦能,以自身詮釋後再和科學知識相互協助 的多重意義。

關於醫療,人們相信科學,但也離不開社會,因此張珣(2008)指出人們要人(醫療專家)也要神(民俗信仰),本文認為在當代人們更要網友:

⁵ 在本文中,embodied 翻譯為「肉身化」,disembodied 將翻譯為「去肉身化」,係為一組相應詞彙。 學界有人將 embodied 翻譯為「具身化」、「體現」等,強調身體如何作為性別實作的載體與場域, 讓性/別論述或價值在生活經驗中彰顯,人們亦可能依著肉身經驗對結構產出能動策略意涵。 如 McDowell & Court (1994) 注意到人們日常勞動的服務內容,是藉由身體與場域共同展演出 社會建構性別差異的實踐;又如 Malmström (2012) 亦曾針對 embodied 做出定義,包括這是主 體的生活經驗詮釋(lived experiences)、感官、肉身與能動性(senses, body and agency)之連動 等。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楊幸真(2010)曾對 embodied 翻譯為「肉身化」進行說明, 即是身體是具體的存在,這種存在是各式性別論述之化身。據此,本文認為 embodied 不僅有「具 現」、「體現」意涵,更包含了社會建構之(性別)價值如何銘刻於身體,而主體又如何藉由日 常的肉身經驗社會意義,來反映某種社會運作機制,或實踐特有協商策略。

在當今人們密切使用社群媒體脈絡下,需要和自己有相似經驗或社會角色的閱聽人,像同學那般一起學習實踐社會期待或責任意義。接下來本文以共能知識進行分析。第一節「一起同學當媽媽」,資料分析從生活論述而來,包含兩個部分的討論。主標題中的「一起同學當媽媽」便由此摘錄,突顯母職實踐中女性主體特性「一起」、「同學」等,而後者更有名詞與動詞的雙層意涵。此處重點為共能知識如何具體彰顯、又如何於社群中運作?本節發現有二:(1)共能知識具知識再轉移特性。(2)共能知識呈現了場域轉移演變。第二節「共能知識的母職多元樣貌」,資料分析從醫療論述與醫美論述等類型而來,並分兩小節討論。第一節探討共能知識如何對醫療知識再詮釋,體現女性實踐「遊走式母職」(pick-and-choose motherhood)行動。第二節討論遊走式母職兩項實作方式:「協作」與「校正」,如何和社群平台價值相互襯映,又可能呈現什麼樣的醫用光譜。

一、一起同學當媽媽

(一) 知識再轉移:說出受擠壓的女性主體

在婦幼媒體場域,往往能見到醫療專家論述建構著知識典範。今日的《嬰兒與母親》官方網站一如十年前的雜誌,從生活起居至孕期各種症狀處理,無所不包的專家論述依然「關懷」媽媽,「關心」母職(陳婷玉,2010)。

以孕吐為例。孕吐是許多孕婦共通經驗,既常見又原因不明(unknown)之懷孕徵候,輕重程度皆不同(Almond et al., 2016),也是常見醫療專家衛教題材。例如〈孕媽咪切莫輕忽孕吐〉,便對嚴重孕吐提供醫療建議如:

……事實上,很嚴重的惡性孕吐,容易有代謝失調及電解質不平衡、體重減輕等症狀,若吐到無法進食,甚至靜脈給予葡萄糖及B群皆無效時,就必須接受鼻胃管灌食治療來補充營養。……過度孕吐除了有電解質不平衡、膽沙、腦病變的異常之外,胎兒也可能有雙胎、葡萄胎及胎水腫的異常現象,必須要詳細檢查,及早治療(嬰,尹長生,2017年2月6日)。

或許專家論述承載之專家主義技術,包括以孩子為中心的言語擠壓母親 身體,又或透過醫學語言將產婦視為病人,使得母親主體性抗爭節節敗退(吳

嘉苓,2000;陳婷玉,2010)。而在《嬰兒與母親》網站多見以醫療角度提 供孕婦自我評估專文,當準/媽媽們閱讀及自我評估過程,或許有所收穫, 但亦可能受專家病理論述影響,加劇對母體病變或胎兒異常焦慮。

然而,孕叶是動態、具異質性的懷孕經驗,基於社群媒體同建同享特性, 媽媽閱聽人們所製造之共能知識,使「嚴重孕叶」應對與思考方式,能從科 學知識同質化論就,再次轉移同中有異的母體,一起同學多元解決策略。例 如有位媽媽發文〈懷孕初期孕叶好煩人啊〉:

上個月某天吃飯的時候突然很想吐,檢查後才發現是懷孕 了 ~~~~ 求了很久終於懷上了,但是最近就是一個瘋狂吐,吃甚麼 吐什麼,老公非常擔心但是我又沒辦法控制,有時候只要一想到食 物的書面也會非常想吐,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緩解秘方啊(嬰,姵彦, 2020年5月7日)?

社群媒體是型塑母職和自我意識的親密管道(Lupton, 2017),她們置身 不明原因的孕叶歷程,一起在這虛擬平台裡,同學實踐「準」媽媽身分認同 與生活策略,從中反覆正視母體感受經驗,達成主體意識覺醒與賦能。這重 要之處在於「恢復肉身化」,她們同樣進入「母親」角色,有相似血肉經驗 與處境,卻有不同應對母體難題的知識,形成有別專家論述的另類實作方法, 進而和醫療專家主流論述區隔,使知識生成具解決切身情形功能。應對嚴重 孕叶方法如:

有空就多出去走走散散步,聽聽音樂讓自己放鬆,吃東西吃冷 一點的比較可以減少孕吐(穎穎,2020年5月26日)。

試者吃冷食,食物味道沒那麼重也就不會那麼容易想吐 (Adam, 2020年5月26日)。

我在懷孕初期也是吃什麼吐什麼,但是我就是特別愛吃水餃, 可以去找一些讓自己吃起來不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的食物,讓自 己少量多餐在床邊放一點小餅乾之類的不讓自己空腹也會減少孕吐 喔 (Susan, 2020年5月26日)。

在過往醫病關係裡,醫療使用者經驗自述不被認為是知識,有科學根據

的醫療效果才是知識源頭;但在醫用關係中,醫療使用者在經歷社會所產生的個人知識,使他們可能有所協商空間(成令方,2002)。延伸論之,或許在醫療科學領域,抽象又無根據事物難以稱為知識;但閱聽人彼此依經驗「對症下藥」,這卻是具體又實用的知識。因為相較於專家論述多以學理角度診斷,共能知識以日常生活出發,使知識和處境產生交互意義,閱聽人能先使用和自身狀況接近的建議,應對艱辛孕程。然而,我們仍不能否認專家知識協助的重要性,且在現實生活具影響力。就像有媽媽分享自身經驗,後又提及諮詢專家建議:

如果真的什麼都吃不下的話就盡量去喝舒跑之類的可以補充養分,再去詢問醫生有沒有可以補充養分或是緩解的辦法(林小珍, 2020年5月26日)。

但其中幽微之處在於,回文者並非直接建議詢問醫療專家,或是轉貼專家論述文章,而是以個人經驗作為知識率先分享,這正體現了社群媒體特殊性:媒介訊息的接收過程不是如實質物體般,能夠將訊息原封不動地從腦袋傳輸到另一個腦袋,而是唯有當訊息對生活產生意義時,才能理解訊息帶來的影響(Dervin, 2003),這即和傳統媒體(雜誌)單一建構科學知識、剝奪主體語言的情形(陳婷玉,2010),有明顯不同。尤其婦幼社群媒體充滿醫療論述與母職想像,但媽媽閱聽人互動基礎,也不只於解決孕期不適,更是實踐母親角色與身分認同的行動。如同這位媽媽已於現實生活看診取藥,但仍繼續發文〈孕叶的厭世感〉詮釋自身狀況:

只是想抒發而已。孕吐無解,我知道,醫生也有開止吐藥給我,但我覺得吃止吐藥多少都會影響胎兒,因此努力的忍著,非到必要就不會吃藥。但孕吐真的好厭世啊!本來懷孕開心的不得了,但從孕吐開始的那一刻,我覺得人生好辛苦啊!不過爲了寶寶我還是得忍耐,我覺得這種不適感真的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有的體會(寶,girafee03,2020年1月29日)。

即便使用醫療藥物,仍無法緩解嚴重孕吐問題,並非醫療藥物無效,而是因其「辛苦」亦有社會性因素。包括擔心「吃止吐藥影響胎兒」、「得忍耐」或「只有經歷過才有體會」等論述,體現母親角色在社會文化中,容易面臨為了孩子而抑制自我的異化處境。因此,除使用科學知識或藥物技術解決徵

候,其處境如何被理解亦是重點。於是,她們一方面接收或使用醫療知識治療母/孕體「病理」問題,另一方面也經歷因孕育變化延伸的生活策略,共能知識將專家與閱聽人各自立場橋接。意即,她們使用專家知識,但也能將知識的製造與使用權再轉移至母體,實踐主體/母職認同,或協調其拉扯:

真的,尤其是自己以前爱吃的東西看到想吐,不能吃的感覺更哀傷,空氣味道不對也不行 OO (mma Hs, 2020年1月30日)。

我目前是七週多,也是吐到一個不行,吐完又好餓,但又沒胃口,真的會厭世,但是比起備孕時的失落,這些我都可以忍,我喝氣泡水可以稍微壓下來一點,可以試試唷(uka.C,2020年2月2日)!

辛苦了,有喜歡吃能吃的東西就多吃點,正面想著寶寶非常健康的在成長,只是有點調皮,撐過10個月就能見到寶寶了 (inbb, 2020年2月3日)。

轉移注意力 或不要一直去想吐這件事 <-- 説出這些話的人都超級沒有同理心 (ina "佩, 2020 年 2 月 4 日)。

是以,有別於千篇一律病理論述,共能知識解決母體看似同質卻也異質之問題,如同樣是嚴重孕吐徵候,卻有不同解決生理之道,及緩解母職與社會文化磨合的功能。如此肉身化知識,掙脫過往隱身於專家論述裡模糊或單一客體化形象,回文互動過程使主體意識更為清晰,重拾母體話語權身體感受。這或許再次說明,社群媒體環境提供閱聽人相互理解,及具製造有意義訊息的獨特性(Ang, 1996)。使得母親為主體製造之共能知識,讓專家論述在社群媒體的指導權威,產生鬆動可能性。

(二) 照料場域演變:媽媽網友們的社群支持

技術專家主義宰制的母職論述,不僅涵蓋懷孕病症指標面向,也包括社會文化中懷孕禁忌與照料迷思。陳婷玉(2010)曾指出,婦幼雜誌傾向請專家用醫療科學視角論說,破解懷孕禁忌或照料迷思,但她認為這僅是從父權

宰制或常民文化知識,轉移到科學醫療知識的照料迷思。那麼,當雜誌轉化 為閱聽人可高度參與的社群媒體,共能知識如何使懷孕禁忌、照料迷思產生 質變,影響日常為母實踐?

以孕婦按摩迷思為例。在《嬰兒與母親》即有篇〈孕婦可以按摩嗎?專家教妳把握3大原則不踩雷〉專欄文章,各採訪芳療師與中醫師討論孕婦能否按摩。當今婦幼社群媒體,已非僅呈現醫學知識取向,「常民文化知識」與「醫療知識」皆可能納入社群媒體編排。但這不代表閱聽人會被引入特定專家迷思治理,或是必須選擇服膺某一方知識權威,來逃離另一方知識權威的馴化。反之,她們可能以共能知識,向既有醫療知識或常民文化知識進行使用協商。有位媽媽以〈懷孕也有按摩的權力〉一文抒發處境:

爲了這件事,我跟婆婆爭執了不少天……她認爲孕婦就是不能按摩,會動胎氣,但我已經是穩定期,也問過醫生說可以,而且我找的按摩店家在媽媽界小有名氣,我兒子就在我肚子,我會不小心嗎! (白眼) 反而是婆婆一直嘰嘰喳喳真的會加重我的躁鬱!孕婦按摩一點都不危險好嗎!危險的是你亂找人亂按,真的是無語問蒼天啊(嬰,愛美麗,2020年4月6日)!

臺灣社會的婆媳代間關係,會因觀點、情感、角色責任有所相異導致衝突,或產生負面情緒(利翠珊,2002),而「動胎氣」作為一種臺灣習俗懷孕禁忌的文化產物(陳婷玉,2010),按摩讓婆媳之間情緒緊張,也反映女性懷孕時,他人如何以孩子健康為名,將管轄女性身體合理化,無形中亦抹去女性肉身化,或否定女性自我理解與渴求。婆婆身為有生育經驗長輩,可能會用一種「過來人」專家視角論述按摩禁忌,當媽媽不願接受傳統常民文化知識,以現代醫療科學為中心的專家論述,則成為媽媽策略性使用的有利盟友。只是,孕婦按摩仍多被視為非嚴謹科學的常民療法,無論是婆婆論述或專家論述,皆無法真正回應媽媽所需。兩者「專家」分別以「現代」醫療科學與「傳統」常民文化面向知識,雙重壓縮懷孕女性話語或行動權。

媽媽雖將醫師論述作為面對婆婆的後盾,亦非全盤接收醫療專家建議, 也不願意接受「動胎氣」文化論述,她仍選擇自己渴望的民間孕婦按摩。事 實上,「我找的按摩店家在媽媽界小有名氣」即已透露當代媽媽上網使用知 識做功課為常態,及採納其他媽媽使用後推薦的按摩店為行動底氣,這皆彰 顯以社群媒體製造共能知識的賦能特點。因此,當媽媽揭露孕婦渴望按摩困 境,再詮釋「孕婦按摩一點都不危險好不好,危險的是你亂找人亂按」母體語境,可能突破既有醫學知識或常民文化治理,也拓邊母體言說。如媽媽網友們接連回覆:「每個長輩都是會這樣的~擔心的比較多!」(形 MAMA,2020年4月11日)、「辛苦了~老一輩的人真的不好溝通 >"<」(萱,2020年4月16日)等支持安慰,或是同樣欲嘗試孕婦按摩如:「想知道+1 你婆婆也是擔心啦…老人家都會這樣」(心心,2020年4月10日)、「想知道你去哪按,我最近也想放鬆一下,之前找過一家都是用摸的根本沒按」(小萌萌,2020年4月8日)等論說,間接支撐母體論述正當性,進而找回她們作為母親與自我的主體協商可能。

共能知識亦反映母體照料與支持,已從傳統社會網絡,擴散至社群媒體網絡,進行非正式支持系統的場域演變。在臺灣社會文化與母職實踐歷程,非正式系統一向是母親角色的重要支持,無論是年輕世代(20到35歲)或中世代(35歲到50歲左右),娘家、婆家等支持皆為影響女性實踐母職策略之關鍵(潘淑滿,2005),但工業化時代後,臺灣父系家庭的分家系統或家務分工也有所轉變(林津如,2007),女性未必會再和婆家同住,支持需求也從中改變。而相較於過往仰賴醫療專家、血緣、親緣或鄰里的育兒知識,以及實質母體照料支持,她們則以更廣大的網路文化經驗,轉移至向網友尋求建議,跨越既有社會資本與空間限制,也跨越醫療專家與代間差異的文化論述,實踐新世紀女性的相互支持與應用,進而改變日常的母體照料行動。

其中,共能知識亦有新自由主義運作軌跡,使傳統社會網絡照料,外包至月子中心。新自由主義模式邏輯特點之一,在於個人能透過和資本市場交易,使效益有最大化的可能(Harvey, 2005),若放在共能知識脈絡下,促使母親與資本主義市場交易效益最大化驅力,或許正源自她們所論述之主體需求,往往在醫療與文化知識的雙重擠壓中消失。例如產後想吃喜愛口味,可能招來醫療論述檢視營養成分,或是傳統文化論述質疑不夠滋補。然而,透過社群媒體,共能知識使她們分享消費經驗驅動照料自我行動,選擇提供融合醫療與文化技術的「月子餐」。雖然消費意識可能簡化母職實作的矛盾(陳婷玉,2010),但共能知識卻有機會使資本家看見母體需求,讓非正式支持系統有所多選擇管道:

……第一胎就讓婆婆幫我坐了月子,雖然婆婆也對我很好很用 心,但坐月子真的就很累會覺得很想要休息,婆婆就是有他覺得要 遵循的古法,讓我有時候真的很疲倦。然後月中的訪客制度我也比較有管控,長輩一個禮拜只能來一次,但又可以抱到孫子他們就不會抱怨,哈哈。月子餐我覺得她們家的還蠻不錯吃的,而且有兩家可以自己換,我剛開始是某家,現在就有改吃某家,兩家口味我覺得都還不錯,但可以變換個口味也還不錯,剛退房趁記憶猶新的時候趕快來分享,免得生完記憶力真的好差 XD(實,天意人,2019年6月17日)。

這篇〈住到覺得很素喜的月子中心〉分享,引起閱聽人們實踐為媳/為母/為我的角色共鳴:「真的建議如果是長輩幫忙做月子,一定要觀念很相同的,不然真的會累到自己」(熱拿鐵,2019年6月18日)、「感謝分享~看起來真的不錯耶!目前有在找月子中心,等等來預約,希望生完可以好好休息」(蘇人生媛,2019年6月17日)。換言之,她們渴望符合個人自由意識選擇,於是母親主體意識、社群網路文化與新自由主義市場,此刻相互召喚,互利共生。雖然,共能知識可能仍鞏固甚或服膺資本主義市場,卻也協助她們跳脫選擇醫療科學論述,或常民文化論述等二分方案,賦予她們某種自主自擇能動性,重新掌握母體感知與論述權力。婆家、娘家、親友等傳統非正式支持系統仍重要,但共能知識使個人選擇得以有所正當性,豐富支持系統管道,同時反映當代母體需求,以及複雜化資本主義市場和媽媽閱聽人的關係。

媽媽們藉由社群媒體談論形成了一種主體性的母體知識(maternal knowing)(Price et al., 2018),而母體經驗之所以能發酵成知識,即奠定於共同賦能,血肉經驗得以被論證成為知識。過往媽媽閱聽人多為專家論述的知識接收者,至今則為參與並製造知識的行動者,隱喻了多重身分認同:她們作為孩子(或社會價值想像中)的母親,醫療系統的常民,以及媽媽界的同學與專家,在線上與線下世界穿梭實作,而遊走式母職也於此生長。

二、共能知識的多元母職樣貌

傅柯認為所謂權力或壓迫,並非簡單地來自某個政權或政府,而是藉由權力與知識結合後,如同血液般流遍整個社會組織(梁其姿,1986)。而無論是從陳婷玉(2010)所見《嬰兒與母親》紙本雜誌,或是現今社群媒體型

態,皆充斥推銷媽媽生活態度的消費意識,包括醫療專家推薦需補充維他命、 自費檢查項目等,媒體刊載與專家論述共塑意識形態,間接告訴母職義務, 母親在其中也被成為消費者(同上引)。

只是,如前述所提,共能知識使得閱聽人和新自由主義市場共謀,得以獲得多元支持管道,媽媽閱聽人亦成為和專家論述協商的行動者。在此脈絡下,廣告方與專家論述結合之知識,也可能不再獨霸一方。接下來從共能知識發展出的女性行動模型:「遊走式母職」進行討論,並分析遊走式母職中其他實作方式,包括「校正」與「協作」方式。這兩方式皆奠基於遊走式母職特性,只是側重的實作面向有所不同:協作方式是肯認或過濾檯面上的專家知識技術,校正方式則具化解檯面下母體心照不宣隱憂的功能。這將體現新世紀女性可以更自由參與消費、實踐自我,又透露她們亦需要新時代的「專家」協助。

(一) 遊走式母職

婦幼雜誌裡常見專家學者們忠告生育風險,女性們做母親的知識受貶抑,而專家權威晉升(陳婷玉,2010),那麼,社群媒體裡的共能知識如何參與技術專家統治(technocratic)?從《嬰兒與母親》官網可見,首頁精選是專家學者育兒文章,右側欄位是駐站醫師專欄連結,婦幼社群媒體仍視醫療專家論述不可或缺,但也不再奉為圭臬。因為使用婦幼社群媒體的媽媽閱聽人,能以線下看診經驗進行線上點評,共同檢視醫療專家有無論述實作合一。《嬰兒與母親》公布「2020年度搜尋好醫師」排行榜(圖1),即是開放媽媽們票選結果,主要推薦原因在於醫術精良與專業用心兩大面向。

事實上,社群媒體需提供閱聽人製造訊息、討論分享空間,已是心照不宣的必備功能。尤其社群媒體給予網路使用者相似權力作用背景,傳播方與閱聽人能從中相互製造各式活動,彼此說服,使得傳播方與閱聽人具有心理調和現象(psychological attunement),即是資訊的說服力需要傳播方和閱聽人心理感受一致(Dubois et al., 2016)。因此,假使《嬰兒與母親》不舉辦投票,媽媽們可能仍會透過討論區評鑑專家,在社群媒體裡質疑知識、服從知識或共創知識,藉以遊走於專家論述與機構,她們成為肯認專家說服力的關鍵者。



圖 1:《嬰兒與母親》官方網站好醫師排行榜前六名

資料來源:https://www.mababy.com/doctors/

她們藉以共能知識實踐醫療使用者身分,在社群媒體遊走各方醫院診所,進行線上集體逛醫師行動,交流什麼樣的醫療機構、醫療人員、或醫療知識值得被選擇使用,這即是「遊走式母職」特性。就像張苙雲(1998)指出求醫過程並非病人單方面而成,而是病人與醫療系統互動的結果,若病人沒有獲得足夠訊息或解決問題,會呈現「逛醫師」行動來回應醫療體系。若借用吳嘉苓(2000)批判醫療體系視產婦為「病人」觀點來看,新世紀的女性將挑戰「病人」被動形象。有位準媽媽發文〈怎麼選擇產檢&生產的醫院跟診所呢?〉,疑惑是否在住家附近診所產檢,生產前再轉去大醫院即可?從媽媽閱聽人們回覆,可見遊走式母職策略:

我是上網看離家比較近的婦產科,看哪一家我比較喜歡跟評價 比較好的醫生,之後產檢到接生都是同一位醫生唷(小鋼板,2019 年7月20日)! 找離家近又有好評的婦產科醫院,從產檢到接生都在同一個地方,也不用再多花時間適應醫院環境(Cathy 凱西,2019年7月22日)。

我自己選擇的是離家近,評價好,醫生緣。畢竟到後期每個禮 拜都要去一次~太遠的話 真的很不方便(小米蛋,2019年11月 30日)!

如果不放心,直接找大醫院就可以了,在那產檢也在那生。初期可以看跟哪個醫生比較有緣,心情很重要。在產檢地方生你會安心一點,醫生也比較知道你的情況。初期頻率比較高,到了中期12周後就一個月產檢一次,聽說37周後就一星期或兩星期一次(NEWRED,2020年6月23日)。

媽媽們遊走各式網站,瀏覽相關網友評價留言,跨越空間與生理限制,進行另類集體逛醫院、逛醫師行動,亦能緩解個人實地造訪心力。而線上逛醫師方式,也可能轉換成線下的醫用關係行動。醫療使用者的線上經驗,對線下醫療實務有重要影響(Peng et al., 2019),是以,社群媒體提供閱聽人們親密感與同理心,建立溝通與共感關係,能使網路使用者改變對既有事物的看法(Coleman, 2005),醫療專家也可能因受網路評價影響,在真實生活中進行反思;媽媽亦未必須實地經驗醫用關係磨合,而是可借助其他閱聽人所累積經驗與處境知識,隨著滑動社群媒體推薦或分享,來決定是否值得「逛逛看」。

媽媽閱聽人們透過分享實踐醫用者身分,其肉身化知識於社群空間擴展,成為預備生育女性們,皆可依自身情況參考的醫用先備知識。過往受傳統媒體限制下,母職雜誌鮮少傾聽女性主觀經驗,醫療專家論述則從中籠罩、馴化身為母親的女性(陳婷玉,2010),但在當今社群媒體中,她們以共能知識遊走網路空間,線上和醫療專家(或機構)論述協商。也因此,遊走式母職能集合醫病關係與醫用關係的理想,不僅靠近 Szasz & Hollender (1956)提出「相互參與模式」的具體想望,透過閱聽人們藉由網路媒體評價互動,讓醫療專家與使用者如合作夥伴關係,又體現成令方(2002)所提的醫用關係特點,包括呈現了女性在實踐母親/醫用者多重身分過程,從不容易被醫

療體系視為知識的邊緣位置(同上引),轉化為製造含有社會意義,並且向醫療體系發出需求聲音的主體多元知識。例如母體支持知識(如離家近、生產環境適應);社會性知識(如規模大和好評價醫院);醫療知識(如理解自身懷孕週數與母體狀況);主體經驗知識(如醫師緣)。

事實上,相較於仍仰賴工具性質(instrumental)與情感性質(affective interaction)的專家知識導向關係(Wu et al., 2018),本文認為,媽媽閱聽人的共能知識,即已具備工具性質及情感性質特性,使她們遊走於醫療專家與醫療使用者知識中,彈性調和個人選擇,共同建立因母親角色而來的關係。如有媽媽以〈預產期快到了,都沒任何產兆〉詢問:

2/11 預產期,原本還在擔心會提早生寶寶或在過年期間蹦出來,結果年都快過完了,卻一點感覺都沒有,家人朋友一直問我生了沒?!我自己也好緊張,倒數2天了,完全沒有任何產兆,好多人說第一胎會提早或男寶寶會提早,我怎麼一點感覺都沒有?好擔心,好希望此刻寶寶就可以快點平安健康出生(嬰,芳芳,2019年2月9日)。

產兆直接關係母體與胎兒生命,除透露分娩跡象,亦可能傳達胎兒窘迫或子宮破裂等生理危險訊息。媽媽閱聽人或許已查詢專家專文建議,但仍陷於不安處境。從「希望此刻寶寶快點平安健康出生」言說,可見女性主責胎兒健康、維持優質母體的母職壓力,這擔憂結合生理性與社會性的意義。對此,共能知識提供了工具性與情感性兼具之建議:

醫生確認沒問題,媽媽就別擔心,我有朋友生三個都沒產兆後來用催生藥(Sunny,2019年6月19日)。

只要醫生確認過,沒有胎盤鈣化等等相關醫療問題,就只要靜候產兆出現囉!我個人第一胎也是預產期晚了八天才生,但一切順利,實寶頭好壯壯,所以媽咪不用擔心(Sue,2019年2月12日)。

媽媽閱聽人們論述裡,即含有「沒產兆用催生藥」、「沒有胎盤鈣化相關醫療問題,只要靜候產兆」工具性資訊,以及「媽媽別擔心」、「個人第一胎也是預產期晚了八天才生」情感性經驗,使發文者或是有相同處境的媽媽閱聽人,能像 Lupton(2016)指出那般,可反覆瀏覽網友詳細經驗資訊緩解

焦慮,互相鼓勵安慰,或藉此判斷是否在家等待產兆或提前至醫院。意即, 共能知識使媽媽們得以遊走在「前往尋求醫師」與「安心在家待產」兩端選擇,或綜合評估後再進入醫療體系使用醫療專業,而非單方面受限於婦幼社 群媒體的醫療論述中。

然不可否認,像產兆或生產等直接觸及生命安危的醫療主題,即便閱聽人相互提供工具性與情感性兼具、共同賦能的知識,但媽媽們普遍仍需進入醫療體系、接受醫療行為,過程仍可能又回到醫療專家主導關係。就像媽媽們也建議發文者「要醫師確認沒問題」,這是醫用關係的不轉變,但轉變之處為:在社群媒體與社會網絡變遷下,不僅如 Hardey(1999)所認為,醫療使用者的個人主義和自主性,只會為醫用關係帶來質疑或衝突而已。反之,她們能藉以共能知識準備身心或相關知識策略,具主體意識地進入醫療系統。溝通行動是良好的醫用關係基礎(Namazi et al., 2016),而社群媒體的共能知識,也會是媽媽們在醫療現場的發聲支柱,這是當今醫療人員不得不正視之現象。

此外,共能知識具備重組醫用關係功能。例如有位媽媽因自己是「高齡產婦」,遲疑是否需多加做檢查,而發文〈準備去國泰產檢,羊穿就好還是 羊穿+羊晶?〉,參考媽媽網友們建議後,也分享自己的醫師口袋名單:

喔對,我的醫生是陳某某陳醫生喔,很溫柔很親切的醫生,如果未來有其他媽媽也想找女醫生,我很推陳醫生哩 (tnnt0719,2019年7月4日)!

閱聽人媽媽們遊走醫療專家與醫療使用者論述間,或融合兩者知識價值,再和科學知識相互賦能。遊走式母職使她們自己本身是「求醫」的常民,也是擁有「用醫」的經驗專家,體現在新一波醫用關係裡,醫療專家握有科學技術知識作為主導的不變,以及醫療使用者能夠交換經驗知識,作為協商籌碼的轉變。

因此,有別於 Lupton (2016) 指出媽媽閱聽人雖能製造資訊,但未必會積極貢獻面向,本文認為,從共能知識發展出的遊走式母職,媽媽們能從發問角色轉換為知識貢獻者,這樣的貢獻是動態且相互性質,並體現閱聽人看似鞏固醫療科學權威地位,但其「地位」說服力卻也仰賴閱聽人共能知識協商與肯認。閱聽人是能在生活世界裡尋找意義與理論的建構者(施伯燁,2014),知識亦源於生活世界(Hooks, 1994),Freire (1970) 主張知識應互

為主體,需鬆動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的知識權力位階;而本文認為,社群媒體提供分解固有論述位置的空間,專家學者不再是言語霸權者,閱聽人之間亦能互為主體。同時,每位媽媽閱聽人皆不會永遠是發文者的學生角色,更能成為回饋指引的教師角色,相互製造智識、蒙受益處,也突顯社群平台價值特性,以及大眾使用及專業需求的張力。

(二) 母職實踐與專業需求: 社群平台的價值

1. 協作情形日趨普遍:新世代媽媽閱聽人的共能知識

專家論述往往「建議」女性當一個時尚、美麗孕媽咪,因為變胖不是母親的權力,這只會使媽媽看起來不自制、不美麗、及政治不正確(陳婷玉,2010)。然而,如何成為美麗母親卻也是媽媽們討論重鎮,她們將透過共能知識呈現一種「協作」的方式:一方面實踐美麗母職,另一方面使用醫療知識/技術豐富樣貌。

事實上,美貌神話迷思不僅存在傳統媒體,現代人日常使用的檢索程式亦充滿性別問題。Zou & Schiebinger(2018)即指出 AI 程式科技撰寫過程,其實充滿種族與性別政治,如讓電腦程式辨識穿白紗西方女性圖,解讀文字是「新娘」,但印度新娘圖卻會被解讀成「民族舞蹈」,體現西方霸權與白人中心的種族化權力關係。而本文在 Google 網站檢索「孕婦」,多是粉白背景、纖細四肢捧著大肚,卻露出微笑的孕婦圖像,少有筋疲力盡或各種身形體態的孕婦圖(若有,也是關於妊娠糖尿病警示圖)。在看似客觀、中性的科技檢索,其實呈現科技與社會關係之間的性別政治,而母體置身性別文化、商品價值與專家論述裡,她們也可能不斷審視自我:是否有接近主流母親樣貌的期待?進而從中背負母職使命(the motherhood mandate)和美麗使命(beauty mandate),因為母職和美麗的結合,是母親角色最佳實踐的想像(Sauer-Sargent, 2016),也深化父權體制對女性身體的規訓與控管。

而論壇內也充滿如何成為美麗母親的討論,這或許呼應陳婷玉(2010,頁 65)指出婦幼雜誌透過各種瘦身技術,告訴為母者「必須更奮力地鞭策自己,以得回美麗的身體」,或美貌神話透過誘惑與愉悅的論述實踐,製造女性自動自願執行美貌責任,創造感受寵愛自己的快樂(林芳玫,2005)。但是,媽媽們僅被動式服從專家論述,盲從地跟隨論述所建構的變美技術嗎?

似乎也未必,因為社群媒體使大眾與專家知識角力,已有更為細緻轉變。

在社群媒體裡,閱聽人已非聽從專家論述律令的被動者,而是成為參與專家論述的受邀者。社群媒體特殊性,在於集體思考和創造知識,使網路空間充滿分享的能力與文化(Leadbeater, 1999),因此,即使專家論述以媒體傳播訊息,邀請閱聽人參與這份美麗版圖,但當閱聽人參與後,彼此於社群媒體製造之共能知識,具備協作專家知識或技術的彈性空間。舉例來說,這位媽媽對於埋線或電波拉皮兩者技術感到猶豫,進而發文〈產後雙下巴變好厚 想問電波跟埋線哪個比較推?〉:

已經生完一年了,身材恢復的不錯,但覺得整個臉變圓,鬆到不行,完全沒有一點輪廓的感覺。我其實自己有爬過文做過功課,大家都說如果想立即有感要做埋線,但真心不知道要選哪種線,電波拉皮感覺也厲害……好猶豫,有人做過埋線拉提或兩個都有做過嗎(嬰,我是恬恬不是小甜甜,2020年7月27日)?

對此,其他媽媽們從自身經驗中提取知識,並強調篩選醫師的重要性:

我推埋線拉皮,自己本身也有做,是給某診所的楊某某醫師做的,我的線材是藍鑽魚骨線,拉力比較夠、維持比較久。我除了收掉雙下巴外,也有把微微下垂的嘴邊肉往上收,其實這樣小V臉的線條就有出來了喔~目前做了一年半了,效果還是很好喔(曬夕陽的章魚,2020年9月17日)。

在知名連鎖諮詢後做過電波,覺得當下感覺臉有稍微變小變緊,回家還是感覺不夠==診所說要時間長膠原蛋白,但現在半年了還是無感啊,最近想換一家試試看,朋友推我去東區的診所做,看朋友分享做埋線,真的比較明顯,整個下巴像開美圖軟體,尖非常非常多,臉變超小(小毛,2020年7月28日)。

由此可見遊走式母職協作方式。首先是線上逛醫師、逛醫院,游移選擇 醫美技術,體現實踐「美麗媽媽」行動。接著,雖然在父權文化下,女性容 貌與身體被關注與監控,或仍在醫療專家知識宰制下使用知識,但值得注意 的是,媽媽們也藉由共能知識,協作過濾及篩選專家知識或技術。包括反過 來監視醫師及選擇變美方案,得以產生醫療使用策略,呈現社群媒體提供更 自由使用知識技術的環境。意即,媽媽們作為閱聽人與醫療使用者,她們可 能內化美貌神話迷思,但亦能相互借助社群媒體的共能知識,群策群力地從 專家論述來監督專家,或和專家進行策略性協作,產生更複雜的醫用圖像:

原本都聽朋友說, 餵母奶也是很好瘦身的方法,但小孩已經 6M了,再過一陣子也打算要讓他斷奶,但體重還是遲遲回不到從 前……我是不打算做醫美,想問媽咪們都會用什麼樣的方式瘦身阿 QQ (實,本草一下,2018年5月3日)?

成令方(2002)解釋醫療工作者和醫療使用者皆為多重認同主體,彼此知識交流過程,可能產生權力關係的協商或挑戰。因此,從此串〈餵完母奶還是瘦不回去好痛苦啊...〉討論可見,雖然媽媽閱聽人仍會接收或接受美貌神話論述,但也未必成為醫美技術預設的消費者。在面對已然步入專家論述的變美途徑,她們會發文開啟其他變美方案協作建議:

餵母奶瘦很慢,但還是會瘦(阿棉兒,2018年5月3日)。

少吃含糖食物,多運動(快樂是計較少的人,2018年5月3日)。

我覺得還是先以運動的方式、還有控制自己的飲食爲主,不然可以看減重門診,我之前是因爲體重已經到了輕度肥胖,所以醫生有建議我吃某某(減肥藥)減緩食慾,這個是衛生署核可的藥,我覺得相對比較有保障(好菜,2018年5月4日)。

對此,發文者回覆:「謝謝媽咪們回覆,打算先去找醫生問看看」(本草一下,2018年5月7日)。由此可見媽媽閱聽人們協力形成的複雜醫用圖像,即是和專家論述建構的美貌神話協作/不協作/及再協作。閱聽人的共能知識,是使得看似常民經驗分享,轉化為真正貼近閱聽人生活與需求的在地專家知識,得以和科學背書的專家論述分庭抗禮。這有別於 Asayesh & Sadeghzadeh (2020) 的發現:在網路文化裡的醫用關係,閱聽人不傾向信任或尋求網友提供資訊。因在社群媒體具備相互製造意義脈絡下,閱聽人能讓個人出發的屬己知識,轉化為和他人在特定事件裡,相互影響的共同知識(劉慧雯,2017)。而若延伸「共同知識」,媽媽閱聽人們的共能知識使彼此

共同學習、賦能,得以再詮釋和科學知識呈現調動的協作特質。

也就是說,美貌神話無所不在,可能壓迫女性內化美麗母親理想,但她們既能襯托專家論述,也能共同檢視專家論述,或決定是否使用專家知識與技術,而非單一接收專家知識技術的被動者。包括哪位醫師被媽媽們推薦,哪種專家技術、醫療行為被媽媽們認證效果,哪種變美途徑被媽媽們認為不需和醫療技術協作,卻能和醫療知識再協作,進而共構動態知識光譜。甚或,協作方式亦會因女性的消費階級有所影響,這是未來可繼續探討之處,也是和傳統媒體研究中,女性完全受抑制的單一面向不同之處,因共能知識的協作方式日趨普遍,而呈現閱聽人對醫療技術/知識協商動態軌跡。

2. 校正中尋求專家:修正單一面向指標的「一起同學」

對於女性而言,懷孕使味覺慣習轉變、進食敏感,又同時須顧慮胎兒營養,是她們共同面臨的人生新課題,也是自我與實踐母職初步協商。因此,若進入《嬰兒與母親》官方網站的「試用大隊」。專欄,可見如維他命、葉酸等各式「必須補充」食品無所不在。亦仍如陳婷玉(2010)所指出那般,媒體是廠商肆無忌憚推銷商品的場域,而推銷背後所呈現之意識型態,建構了社會對母職的各種期待與理解。

但不同的是,現在「推薦」已是媽媽閱聽人分享使用為軸心。現代社 群媒體與廣告商業合作雖仍是常態,但事實上,媒體資訊價值已逐漸轉向 閱聽人之間的資源分享,並在過程共創感知及共享有用的訊息(Lee et al., 2014),也和過往傳統媒體呈現「內容幾乎是廠商提供,並無消費者實際使 用經驗或撰文者評估,因而消費者並無法從中獲得太多有用的訊息」(陳婷 玉,2010,頁 68)有所差異。那這會為當今母職實踐帶來哪些不同面向?

共能知識特點之一在於肉身化,而女性憑藉懷孕的生理與社會經驗,她們不會只被動面對社會、市場或知識所建構之母職期待,亦可能運用母體/職實踐主體話語權,重新校準醫療商品市場:這些向媽媽閱聽人推銷的產品,有沒有符合或看見母親主體需求的期待,呈現了一種「校正」方式。

如何校正?接下來以衛生福利部(2018年2月23日)在「孕婦如何吃 出健康」衛教文章指出之「葉酸的重要性」的葉酸為例。在資本主義市場與

^{6 《}嬰兒與母親》試用大隊網址:https://www.mababy.com/fun-tryout-list,查詢日期:2020 年 12 月 27 日。

醫療專家聯手推廣「有助胎兒腦神經發展」、「奠定寶寶健康一生」等知識下,葉酸保健食品五花八門。有位媽媽則以〈懷孕初期該補葉酸嗎?〉為題述說擔憂:

我剛懷第一胎沒多久(一個月左右),因爲是第一次懷孕,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有問過一些有經驗的媽咪,他們建議我前期可以補充葉酸,說是對寶寶生長比較好(似乎還有研究說可以預防心臟病),也有去問過醫師,醫生說適量補充可以,但不要過量,自己還是有一點不太放心~所以想問問大家懷孕會另外補充葉酸嗎(嬰,逃背著他,2018年8月22日)?

令人玩味之處,在於網路上隨處可見醫療專家極力論述葉酸重要性,葉酸功能亦有助胎兒發育,而發文者表明「也有去問過醫師,醫生說適量補充可以」,透露已實際於門診中詢問醫師葉酸食用疑惑,那為何還需要向網友尋求建議?這將體現母體吞食葉酸時,心照不宣的擔憂或困難。就像媽媽們看見發文者對於補充葉酸有所猶豫後,除給予有關補充葉酸優點,更分享吃起來沒藥味又少糖份的葉酸補品:

葉酸平常就可以補充了,他是寶寶神經管發育的重要營養素。 我個人是吃某牌的維他命補充,酸酸甜甜的不會有維他命的藥味。 因爲單一營養素補充吸收度會比較差,而且我本身也容易缺鐵。所 以我覺得吃綜合維他命比較好唷(Lily Chen, 2018年10月5日)。

我吃某牌維他命 (裡面也有葉酸),酸酸甜甜的一點都不像在吃營養品 (Hsun-hsun Lin, 2018年10月3日)。

擔心葉酸蘊含糖量或有藥味,這可能是發文者(或有相似疑慮的準/媽媽)對葉酸遲疑所在。葉酸功能固然對孕婦重要,但這亦是專家論述僅關注葉酸對胎兒成長如何重要,卻容易忽視媽媽主體感知之處。共能知識將專家論述與肉身經驗的斷裂重新銜接,使她們服用營養食品,實踐照料胎兒的母職召喚,也重返關照自身主體感受,校正了食用葉酸的「唯一標準」知識:不僅掌握專家論述的胎兒發育知識,亦點出懷孕後女體改變之需求知識。在使用醫療知識或產品過程,她們針對特定問題困境,藉由彼此揭露自我經歷、相互傾聽往來,使「知識」具揭露弦外之音特性,亦成為發文者行動與決策

的驅力。這在《寶貝家庭》討論區亦可見相關討論,如〈不會吞葉酸怎麼 辦?>:

各位媽咪好:想請問一下,因爲我很不會吞藥,連很小顆的藥 都會因爲巨大的心理障礙而無法順利吞嚥,還是常會不自覺得咬破 咬碎才吞得下去,又聽說懷孕初期要吃葉酸,我想請教各位媽咪有 推薦的葉酸,是可以讓像我這種笨拙吞藥的媽媽服用的嗎(寶,姵 綾,2018年2月26日)?

這時,有媽媽回**覆暫擱保健食品,回歸天然食材的校正建議:「那就多** 補充葉酸多的蔬果,如菠菜、花椰菜、小番茄之類的| (茶兒柚子,2018年 2.月26日)、「恩恩多吃深綠色的蔬菜效果一樣……」(sfen, 2018年2月26 日),而發文者回覆:「謝謝樓上兩位熱心的媽咪 ^^,但是單從食物攝取這 樣足夠嗎……因爲我是個租屋在外的上班族(沒有廚房),每餐都是外食, 有時候三餐的攝取可能無法營養均衡,不知道有沒有粉狀的或是有喝的葉 酸 ?」(姵綾,2018 年 2 月 26 日)。在其生活背景與限制下,發文者仍尋求 推薦葉酸保健食品,其他媽媽見狀則以經驗推薦:

某牌有出葉酸的口嚼錠,檸檬口味,很好入口(明萱,2018 年2月26日)。

可以喝某牌的哦!喝起來像檸檬汽水,我看朋友生了兩胎都是 喝那個,我就跟著喝了,葉酸濃度驗出來很夠~ P.s. 我沒有在賣哦 (樂皮皮, 2018年2月26日)

身為準/媽媽獨有肉身經驗,能校正資本市場或醫療論述中,所沒顧及 到的母親主體感知。共能知識的校正方式,使媽媽們能夠由下而上校正「放 諸四海皆準」的醫療科學知識,達成共同恢復作為女性/母親主體意識,並 和科學知識相互賦能的多重意義,甚或在社群媒體傳遞另一種新的醫療市場 參考。然而,從樂皮皮網友所強調「我沒有在賣哦」言論,我們也必須注意 或延伸思考,在媽媽網友群體裡,也可能潛伏廠商聘請的虛假評論者,或偽 裝成一個真實的使用者(鄭麗珍等人,2019)。本研究雖旨不在過濾或分析 虚假評論者,也不敢斷然指出留好評的媽媽都只是「網軍」,但除了註冊所 提供的個人基本資料外,身為準/媽媽相互理解的肉身經驗與社會處境,亦 是提供其他媽媽網友判斷「真實性」的重要來源。

整體而言,在看似仍籠罩專家主義與消費意識的社群媒體中,媽媽們可以藉由共能知識,揭示或校正醫療專家論述沒關照到的主體隱憂。然而,共能知識也可能夾雜寫手或不實訊息,這是共能知識的限制與風險;但能提供媽媽閱聽人更自由地消費、實踐自我與選擇使用醫療商品/知識,挑戰社會對母職的單一想像,這是共能知識的彈性與生機,亦是新世紀女性使我們看見新一波醫用協商的可能。

伍、結論

本文檢視《嬰兒與母親》官方網站專家專欄,發現即使傳播型態從紙本雜誌轉換為社群媒體,母職圖像仍如陳婷玉 (2010) 研究傳統媒體指出那般,媒體型塑與醫療專家論述內外夾攻,再現試圖馴化或抑制母體。專家論述仍多呈現去肉身化或科學權威大於關懷的知識,及以美貌神話與消費召喚等建構母職/體現象,然而,本文透過《嬰兒與母親》與《寶貝家庭》兩個婦幼官網,分析 2017-2020 年討論區裡的閱聽人互動資料,發現因社群媒體特性,媽媽閱聽人不僅能參與醫療專家論述的母職版圖,亦能重返主體或醫用協商。當媽媽閱聽人們集體言說母體/職特有經驗,共構肉身化知識時,閱聽人與專家論述關係,及使用醫療知識的新層次,已然幽微開展變化。

本文主要有三項發現:

- 一、在閱聽人研究上,媽媽閱聽人藉以社群網路共構的母體知識,具實 踐主體意識共同覺醒,以及對醫療知識的再詮釋,使母體知識和 科學知識重新調和、相互賦能的多重意義,稱之為共能知識(coempowermental knowledge)。
- 二、在媒體傳播演變裡,她們的知識來源與主體性再轉移,反映出臺灣母職非正式支持系統的演變。基於社群媒體提供閱聽人同建同享功能,她們延伸出同學做媽媽特點,一起學習成為母親,呈現從「服從醫療專家知識」到「使用母親主體知識」的知識再轉移,緩解生理性與社會性的苦痛疑慮。場域演變特點則在於,媽媽閱聽人跳脫現代醫療科學或傳統常民文化知識,轉為母體自主自擇的照料支持。例如從親友鄰里為核心的非正式支持系統,轉移至向網友尋求建議,或是以共能知識消費月子中心。親友鄰里仍是重要支持

網絡,但共能知識豐富當代支持管道,也複雜化新自由主義運作邏輯、社群媒體和媽媽閱聽人之間的關係,並反映臺灣母職非正式支持系統演變。

三、社群媒體呈現了新的醫用關係型態,共能知識體現遊走式母職樣貌,其中亦可見協作與校正實作方式。首先,遊走式母職具彈性選擇醫療知識及醫療系統策略。基於社群媒體特性,共能知識兼備工具性質與情感性質,使得媽媽閱聽人挑戰了過往以醫療專家為軸心的模式,並集合醫病關係與醫用關係的理想可能。她們遊走網路選擇醫療知識,透過線上逛醫師、評價醫師等行動,達成線下醫用關係調和策略。遊走式母職反映需要醫療專家協助的不變,但透露醫療使用者有所詮釋與能動的轉變。

接著,遊走式母職的協作方式,具備和醫療知識技術協作/不協作/再協作策略。特別是在醫療專家論述與父權文化聯手打造美麗版圖裡,媽媽們被邀請實踐「美麗母親」理想,但她們能藉由社群媒體交流,協力加盟、不使用或再協作「美貌神話」的醫用動態樣貌。

而校正方式具修正專家唯一指標策略。媽媽閱聽人面對媒體、市場與專家形構的科學資訊,確實可能受召喚購買營養食品,進而回應社會文化對母職要求。但她們集體言說共感與經驗詮釋,揭露醫療專家或資本家所忽略的母體隱憂,進而校正在社群媒體中科學唯論的知識功能。

社群媒體平台價值,提供當代閱聽人新型的自由與賦能,和過往容易成為專家獨霸的論述進行協商、再詮釋與策略性使用,亦不否認仍需專家知識協助。在此脈絡下,新一波的醫用關係隱然萌芽。批判式思考的媒體素養教育是為重要,因為當代閱聽人不僅須辨識假新聞(Stoddard et al., 2021),亦須辨識假知識。然而,知識源於生命經驗,也因此知識與經驗不應產生斷裂,否則知識只是使人異化的技術(Freire, 1970; Hooks, 1994),這亦是閱聽人/醫療使用者產生知識的可貴處。因此,共能知識開展新一波的「醫用關係」,即是使之逐漸轉為「專用關係」:熟知醫療知識的專業者,及以日常活出專業心得的閱聽人互為知識主體。醫療專家須正視、認知閱聽人(大眾)的生命經驗與其價值,以貼近閱聽人的語言闡述知識,避免知識成為異化技術;閱聽人亦須理解醫療專家其專業性,達成多方參照、互用活用的專用關係。這是未來研究可延續之處,因共能知識所開展新一波的「醫(專)」用協商。

日新月盛的社群媒體,成為新世紀女性重要支持場域,共能知識體現媽

媽們如何一起「努力」(try hard)來回實踐母職與自我之間的交鋒,及同學應對對母體/職的生理性需求與社會性隱憂。她們汲取醫療知識樣貌活躍多元,若理解從社群媒體開展的共能知識,或許有助醫療、性別及社會之間更緊密對話與發展。盼本文提供未來「專用關係」延續討論的可能,且當準/媽媽們以網友經驗或社群資訊為依據求診,也非盲目無知,即是共能知識涵蓋之母體肉身感受,以及母職角色意義,使她們有所共鳴能量,進而發展相關面對醫療人員或體系的策略樣貌。而如何辨識其中弦外之音,提供為母者身心適切的專業支持,將是醫療相關學者或工作者,未來可參考與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 成今方(2002)。〈醫「用」關係的知識與權力〉,《台灣社會學》,3:11-71 °
- 朱海成(2019)。《電子商務概論與前瞻(第二版)》。 碁峰。
- 官晨怡(2013)。〈生產中的現代性:科技信仰與科技侷限的競技場〉,《臺灣 人類學刊》,11(1):65-91。
- 利翠珊(2002)。〈婆媳與母女:不同世代女性家庭經驗的觀點差異〉,《女學 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3:179-218。
- 林芳玫(2005)。《權力與美麗:超越浪漫說女性》。九歌。
- 林津如(2007)。〈父系家庭與女性差異認同:中產階級職業婦女家務分工經 驗的跨世代比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8:1-73。
- 吳嘉芩(2000)。〈產科醫師遇上辦信婦女?台灣高剖腹產率論述的性別、知 識與權力〉,何春蕤(編),《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頁 1-38。麥田。
- 江義平、江孟璇、楊婉伶(2019)。〈社群媒體使用行為之構形探究〉,《電子 商務研究》,17(4):247-275。
- 梁其姿(1986)。〈悲觀的懷疑者:米修‧傅柯〉,《當代雜誌》,1(1):18-21 °
- 陳婷玉(2010)。〈當媽媽真好?流行婦幼雜誌的母職再現〉,《女學雜誌:婦 女與性別研究》, 26:33-86。
- 黃道琳(1986)。〈知識與權力的毀解——米修 · 傅柯及其思想〉,《當代雜 誌》,(1):22-33。
- 張苙雲(1998)。〈「逛醫師」的邏輯:求醫歷程的分析〉,《臺灣社會學刊》, 21:59-87 •
- 張 珣(2008)。〈為何要人也要神〉,成令方(編),《醫療與社會共舞》,頁 8-17。群學。
- 施伯燁(2014)。〈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之概念、方法與方法論初探〉,《傳 播研究與實踐》,4(2):207-227。
- 夏春祥(1997)。〈文本分析與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54:141-166。
- 游梓翔(2018)。《社群媒體與口語傳播》。五南。
- 潘淑滿(2005)。〈台灣母職圖像〉,《女學雜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0:41-91 °

- 鄭麗珍、鐘采瑜、陳亮融、黃俊豪(2019)。〈網路論壇寫手之行為分析—— 以 Mobile01 個案探討〉,《數據分析 Journal of Data Analysis》,14(4): 1-24。
- 楊幸真(2010)。〈導論:青少年的性〉,楊幸真(編),《青少年的性:西方研究與在地觀點》,頁 1-17。
- 衛生福利部(修改日:2018年2月23日,發布日:2017年1月13日)。〈孕婦如何吃出健康?〉,《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上網日期:2021年5月1日,取自: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143&pid=6601
- 實貝家庭(2018年2月26日)。〈不會吞葉酸怎麼辦?〉,《BabyHome 實 貝家庭》。上網日期:2022年5月5日,取自 https://forum.babyhome. com.tw/topic/4763071
- _____(2018年5月3日)。〈餵完母奶還是瘦不回去好痛苦啊...〉, 《BabyHome寶貝家庭》。上網日期:2022年5月3日,取自https:// forum.babyhome.com.tw/topic/4776305
- _____(2019年6月17日)。〈住到覺得很素喜的月子中心〉,《BabyHome 寶 貝 家 庭 》。上 網 日 期:2019年6月17日,取 自 https://forum.babyhome.com.tw/topic/4844477
- _____(2020年1月29日)。〈孕吐的厭世感〉,《BabyHome 寶貝家庭》。 上網日期: 2022年5月2日,取自https://forum.babyhome.com.tw/topic/4876983
- 嬰兒與母親(2017年2月6日)。〈孕媽咪切莫輕忽孕吐〉,《嬰兒與母親》。 上網日期:2021年5月2日,取自 https://www.mababy.com/knowledgedetail?id=5480
- _____(2018 年 8 月 22 日)。〈懷孕初期該補葉酸嗎?〉,《嬰兒與母親》。 上網日期: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mababy.com/forumdetail?id=2371
- _____(2019年2月9日)。〈預產期快到了,都沒任何產兆〉,《嬰兒與母親》。 上網日期:2020年11月7日,取自https://www.mababy.com/forumdetail?id=3582
- _____(2019年3月3日)。〈怎麼選擇產檢&生產的醫院跟診所呢?〉,《嬰 兒與母親》。上網日期:2020年12月27日,取自 https://www.mababy. com/forum-detail?id=3655

- ______(2019年7月2日)。〈準備去國泰產檢,羊穿就好還是羊穿+羊晶?〉,《嬰兒與母親》。上網日期:2020年11月5日,取自 https://www.mababy.com/forum-detail?id=4396
 ______(2020年4月6日)。〈懷孕也有按摩的權力〉,《嬰兒與母親》。上網日期:2020年12月27日,取自 https://www.mababy.com/forum-detail?id=7323
 ______(2020年5月7日)。〈懷孕初期孕吐好煩人啊〉,《嬰兒與母親》。上網日期:2020年11月5日,取自 https://www.mababy.com/forum-detail?id=7904
 _____(2020年7月7日)。〈孕婦可以按摩嗎?專家教妳把握3大原則不踩雷〉,《嬰兒與母親》。上網日期:2020年11月1日,取自 https://www.mababy.com/knowledge-detail?id=10265
 ______(2020年7月27日)。〈產後雙下巴變好厚 想問電波跟埋線哪個比較推?〉,《嬰兒與母親》。上網日期:2020年11月5日,取自 https://
- 盧嵐蘭(2004)。〈閱聽人媒介經驗之建構〉,《中國廣告學刊》,9:84-106。

www.mababy.com/forum-detail?id=18580

- 劉慧雯(2017)。〈建構「倫理閱聽人」:試論社群媒體使用者的理論意涵〉, 《新聞學研究》,131:87-125。
- Acker, J. (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s. *Gender & society*, 4(2), 139-158.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90004002002
- Almond, D., Edlund, L., Joffe, M., & Palme, M. (2016). An adaptive significance of morning sickness? Trivers-willard and hyperemesis gravidarum.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21*(2), 167-171. https://doi.org/10.1016/j.ehb.2016.02.001
- Ang, I. (1996). Living room wars: Rethinking media audiences for a postmodern world. Routledge.
- Asayesh, Y., & Sadeghzadeh, K. (2020).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the quality of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 2020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EEM), 1064-1068.
- Barreto, J. E., & Whitehair, C. L. (2017). Social media and web presence for patients and professionals: Evolving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PM&R*, 9, 98-105. https://doi.org/10.1016/j.pmrj.2017.02.012

- Benetoli, A., Chen, T., & Aslani, P. (2018). How patients' use of social media impact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101(3), 439-444. https://doi.org/10.1016/j.pec.2017.08.015
- Brenton, J. (2017). The limits of intensive feeding: Maternal foodwork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39*(6), 863-877. https://doi.org/10.1111/1467-9566.12547
- Bruns, A. (2008).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Peter Lang.
- Chipidza, F. E., Wallwork, R. S., & Stern, T. A. (2015). Impact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Prim Care Companion CNS Disord, 17*(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sychiatrist.com/pcc/delivery/patient-physician-communication/impact-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leman, S. (2005). The lonely citizen: Indirect representation in an age of network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2(2), 197-214. https://doi.org/10.1080/10584600590933197
- Daher, M., Carré, D., Jaramillo, A., Olivares, H., & Tomicic, A. (2017). Experience and mean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conceptual review and a methodological device proposal.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18*(3), 62-85. https://doi.org/10.17169/fqs-18.3.2696
- Dang, B. N., Westbrook, R. A., Njue, S. M., & Giordano, T. P. (2017). Building trust and rapport early in the new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study. *BMC Medical Education*, 17(1), 32. https://doi.org/10.1186/s12909-017-0868-5
- De Beauvoir, S. (2011). The second sex. Vintage.
- Dervin, B. (2003). Communication gaps and inequities: Moving toward a reconceptualization. In B. Dervin, L. Foreman-Wernet & E. Lauterbach (Eds.), Sense-making methodology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renda Dervin (pp. 17-46). Hampton.
- Dubois, D., Rucker, D. D., & Galinsky, A. D. (2016). Dynamics of communicator and audience power: The persuasiveness of competence versus warmth.

-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3, 68-85. https://doi.org/10.1093/jcr/ucw006
- Duymuş, T. M., Karadeniz, H., Şükür, E., Atiç, R., Zehir, S., & Azboy, İ. (2017). Social media and Internet usage of orthopaedic surgeons. *Journal of 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Trauma*, 8, 25-30. https://doi.org/10.1016/j.jcot.2016.10.007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enguin Press.
-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Herder & Herder.
- Guerrina, R. (2001). Equality, difference and motherhood: The case for a feminist analysis of equal rights and maternity legislatio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0, 33-42. https://doi.org/10.1080/095892301300050555
- Hadfield, L., Rudoe, N., & Sanderson-Mann, J. (2007). Motherhood, choice and the British media: A time to reflect. *Gender & Education*, 19(2), 255-263.
- Harbishettar, V., Krishna, K. R., Srinivasa, P., & Gowda, M. (2019). The enigma of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61(4), 776-781. https://doi.org/10.4103/psychiatry.IndianJPsychiatry_96_19
- Hardey, M. (1999). Doctor in the house: The internet as a source of lay health knowledge and the challenge to expertis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1*, 820-835. https://doi.org/10.1111/1467-9566.00185
-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s, S.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rmida, A., & Thurman, N. (2008). A clash of cultures: The integra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within professional journalistic frameworks at British newspaper websites. *Journalism Practice*, 2(3), 343-356.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0802054538
- Hooks, B. (1994). Teaching to transgress. Routledge.
- Kaplan, A. E. (2013). Motherhood and representation: The mother in popular culture and melodrama. Routledge.
- Kurtuluş, S., Özkan, E., & Öztürk, S. (2015). How do social media users in Turkey differ in terms of their use habits and prefer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10(3), 337-364.
- Leadbeater, C. (1999). Living on thin air: The new economy. Viking.

- Lee, M. R., Yen, D. C., & Hsiao, C. Y. (2014). Understanding the perceived community value of Facebook use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5*(5), 350-35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03.018
- Leppänen, S., Westinen, E., & Kytölä, S. (2017). Social media discourse, (dis) identifications and diversities. Routledge.
- Lupton, D. (2016). The use and value of digital media for information about pregnancy and early motherhood: A focus group study.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16(1), 171. Retrieved from: https://bmcpregnancychildbirth. 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84-016-0971-3.
- _____(2017). 'It just gives me a bit of peace of mind': Australian women's use of digital media for pregnancy and early motherhood. *Societies, 7*(3), 25. Retrieved from: http://www.mdpi.com/2075-4698/7/3/25/htm
- Mackenzie, J., & Zhao, S. (2021). Motherhood online: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Context & Networks*, 13, 132-142. https://doi.org/10.1016/j.dcm.2021.100472
- Malmström, M. (2012). Gender, agency, and embodiment theories in relation to space. *Egypte/monde arabe (troisième série)*, *9*, 21-36. https://doi.org/10.4000/ema.2985
- McDowell, L., & Court, G. (1994). Performing work: Bodily representations in merchant bank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 727-750. https://doi.org/10.1068/d120727
- Miller, E. M. (2020). Motherhood stripped. Momosa Publishing.
- Namazi, H., Aramesh, K., & Larijani, B. (2016).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Toward a conceptual re-examination.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and History of Medicine*, 9, 10.
- Newhouse, N., & Blandford, A. (2016). "My Facebook is a bit of a multiple personality at the minute": Social med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new motherhood. Paper presented at NordiCHI 2016: Nordic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Gothenburg,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s://bit.ly/3grnew9
- Orton-Johnson, K. (2017). Mummy blog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hood: "Bad mummies" and their readers. *Social Media + Society, 3*(2), 1-10. https://doi.

- org/10.1177/2056305117707186
- Paulussen, S., & Ugille, P. (2008).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 the newsroom: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s on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5(2), 24-41.
- Peng, Y. X., Yin, P. P., Deng, Z. H., & Wang, R. X. (2019). Patient-Physician interaction and trust in online health community: The role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health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 139.
- Plaza, M. (1982). The mother/the same: Hatred of the mother in psycho analysis. Feminist Issues, 2, 75-99. https://doi.org/10.1007/BF02933967
- Price, S. L., Aston, M., Monaghan, J., Sim, M., Tomblin Murphy, G., Etowa, J., Pickles, M., Hunter, A., & Little, V. (2018). Maternal knowing and social networks: Understanding first-time mothers' search for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social network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8(10), 1552-1563. https://doi.org/10.1177/1049732317748314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010139
- Rappaport, J. (1987). Terms of empowerment/exemplars of prevention: Toward a theory for community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5, 121-148. https://doi.org/10.1007/BF00919275
- Ridd, M., Shaw, A., Lewis, G., & Salisbury, C. (2009). The patient-doctor relationship: A synthesis of the qualitative literature on patients' perspec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29(561), 116-133. https://doi.org/10.3399/bjgp09X420248
- Rohrich, R. J. (2017). So, do you want to be Facebook friends? How social media have changed plastic surgery and medicine forever.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139(4), 1021-1026. https://doi.org/10.1097/PRS.0000000000003188
- Rome, J. M. (2020). Exploring constructions of "good" motherhood on social media: Navigating neoliberal mommy rhetorics and the negative affective entanglements of women's discourses on Pinterest, Facebook, and Instagram.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 Sauer-Sargent, J. S. (2016). Navigating the transition into motherhood: Women's

- experiences of control, emotion, and social ideals (Publication No. 1661).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yne State, Michigan.
- Stoddard, J., Tunstall, J., Walker, L., & Wight, E. (2021). Teaching beyond verifying sources and "fake news": Critical media education to challenge media injustices.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13(2), 55-70. https://doi.org/10.23860/JMLE-2021-13-2-5
- Szasz, T. S., & Hollender, M. H.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The basic models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and History of Medicine*, 97, 585-592.
- Utomo, A. J. (2016). Online sisterhood: Women, income generation, and online social capital in urban Indonesia. In E. Rebecca & J. Raechel (Eds.), *Gender considerations in online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internet use* (pp. 208-227). InstagramI Global.
-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Blackwell.
- Wu, T., Deng, Z., Zhang, N., Buchanan, P. R., Zha, N., & Wang, R. (2018). Seeking and using inten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from doctors in social media: The effect of doctor-consum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115, 106-113. https://doi.org/10.1016/j.ijmedinf.2018.04.009
- Young, I. M. (2005).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ou, J., & Schiebinger, L. (2018). Design AI so that it's fair. Nature, 559, 324-326.

本文引用格式

- 平雨晨 (2022)。〈一起同學當媽媽:婦幼社群閱聽人之醫用協商與共能知識〉, 《傳播研究與實踐》,12 (2): 211-251。http://dx.doi.org/10.53106/222 114112022071202008
- Ping, Y. C. (2022). Mothers stronger together: Co-empowerment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user negotiation in online mothering forum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211-251.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8 [Text in Chinese]

Mothers Stronger Together: Co-Empowerment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User Negotiation in Online Mothering Forums

PING, Yu-Chen

PhD Candidate, PhD Program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in the discourse of motherhood, medical expertise often played a dominant role, possessing the power to construct the image of ideal motherhood. However,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altered the way people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complica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expert opinions and actual mothering practice. This paper employs text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o-empowermental knowledge" shared by the users of two online mothering forum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in terms of audience studies, the mothers in the forums are practicing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nd mutual empowerment by using knowledge they have co-constructed on social media. Second,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media,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of the mothers and their subjectivity have shifted again and again, from oral tradition to media-based knowledge. This shift also illustrated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informal support systems for mothers in Taiwan. Third,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user relationship, women in the new era enjoy more freedom to apply knowledge, to participate in consumption, and to pursue selfre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need help from the experts of the new era. The co-empowermental knowledge will begin a new wave of professional-user negotiation.

Keywords: motherhood, co-empowermental knowledge, social media, audience, professional-user relationship

* E-mail: deersnow1008@gmail.com Received: 2021.10.05; Accepted: 2022.06.19







《傳播研究與實踐》專題論文/論壇徵稿

媒體與戰爭

(2022年11月01日截止)

在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緊張之際,莫斯科當局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無預警地入侵烏克蘭。做為關注這場戰爭的「他者」,八千公里之遙的台灣民眾應該相當有感,我們驚覺到「戰爭離現實生活並不遙遠」。事實上,2021 年 4 月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便曾以雷達圖做為封面,左有中國五星旗、右有美國星條旗,並有軍艦、軍機光點,稱台灣是在美、中大國角力中的風險之地(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2022 年俄、烏戰爭屬於地緣政治的軍事衝突,主要是涉及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典型的混合戰爭。交戰雙方透過傳播媒介進行資訊戰、心理戰、輿論戰與國際宣傳戰。俄、烏衝突可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群媒體戰爭,有國際媒體喻其為 TikTok (抖音) 戰爭。圍繞交戰國民眾及國際社會間所進行的「媒體戰」,有的發生在社群媒體上,有的則是在傳統媒體與社群平台間交叉傳遞。其中不乏移花接木的假訊息、臨演拍攝的假事件,以及梗圖變造的網路迷因等。

處於大國博弈之間,國家的領導人需要更具智慧的戰略思維與軍事理論,在武裝力量外,尋求公共外交、公共關係的策略與作為來避免戰爭的發生,並透過資訊操作與心理作戰等訊息力量,來因應日趨嚴峻的認知作戰。 媒體與戰爭屬於跨際整合的研究領域,參與的學者包括傳播學、軍事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資訊科學、法學、人類學等。

本專題關切戰爭中的媒體與民意、軍事與媒體關係、資訊流通管理、媒體在衝突中的表現、衝突與戰爭訊息的產製與接收,以及媒體視覺化對戰爭文化、圖像與記憶的建構、難民的媒體再現與偏見等。軍事危機處理、軍事謠言澄清與因應、軍事輿論的演算法效應,還有假訊息、網軍、軍事智庫、軍事迷因、運算宣傳對戰爭風險感知的影響等,亦是亟需探索的議題。當然,也歡迎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徑與理論典範,例如,媒介景觀能否做為一種戰略

傳播、演化心理學及論辯批評如何助益政策溝通研究、資料科學方法能對軍事數據分析發揮何等作用。在俄烏戰爭及兩岸認知對抗的促動下,華人傳播學界的驀然回首,能為媒體與戰爭、軍事傳播成就多少知識拼圖?冀盼所有熟悉的及想要熟悉的人一起參與,讓軍事戰略傳播的實務與知識能有所提升。投稿文章可包括但不限於上述舉例,凡觸及本專題構想者,皆歡迎來稿。

本期專題預計於 2023 年出刊。客座主編為世新大學新聞系胡光夏教授,來稿請標明「媒體與戰爭」專題投稿。來稿論文須符合學術論文的寫作要求,須參照相關理論文獻、研究方法,且賦予新的意旨,並經過本刊雙匿名的學術審查程序,詳細體例說明詳見本刊網站。專題徵稿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11 月 1 日。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詢問《傳播研究與實踐》(crpjour@gmail. com)。

《傳播研究與實踐》專題論文/論壇徵稿

民主深化與傳播媒介 (2023年03月01日截止)

當代台灣經歷以及正在體驗的,乃是民主深化過程中的眾多利基與囿限。可以肯定的是,媒體公民已然擁有各式多樣的民主參與機會。舉凡公共議題的思考論辯、社會爭議的論述交鋒,乃至於眾媒介平台所體現、表態(或不表態)的意見,皆共同構築了民主光景的社會常態。然而,民主深化在社會實踐面向的具體倡議為何?民主深化的經營如何避免形式和實質上的倒退?這實乃有待強化思索的問題意識,更是值得持續推動的思想革命。

若民主深化可被視為持續革命的傳播歷程,而媒體與個體得以在此扮演著對話、思辨、翻轉、創新、踰越的關鍵角色,那麼民主深化的物質條件(或困境),本就是一個有待被推敲和反思的開放命題。在此,民主深化所奠基的過去、所造就的現況、所投射的未來,更有賴相關論述豐富其間的討論,並擘劃可能的選項。本期專題「**民主深化與傳播媒介**」便醞釀於斯,且希望藉由這樣的思考脈絡,提供以傳播媒介為核心的觀點和視野。

我們認為,不同於政治學從選舉或政體的建制化界定民主的運作、社會學從集體行為的角度觀察民主社會中的諸多草根現象和在地行動,傳播學可提供更為細緻又系統性的視野,推敲民主如何藉由媒介的實踐性步驟,來彰顯或遮蔽社會的對話與互動。尤其是意義的集結和凝聚,如何逆襲各種慣性的思維,甚或轉化為嶄新的論述方向和社會關懷。

舉例來說,傳播科技歷史演進中的特定媒介機制如何醞釀社會的變遷?文化轉型和價值觀劇烈變動之際,民主深化的寬容性如何透過各種中介式的傳播進程來培養和落實呢?民眾以不介入、低度或過度介入社會事務的方式闡述立場,是否是民主深化會同意和肯認的積極方向?社群媒體崛起以及公民權年齡下修這兩股態勢的互為配搭,如何讓小編治國、梗圖當道等現象被進一步地檢視與反思?公共領域中的審議技巧和言說技藝如何提升?尊重差異和擁抱多元如何倖免淪為虛有其表的政治正確修辭?升學體制與各類評量

方式逐漸多樣化的制度設計,是否得以作為民主深化的可能選項?這些提問,沒有簡化的答案。

基於上述,本期專題特別強調以「問題意識」為籌畫的核心,不明確限定來稿所屬的領域或次領域,主題也不須受限於上述的舉例。凡此得以在研究發想、研究方法、研究發現或反思中觸及本專題構想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皆歡迎來稿。

專題預計於 2023 年出刊,客座主編為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王孝勇特聘教授(hywang2@pu.edu.tw)。來稿請標明「民主深化」專題投稿;論文則須符合學術論文的寫作要求,須參照相關理論文獻、研究方法,並賦予新的意旨,並經過本刊雙匿名的學術審查程序,詳細體例說明詳見本刊網站。專題徵稿截止日期為 2023 年 3 月 1 日。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信詢問《傳播研究與實踐》(crpjour@gmail.com)。

徵稿啟事

《傳播研究與實踐》在 2011 年 1 月出版創刊號,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舍我紀念館共同出版,是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的共同園地;凡是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的研究性論述,均歡迎投稿。每期並針對新聞傳播之關鍵議題,規劃專題,促進學術討論與交流。近日規劃中的主題如:運動傳播、傳播創生、國際傳播、民主深化、平臺治理等跨領域對話,均有賴產、官、學界共同探究,以發現更多引領時代前進的創新洞察與學術/實務建議。

壹、定位與特色

《傳播研究與實踐》主要在提倡世新大學創校以來「學」與「術」並重,以 及二者相互引領的對話精神。本刊之特色與使命如下:

- 一、提供華人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對話平臺;
- 二、鼓勵傳播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之整合性、實證性、反思性、前 瞻性之研究論述:
- 三、促進傳播學門內部不同系所以及與其他學門的知識匯流。

貳、本刊內容

- 一、研究論文: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完整論文(論文長度原則上為 12,000-25,000字為主)投稿,來稿書寫方式必須符合學術論述格式; 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之研究成果將優先刊登。
- 二、專題論文/論壇: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 群共同關切之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撰文,進行理性的、多元 的以及民主的觀念交流。除邀稿外,專題論文亦歡迎各界投稿。專題論 文自3卷2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 三、特邀論文: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各期專題之主題或針對學術研究社 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撰文。
- 四、研究紀要:研究議題重要且具前瞻性,能系統闡述特定領域相關文獻或

最新變動情況,已通過審查但與一般論文偏重不同,以研究紀要刊出。

- 五、典籍再現:不定期選擇對傳播研究社群或實務工作社群具備重大影響的 經典著作,進行跨時空的詮釋和省思。典籍再現自10卷2期起,均依 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 六、口述歷史:不定期刊出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人員或本刊編輯規劃 之口述歷史專題。
- 七、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針對當期專題論文/論壇題旨,邀請專家學者 針對其個人田野經驗,分享反思與實踐之心路歷程。

參、審查制度

- 一、研究論文將送請 2-3 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評審人選由本刊編輯委 員會推薦。
- 二、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 改權。
- 三、審查結果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 (一) 刊登;
 - (二) 修改後刊登;
 - (三) 修改後再審;
 - (四) 退稿;
 - (五) 其他。
- 四、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編輯審查、作者 修改)約花費 3-6 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在以下兩種情 況中,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 (一) 刊登 vs. 退稿;
 - (二) 修改後刊登 vs. 退稿。

肆、來稿須知

一、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網頁之最新論文體例。未提及之處,請自行參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七版撰寫體例。

- 二、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請儲存成「.doc」或「.docx」文件檔,並以「稿件名稱」作為文件檔名,透過本刊線上投稿系統上傳;上傳方式請參考首頁上的「使用說明」。若有疑問,歡迎寫信至本刊詢問,電子郵件: crpjour@gmail.com。
- 三、本刊只刊登原創性論文,凡已於國內外之刊物發表之論文,無論語文異同,請勿投寄;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於會議結束並正式宣讀或發表後,再行投稿;同一稿件,請勿同時投遞多份刊物。一經發現, 本刊即予撤稿。
- 四、「特邀論文」、「口述歷史」、「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文稿將由主編審查,再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 五、來稿屬於「舊稿新投」(如退稿後以相近主題重新投稿),修改幅度應達 二分之一以上,並另提供修改幅度說明供編委會審酌。
- 六、論文一經刊出,致贈當期電子期刊 1 本,與該文 PDF 檔案。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網站之「檔案下載」:

https://jcrp.ciaoyu.com.tw/guidelines/dowloads



傳播研究與實踐訂閱單

如有訂購需求,請逕洽一葉設計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886-2-89147168 傳真專線:+886-2-29100335

服務信箱:andyspos@coolorz.com.tw

訂閱者資料

□ 個人訂購	姓名		電話		傳真		
□機關訂購	機關名稱			-			
	統一編號		電話		傳真		
收件地址				-			
訂閱期數 第	卷	期至第	卷	期,數量	₩	金額	元
郵資每冊 60 ラ	亡,共	冊 金額	元				
總金額	元						

個人訂閱價			圖書館/機關團體訂閱價		
	一期	一年	一期	一年	
新臺幣	\$ 350	\$ 600	\$ 700	\$ 1400	
歐洲	€ 31	€ 58	€ 48	€ 96	
美洲	US\$ 36	US\$ 66	US\$ 56	US\$ 112	
亞太	US\$ 33	US\$ 60	US\$ 53	US\$ 106	

注意事項

- 期刊將在付款後兩個營業天內寄出。
- 價格及建議出版日恕不另行通知可能變更。
- 機構團體是指圖書館、政府機構、公司使用者及公司以個人名義訂購。
- 個人訂戶是指單一個人使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者。

付款方式:銀行匯款

戶名:一葉設計有限公司

銀行:玉山商業銀行-新店分行

代碼:總行代碼:808;分行代碼:0554

帳號:0554940001865

付款後請傳真或回函本訂閱單,即完成訂閱。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 12 卷 第 2 期 2022 年 7 月 Volume 12, Number 2, July 2022 科技部 TSSCI 期刊

出版者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Publisher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期刊地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Add No. 1, Ln. 17,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電話 Tel +886-2-22368225 ext. 83112

期刊網址 Website https://jcrp.ciaoyu.com.tw/

電子信箱 E-mail crpjour@gmail.com

行政編輯 Administrative editor 黃怡婷 HUANG, Yi-Ting

內頁排版 Page layout 一葉設計有限公司 Coolorz Design Co. Ltd

封面設計 Cover design 鐘睦涵 CHUNG, Mu-Han

體例校對 Proofreading 吳亮儀 WU, Liang-Yi

電話 Tel +886-2-89147168 傳真 Fax +886-2-29100335

電子信箱 E-mail andyspos@coolorz.com.tw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2221-1411

Copyright © 2022 b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ll rights reserved.